

# 斯大林全集

## 第九卷



**斯大林全集**

**第九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精裝本定價三萬五千元

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字數 236,000 字

印數 1—30,000 册

書號 1550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依照『斯大林全集』俄文版譯出的。『斯大林全集』俄文版是根據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決定，由聯共（布）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編輯、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四六年開始出版的。

# 目 錄

第九卷說明 .....	一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 .....	三一—三五
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十二月七日報告） .....	三十一—三六
一 幾點預先的說明 .....	三十一
一、黨內發展的矛盾 .....	三十一
二、黨內矛盾的根源 .....	三十一
三 聯共（布）黨內反對派的特點 .....	三十一
三 聯共（布）黨內的意見分歧 .....	三十一
一、社會主義建設的幾個問題 .....	三十一
二、「喘息」的因素 .....	三十一
三、革命的「民族」任務和國際任務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 .....	三十一
目 錄 .....	一

四、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歷史	· 二七
五、目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特別重要的意義	· 三三
六、關於革命的前途	· 三六
七、實際上問題是怎樣的	· 三六
八、關於勝利的機會	· 四〇
九、實際政策上的意見分歧	· 四四
四、工作中的反對派	· 四四
五、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爲什麼稱讚反對派	· 四六
六、反對派聯盟的失敗	· 五三
七、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的實際意義和作用	· 五五
結論(十二月十三日)	· 五九—六三
一、幾點意見	· 五九
一、我們需要的是事實，而不是捏造和誹謗	· 五九
二、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爲什麼稱讚反對派	· 六三
三、錯誤是有各種各樣的	· 六六
四、季諾維也夫所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	· 七二

五、托洛茨基的巫師箴言 .....	壹
六、季諾維也夫像小學生那樣引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 .....	七
七、季諾維也夫所理解的修正主義 .....	六
二 社會主義在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內勝利的問題 .....	六
一、帝國主義時期個別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 .....	六
二、季諾維也夫怎樣「改正」列寧的話 .....	一〇
三 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	一〇
一、反對派的「手腕」和列寧黨的「民族改良主義」 .....	一〇
二、我們正在蘇聯建立並能建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	一三
三、我們和全世界無產者結成聯盟來建設社會主義 .....	一三
四、蛻化問題 .....	一六
四 反對派和黨的統一問題 .....	一六
五 結論 .....	一三
給克謝諾豐托夫的信 .....	一三—一六
在聯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	一三—一六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 .....	一三—一六

給札依采夫同志的信	一四一—一五〇
給連納的工人們	一五二
致斯大林格勒『鬥爭報』的賀電	一五三
在十月鐵路局斯大林鐵路工廠工人大會上的演說(摘要)	一五五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	一五五—一五九
給茨維特柯夫和阿雷坡夫兩同志的信	一六一—一六三
論工農政府問題(答德米特利也夫)	一六四—一七三
給申凱維奇的信	一七三—一七四
在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次全國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一七五—一八二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一七五—一八二
給邱貢諾夫的信	一八三—一八四
論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答楊—斯基)	一八五—一九九
中國革命問題(聯共(布)中央批准的給宣傳員的提綱)	一九一—二〇七
一 中國革命的前途	一九九
二 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	二〇〇
三 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	二〇三

四 反對派的錯誤	二〇四
給『真理報』(紀念創刊十五周年)	二〇九
論中國革命的幾個問題(答馬爾秋林同志)	二二一—二二六
和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二二七—二四一
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答坡克羅夫斯基)	二四二—二五五
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產國際 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會第十次會議上的演說)	二五七—二六三
一 幾個小問題	二七〇
二 農民土地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	二七九
三 屠殺共產黨人的南京右派國民黨及與共產黨人保持聯盟的武漢左派國民黨	二八七
四 論中國工農代表蘇維埃	二九六
五 兩條路綫	三〇六
給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學生們	三〇三
答坡克羅夫斯基	三〇五—三〇六
時事問題簡評	三〇一—三〇五
一 論戰爭的威脅	三〇一



二 關於中國

註釋

年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

二九

三七一—三三四

三三五—三三九

## 第九卷說明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包括斯大林同志自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的著作。

這一個時期，蘇聯的工人和農民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根據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和第十五次代表會議的決定，繼續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奮鬥。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鞏固使帝國主義國家的反蘇鬥爭和國內資本主義成分反社會主義成分的鬥爭急劇地尖銳化了。

當時『正在建立一種從張伯倫到托洛茨基的統一戰綫之類的東西』來反對蘇維埃政權。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上的報告『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中，在對該報告所做的結論中，在聯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和斯大林鐵路工廠工人大會上的演說中，在『時事問題簡評』和其他著作中，斯大林同志捍衛了並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黨是蘇維埃國家基本的指導力量和領導力量的學說，揭穿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集團首領們跟工人階級和布爾什維克黨的事業為敵的『理論』，揭穿了他們在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內的破壞活動。

斯大林同志的這些著作發揮了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及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強調了

社會主義革命的民族任務和國際任務的統一性和不可分割性，確定了黨在蘇聯受到更大的新的軍事進攻威脅情況下的對外政策路綫，規定了加強蘇聯國防力量的任務。

在『論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論工農政府問題』、『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等著作中，發展了列寧關於工農聯盟以及無產階級在這一聯盟中的領導作用的學說，闡明了蘇維埃國家和蘇聯政府的階級性質。

分析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間中國人民的革命民主主義運動和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動力和發展前途的著作在第九卷中佔很大篇幅，這些著作就是『中國革命問題』、『和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等。

本卷第一次發表了斯大林同志給克謝諾豐托夫、札依采夫、申凱維奇、邱贊諾夫、茨維特柯夫和阿雷坡夫、坡克羅夫斯基的書信。

聯共（布）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

#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

載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十日、十九日、  
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真理報」第二八五、第  
二八六、第二九四、第二九五和第二九六各號



# 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十二月七日報告)

## 一 幾點預先的說明

同志們！在講到問題的實質以前，讓我先作幾點說明。

### 一、黨內發展的矛盾

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黨內鬥爭的問題，這個鬥爭不是昨天才開始的，而且現在還沒有停止。

如果考察我們黨自誕生以來，自一九〇三年布爾什維克派形成以來的歷史，並探討我們黨從那時起直到今天的各個階段，那末，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我們黨的歷史就是黨內各種矛盾鬥爭的歷史，就是克服這些矛盾並在克服這些矛盾的基礎上逐漸鞏固我們黨的歷史。也許有人以為俄國人太好吵架，喜歡爭辯，愛鬧意見，所以他們的黨是通過克服黨內矛盾而發展的。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裏問題不在於好吵架。這裏問題在於存在着原則上的意見分歧，這些分歧是在黨的發展的進程中，在無產

階級階級鬥爭的進程中發生的。這裏問題在於：只有爲一定的原則、爲一定的鬥爭目標、爲達到目標的一定的鬥爭方法而鬥爭，才能克服矛盾。在當前政策問題上，在純屬實際性質的問題上，可以而且應該和黨內抱有不同想法的人作各種妥協。但是，如果這些問題和原則上的意見分歧有關，則任何妥協、任何「中間」路綫都無濟於事。在原則性的問題上沒有而且不能有「中間」路綫。應當成爲黨的工作基礎的不是這些原則，便是另一些原則。原則問題上的「中間」路綫是引起思想混亂的「路綫」，是掩飾意見分歧的「路綫」，是使黨在思想上蛻化的「路綫」，是使黨在思想上滅亡的「路綫」。

西方社會民主黨目前是怎樣生活和發展的呢？它們有沒有黨內矛盾，有沒有原則上的意見分歧呢？當然有。它們有沒有在黨員羣衆面前誠懇坦白地揭露這些矛盾並竭力克服這些矛盾呢？沒有，當然沒有！社會民主黨的實踐是要把這些矛盾和分歧掩蓋起來，隱藏起來。社會民主黨的實踐是要把自己的代表會議和代表大會變成空洞的粉飾太平的集會，竭力隱藏和掩飾內部的意見分歧。但是，這除了引起思想混亂並使黨在思想上貧困化外，是什麼也得不到的。這就是過去是革命的而現在是改良主義的西歐社會民主黨墮落的原因之一。

但是，同志們，我們是不能這樣生活和發展的。原則上的「中間」路綫政策不是我們的政策。原則上的「中間」路綫政策是衰頹的和蛻化的黨的政策。這樣的政策不能不使黨變成空忙一陣和脫離工人羣衆的空洞的官僚主義機構。這條道路不是我們的道路。

我們黨過去的一切都證實了這個原理：我們黨的歷史就是克服黨內矛盾並在克服這些矛盾的基

礎上不斷鞏固我們黨的隊伍的歷史。

拿第一個時期，即『火星報』時期，亦即我們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時期來看，當時在我們黨內第一次發生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意見分歧，我們黨的上層終於分裂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布爾什維克（列寧），一部分是孟什維克（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馬爾托夫、查蘇利奇、坡特列索夫）。列寧當時是孤立的。你們要知道，當時對於那些離開了列寧的『了不起的人物』曾發出多少叫喊和呼號！然而鬥爭的實踐和黨的歷史表明，這種意見分歧是有其原則基礎的，這種分歧是真正革命的和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政黨誕生和發展所必經的階段。鬥爭的實踐當時表明：第一、問題不在於量而在於質；第二、問題不在於形式上的統一，而在於統一要有原則基礎。歷史表明列寧是對的，而那些『了不起的人物』是不對的。歷史表明，如果不克服列寧和『了不起的人物』之間的矛盾，我們就不會有真正革命的黨。

拿下一個時期即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夜的時期來看，當時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作為兩個政綱完全不同的營壘，仍然在一個黨內處於互相反對的狀態，當時布爾什維克正處於黨的正式分裂的前夜，他們爲了堅持我們革命的路綫，不得不召開自己的單獨的代表大會（第三次代表大會）。黨的布爾什維克部分當時何以佔了上風，何以博得了黨內多數的同情呢？這是因爲它沒有掩飾原則上的意見分歧，並且用孤立孟什維克的辦法來爲克服這些分歧而鬥爭。

其次，我還可以舉出我們黨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即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以後的時期，亦即一九〇



七年的時期，當時有一部分布爾什維克，即以波格丹諾夫爲首的所謂「召回派」，背棄了布爾什維主義。這是我們黨生活中的一個危急時期。這個時期有許多資格很老的布爾什維克離開了列寧和列寧的黨。孟什維克當時大叫布爾什維克要滅亡。然而布爾什維主義並沒有滅亡，短短一年半的鬥爭實踐表明，列寧和列寧的黨爲克服布爾什維主義隊伍中的矛盾而鬥爭，是正確的。這些矛盾之被克服，並不是由於掩飾了它們，而是由於揭露了它們，由於進行了有利於我黨的鬥爭。

其次，我還可以舉出我黨歷史的第四個時期，即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時期，當時布爾什維克已恢復了幾乎被沙皇反動勢力擊潰的黨並驅逐了取消派。這時，也像以往各個時期一樣，布爾什維克之恢復並鞏固了黨，並不是由於掩飾了和取消派之間的原則上的意見分歧，而是由於揭露了並克服了這些分歧。

再其次，我還可以指出我黨發展的第五個階段，即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時期，當時以布爾什維克黨幾個著名領袖爲首的一部分布爾什維克動搖了，不想舉行十月起義，認爲這是一種冒險。大家知道，布爾什維克之克服這個矛盾，也不是由於掩飾了意見分歧，而是由於爲十月革命進行了公開的鬥爭。鬥爭的實踐表明，如果不克服這些分歧，我們就會使十月革命陷於危急的境地。

最後，我還可以指出此後我們黨內鬥爭發展的各個時期，即布列斯特和約時期，一九二一年（工會問題的爭論）時期以及其他各個時期，這些時期你們都已知道，我在這裏就不多說了。大家知道，在所有這些時期中，也像過去一樣，我們黨是通過克服內部矛盾而成長和鞏固起來的。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什麼呢？

結論就是：聯共（布）是通過克服黨內矛盾而成長和鞏固起來的。

結論就是：以鬥爭來克服黨內意見分歧是我們黨的發展規律。

可能有人會說，這是聯共（布）的規律，而不是其他無產階級政黨的規律。這是不對的。這個規律是一切較大政黨的發展規律，無論蘇聯無產階級政黨或西方無產階級政黨都是一樣。如果在小國中的小黨內可以用某種方法掩飾意見分歧，用一個人或幾個人的威信把意見分歧掩蓋起來，那末在大國中的大黨內，通過克服矛盾而發展，就是黨成長和鞏固所必不可少的因素。過去如此，現在還是如此。

我想在這裏引證和馬克思一起領導西方無產階級政黨達數十年的恩格斯的一段有權威的話。這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事情，當時德國施行反社會主義者特別法<sup>(二)</sup>，馬克思和恩格斯僑居倫敦，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國外秘密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sup>(三)</sup>實際上指導着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工作。伯恩斯坦當時是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他還沒有變成改良主義者），恩格斯常常和他通信討論德國社會民主黨政策中最迫切的問題。下面就是他當時（一八八二年）寫給伯恩斯坦的一段話：

「看來大國的任何工人政黨，只有在內部鬥爭中，只有在完全符合於一般辯證發展規律的情況下，才能發展起來。德國黨是在愛森納赫派和拉薩爾派<sup>(四)</sup>的鬥爭中變成了現在的樣子的，在這個鬥爭中連吵架本身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有被拉薩爾特意象養起來充當其工具的一幫壞蛋沒

落以後，團結才有可能，其實就在那時我們的人去謀取團結也是過於匆忙了。在法國，有些人雖然拋棄了巴枯寧的理論，却繼續運用巴枯寧的鬥爭手段，同時還想爲了自己的特殊目的而犧牲運動的階級性質，這些人也必須先行沒落，然後團結才有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宣傳團結就是十足的愚蠢。道德的說教對於反對目前情況下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是沒有幫助的。」（見『馬克思和恩格斯文庫』第一冊第三二四頁至第三二五頁〔四〕）

在另一個地方（一八八五年）恩格斯說道：

『矛盾絕不能長期掩飾起來，它們是以鬥爭來解決的。』（同上，第三七一頁）

首先必須這樣來解釋我們黨內矛盾的存在並說明我們黨是以鬥爭的方法克服這些矛盾而發展起來的。

## 二、黨內矛盾的根源

可是，這些矛盾和意見分歧從何而來，其根源何在呢？

我想，無產階級黨內矛盾的根源在於兩種情況。

這兩種情況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在階級鬥爭的環境中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對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使用壓力，無產階級中最不穩定的階層和無產階級政黨中最不穩定的分子往往受到這種壓力的影響。不能認爲無產

階級是完全與社會隔離而站在社會之外的。無產階級是社會的一部分，它和社會各種不同的階層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而黨是無產階級的一部分。因此，黨也就不能和資產階級社會中各種不同的階層斷絕聯系並擺脫它們的影響。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對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壓力表現於：資產階級的觀念、風俗、習慣和情緒往往通過某些和資產階級社會有一定聯系的無產階級階層而滲透到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來。

第二、就是工人階級的龐雜性，工人階級內部存在着各種階層。我認爲無產階級作爲一個階級來說可以分爲三個階層。

第一個階層就是無產階級的基本羣衆，它的核心，它的固定部分，就是那些早已和資產階級斷絕聯系的「純血統的」無產者羣衆。這一無產階級階層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可靠的柱石。

第二個階層就是那些不久以前才從非無產階級，即從農民、小市民隊伍、知識分子中分化出來的人。這批出身於其他階級的人，在不久以前才加入無產階級隊伍，並把自己的作風、習慣、猶豫和動搖帶到工人階級中來。這個階層是滋長各種無政府主義派、半無政府主義派和「極左派」的最好的土壤。

最後，第三個階層就是工人貴族，工人階級的上層分子，無產階級中生活最有保障的一部分，他們力求和資產階級妥協，極愛巴結有權有勢的人物，喜歡「出人頭地」。這個階層是滋長露骨的改良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的最好的土壤。

工人階級的這後兩個階層雖然在外表上有所不同，却或多或少是培養一般機會主義的共同園地，在工人貴族的情緒佔上風時，養成公開的機會主義，而在和小資產階級還沒有完全斷絕關係的工人階級半小市民階層的情緒佔上風時，則養成以「左的」詞句掩蓋着的機會主義。「極左的」情緒和公開的機會主義的情緒往往是一致的，——這個事實一點也不奇怪。列寧不止一次地說過，「極左的」反對派是右的、孟什維克的、露骨的機會主義的反對派的另一面。這是完全正確的。如果說「極左派」主張革命僅僅是因為他們盼望革命在明天就勝利，那末很明顯，如果革命一旦受到阻礙，如果革命在明天不能勝利，他們一定會悲觀失望，對革命喪失信心。

自然，每當階級鬥爭發展到轉折點的時候，每當鬥爭尖銳化和困難加重的時候，無產階級各個階層間在觀點、作風和情緒上的差別，必不可免地表現為黨內的某些意見分歧，而資產階級及其思想的壓力必然使這些分歧尖銳化，使這些分歧通過無產階級政黨內部的鬥爭來解決。

這就是黨內矛盾和意見分歧的根源。

能不能避開這些矛盾和意見分歧呢？不，不能。以為能避開這些矛盾，就是欺騙自己。恩格斯說得對：長期掩飾黨內矛盾是不可能的，這些矛盾是以鬥爭來解決的。

這並不是說，黨應當變成一個爭論的俱樂部。相反地，無產階級政黨是而且應當始終是無產階級的戰鬥組織。我僅僅想說，對黨內的意見分歧，如果這些分歧是原則性的，不能把手一揮，把眼一閉，置之不理。我僅僅想說，只有為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路綫而鬥爭，才能使無產階級政黨擺脫資產階級的

壓力和影響。我僅僅想說，只有克服黨內矛盾才能使黨健全和鞏固起來。

## 二 聯共（布）黨內反對派的特點

現在讓我從幾點預先的說明進而談到聯共（布）黨內反對派的問題。

首先，我想指出我們黨內反對派的幾個特點。我指的是它表面上的顯而易見的特點，而暫不涉及意見分歧的實質。我想這些特點可以歸結為三個主要的特點。第一、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是聯合起來的反對派，而不是什麼「簡單的」反對派。第二、反對派竭力以「左的」詞句掩蓋自己的機會主義，以「革命的」口號炫耀自己。第三、反對派由於自己沒有一定的原則，往往抱怨別人不了解他們，反對派的首領們實質上代表着「不被了解的人們」的派別組織。（笑聲）

先從第一個特點談起。反對派在我們這裏是作為聯合起來的反對派，作為過去受過黨的譴責的種種派別的聯盟而出現的，並且它不是怎樣「簡單地」出現，而是在托洛茨基主義領導下出現的，——這一事實用什麼來說明呢？

這要用下面的情況來說明：

第一、結成聯盟的一切派別，不論是托洛茨基派、「新反對派」、「民主集中派」或殘餘或是「工人反對派」或殘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機會主義的派別，它們不是從產生時起就和列寧主義作鬥爭，便

是近來才開始和列寧主義作鬥爭。不用說，這個共同特點一定促使它們結成聯盟來進行反黨鬥爭。

第二、目前這一時期是個轉折時期，這個轉折時期重新直截了當地提出了我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因為這一切派別在某些革命問題上是和我們黨有過意見分歧而且繼續有意見分歧的，所以很自然，在目前這個時期所具有的總結性質，要清算我們的一切意見分歧，一定會推動這一切派別結成一個聯盟，結成一個反對我黨基本路線的聯盟。不用說，這種情況不能不促使各色各樣的反對派別聯合成一個共同的營壘。

第三、一方面是我們黨的強大有力和團結一致，一方面是一切的反對派別的軟弱無力和脫離羣衆，這就不能不使這些派別的分散的反黨鬥爭成爲顯然無望的事情，因此，各反對派別必然要走上把力量聯合起來的道路，以便以各個集團的結合補救它們的弱點，這樣，至少從表面上可以增加反對派成功的機會。

爲什麼領導反對派聯盟的正是托洛茨基主義呢？

第一、因爲托洛茨基主義是我們黨內現有一切反對派別中最完整的機會主義派別（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認定托洛茨基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傾向，這是對的〔七〕）。

第二、因爲在我們黨內沒有一個反對派別能像托洛茨基主義那樣靈活而巧妙地以『左的』和最最革命的詞句掩飾自己的機會主義。（笑聲）

在我黨歷史上，托洛茨基主義領導各種反對派別來反對我們黨，這並不是第一次。我想舉出我黨

歷史上一個人所共知的前例，這是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四年間發生的，當時成立了以托洛茨基爲首的各種反黨的反對派別的聯盟，即所謂八月聯盟。我所以要舉出這個前例，是因為它是目前反對派聯盟的某種原型。當時托洛茨基把取消派（坡特列索夫、馬爾托夫等人）、召回派（「前進報派」）和他自己的集團聯合起來一同反對黨。而現在他又企圖把「工人反對派」、「新反對派」和他自己的集團聯合成一個反對派聯盟了。

大家知道，列寧當時反對八月聯盟歷時三年之久。在八月聯盟形成的前夜，列寧就這樣寫道：

「因此，我們代表全黨聲明：托洛茨基在執行反黨的政策，他在破壞黨的合法性，走上冒險和分裂的道路……托洛茨基對這個不容爭辯的真理所以默不作聲，是由於真理和他的政策的實際目的是不相容的。可是實際目的愈來愈明白，甚至連最沒有遠見的黨員都看得很清楚了。這種實際目的就是坡特列索夫分子和前進報派的反黨聯盟，這個聯盟正由托洛茨基支持和組織起來……這個聯盟當然要支持托洛茨基的「基金」和他所召集的反黨的代表會議，因爲坡特列索夫先生們和前進報派先生們可以從這裏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自己派別組織的自由，使派別組織神聖化，掩蓋它們的活動，在工人面前爲這種活動辯護。」

正是從「原則基礎」上來看，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個聯盟是千真萬確的冒險主義。托洛茨基不敢說他把坡特列索夫和召回派看做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看做社會民主主義原則性的真正維護者。冒險家立場的實質也就在於他不得不經常躲躲閃閃……正是從「原則基礎」上來看，托洛



茨基和坡特列索夫及前進報派的聯盟是一種冒險行爲。從黨的政治任務上來看，這樣說也是對的……中央全會以後一年來的經驗在事實上說明：體現着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這種影響的，正是坡特列索夫集團，正是前進報派的派別組織……最後，第三、托洛茨基的政策是組織上的冒險行爲，因爲，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它破壞了黨的合法性，而且代表一個國外集團（或代表呼聲報派和前進報派這兩個反黨的派別組織的聯盟）召開代表會議，直接走上分裂的道路。」（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七卷第十三、十五、十七、十八各頁）這就是列寧對以托洛茨基爲首的第一個反黨派別聯盟的批判。

對目前還是以托洛茨基爲首的反黨派別聯盟，基本上也必須給以相同的但更加嚴厲的批判。

這就是我們的反對派目前作爲一個聯合起來的反對派出現，並且不是「簡單地」而是在托洛茨基主義領導下出現的原因。

反對派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如此。

現在談談第二個特點。我已經說過，反對派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力圖以「左的」、「革命的」詞句掩蓋自己的機會主義的行爲。我認爲在這裏不必多舉事實去證明在我們反對派的實踐中經常是「革命的」詞句和機會主義的行爲不一致。只要看看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所通過的論反對派的提綱<sup>(2)</sup>，就足以明瞭這套把戲的秘訣。我只想從我們黨的歷史上舉出幾個例子來說明我們黨內的一切反對派別，在取得政權以後的時期中，竭力以「革命的」詞句掩蓋自己的非革命的行爲，不斷「從左

面」批評黨和黨的政策。

例如拿「左派」共產主義者來看，他們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一九一八年）是反對黨的。大家知道，他們「從左面」批評黨，反對布列斯特和約，並認為黨的政策是機會主義的、非無產階級的、對帝國主義者妥協的政策。事實上却是這樣：「左派」共產主義者在反對布列斯特和約時，妨礙了黨獲得「喘息」以組織和鞏固蘇維埃政權，幫助了當時反對布列斯特和約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使帝國主義易於在蘇維埃政權萌芽時就把蘇維埃政權消滅。

拿「工人反對派」（一九二一年）來看。大家知道，「工人反對派」也「從左面」批評黨，百般「攻擊」新經濟政策，把列寧的要恢復工業必先發展供給工業以原料和糧食的農業這一論點「痛罵」得「體無完膚」，「痛罵」列寧這一論點是忘記了無產階級的利益，是一種農民的傾向。事實上却是這樣：如果不實行新經濟政策，如果不發展供給工業以原料和糧食的農業，那我們就不會有任何工業，而無產階級就會喪失階級性。此外，「工人反對派」此後向哪方面發展，向右還是向左，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最後，拿托洛茨基主義來看，它「從左面」批評我們黨已有好幾年了，而且如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所正確指出的，它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傾向。在小資產階級傾向和真正的革命性之間能有什麼共同點呢？「革命的」詞句在這裏不過是小資產階級傾向的掩蓋物，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至於用「左的」叫喊來掩蓋自己做了托洛茨基主義的俘虜的「新反對派」，我就不談了。

這些事實說明什麼呢？

它們說明用「左的」假面具來掩蓋機會主義的行爲，是取得政權以後我們黨內所有一切反對派別的最顯著的特徵之一。

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呢？

這是由於蘇聯無產階級的革命性，由於我國無產階級內部留下來的偉大的革命傳統。這是由於蘇聯工人根本仇視反革命分子和機會主義分子。這是由於我國工人不會輕信露骨的機會主義分子，因此，「革命的」假面具就是反對派用來至少在表面上吸引工人注意並使工人信任他們的釣餌。例如我國工人不能了解爲什麼英國工人直到現在還沒有想到把湯姆斯這樣的叛徒溺死，把他們扔到井裏去。（笑聲）凡是知道我國工人都容易了解，像湯姆斯那樣的人和那樣的機會主義者在蘇聯工人中間簡直是無容身之處的。然而大家知道，英國工人不僅不打算把湯姆斯這幫先生們溺死，而且一再把他們選入總委員會<sup>(註)</sup>，同時不是平平淡淡地選舉他們，而是在選舉時選舉行遊行示威。顯然，對於這樣的工人是用不着以革命的假面具掩蓋機會主義的，因爲他們本來就不反對把機會主義者吸收到自己的隊伍裏去。

這是由於什麼呢？這是由於英國工人缺乏革命的傳統。這種革命的傳統目前正在產生。它們正在產生和發展，而且沒有理由懷疑英國工人正在革命戰鬥中受到鍛鍊。但是當這一點還不具備時，英國工人和蘇聯工人間的差別是依然會存在的。這也就說明了這一事實：我們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如不

戴上某種「革命的」假面具便去接近蘇聯工人，那是很冒險的。

反對派聯盟使用「革命的」假面具的原因就在這裏。

最後，談談反對派的第三個特點。我已經說過，這個特點就是反對派聯盟沒有一定的原則，它沒有原則性，它像變形蟲一樣地善變，因此，反對派首領們經常抱怨「人們不了解」他們，「曲解了」他們，把他們「沒有說過」的話硬加在他們身上等等。這的確確是「不被了解的人們」的派別組織。無產階級政黨的歷史告訴我們，這個特點（「人們不了解！」）是一般機會主義最平常和最普遍的特點。同志們，你們應當知道，在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紀初，德國社會民主黨隊伍中著名的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福爾馬爾、奧艾爾等人的「遭遇」完全與此相同，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是革命的，這些頑固不化的機會主義者曾經在好幾年內抱怨「人們不了解」他們，「曲解了」他們。大家知道，當時德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曾屬伯恩施坦的派別組織是「不被了解的人們」的派別組織。因此，人們把反對派聯盟列入「不被了解的人們」的派別組織一類，這一事實不能認為是偶然的。

反對派聯盟的幾個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如此。

### 三 聯共（布）黨內的意見分歧

現在談談意見分歧的實質。

我想，我們的分歧可以歸結為幾個基本問題。我不打算詳細講這些問題，因為時間很少，而報告又已拉得很長了。況且你們有了關於聯共（布）問題的材料，這些材料在翻譯上雖然有些錯誤，但對我們黨內意見分歧基本上仍能提供一種正確的觀念。

### 一、社會主義建設的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可能性的問題，關於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問題。這裏所說的當然不是徹爾諾戈里亞，也不是保加利亞，而是我們的國家，是蘇聯。這裏所說的是這樣一個國家，那裏有過而且發展過帝國主義，那裏有一定數量的大工業，那裏有一定數量的無產階級，那裏有領導無產階級的政黨。這樣，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是否可能呢？靠我國內部力量，靠蘇聯無產階級所擁有的條件，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是否可能呢？

如果用具體的階級語言解釋這一公式，建成社會主義是什麼意思呢？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就是在鬥爭進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戰勝蘇聯本國的資產階級。所以問題歸結起來就是蘇聯無產階級能不能戰勝蘇聯本國的資產階級。因此，當人們說在蘇聯有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時，也就是想說蘇聯無產階級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戰勝蘇聯的資產階級。在解決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課題時，問題就是如此，而且只能如此。

黨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因為黨所持的出發點是：蘇聯無產階級、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有

可能用本身的力量戰勝蘇聯的資產階級。

假如這是不正確的，假如黨沒有理由斷定說，雖然我國在技術上比較落後，但蘇聯無產階級能修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那末黨就沒有理由繼續掌握政權，它無論如何應當放棄政權並轉到在野黨的地位。

因爲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我們能戰勝本國「民族」資產階級，能建設社會主義，並終於把它建成，那末黨就應該繼續掌握政權，領導國內社會主義建設，以期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獲得勝利；

或者是我們不能用本身的力量戰勝本國的資產階級，那末，鑒於不能立即得到外援，即其他國家革命勝利的支援，我們就應當老實地和公開地放棄政權，而採取在蘇聯組織未來的新革命的方針。

黨能不能欺騙自己的階級即工人階級呢？不，不能。這樣的黨是要被肢解的。正因爲我們黨沒有權利欺騙工人階級，它就應該直截了當地說：對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就會使我們黨放棄政權，使我們黨由執政黨的地位轉到在野黨的地位。

我們爭得了無產階級專政，從而建立了走向社會主義的政治基礎。我們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建成社會主義所必需的新的經濟基礎呢？社會主義的經濟實質和經濟基礎是什麼呢？是不是在人間創造「天堂」使大家都心滿意足呢？不，不是這樣的。這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實質的庸俗的、市儈的見解。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就是把農業和社會主義工業結合爲一個整體

經濟，使農業服從社會主義工業的領導，在農產品和工業品交換的基礎上調整城鄉關係，堵死和消滅階級首先是資本藉以產生的一切孔道，最後造成直接消滅階級的生產條件和分配條件。

對於這一點，列寧同志在我國施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在建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的問題整個擺在黨的面前時候，曾這樣說：

「以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這一代替的根本意義就是從「戰時」共產主義轉向正常的社會主義基礎。不是餘糧收集制，也不是糧食稅，而是用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化的」）工業的產品來交換農民的產品，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實質，社會主義的基礎。」（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〇頁）

列寧對於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問題的看法就是如此。

但是，爲了把農業和社會主義化的工業結合起來，首先必須有巨大的產品分配機關網，巨大的合作社機關網，即消費合作社和農業生產合作社機關網。列寧在他的「小冊子『論合作制』」中說到下面一點時，正是從這個原理出發的：

「在我國的條件下，合作制往往是和社會主義完全一致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三三頁）

那末，在我國被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蘇聯無產階級能不能用本身的力量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呢？

黨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見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決議（二〇）。列寧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是肯定的（只要看看他的小冊子『論合作制』就可知道）。我國建設的全部實踐對這個問題作了肯定的回答，因為我國經濟中的社會主義部分的比重，無論在生產方面或流通方面，都由於私人資本比重的減少而逐年增加，同時我國經濟中的私人資本的作用和社會主義成分的作用比較起來却在逐年降低。

可是反對派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呢？

他們對這個問題作了否定的回答。

可見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勝利是可能的，可以認為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可能性是有保證的。

這是不是說可以把這種勝利稱為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最後勝利，這種勝利能保證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免除任何外來的危險，免除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以及與之相聯的復辟的危險呢？不，不是這個意思。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是戰勝本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問題是戰勝世界資產階級的問題。黨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單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能戰勝世界資產階級的。黨告訴我們，爲了使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獲得最後勝利，就必須戰勝世界資產階級或至少使之中立。黨告訴我們，這樣的任務只有靠幾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才能完成。因此，社會主義在某一個國家內的最後勝利就意味着無產階級革命至少在幾個國家內的勝利。

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沒有引起特別的意見分歧，因此，我就不多講了。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同志



可以參看前幾天發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各個委員的我黨中央的材料。

## 二、「喘息」的因素

第二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蘇聯目前所處的國際地位的條件問題，關於我國開始和展開社會主義建設工作的這一「喘息」時期的條件問題。我們能夠而且應當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但是要建設社會主義，首先必須生存。必須有一個擺脫戰爭的「喘息時機」，必須沒有武裝干涉企圖，必須爭取到為生存和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需的某些起碼的國際條件。

試問，如果已經證明武裝干涉的危險存在着而且將來還會存在，證明這個危險只有在幾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才能消滅，那末，目前蘇維埃共和國所處的國際地位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呢？就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而言的我國目前這種「和平」發展時期是由什麼決定的呢？已經爭得的、使資本主義世界沒有可能立即進行嚴重的武裝干涉的、並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造成必要的外部條件的這個「喘息」或「喘息」時期，是以什麼為根據的呢？

目前的「喘息」時期至少是以下面四個基本事實為根據的。

第一、帝國主義者陣營內的矛盾，這些矛盾並沒有減弱，這些矛盾使他們難以勾結起來反對蘇維埃共和國。

第二、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國家之間的矛盾，殖民地和附屬國解放運動的發展。

第三、資本主義國家中革命運動的發展和全世界無產者對蘇維埃共和國的同情日益增長。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者還無力直接進行革命以反對本國資本家來支援蘇聯的無產者。但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已經無力推動「自己的」工人來反對蘇聯無產階級了，因為全世界無產者對蘇維埃共和國的同情正在增長而且不能日益增長起來。而現在沒有工人是不能進行戰爭的。

第四、蘇聯無產階級的強大有力，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蘇聯紅軍的組織力量。

諸如此類的條件結合起來，便造成一個成爲蘇維埃共和國目前國際地位的特點的「喘息」時期。

### 三、革命的「民族」任務和國際任務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

第三個問題。第三個問題是關於某一國家內無產階級革命的「民族」任務和國際任務的問題。黨所持的出發點是：蘇聯無產階級的「民族」任務和國際任務融合爲一個共同的任務，即從資本主義壓迫下解放各國無產者的任務；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利益和各國革命運動的利益完完全全融合爲一個共同的利益，即社會主義革命在世界各國的勝利。

假使世界各國無產者不同情和不支持蘇維埃共和國，那會怎樣呢？蘇維埃共和國就會受到武裝干涉，就會被摧毀。

假使資本得以摧毀蘇維埃共和國，那會怎樣呢？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國家內最黑暗的反動時代就會到來，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的民族就會受到摧殘，國際共產主義的障地就會被摧毀。

如果各國無產者對蘇維埃共和國的同情和支持加強和增長起來，那將怎樣呢？那將根本有助於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

如果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不斷擴大，那將怎樣呢？那將根本改善世界各國無產者和資本作鬥爭的革命陣地，將摧毀國際資本和無產階級作鬥爭的陣地，將使世界無產階級有更多的機會取得勝利。

因此，應得出結論說，蘇聯無產階級的利益和任務是同各國革命運動的利益和任務交織在一起並不可分割地聯系着的，反過來說，各國革命無產者的任務是同蘇聯無產者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綫上的任務和勝利不可分割地聯系着的。

因此，把某個國家無產者的「民族」任務與國際任務對立起來，就是在政治上犯了極嚴重的錯誤。因此，把蘇聯無產者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綫上的那種勤奮和熱忱說成「民族閉關自守」和「民族狹隘性」的表現，像我們的反對派有時所做的那樣，這不是失去了理智，就是害了幼稚病。

因此，把一個國家無產者的利益和任務跟各國無產者的利益和任務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確立起來，乃是各國無產者的革命運動獲得勝利的最可靠的道路。

正因為如此，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不是最終目的，而是各國革命的發展和勝利的手段和助力。

因此，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就是從事各國無產者的共同事業，就是不僅在蘇聯而且在一切資本

主義國家內逐步造成對資本的勝利，因為蘇聯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革命的開端及其發展的基礎。

#### 四、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歷史

第四個問題。第四個問題是關於所討論的問題的歷史。反對派硬說，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是一九二五年才在我們黨內第一次提出的。至少托洛茨基在黨的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曾直截了當地聲明：『爲什麼要求在理論上承認一個國家能建成社會主義呢？這個前途從何而來呢？爲什麼在一九二五年以前誰也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呢？』

這樣說來，在一九二五年以前這個問題沒有在我們黨內提出過。這樣說來，只有斯大林和布哈林在黨內提出了這個問題，並且是在一九二五年才提出的。

這對不對呢？不，不對。

我肯定地說，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還在一九一五年就由列寧第一次在黨內提出了。我肯定地說，當時反駁列寧的不是別人，正是托洛茨基。我肯定地說，從那時起，也就是從一九一五年起，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在我們報刊上和我們黨內就會多次地論述過。

我們看看事實。

(甲)一九一五年。布爾什維克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二)上列寧的論文「論歐洲聯邦

口號」。列寧在這篇論文中說道：

『然而把世界聯邦口號當做一個獨立的口號未必是正確的，因為第一、它和社會主義混合起來了；第二、它會產生認為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不正確的見解，以及對這個國家和其餘各國間的關係的不正確的見解。』

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然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sup>⊖</sup>，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反對資本家的起義，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剝削階級及其國家。……因為『沒有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各落後國家的相當長期的頑強鬥爭，便不能實現各民族在社會主義中的自由聯合。』（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頁）而托洛茨基於同年（一九一五年）在他所領導的報紙『我們的言論報』<sup>⊙</sup>上反駁道：

『「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社會民主黨人報』（一九一五年布爾什維克中央機關報，列寧的上述論文就是在該報上發表的。——斯大林註）由此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因而每一個別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無須以建立歐洲聯邦為其先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決條件……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應當在自己的鬥爭中「等待」其他國家，這是一個淺顯的道理，爲使國際間同時行動的思想不致爲國際間消極等待的思想所代替，把這個道理反覆加以說明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我們不等待其他國家而在本國的基礎上開始鬥爭並繼續下去，深信我們的倡導會推動其他各國的鬥爭；假如事實並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羅斯能在保守的歐洲面前站得住腳，或社會主義的德意志能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孑然獨存，這是歷史上的經驗和理論上的推論都證明了的。在民族範圍內觀察社會革命的前途，就意味着變爲構成社會愛國主義實質的民族狹隘性的犧牲品。」①（見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第三卷第一部第八十九頁至第九十頁）

可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問題，早在一九一五年，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前夜，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擺在日程上的時候，就由列寧提出來了。

可見當時反對列寧同志的不是別人，正是托洛茨基，他顯然知道列寧論文所指的是「社會主義的勝利」和「在一個國家內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可能性。

可見關於「民族狹隘性」的責難，早在一九一五年就由托洛茨基第一次提出來了，而且這個責難不是用來反對斯大林或布哈林，而是用來反對列寧的。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現在季諾維也夫也常常發出關於「民族狹隘性」的可笑的責難。但他大概不了解他是在重複並從而恢復托洛茨基旨在反對列寧和列寧的黨的論點。

(乙)一九一九年。列寧的論文「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列寧在這篇論文中寫道：

「不管各國的資產者及其公開的和暗藏的幫兇們（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者』）怎樣誣譏，怎樣造謠，有一點是不容懷疑的：從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經濟問題來看，我國已經有了共產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保證。全世界資產階級所以猖狂地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組織軍事進攻和陰謀等等來反對布爾什維克，正是由於它完全懂得要是不用武力壓倒我們，我們在改造社會經濟方面就必然獲得勝利。可是資產階級要這樣來壓倒我們是辦不到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卷第九十頁）

可見列寧這篇論文中說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問題」，是爲了「共產主義勝利」而「改造社會經濟」的問題。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問題」和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改造社會經濟」呢？這無非是在一個國家即我們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

(丙)一九二一年。列寧的小冊子「論糧食稅」<sup>(二)</sup>。關於我們能够而且應當建立「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這一著名的論點（見「論糧食稅」）。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丁)一九二二年。列寧同志在莫斯科蘇維埃會議上的發言。他在發言中說道：「我們把社會主義拖進日常生活中了」，「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〇五頁)。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在其『和平綱領』的『跋』中加以反駁，而沒有直接指出他在和列寧進行論戰。托洛茨基在這篇『跋』中說道：

『在「和平綱領」中一再重複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不能在民族範圍內勝利完成的論斷，在某些讀者看來也許已被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將近五年的經驗推翻了。但這樣的結論是沒有根據的。工人的國家在一個國家而且是一個落後的國家裏抗住了全世界，這個事實證明無產階級有雄偉的力量，這種力量在其他比較先進、比較文明的國家裏是真能做出奇蹟來的。可是，我們雖然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保持為一個國家，但是我們並沒有達到甚至還沒有走近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階段。這個時期為革命的國家的自衛而進行的鬥爭引起了生產力的異常低落；只有在生產力發展和繁榮的基礎上，社會主義才是可能的。同資產階級國家進行的商務談判、租讓、熱那亞會議等等，是不可能<sup>在民族國家範圍內孤立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極其顯明的證據……</sup>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高漲只有無產階級在歐洲幾個最重要的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才會是可能的。』(見托洛茨基『一九一七年』第三卷第一部第九十二頁至第九十三頁)

◎ 清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



托洛茨基在這裏講的「不可能在民族國家範圍內孤立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是反駁誰呢？當然不是反駁斯大林或布哈林。托洛茨基在這裏是反駁列寧同志，並且他所反駁的不是別的問題，而是一個基本問題，即關於「在民族國家範圍內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問題。

（戊）一九二三年。成爲列寧的政治遺囑的小冊子「論合作制」。列寧在這本小冊子中說道：

「的確，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掌握着國家政權，無產階級和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有領導農民的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經過合作社，僅僅經過合作社，經過我們從前鄙視爲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視的合作社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嗎？這還不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頁）

看來不能說得更明白了。

在托洛茨基看來，「在民族國家範圍內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是不可能的。列寧則肯定說，我們蘇聯無產階級，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具有「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這兩種觀點是完全對立的。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事實就是如此。

由此可見，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還在一九一五年就已經在我們黨內提出來了，這個問題是列寧親自提出的，在這個問題上和列寧爭論過並以「民族狹隘性」責難列寧的，不是別人，正是托洛茨基。

可見從那時起直到列寧同志逝世為止，這個問題並未從我們黨的工作日程上取消。

可見這個問題曾幾次被托洛茨基以某種形式，即以掩蔽的但分明是和列寧同志爭辯的形式挑起來，而且托洛茨基每次都不是本着列寧和列寧主義的精神，而是以反對列寧和列寧主義的精神來解釋這個問題的。

可見托洛茨基硬說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在一九二五年以前誰也沒有提出過，這是公開的撒謊。

### 五、目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特別重要的意義

第五個問題。第五個問題是關於目前社會主義建設任務的現實性的問題。爲什麼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惟有在目前，惟有在近來具有特別現實的性質呢？爲什麼在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三年，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只是偶然在個別的文章中討論過，在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這個問題却在我們黨的實踐中佔了特別突出的地位呢？其

原因何在呢？

在我看來有三個主要原因。

第一、近幾年來，其他國家的革命速度緩慢下來了，所謂「資本主義的局部穩定」到來了。由此便產生一個問題：資本主義的局部穩定是否會削弱或甚至消滅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呢？由此人們對我國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命運問題的注意就增加了。

第二、我們施行了新經濟政策，容許私人資本存在並實行了某種退却，以便重新部署力量，再行進攻。由此便產生一個問題：新經濟政策的施行是否會削弱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呢？由此人們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問題就更加注意了。

第三、我們在內戰中取得了勝利，趕走了武裝干涉者，爭得了擺脫戰爭的「喘息時機」，保證了和平，保證了為消滅經濟破壞狀態、恢復國內生產力和從事我國新經濟建設提供有利條件的和平時期。由此便產生一個問題：應該把經濟建設導向哪一方面，導向社會主義方面還是導向別的方面呢？由此便產生一個問題：如果把經濟建設導向社會主義方面，是否有根據指望我們在新經濟政策和資本主義局部穩定的條件下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呢？由此便引起了全黨和整個工人階級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命運問題的莫大注意。由此黨和蘇維埃政權機關便從增加工業、商業和農業方面的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比重這一觀點上每年對各種統計材料加以總結。

這就是說明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對於我們黨和我國無產階級以及對於共產國際都是最迫切的問題

的三個主要原因。

反對派以爲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只有理論上的意義。這是不對的。這是極糊塗的。這樣論述問題只能說明反對派完全脫離了我們黨的實踐，脫離了我國的經濟建設，脫離了我國的合作社建設。現在，當我們消滅了經濟破壞狀態，恢復了工業，並進入了在新的技術基礎上改造整個國民經濟的時期以後，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便具有莫大的實踐意義。經濟建設時期的事業應導向哪裏，朝哪個方向建設，建設些什麼，我們建設的前途應當怎樣，這些問題如不解決，誠實的和細心鑽研的經濟工作人員就一步也不能前進，假使他們願意真正自覺地和細心地來對待建設事業的話。我們從事建設是爲了給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施肥，還是爲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是現在我們建設工作的根本問題。現時，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局部穩定的條件下，我們是否有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可能，——這就是現在我們黨和蘇維埃工作中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列寧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只要看看小冊子『論合作制』就可知道）。黨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是肯定的（見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而反對派呢？我已經說過，反對派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已經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中說過，而現在不得不在這裏重複一遍：反對派聯盟的首領托洛茨基，還在不久以前，即在一九二六年九月，曾在其所共知的告反對派書中聲稱，他認爲『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是在理論上爲民族狹隘性辯護』（見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四））。

把托洛茨基的這段話（一九二六年）和他在一九一五年所寫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他就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可能性問題和列寧進行論戰，第一次提出了關於列寧同志和列寧主義者的『民族狹隘性』問題）比較一下，你們就會懂得，托洛茨基對於在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依然是站在自己原來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否定的立場上的。

正因為如此，黨認定托洛茨基主義是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 六、關於革命的前途

第六個問題。第六個問題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途問題。托洛茨基在黨的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中說道：『列寧認為在二十年內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由於我們農民國家的落后性就是三十年也不能建成。最低限度也要三十年至五十年。』

同志們，我應當在這裏聲明，托洛茨基所臆造的這個前途和列寧同志指出的蘇聯革命的前途毫無共同之處。幾分鐘以後，托洛茨基本人就開始在他的演說中和這種前途作鬥爭。不過這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我應當聲明，不論是列寧或黨都不能對托洛茨基所臆造出來的這種前途和由此得出的結論負責。托洛茨基捏造了這種前途，然後開始在自己的演說中和他自己的捏造作鬥爭，這個事實只能說明托洛茨基糊塗已極並使自己陷入可笑的境地。

列寧根本沒有說過在三十年或五十年內『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其實列寧說

的是：

「只要在十年至二十年內和農民保持正確的關係，就能保證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甚至在發展着的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延遲的情況下），否則就會遭到二十年至四十年白匪恐怖的苦難。」（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二頁至第三〇三頁）

能不能從列寧這一論點得出我們『在二十年至三十年或五十年內無論如何也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結論呢？不，不能。從這一論點只能得出下列的結論：

（甲）在和農民保持正確關係的條件下，我們可以保證在十年至二十年內取得勝利（即社會主義的勝利）；

（乙）這個勝利將不僅是蘇聯的勝利，而且是「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

（丙）如果我們在這個時期內沒有取得勝利，這就說明我們被擊潰了，無產階級專政制度被白匪恐怖制度代替了，白匪恐怖制度可能延長二十年至四十年之久。

當然，對列寧這個論點以及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可同意可不同意的。但像托洛茨基那樣地歪曲它是不行的。

「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不是說這樣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意義相同呢？不，不是這個意思。列寧在自己的著作中是把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的勝利和「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嚴格地區別開來的。列寧談到「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他的意思是說：我國

社會主義的成就，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具有如此巨大的國際意義，它（勝利）不能局限於我國範圍內，它定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中引起強大的社會主義運動，如果它在時間上和其他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不能一致，那末，它無論如何也將掀起其他國家無產者的導向世界革命勝利的強大運動。如果指的是革命勝利的前途，則列寧所說的革命前途就是如此，其實我們黨內所談的也是如此。將這個前途和托洛茨基的三十年至五十年前途混淆起來就是誣蔑列寧。

### 七、實際上問題是怎樣的

第七個問題。反對派對我們說：好吧，但究竟和誰聯盟好些，和世界的無產階級還是和我國的農民呢？選擇誰做同盟者最好呢，是世界的無產階級還是蘇聯的農民呢？於是事情被描繪成這樣：好像在蘇聯無產階級面前有兩個同盟者，一個是世界無產階級，它準備立即推翻自己的資產階級，但等着我們對此欣然同意；另一個是我國的農民，他們準備幫助蘇聯無產階級，但不完全相信蘇聯無產階級會接受這種幫助。同志們，這是問題的幼稚的提法。問題的這種提法，無論與我國革命的進程或與世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鬥爭戰綫上的力量對比，都毫無共同之處。請原諒我這樣說，這樣提問題的只能是貴族女學生。可惜事情並不像一些反對派向我們描繪的那樣，而且沒有理由懷疑這一點：我們會樂意接受兩方面的幫助，假使這僅僅取決於我們的話。不，在實際生活中問題並不是這樣的。

問題是這樣的：既然世界革命運動的速度緩慢下來，在西方還沒有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而蘇聯

無產階級已掌握政權，一年年地鞏固這個政權，把基本農民羣衆團結在自己周圍，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綫上已經取得重大勝利，並且順利地鞏固着自己與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的友好聯系，那末，是否有理由否認雖然資本主義包圍存在，但蘇聯無產階級能够戰勝本國的資產階級並在我們國內繼續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呢？

當然，如果不像反對派聯盟那樣從幻想出發，而是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鬥爭戰綫上的實際力量對比出發，那末現在問題就是這樣。

黨回答這個問題說，蘇聯無產階級在這種條件下能够戰勝本國「民族」資產階級並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經濟。

反對派却說：

「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權，就不能把自己暫時的統治變成長期的社會主義專政。」（見托洛茨基「我們的革命」第二七八頁）

托洛茨基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歐洲無產階級的國家援助」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西方無產階級不預先取得勝利，西方無產階級不預先奪得政權，蘇聯無產階級不僅不能戰勝本國的資產階級和建設社會主義，甚至不能保持政權。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



問題就是這樣，我們意見分歧的根源就在這裏。

托洛茨基這個立場和孟什維克奧托·鮑威爾的立場有什麼區別呢？

可惜一點也沒有。

## 八、關於勝利的機會

第八個問題。反對派說：好吧，可是誰有更多的勝利的機會呢，是蘇聯無產階級呢，還是世界無產階級？

托洛茨基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中說道：『能不能設想歐洲資本主義會腐朽三十年至五十年，而無產階級還沒有能力完成革命呢？我要問：爲什麼我應當接受這個只能稱之爲對歐洲無產階級懷着毫無根據的極端悲觀心理的前提呢？……我斷言，我沒有任何理論的和政治的根據來設想我們和農民一起建成社會主義要比歐洲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容易些。』（見托洛茨基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第一、應當毫無保留地拋棄歐洲要停滯『三十年至五十年』的前途。誰也沒有要托洛茨基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這個前途出發，這個前途與我們黨的前途是毫無共同之處的。托洛茨基本人既把自己和這個臆造的前途聯在一起，自己就應當對這種做法的後果負責。我想，如果指的是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真正的前途，這個期限至少應該縮短一半。

第二、托洛茨基毫無保留地決定西方無產者戰勝現在執政的世界資產階級，要比蘇聯無產階級戰勝在政治上已被打垮的、已被趕出國民經濟指揮所的、在經濟方面不得不在無產階級專政和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壓力下退却的本國「民族」資產階級有更多的機會。

我認爲這樣提問題是不正確的。我認爲托洛茨基這樣提問題恰好露了馬脚。難道孟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異口同聲地大叫時，不也是向我們說西方無產者推翻資產階級和奪取政權要比技術不大發達、無產階級人數不多的俄國的無產者有更多的機會嗎？不管孟什維克怎樣痛哭流涕，俄國無產者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比英國、法國或德國的無產者有更多的機會推翻了資產階級並奪取了政權，這難道不是事實嗎？難道全世界革命鬥爭的實踐沒有表明和沒有證實不能像托洛茨基那樣提問題嗎？

誰有更多的機會迅速獲得勝利的問題，其解決辦法不是拿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和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相對比，或者拿我國農民和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相對比。這樣的對比是把比較當兒戲。誰有更多的機會迅速獲得勝利的問題，是要由現實的國際環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鬥爭戰綫上的實際的力量對比來解決的。在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建成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時，也許西方無產者就已戰勝自己的資產階級並奪得政權。這並不是不可能的。反之，在西方無產者還沒有推翻自己的資產階級時，也許蘇聯無產階級就已成建成本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這也不是不可能的。

誰有機會迅速獲得勝利的問題的解決，是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鬥爭戰綫上的實際情況爲轉移的，而且只是以這種實際情況爲轉移的。

## 九、實際政策上的意見分歧

以上就是我們意見分歧的基礎。

從這些基礎中產生了一些在對外對內政策方面和在純粹黨內政策方面的實際政策性質的意見分歧。這些分歧就是第九個問題的題目。

(甲)黨從資本主義局部穩定這個事實出發，認為我們正處於兩個革命之間的時期，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我們正走向革命，各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是開闢接近羣衆的道路，加強自己和羣衆的聯系，掌握無產階級的羣衆組織，使廣大的工人羣衆作好準備去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搏鬥。

可是反對派不相信我們革命的內部力量，懼怕資本主義局部穩定這個事實會毀滅我們的革命，認為(或者曾經認為)可以否認資本主義局部穩定這個事實，認為(或者曾經認為)英國罷工(二)是資本主義穩定已經結束的標誌，但當終於發現穩定是事實的時候，反對派却強詞奪理說，那就該事實倒霉，那就可以跳過事實，同時他們裝腔作勢地提出修改統一戰綫的策略、與西方職工運動破裂等等聳人聽聞的口號。

可是不顧事實，不顧事物的客觀進程，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離開科學的基礎而站到巫術的基礎上去了。

由此就產生了反對派聯盟在政策上的冒險主義。

(乙)黨從工業化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道路而我國的國內市場又是社會主義工業的基本市場出發，認為應當在不斷改善基本農民羣衆（更不用說工人）的物質生活的基礎上實行工業化，認為工業和農業間、無產階級和農民間的結合以及無產階級在這個結合中的領導，正如列寧所說，乃是「蘇維埃政權的全部」<sup>(25)</sup>和我國建設勝利的全部，因此，我們的一般政策，其中包括稅收政策和價格政策，應當符合於這個結合的利益。

可是反對派不相信有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可能性，顯然他們認為可以損害基本農民羣衆的利益來實行工業化，因而走上資本主義工業化方法的道路，走上把農民當做「殖民地」、當做無產階級國家的「剝削」對象的道路，而且提出一些只能瓦解工業和農業的結合、損害貧農和中農的經濟地位、破壞工業化基礎的工業化辦法（加緊對農民的捐稅壓榨，提高工業品的出廠價格等等）。

由此就產生了反對派對無產階級和農民聯盟以及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權這一思想的否定態度——這是社會民主黨所特有的態度。

(丙)我們的出發點是：黨，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工具；一個黨的領導（這個黨不與其他政黨而且不能與其他政黨分享這種領導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就不可能有任何鞏固的和發展的無產階級專政。因此，我們認為在我們黨內不容許有派別存在，因為顯而易見，在黨內存在着各種有組織的派別，就會使統一的黨分裂成一些平行的組織，就會在國內形成一個或幾個新黨的萌芽和細胞，也就是說，會瓦解無產階級專政。

反對派雖然不公開反駁這些論點，但他們在自己實際工作中所持的出發點却是：必須削弱黨的統一，必須有在黨內成立派別的自由，也就是說，必須造成建立新黨的因素。

由此就產生了反對派聯盟在實際工作中的分裂政策。

由此就產生了反對派對黨內「制度」的號叫，其實這正是國內非無產階級分子反抗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反映。

由此就產生了關於兩個政黨的問題。

同志們，我們和反對派的意見分歧總括起來就是如此。

#### 四 在工作中的反對派

現在來談談這些意見分歧是怎樣表現在實際工作中的。

那末，我們的反對派在其實際工作中，在其反黨鬥爭中究竟是怎樣表現的呢？

大家知道，反對派不僅在我們黨內為非作歹，而且在共產國際其他支部，如德、法等國黨內為非作歹。因此，問題應該這樣提出：反對派及其門徒們在聯共（布）黨內以及在共產國際其他支部內的實際工作究竟是怎樣的呢？

（甲）反對派及其門徒們在聯共（布）黨內的實際工作。反對派是從對黨發出最嚴厲的責難來開

始其『工作』的。反對派說黨正在『爬上機會主義的道路』。反對派說黨的政策『與革命的階級路線背道而馳』。反對派說黨在蜕化並走向特米多爾<sup>②</sup>。反對派說我們的國家『遠非無產階級的國家』。這一切不是在反對派代表的公開宣言和演說（一九二六年中央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七月全會）中發表過，就是在反對派門徒們所散發的反對派的秘密文件中發表過。

反對派對黨發出這些嚴厲的責難，從而為在黨內組織平行的新支部、組織平行的新的黨中央、成立新政黨造成基礎。反對派的門徒之一奧索夫斯基先生在其論文中會直言不諱地說，現有的黨即我們黨是保護資本家利益的，因此，必須組織一個新黨，即與現有的黨一同存在和活動的『純無產階級政黨』。

反對派可以說他們對奧索夫斯基的立場不負責任。但這是不對的。反對派對奧索夫斯基先生的『行爲』要負完全責任。大家知道，奧索夫斯基公開自命為反對派的門徒，反對派對這一點也沒有試圖加以反駁。其次，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在中央七月全會上曾經祖護奧索夫斯基而反對莫洛托夫同志。最後，大家知道，雖然黨一致反對奧索夫斯基，但反對派在中央表決時却反對開除奧索夫斯基出黨。這一切都說明反對派對奧索夫斯基的『行爲』負有道義上的責任。

結論：反對派在聯共（布）黨內的實際工作，已經表現在奧索夫斯基的立場上，表現在他所持的必須在我國成立一個與聯共（布）平行並反對它的新黨這一立場上了。

不這樣也不可能。因為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反對派在對黨發出這些嚴厲的責難時，自己並不相信這些責難的嚴重性，提出來僅僅是爲了示威，那末，他們就是把工人階級引入迷途，這是犯罪的；

或者是反對派過去相信而且現在仍然相信自己的責難的嚴重性，那末，他們就應當採取打垮黨的領導幹部和組織新黨的方針，他們也真的採取了這個方針。

一九二六年十月以前，我們的反對派在其反對聯共（布）的實際工作中的面貌就是如此。

（乙）反對派的門徒們在德國共產黨內的實際工作。以柯爾什先生爲首的德國「極左派」，從我們的反對派對黨的責難出發，做出了自己的「進一步的」結論並說得更加露骨。大家知道，德國「極左派」的思想家柯爾什硬說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是「純粹資本主義的工業」。大家知道，柯爾什把我們的黨叫做「富農化了的」黨，而把共產國際叫做「機會主義的」組織。其次，大家知道，柯爾什因此就鼓吹反對蘇聯現存政權的「新革命」的必要性。

反對派可以說他們對柯爾什的立場不負責任。但這是不對的。反對派對柯爾什先生的「行爲」要負完全責任。柯爾什說的話，就是從我們的反對派首領以衆所周知的對黨的責難的形式傳授給自己門徒的那些前提得出的自然的結論。因爲黨既然在爬上機會主義的道路，黨的政策既然與革命的階級路線背道而馳，黨既然在蛻化並走向特米多爾，而我們的國家又「遠非無產階級的國家」，那末從這裏只能得出一個結論：進行新的革命來反對「富農化了的」政權。此外，大家知道，德國的「極左派」，包括維丁派（二）在內，曾反對開除柯爾什的黨籍，因而對柯爾什的反革命宣傳負有道義上的責任。可

是，誰不知道『極左派』是擁護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的呢？

（丙）反對派的門徒們在法國的實際工作。關於法國的反對派門徒也必須這樣說。我指的是蘇瓦林及其在法國一個著名雜誌上活動的集團。從我們的反對派在其對黨的責難中所提供的前提出發，蘇瓦林得出結論說，革命的主要敵人是黨內的官僚，是我們黨的上層領導集團。蘇瓦林硬說：『生路』只有一條，就是進行新革命反對黨和蘇維埃政權中的上層領導集團，首先是反對聯共（布）中央書記處。在那裏，在德國，是反對蘇聯現存政權的『新革命』。在這裏，在法國，是反對中央書記處的『新革命』。那末怎樣組織這個新革命呢？沒有一個適合於新革命的目標的特殊政黨，能不能組織這個新革命呢？當然不能。由此便產生了建立新黨的問題。

反對派可以說他們對蘇瓦林的言論不負責任。但這是不對的。第一、大家知道，蘇瓦林及其集團是反對派的門徒，特別是托洛茨基那一部分反對派的門徒。第二、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反對派還計劃把蘇瓦林先生安插到法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去。誠然這個計劃沒有成功。但這不是我們的反對派的過失，而是他們的倒霉！

由此可見，如果不看反對派自己所描繪的外貌，而看他們在我們蘇聯以及法國和德國的工作過程中的表現，那末我要說，反對派在自己的實際工作中已經就要走到打垮我黨現有幹部並組織新黨的地步了。



## 五 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爲什麼稱讚反對派

社會民主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爲什麼稱讚反對派呢？

或者換句話說，反對派反映着哪種人的情緒呢？

你們大概已經注意到，所謂「俄國問題」近來已經成爲西方社會民主黨和資產階級報刊極爲注意的問題了。這是偶然的嗎？當然不是偶然的。蘇聯社會主義的成長和西方共產主義運動的開展，不能不在資產階級及其在工人階級中的代理人——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們——當中引起極度的驚惶。革命和反革命間的界限，現時就截然表現在一些人對蘇聯無產階級政黨採取深惡痛絕的態度而另一些人則採取同志友好的態度上。目前「俄國問題」的極偉大的國際意義已成爲共產主義的敵人不能不加以重視的事實了。

圍繞着「俄國問題」形成了兩條戰綫，一條是蘇維埃共和國的敵人的戰綫，一條是蘇維埃共和國的奮不顧身的朋友的戰綫。蘇維埃共和國的敵人所希望的是什麼呢？他們力求在廣大民衆中造成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前提。蘇維埃共和國的朋友所希望的是什麼呢？他們力求在無產階級廣大階層中間造成支持和保衛蘇維埃共和國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前提。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社會民主黨人和俄國資產階級的流亡分子中的立憲民主黨人爲什麼稱讚我

們的反對派。

例如德國著名的社會民主黨首領保爾·列維說道：

「我們一向認為工人的特殊利益歸根到底就是社會主義的利益，它是與農民私有制的存在相矛盾的，工農利益的一致只是表面的現象，俄國革命進一步的發展將使這個矛盾更加尖銳更加鮮明。我們認為利益相同的思想是一種變態的聯合思想。如果一般說來馬克思主義還有一點根據，如果歷史是辯證地發展着的，那末這個矛盾一定會粉碎聯合的思想，正如它在德國已被粉碎一樣……我們這些從旁邊，從西歐觀察蘇聯事變的人看得很清楚：我們的觀點和反對派的觀點是一致的……當前的事實是：在階級鬥爭的口號下，獨立的、反資本主義的運動又在俄國開始了。」（見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日『萊比錫國民日報』）

在這裏，在這段引文中，對於工農利益「一致」的問題存在着糊塗觀念，這是顯而易見的。但保爾·列維因我們的反對派與工農聯盟思想作鬥爭而稱讚他們，這也是無庸置疑的。

『俄國』社會民主黨首領、主張在蘇聯復活資本主義的『俄國』孟什維克的首領、並非無名之輩的唐恩關於我們的反對派說道：

「布爾什維克的反對派對現存制度的批判幾乎是逐字逐句地重複着社會民主黨的批判，他們正以這種批判進行……思想上的準備來接受社會民主黨的優良的綱領。」

往下又說：

「反對派不僅在工人羣衆中間而且在工人共產黨員中間培養這種思想和情緒的幼苗，這種幼苗若是好好地加以培植，很容易結出社會民主主義的果實。」（『社會主義通報』第十七、十八兩期合刊）

看來是很明白的了。

米留可夫的反革命資產階級政黨的中央機關報『最近新聞報』（△關於我們的反對派寫道：

「今天，反對派在破壞專政，反對派的每一種新的刊物都在發表越來越「可怕」的言論，反對派自己正在向愈益猛烈抨擊統治制度這方面演變，在目前這已足以令人感激不盡地把反對派當做政治上不滿的廣大居民階層的喉舌來看待了。」（見『最近新聞報』第一九九〇號）

往下又寫道：

「對蘇維埃政權來說，現在最可怕的敵人就是悄悄地爬近蘇維埃政權，用自己的觸角從各方面把它包圍起來，並在它沒有發覺之前就把它消滅的那些人。蘇維埃的反對派所扮演的正是這種在我們還沒有度過的準備時期中所不可缺少的角色。」（見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最近新聞報』第一九八三號）

我想，這裏是用不着解釋的。

由於時間有限，我只引用了這幾段話，雖然這樣的引證還可以舉出幾十段幾百段來。

這就是社會民主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稱讚反對派的原因。

這是偶然的嗎？不，不是偶然的。

由此可見，反對派所反映的不是我國無產階級的情緒，而是不滿無產階級專政、仇視無產階級專政、急切期待無產階級專政瓦解和崩潰的非無產階級分子的情緒。

這樣，我們的反對派的派別鬥爭的邏輯，實際上就使得我們的反對派的戰綫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對者和敵人的戰綫在客觀上合而為一了。

反對派是否願意這樣呢？也許他們不願意這樣。但是這裏的問題不在於反對派願意怎樣，而在於他們的派別鬥爭在客觀上會引起怎樣的後果。派別鬥爭的邏輯勝過某些人的願望。正因為如此，反對派的戰綫實際上便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对者和敵人的戰綫合而為一了。

列寧曾教導我們說，共產黨員的基本義務就是保衛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然而事情却顛倒成這樣：反對派由於採取派別政策而墮落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的陣營中去了。

正因為如此，我們說反對派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也脫離了列寧主義。

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鬥爭戰綫上的力量對比是這樣的：工人階級隊伍裏現在只能有一種政策，不是共產主義的政策，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反對派企圖在反聯共（布）的鬥爭尖銳化的時候採取第三者的立場，這必然要以反對派被派別鬥爭的進程拋到列寧主義的敵人的營壘中去而告終。

從上述事實來看，結果也正是如此。

這就是社會民主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稱讚反對派的原因。

## 六 反對派聯盟的失敗

我在上面說過，反對派在其反黨鬥爭中對黨發出了種種極嚴厲的責難。我已說過，反對派在其實際工作中就要走到分裂黨和組織新黨的地步。由此就產生一個問題：反對派在這個分裂的立場上能夠維持多久呢？事實告訴我們，反對派在這個立場上才維持了幾個月。事實告訴我們，到今年十月初，反對派已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失敗，已不得不退却了。

反對派退却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認爲反對派退却的原因有下列幾種。

第一、反對派在蘇聯沒有自己的政治軍隊。很可能，建立新黨是一種吸引人的事情。但是在爭論以後既已發現沒有可資建立新黨的人，那末很明顯，退却便是唯一的出路了。

第二、在派別鬥爭進程中，不論我們蘇聯的或國外的各種卑鄙醜惡分子都和反對派結成一夥了，而社會民主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則竭力稱讚反對派，同他們接吻，使他們在工人眼中大丟其臉。因此，反對派應該有所選擇：或者接受敵人的這種稱讚和接吻，視爲理所當然；或者翻然悔改，使黏附在他們身上的骯髒尾巴自動地掉下來。反對派既已退却而且承認了自己的退却，也就是承認了第二

條出路是他們唯一可走的道路了。

第三、蘇聯國內狀況要比反對派所預料的好些，而黨員羣衆的覺悟程度和團結程度也要比反對派在鬥爭開始時所看到的高些。當然，假如國內發生了危機，假如工人日益不滿，假如黨表現得不够團結，那末反對派就會走上另一條道路，他們是決不會退却的。但是，事實表明反對派在這方面的打算也落空了。

這就是反對派失敗的原因。

這就是反對派退却的原因。

反對派的失敗經過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這就是反對派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聲明』。反對派在這個文件中放棄了派別自由的理論和實踐，放棄了派別鬥爭的方法，公開地毫不含糊地承認了自己在這方面的錯誤。但反對派所放棄的不止於此。既然反對派在自己的『聲明』中同『工人反對派』以及一切柯爾什分子和蘇瓦林分子劃清了界限，從而他們也就放棄了不久以前還使他們和這些派別接近的思想立場。

第二個階段，這就是反對派事實上放棄了不久以前對黨發出的種種責難。應該承認這一點，而且在承認以後應該着重指出，反對派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已不敢重複自己對黨的責難了。如果把中央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七月全會的記錄與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的記錄比較一下，那就不能不指出，以前的種種責難，說黨是機會主義，是特米多爾主義，是背棄了革命的階級路線等等，

在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連一點影子也沒有了。此外，如果注意到這種情況，即好多代表向反對派提到過去的種種責難的問題，而反對派對此仍然默不作聲，那就不能不承認反對派實際上已經放棄他們過去對黨的種種責難了。

是否可以把這種情況看做反對派事實上放棄了自己一系列的思想立場呢？可以而且應該。這是反對派在失敗面前自覺地捲起了自己的戰鬥旗幟。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發出責難是打算建立一個新黨。既然這種打算落了空，這些責難至少暫時要收起來了。

第三個階段，這就是反對派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完全孤立。應該指出，反對派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連一票也沒有得到，因而完全陷於孤立。你們回想一下反對派在今年九月底向黨舉行進攻、舉行公開的進攻時所發出的叫囂，並把這種叫囂和反對派在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可以說處於孤立無援狀態的事實比較一下，你們就會懂得反對派的失敗真是『無以復加』了。

反對派實際上放棄了他們對黨的責難，雖然有代表要求，他們也不敢在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重複這些責難，這個事實能不能否認呢？

不，不能，因為這是事實。

反對派為什麼走上了這條道路，他們為什麼捲起了自己的旗幟呢？

因為反對派思想旗幟的展開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組織兩個黨的理論，意味着所有的卡茨分子、柯爾什分子、馬斯洛夫分子、蘇瓦林分子及其他卑鄙齷齪的分子的活躍，意味着我們國內一切反

無產階級的力量蠢動，以及俄國流亡分子中的社會民主黨人和自由資產者對反對派的稱讚和他們的接吻。

反對派的思想旗幟害了反對派。同志們，這就是問題的所在。

因此，反對派爲了不致徹底腐敗起見，便不得不退却並拋掉自己的旗幟。

反對派聯盟失敗的根源就在於此。

## 七 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的實際意義和作用

同志們，我要結束我的講話了。現在我只從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的各項決議的意義和作用方面來把幾個結論談一談。

第一個結論就是：這次代表會議總結了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以後的黨內鬥爭，正式肯定了黨對反對派的勝利，孤立了反對派，結束了反對派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以前硬在我們黨內造成的派別混亂局面。

第二個結論就是：這次代表會議在我國建設的社會主義前途的基礎上，在爲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而向我們黨內一切反對派別、向我們黨內一切傾向作鬥爭的思想的基礎上，使我們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



現在我們黨內最迫切的問題就是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問題。列寧說得對：全世界都看着我們，看着我們的經濟建設，看着我們在建設戰綫上的勝利。可是爲了在這個戰綫上取得勝利，就必須使我們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工具——有進行這個事業的決心，使它意識到這個任務的重要性，使它成爲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槓桿。第十五次代表會議的意義和作用，就在於它正式地和最後地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思想武裝了我們黨。

第三個結論就是：這次代表會議堅決反擊了我們黨內所有一切思想上的動搖，從而促進了列寧主義在聯共（布）黨內的完全勝利。

如果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批准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的決議並承認我們黨對反對派的政策是正確的（我沒有理由懷疑這一點），那就可以得出第四個結論說，第十五次代表會議爲使列寧主義在整個共產國際、在世界各國和各族人民的革命無產階級隊伍裏獲得勝利準備了若干必需的重要條件。（熱烈鼓掌，全場歡呼。）

## 結 論

(十二月十三日)

### 一 幾點意見

一、我們需要的是事實，而不是捏造和誹謗

同志們！在談到問題的實質以前，請允許我對反對派那些不是歪曲事實就是捏造和誹謗的聲明作幾點事實上的修正。

(一) 第一個問題就是反對派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上的發言問題。反對派聲明說，他們之所以決定發言，是因為聯共(布)中央沒有直接指出反對派的發言會違背反對派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聲明」，假如中央禁止他們發言，反對派首領們是不會決定發言的。

其次，反對派聲明說，他們在這裏，在擴大全會上發言，是要用一切辦法不使鬥爭尖銳化，他們只是作幾點一般的「解釋」；老天在上，他們連想也沒有想到向黨進攻；老天在上，他們絲毫沒有打算

責備黨和控訴黨的決定。

同志們，這都是不真實的。這與實際情況完全不符。這是反對派陽奉陰違的表現。事實表明，特別是加米涅夫的發言表明，反對派首領們在擴大全會上的發言並不是「解釋」，而是向黨進攻，向黨襲擊。

公開提出譴責黨右傾的問題是什麼意思呢？這是向黨進攻，這是向黨襲擊。

難道聯共（布）中央在自己的決定中沒有指出反對派的發言會使鬥爭尖銳化，會激起派別鬥爭嗎？是指出了的。這也就是聯共（布）中央對反對派的警告。中央能不能比這再進一步呢？不，不能。爲什麼呢？因爲中央不能禁止發言。每個黨員都有權向高級機關控訴黨的決定。中央不能不重視黨員的這種權利。可見聯共（布）中央爲了防止鬥爭更加尖銳化，防止派別鬥爭更加劇烈，是做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的。

反對派的首領們既然都是中央委員，那就應當知道他們的發言不能不變成對自己黨的決定的控訴，對黨的進攻，對黨的襲擊。

這樣，反對派的發言，特別是加米涅夫的發言，並不是他個人的發言，而是整個反對派聯盟的發言，因爲他所宣讀的演說詞是由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簽了名的，加米涅夫的這次發言是反對派聯盟從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提出的放棄派別鬥爭方法的「聲明」發展到重新採用派別鬥爭方法進行反黨鬥爭的新階段的轉折點。

由此得出結論：反對派違背了他們自己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聲明」，又採用了派別鬥爭的方法。

同志們，讓我們就這樣記下來吧。用不着粉飾。加米涅夫說得對：貓應該叫做貓。（喊聲：「對！」）『豬應該叫做豬！』

（二）托洛茨基在發言時說：「斯大林在二月革命後宣傳過列寧稱之為考茨基傾向的錯誤策略。」同志們，這是不真實的。這是誹謗。斯大林沒有「宣傳過」任何考茨基傾向。我流放回來後有過一些動搖，這一點我並沒有隱瞞，而且親自寫在我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那本小冊子裏了。但是，我們中間誰沒有過一瞬間的動搖呢？至於說到列寧在一九一七年的立場和他的「四月提綱」<sup>〔二〕</sup>（這裏所說的正是這一點），那末黨知道得很清楚，我當時是同列寧同志站在一道並和當時反對列寧提綱的加米涅夫及其集團作鬥爭的。讀過我黨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會議記錄的人不能不知道，我是和列寧站在一道並和他一起反對加米涅夫反對派的。

這裏的魔術就是托洛茨基把加米涅夫弄成我了。（笑聲，鼓掌。）

加米涅夫當時站在反對列寧、反對他的提綱、反對黨內多數的立場上，並且發揮了近似護國主義的觀點，這是千真萬確的。當時加米涅夫在「真理報」上，例如在三月間發表了半護國主義性的文章，對這樣的文章我當然不能負絲毫責任，這也是千真萬確的。

托洛茨基的倒霉就在於他在這裏把加米涅夫弄成斯大林了。

托洛茨基當時究竟在什麼地方呢？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會議時，當黨和加米涅夫集團進行鬥爭時，他是在哪一個黨裏面呢，在左派孟什維克裏面呢，還是在右派孟什維克裏面？爲什麼他當時沒有加入齊美爾瓦爾得左派（*Left*）呢？讓托洛茨基對我們講清這一點吧，哪怕在報刊上也好。至於他當時不是我們的黨員，這是托洛茨基應該記得的事實。

（三）托洛茨基在發言時說：「在民族問題上斯大林犯了很大的錯誤。」什麼錯誤，在什麼情況下犯的，托洛茨基始終沒有說出來。

同志們，這是不真實的。這是誹謗。在民族問題上，我和黨或者和列寧從來沒有過任何意見分歧。托洛茨基在這裏所說的大概是一件小事，即列寧同志在我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前責備過我，說我對於穆吉萬尼（不久以前做過駐法國的商務代表）這一類格魯吉亞的半民族主義者、半共產主義者採取了過嚴的組織政策，說我「迫害」他們。可是後來的事實表明，對待所謂「傾向分子」如穆吉萬尼一類人的態度，實際上應比作爲我們黨中央的書記之一的我所採取的態度更嚴厲些。後來的一些事件證明這些「傾向分子」是最露骨的機會主義的腐化的派別。讓托洛茨基證明不是這樣的吧。列寧當時不知道而且不能知道這些事實，因爲他臥病在牀，不可能注意這些事件。但是這件小事和斯大林的原則立場能有什麼關係呢？分明是托洛茨基挑撥是非地暗示我和黨之間有什麼「意見分歧」。可是，整個中央委員會，連托洛茨基也在內，一致投票贊成斯大林的民族問題提綱，這難道不是事實嗎？這次投票是在穆吉萬尼事件以後，在我們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前舉行的，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在

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做民族問題報告的正是斯大林而不是別人，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民族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到底在哪裏呢？托洛茨基究竟爲什麼要提起這件小事呢？

(四) 加米涅夫在發言時說，我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犯了『向左邊開火』即向反對派開火的錯誤。這樣說來，黨反對過而且繼續在反對黨的革命核心。這樣說來，我們的反對派是左派而不是右派。

同志們，這都是胡說。這是我們的反對派分子散佈的誹謗。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沒有想到向革命的多數開火，而且不能這樣做。實際上代表大會是向右派開火，向我們的反對派分子開火，他們是右的反對派，雖然他們披着『左的』外衣。當然，反對派喜歡以『革命的左派』自居。但是我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相反地認爲，反對派只是用『左的』詞句來掩飾自己，實際上他們是機會主義的反對派。我們知道，右的反對派常常用『左的』外衣來掩飾自己，以便把工人階級引入歧途。『工人反對派』也自以爲最左，而實際上他們是最右的。現在的反對派也自以爲最左，而現在的反對派的實踐和全部工作都證明他們是一切右的機會主義派別（從『工人反對派』和托洛茨基派到『新反對派』和所有那些蘇瓦林分子）的集中點和策源地。

加米涅夫在『左派』和『右派』的問題上犯了『小小』顛倒是非的毛病。

(五) 加米涅夫引證了列寧著作中說我們還沒有打好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那句話，於是宣稱黨犯了錯誤，說黨好像斷言我們已經打好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了。

同志們，這是胡說。這是加米涅夫的一點小誹謗。黨從未宣稱過它已經打好了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現在爭論的完全不是我們已經打好還是沒有打好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現在爭論的並不是這一點。爭論的只是我們能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來打好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黨肯定說我們有可能打好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反對派却否認這一點，因而滾到失敗主義和投降主義的道路上去了。現在爭論的正是這一點。加米涅夫感到自己立場不穩，力圖迴避這個問題。但他是迴避不了的。

加米涅夫又犯了『小小』顛倒是非的毛病。

(六) 托洛茨基在發言時說，他『已先知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三四月間的政策』。這樣說來，托洛茨基『已先知』列寧同志的『四月提綱』。這樣說來，托洛茨基還在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間就已經獨自想出列寧同志在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間的『四月提綱』中所維護的政策了。

同志們，請允許我說，這是愚蠢而無恥的吹牛。托洛茨基比列寧『先知』——這種情景真值得一笑。碰到這樣的事情，農民總說得很對：『以蒼蠅比巨人。』(笑聲) 托洛茨基比列寧『先知』……讓托洛茨基試出頭在報刊上證明這一點吧。爲什麼他連一次也不嘗試呢？托洛茨基比列寧『先知』……

那末，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同志一出現在俄國舞台上就認爲必須和托洛茨基的立場劃清界限，這個事實如何解釋呢？『後知者』認爲必須和『先知者』劃清界限，這個事實如何解釋呢？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幾度聲明他和托洛茨基的基本公式『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毫無共同之處，這難道不是事

實嗎？列寧當時幾度聲明他和企圖跳過農民運動、跳過土地革命的托洛茨基毫無共同之處，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先見之明」究竟在哪裏呢？

結論：我們需要的是事實而不是捏造和誹謗，可是反對派喜歡運用捏造和誹謗。

## 二、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爲什麼稱讚反對派

我在報告中說過，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流亡國外的俄國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都在稱讚反對派。我說過，他們稱讚反對派是因爲反對派正在幹破壞黨的統一也就是幹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勾當。我作了許多引證，說明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稱讚反對派正是因爲這一點，正是因爲反對派進行活動來策動國內反無產階級的力量，力圖破壞我們黨的威信，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威信，從而便利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的事業。

爲了回答這一點，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也一樣）首先引用了稱讚我黨和斯大林的西方資本主義報紙的言論，然後引用了贊成我黨立場的我國資產階級專家的代表人物——路標轉換派分子（二）烏斯特里雅洛夫的話。

說到資本家，那末他們對我黨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例如不久以前，資本家在美國報紙上讚揚斯大林，說他使他們有可能獲得很大的承租權。而現在又百般責罵斯大林，硬說斯大林「欺騙了」他們。



一個時候在資產階級報紙上出現了諷刺斯大林的漫畫，畫着斯大林手裏提着一桶水在撲滅革命的火燄。可是後來又出現了跟它相反的諷刺畫，畫着斯大林手裏提着一隻桶，但桶裏不是水而是煤油，原來斯大林不是在撲滅革命的火燄，而是在火上加油。（鼓掌，笑聲。）

可見他們資本家對我黨的立場也像對斯大林的立場一樣有很大的分歧。

我們來談一談烏斯特里雅洛夫的問題。烏斯特里雅洛夫是什麼人呢？烏斯特里雅洛夫是資產階級專家和一般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敵人。這是無可爭辯的。但敵人是各種各樣的。有一種階級敵人，他們不願跟蘇維埃政權和好，無論如何要推翻它。也有這樣一種階級敵人，他們願在某種程度上跟蘇維埃政權和好。有一種敵人，他們竭力準備條件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立憲民主黨人等等。但也有這樣一種敵人，他們跟蘇維埃政權合作，反對主張推翻蘇維埃政權的人，希望專政一點點地削弱、蛻化，以至將來能適合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烏斯特里雅洛夫就是屬於後一類的敵人。

加米涅夫爲什麼要引用烏斯特里雅洛夫的話呢？也許是爲了表明我黨蛻化了，因此烏斯特里雅洛夫也就稱讚斯大林，或者稱讚我們黨吧？看來不是爲了這一點，因爲加米涅夫不敢直言不諱。那末，加米涅夫究竟爲什麼在這種場合要引用烏斯特里雅洛夫的話呢？顯然是爲了暗示『蛻化』。

但是加米涅夫忘記說，就是這位烏斯特里雅洛夫更加稱讚列寧。烏斯特里雅洛夫那篇稱讚列寧的文章是我們全黨都知道的。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也許列寧同志在施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就

『蛻化了』，或開始『蛻化』了吧？只要把這個問題一提出，就足以了解這種關於『蛻化』的推測是多麼荒謬的了。

這樣看來，烏斯特里雅洛夫爲什麼稱讚列寧和我們黨，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爲什麼稱讚反對派，這是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也是加米涅夫千方百計力圖迴避的問題。

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之稱讚反對派，是因爲反對派破壞我們黨的統一，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從而幫助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去顛覆蘇維埃政權的勾當。這一點已由引文證明了。烏斯特里雅洛夫稱讚我黨，則是因爲蘇維埃政權採取了新經濟政策，容許私人資本存在，容納了資產階級專家，這些專家的幫助和經驗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

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之稱讚反對派，是因爲反對派以自己的派別活動去幫助他們準備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而烏斯特里雅洛夫們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推翻不了，便拋棄了顛覆蘇維埃政權的觀點，力圖在無產階級專政旁邊佔一席之地，力圖沾無產階級專政的光；至於他們之稱讚黨，則是因爲黨實行了新經濟政策，在一定的條件下容許新興資產階級存在，這個新興資產階級想利用蘇維埃政權去達到本階級的目的，而蘇維埃政權則利用他們來達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

我國無產階級各種階級敵人之間的差別就在於此。

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稱讚反對派，而烏斯特里雅洛夫這班先生們則稱讚我們黨，其根源就在於此。

我想請你們注意列寧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列寧說：「在我們蘇維埃共和國內，社會制度是以工人和農民這兩個階級的合作為基礎的，而現在也容許「耐普曼」即資產階級在一定的條件下參加這個合作。」（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四頁）

正因為容許新興資產階級參加某種有條件的合作（當然是在一定的條件下，並在蘇維埃政權的監督下），——正因為這一點，烏斯特里雅洛夫才稱讚我們黨，希望抓住這個機會，並利用蘇維埃政權去達到資產階級的目的。我們，我們黨則有另外的打算：利用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及其經驗和知識，以便使他們一部分人蘇維埃化和被同化，而另一部分不能蘇維埃化的人則叫他們滾開。

列寧把新興資產階級跟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區別開來，容許前者存在並加以利用，而建議逮捕後者，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關於這個問題，列寧同志在其『論糧食稅』中寫道：

『不要害怕讓共產黨員向資產階級專家，也包括向商人，向合作社小資本家，向資本家「學習」。向他們學習，雖與我們過去向軍事專家學習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實質上是一樣的。「領教」的結果，只有靠實際經驗來檢查；要比自己旁邊的資產階級專家做得更好些，要善於用各種辦法振興農業，振興工業，使農業和工業間的周轉發達起來。「爲了領教」要不惜破費；多花點錢去學習並不可惜，只要能受到教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四三頁）

關於以烏斯特里雅洛夫爲代表的新興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專家，列寧就是這樣說的。

關於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列寧則講過下面的話：

「而對於那些實際上不外乎換上了時髦的喀琅施塔得式非黨服裝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非黨人物」，那就要小心地把他們關在監獄裏，或者把他們遣送到柏林馬爾托夫那裏去自由地享受純粹民主制的一切滋味，去自由地和切爾諾夫、米留可夫以及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們交換意見吧。」（同上，第三四三頁）

列寧就是這樣說的。

也許反對派不同意列寧吧？那就讓他們直截了當地說出來。

正因爲如此，我們逮捕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而容許新興資產階級在一定的條件和一定的限制下存在，以使用經濟手段和他們作鬥爭，一步步地戰勝他們，同時利用他們的經驗和知識來進行我們的經濟建設。

由此可見，某些烏斯特里雅洛夫之類的階級敵人之稱讚我黨，是因爲我們實行了新經濟政策，容許資產階級和現存的蘇維埃制度實行某種有條件的和有限度的合作；而我們這樣做的目的是爲了利用這個資產階級的知識和經驗來進行我們的建設，我們在實現這個目的時，大家知道，並不是沒有成績的。而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一類的階級敵人之稱讚反對派，却是因爲反對派的活動在破壞我黨的統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幫助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去幹推翻專政的勾當。

我希望反對派最後會了解第一類稱讚和第二類稱讚之間的全部差別。

### 三、錯誤是有各種各樣的

反對派在這裏說到個別中央委員的一些錯誤。當然，個別的錯誤是有過的。我們沒有絕對「不犯錯誤的」人。這樣的人是沒有的。但錯誤是有各種各樣的。有一種錯誤，犯者並不堅持，而且不致由此形成政綱和派別。這種錯誤很快就被忘却。另外還有一種錯誤，犯者一直堅持，而且由此形成派別、政綱和黨內鬥爭。這種錯誤就不能很快被忘却了。

必須把這兩種錯誤嚴格地區別開來。

例如托洛茨基說，我在對外貿易壟斷問題上有一個時候犯過錯誤。這是確實的。在我們收購機關混亂時期我的確提議過暫時開放一個港口來輸出穀物。但我沒有堅持自己的錯誤，在和列寧商談後我立刻就糾正了。至於托洛茨基的這類經中央糾正後不再堅持的錯誤，我可以舉出數十個數百個。如果我列舉托洛茨基在中央工作中犯過的但沒有堅持而且被忘却的一切極嚴重的、不大嚴重的和不嚴重的錯誤，那末我得為此做幾次專題報告。但是，我認為在政治鬥爭中，在政治論戰中，應當談的不是這類錯誤，而是後來發展成政綱並引起黨內鬥爭的那種錯誤。

但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談到的問題，恰好是這類沒有發展成反對派別而且很快就被忘却的錯誤。因為反對派談的正是這些問題，讓我在這裏也提一下反對派首領們過去所犯的這樣一些錯誤吧。

也許這對他們是一個教訓，下次他們就不會再想拚命抓住已被忘却的錯誤了。

有一個時候，托洛茨基在我們黨中央委員會裏硬說：蘇維埃政權正處於千鈞一髮的境地，『布穀鳥已經叫過了』，蘇維埃政權存在的時間即使不是幾個星期，也只有幾個月了。這是一九二一年的事情。這是最危險的錯誤，說明托洛茨基具有危險的情緒。但是中央因此嘲笑了他，而托洛茨基也沒有堅持自己這個錯誤，於是錯誤就被忘却了。

有一個時候（在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提議准許我們的工礦企業和托拉斯把國家財產連固定資本在內抵押給私人資本家，以便獲得貸款。（雅羅斯拉夫斯基同志喊道：『這是投降的道路。』）也許就是這樣。無論如何，這是我們企業的非國有化的前提。但是中央否定了這個計劃，托洛茨基爭了一下，可是後來不再堅持自己的錯誤，於是錯誤就被忘却了。

有一個時候（在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提議把我們的工業嚴格地集中起來，那麼狂亂地集中起來，以致必然會把我們將近三分之一的工人階級拋出工廠大門。中央否決了托洛茨基的這個煩瑣的、狂亂的和政治上危險的提議。托洛茨基幾次向中央提到將來勢必走上這條道路。然而我們並沒有走上這條道路。（有人喊道：『那就非把普梯洛夫工廠關門不可。』）是的，事情是會弄到這個地步的。可是後來托洛茨基不再堅持自己的錯誤，於是錯誤就被忘却了。

如此等等。

或者我們拿托洛茨基的朋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來說吧，他們常常喜歡提到布哈林有一次說

的『發財吧』，並且圍着這個『發財吧』手舞足蹈。

還是一九二二年的事情，當時我們正討論烏爾卡爾特<sup>③</sup>的租讓和這一租讓的極苛刻的條件的問題。結果怎樣呢？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建議接受烏爾卡爾特租讓的苛刻條件，並且堅持自己的建議，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可是中央拒絕租讓烏爾卡爾特，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不再堅持自己的錯誤，於是錯誤就被忘却了。

或者再從加米涅夫的錯誤中舉出一件事實來說吧，本來我是不想說它的，但是加米涅夫使我不得不提到它，因為他令人厭煩地屢次提到布哈林的錯誤，提到布哈林早已糾正和消滅了的錯誤。我說的是加米涅夫流放到西伯利亞時的一件事。在二月革命後，加米涅夫與西伯利亞阿琴斯克城的巨商合拍了一封賀電給立憲派米哈依爾·羅曼諾夫，（喊聲：『可恥！』）就是沙皇遜位後授以『即位權』的那位米哈依爾·羅曼諾夫。當然這是一個愚蠢的錯誤，加米涅夫由於這個錯誤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會議上受到我們黨的嚴厲斥責。可是，加米涅夫承認了自己的錯誤，於是錯誤就被忘却了。

要不要提到這類錯誤呢？當然不要，因為它們已被忘却而且早已消滅了。爲什麼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拿這種錯誤來指責黨內論戰的對方呢？他們這樣做只能使我們不得不提起反對派首領們的許多錯誤，這不是很明顯嗎？即使是爲了杜絕反對派的吹毛求疵和惡意誹謗，我們也不得不這樣做。

但是還有另一種錯誤，這種錯誤爲犯者所堅持而且後來發展爲派別的政綱。這完全是另一種錯誤。黨的任务就是要揭發這類錯誤並克服它們。因爲克服這類錯誤是在黨內確立馬克思主義原則、保

持黨內統一、消滅派別活動並保證不再重犯這類錯誤的唯一手段。

例如托洛茨基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時的錯誤，就變成了一套完整的反黨政綱。應不應該公開而堅決地反對這種錯誤呢？是的，是應該的。

又如托洛茨基在工會問題爭論時期的錯誤，在我們黨內就引起了全國性的爭論。

又如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夜的錯誤就造成了黨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起義前的危機。

又如反對派聯盟目前的錯誤則形成了派別的政綱和反黨的鬥爭。如此等等。

是否需要公開而堅決地反對這種錯誤呢？是的，是需要的。

談到黨內意見分歧時能不能對這種錯誤絕口不談呢？顯然是不能的。

#### 四、季諾維也夫所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

季諾維也夫在發言中談到無產階級專政時，硬說斯大林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這篇人所共知的論文中不正確地解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

同志們，這是胡說。季諾維也夫在這裏是嫁禍於人。實際上只能說季諾維也夫是在曲解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觀。



季諾維也夫對無產階級專政有兩種說法，其中沒有一種能稱爲馬克思主義的，而且兩種說法根本互相矛盾。

第一種說法。季諾維也夫從黨是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基本領導力量這個正確的論點出發，得出一個完全不正確的結論：無產階級專政是黨的專政。這樣，季諾維也夫就把黨的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混爲一談了。

把黨的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混爲一談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這就是在階級和黨之間，在整體和部分之間劃上等號，這是荒謬絕倫的。列寧從來沒有把黨和階級混爲一談。在黨和階級之間有許多無產階級的非黨的羣衆組織，在這些組織背後站着無產階級的全體羣衆。忽視這些非黨的羣衆組織的作用和比重，尤其是忽視工人階級全體羣衆的作用和比重，並認爲黨可以代替無產階級的非黨的羣衆組織以及無產階級全體羣衆，那就是使黨脫離羣衆，使黨極度官僚化，使黨變成不容指責的力量，在黨內培植「混恰也夫主義」<sup>(註)</sup>、「阿拉克切也夫制度」<sup>(註)</sup>。

不用說，列寧和這種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毫無共同之處的。

第二、這就是說，不是像列寧同志那樣從轉義上、從黨領導工人階級的意義上去了解黨的專政，而是從「專政」這個名詞的本義上，即以暴力代替黨對工人階級的領導的意義上去了解黨的專政。專政這個名詞的本義是什麼呢？專政這個名詞的本義是依靠暴力的政權，因爲從專政這個名詞的本義

上看，沒有暴力的因素就沒有專政。黨能不能成爲以暴力對付本階級，以暴力對付工人階級的多數的政權呢？顯然不能。不然，這就不是對資產階級的專政，而是對工人階級的專政了。

黨是本階級的導師、領導者、領袖，而不是以暴力對付工人階級的多數的政權。不然，就談不上說服方法是無產階級政黨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的基本工作方法了。不然，就談不上黨應當使無產階級廣大羣衆信服黨的政策正確性，就談不上黨只有在執行這個任務的過程中才能認爲自己是能够領導無產階級進行戰鬥的真正羣衆性的黨。不然，黨對於無產階級勢必以命令和恐嚇代替說服的方法。這是荒謬的，是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觀完全不相容的。

請看季諾維也夫把黨的專政（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混爲一談的『理論』達到了何等荒謬的地步。不用說，列寧和這種『理論』是毫無共同之處的。

我在『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反對季諾維也夫的時候，就駁斥了這種荒謬絕倫的說法。在這裏聲明一下這篇論文的寫作和付印都是得到我黨領導同志的完全同意和贊許的，大概不是多餘的吧。

季諾維也夫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種說法就是如此。

再來看看第二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在一個方向上曲解列寧主義，而第二種說法則是在完全和前者相反的另一個方向上曲解列寧主義。這第二種說法就是季諾維也夫確定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領導，而是工人和農民兩個階級的領導。

季諾維也夫關於這一點說道：

「現在，國家生活的領導權、船舵、方針是在工人和農民這兩個階級手中。」（見季諾維也夫『工農聯盟和紅軍』一九二五年列寧格勒「波濤」出版社版第四頁）

能不能否認我國現在存在着無產階級專政呢？不，不能。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呢？在季諾維也夫看來，無產階級專政原來是兩個階級管理我們國家的生活。這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觀是否相容呢？顯然是不相容的。

列寧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統治。在無產階級和農民聯盟的條件下，這個無產階級獨裁表現於這個聯盟中的領導力量是無產階級和它的政黨，這個政黨不與也不能與其他力量或其他政黨分享國家生活的領導權。這一切都是如此的淺顯和不容爭辯，幾乎沒有必要再作解釋。季諾維也夫却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兩個階級的領導。那爲什麼把這個專政稱爲無產階級專政而不稱爲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呢？按照季諾維也夫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了解，我們就應當有兩個政黨的領導，以符合於兩個階級掌握「國家生活大權」的情況，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季諾維也夫的這個「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觀能有什麼相同之處呢？

不用說，列寧和這種「理論」是毫無相同之處的。

結論：不論季諾維也夫「理論」的第一種說法或第二種說法，都同樣說明季諾維也夫顯然是曲解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

## 五、托洛茨基的巫師箴言

其次，我想談一談托洛茨基的幾個含糊不清的聲明，這些聲明的目的實際上是要把人引入迷途。我想舉出幾件事實。

一件事實。關於托洛茨基如何看待自己孟什維克的過去這一問題，托洛茨基裝模做樣地回答說：『我加入布爾什維克黨這件事實本身……這件事實本身已經證明，我已經把過去所有那些使我和布爾什維主義分開的東西放在黨的門口了。』

『把所有那些使』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主義分開的東西放在黨的門口了』是什麼意思呢？列梅勒當時質問得對：『怎能把這些東西放在黨的門口呢？』真的，怎能把這些骯髒東西放在黨的門口呢？（笑聲）對這個問題托洛茨基始終沒有答覆。

此外，把托洛茨基的孟什維克殘餘放在黨的門口是什麼意思呢？他把這些東西放在黨的門口是爲了儲藏起來以備將來在黨內進行鬥爭之用呢，還是乾脆把它們拿去燒掉？看樣子，托洛茨基把它們放在黨的門口是爲了儲藏起來。否則，如何解釋托洛茨基入黨後不久就跟黨發生的並且直到現在還沒有停止的那些連續不斷的意見分歧呢？

請大家自己判斷吧。一九一八年，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與黨發生分歧，引起了黨內鬥爭。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托洛茨基在工會運動問題上與黨發生分歧，引起了全國的爭論。一九

二三年，托洛茨基在黨的建設和經濟政策的基本問題上與黨發生分歧，引起了黨內爭論。一九二四年，托洛茨基在對十月革命的評價問題和黨的領導問題上與黨發生分歧，引起了黨內爭論。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托洛茨基及其反對派聯盟在我國革命和當前政策的基本問題上與黨發生分歧。

對於一個『把所有那些使他和布爾什維主義分開的東西都已放在黨的門口』的人來說，意見分歧不是太多了嗎？

能不能說托洛茨基與黨發生的這些連續不斷的意見分歧是『偶然發生的事件』而不是合乎規律的現象呢？

恐怕不能這樣說。

那末，托洛茨基這個極端含糊的聲明追求的是什麼目的呢？

我想只有一個目的：混淆視聽，把聽眾引入迷途。

另一件事實。大家知道，從我們黨的思想體系來說，從我們革命的前途來說，關於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理論』的問題是有重要的意義的。大家知道，這個『理論』曾經妄圖而且繼續妄圖在我國革命動力問題上與列寧主義理論一爭上下。因此，人們屢次要托洛茨基表明他現在（一九二六年）對其不斷革命『理論』的態度，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托洛茨基在共產國際全會上發言時是怎樣回答的呢？回答得十分含糊。他說，不斷革命『理論』有某些『缺陷』，這個『理論』的某些方面在我們革命實踐中沒有得到證實。這樣說來，這個『理論』的某些方面雖然有『缺陷』，但這個『理論』的其他方

面並沒有「缺陷」，而且仍舊有效。但是，怎樣把不斷革命「理論」的某些方面和這個「理論」的其他方面分開來呢？難道不斷革命「理論」不是一套完整的觀點嗎？難道可以把不斷革命「理論」看做一隻箱子，比方說，它的兩角已經腐朽，而其餘兩角依然完整無缺嗎？其次，難道在這裏可以只作一個簡單的毫不負責的聲明，一般地提到有「缺陷」，而不說出托洛茨基所指的究竟是哪些「缺陷」，不說出他認為不斷革命「理論」究竟在哪些方面是不正確的嗎？托洛茨基說不斷革命「理論」有某些「缺陷」，可是他所指的究竟是什麼「缺陷」，他認為這個「理論」有哪些方面是不正確的，這一切他隻字未提。因此，應當把托洛茨基對於這個問題的聲明看做敷衍塞責的答覆，看做以「缺陷」這樣含糊不清、毫不負責的詞句來搪塞別人的企圖。

托洛茨基在這裏的舉止正像古時一些狡猾的巫師一樣，這些巫師總是用含糊不清的回答來搪塞問卜者，例如「渡河時一支大軍將被擊潰」。渡什麼河，誰的軍隊將被擊潰，那誰知道。（笑聲）

#### 六、季諾維也夫像小學生那樣引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

其次，我想談談季諾維也夫引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家的特殊手法。季諾維也夫這種手法的特點就是把一切時期和日子弄亂，攪做一團，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個別原理和公式同它們與現實的有機聯系分隔開來，把它們變為陳腐的教條，從而違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一基本要求。

請看幾件事實。

第一件事實。季諾維也夫在自己的演說中引證了馬克思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一書中的盡人皆知的一句話：『工人階級的任務（指社會主義的勝利。——斯大林註）在民族範圍內是不能完成的。』<sup>〔三三〕</sup>

其次，季諾維也夫從馬克思在一八五八年給恩格斯的信中摘引了下面一段話：

『對我們來說，困難的是下面這個問題：大陸上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並將立即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但由於在廣闊無比的領域內資產階級社會還在走上坡路，這個小小的角落裏的革命是不是一定會被鎮壓下去呢？』<sup>⊙</sup>（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集』俄文版第七十四頁至第七十五頁<sup>〔三三〕</sup>）

季諾維也夫引證了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所說的這幾段話並做出結論說：因此，就資本主義的一切時期來說，對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勝利的問題的解答都是否定的。

能不能說季諾維也夫了解了馬克思及其關於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勝利的問題的觀點和基本路線呢？不，不能這樣說。相反地，從這些引證中可以看出季諾維也夫完全沒有了解馬克思，他歪曲了馬克思的基本觀點。

從馬克思這幾段話中能不能得出結論說，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任何條件下，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內的勝利都是不可能的呢？不，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從馬克思的話中只能得出結論說，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還在走上坡路」的情況下，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勝利才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的運動由於事物發展的進程而改變了自己的方向，開始走下坡路，那怎麼辦呢？從馬克思的話中可以得出結論說，在這樣的條件下，否認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勝利的可能性的根據便消失了。

季諾維也夫忘記馬克思這幾段話是指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時期而言，當時整個資本主義是在向上發展，當時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未伴隨着像英國那樣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的腐朽過程，當時發展不平衡的規律還不是而且不能是瓦解資本主義的強有力的因素，像它以後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在帝國主義時期那樣。對於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時期來說，馬克思關於工人階級的基本任務不可能在個別國家內完成的話是完全正確的。我還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中就說過：在舊時，在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時期，對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勝利的問題的解答是否定的，而且解答得完全正確。可是現在，在目前的資本主義時期，當壟斷前的資本主義變成了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時候，能說整個資本主義現時還在向上發展嗎？不，不能這樣說。列寧對帝國主義經濟實質的分析說明，在帝國主義時期，整個資產階級社會是走下坡路的。列寧說得完全對：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列寧同志關於這一點說道：

「不難了解爲什麼帝國主義是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垂死的資本主義，因爲從資本主義中成



長起來的壟斷已是資本主義的垂死狀態，是它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開始。帝國主義造成的大規模的勞動社會化（即辯護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稱之為『互相錯綜』的東西），其含義也是一樣。」（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三卷第九十六頁）

整個向上發展的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是一回事。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是另一回事，這時，世界已被各資本主義集團瓜分，資本主義躍進式的發展需要以軍事衝突重分已被瓜分的世界，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各帝國主義集團間的衝突和戰爭，削弱着資本主義的世界戰綫，使它易被擊破，造成在個別國家內突破這一戰綫的可能。在那時，在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時期，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在現時，在帝國主義時期，在垂死的資本主義時期，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的勝利已成爲可能的了。

同志們，問題就在這裏，而季諾維也夫不願意了解的也就是這一點。

你們看，季諾維也夫像小學生那樣引證馬克思，拋開馬克思的觀點，抓住馬克思的個別詞句，不是作爲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作爲社會民主主義者來應用這些引文。

修正派引證馬克思的手法是什麼呢？修正派引證馬克思的手法就是離開一定時代的具體條件，從馬克思的個別原理中引出一些話來頂替馬克思的觀點。

季諾維也夫引證馬克思的手法是什麼呢？季諾維也夫引證馬克思的手法就是引證馬克思的詞句，割斷這些詞句與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發展條件的有機聯系，把它們變成教條，來頂替馬克思的

觀點。

我想這裏是用不着解釋的。

第二件事實。季諾維也夫從『共產主義原理』(一八四七年)中引證了恩格斯關於工人革命『不能在某一國家內發生』的話，把恩格斯的這些話和我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關於我們在蘇聯已經實現了恩格斯所提出的十二條要求的十分之九的聲明加以對比，並由此做出兩個結論：第一、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勝利是不可能的；第二、我在自己的聲明中粉飾了蘇聯的現時條件。

說到引自恩格斯的話，需要指出，季諾維也夫在解釋恩格斯這段話時所犯的錯誤，也和在解釋馬克思的話時所犯的錯誤一樣。顯然，在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時期，在資產階級社會整個向上發展的時期，恩格斯對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可能勝利的問題應當給以否定的解答。把恩格斯這個適用於舊的資本主義時期的原理機械地應用到新的資本主義時期即帝國主義時期，這就是歪曲恩格斯和馬克思的觀點，以適合於那些離開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時期的實際發展條件而引來的個別詞句。我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中已經說過，恩格斯的這個公式在當時是唯一正確的公式。可是應該了解，不能把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還談不上垂死的資本主義的時期和資本主義發展的現時期，即整個資本主義成了垂死的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時期相提並論。從前認為不可能的，現在在資本主義新的條件下已經成爲可能的和必要的了，這難道難以了解嗎？

你們看，季諾維也夫在這裏對待恩格斯，正如對待馬克思一樣，始終是忠於修正派的引證馬克思

主義經典著作家的手法的。

至於季諾維也夫的第二個結論，那他是直接歪曲了恩格斯關於工人革命的十二條要求或措施的。季諾維也夫把事情描繪成這樣，似乎恩格斯在他的十二條要求中提供了一個包括消滅階級、消滅商品生產以及消滅國家的詳盡的社會主義綱領。這是完全不對的。這完全曲解了恩格斯。在恩格斯的十二條要求中，沒有一個字提到消滅階級，消滅商品經濟，消滅國家，消滅各種各樣的私有制。相反地，恩格斯的十二條要求是以『民主』（恩格斯當時所理解的『民主』是指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階級的存在和商品經濟的存在為出發點的。恩格斯直截了當地說，他的十二條要求指的是直接『侵犯私有制』（而不是完全消滅它）和『保證無產階級的生存』（而不是消滅無產階級這個階級）。下面是恩格斯的話：

『無產階級革命，將來很可能發生的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現社會，並且只有在為廢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已創造出來之後，才能廢除私有制……首先無產階級革命將建立民主制度，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假如無產階級不能立即利用民主來實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證無產階級生存<sup>⊖</sup>的各種措施，那末，這種民主對於無產階級就會毫無用處。這些由現有條件中必然產生出來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接下去就是列舉大家已經知道的十二條要求或措施（見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

由此可見，恩格斯在這裏所說的不是消滅階級、國家、商品生產等等的詳盡的社會主義綱領，而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初步，是直接侵犯私有制、保證工人階級生存、鞏固無產階級政治統治所必需的初步措施。

結論只有一個：季諾維也夫曲解了恩格斯，把他的十二條要求說成詳盡的社會主義綱領。

我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結論中說的是什麼呢？我說的是恩格斯所提出的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初步的那些要求或措施，有十分之九已在我們蘇聯實現了。

這是不是說我們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呢？

顯然不是這個意思。

可見，忠於自己的引證手法的季諾維也夫，在說到我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聲明時犯了「小小」顛倒是非的毛病。

請看，季諾維也夫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特殊手法竟使他走到怎樣的地步。

季諾維也夫的引證手法使我想起了關於社會民主黨人的一個很可笑的「故事」，這個「故事」是瑞典一個革命的工團主義者在斯德哥爾摩講的，在一九〇六年我們黨的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的時候講的。這位瑞典同志把某些社會民主黨人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時所表現的書獃子氣描寫得很可笑，我們這些代表聽了，笑得全身發軟。「故事」的內容是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克里木海陸軍起義的時候。

水兵和步兵的代表去見社會民主黨人說：「近幾年來你們號召我們起義以反對沙皇制度，我們深信你們的號召是正確的，我們水兵和步兵約定起義，現在特來向你們請示。社會民主黨人慌張了起來，回答說他們不召開專門代表會議不能解決起義問題。水兵們示意說，不能再遲延了，事情已準備好了，如果他們得不到社會民主黨人明白的答覆，社會民主黨人不來領導起義，事情就會失敗。水兵和步兵隨即離去，等候指示，而社會民主黨人就召開代表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他們拿出『資本論』第一卷，拿出『資本論』第二卷，最後拿出『資本論』第三卷。他們尋找馬克思有關克里木、塞瓦斯托坡里的指示，有關克里木起義的指示。但是找遍三卷『資本論』，都沒有找到一個，簡直沒有找到一個有關塞瓦斯托坡里、有關克里木、有關水兵和步兵起義的指示。（笑聲）他們又翻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尋找指示，還是一點指示也沒有找到。（笑聲）怎麼辦呢？水兵們已經來了，等着答覆。結果怎樣呢？社會民主黨人只好承認，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們不能給水兵和步兵任何指示。瑞典同志結束自己的故事說：『海軍和步兵的起義就這樣失敗了。』（笑聲）

無疑地，這個故事誇大了事實。但是，同樣無疑地，這個故事一針見血地說中了季諾維也夫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法的主要毛病。

第三件事實。這裏談的是引證列寧著作的問題。季諾維也夫爲了從列寧著作中引出一大堆話把聽衆弄得『目瞪口呆』，用盡了一切辦法。看來季諾維也夫認爲引證愈多愈好，可是他極少注意到引文說的什麼，會引起什麼結果。如果細讀這些引文，那就不難了解，季諾維也夫從列寧著作中引證的

話，沒有一句（哪怕用暗示的方式）是有利於反對派聯盟現在的投降主義立場的。列寧曾說過，必須認爲專政的『經濟問題』的解決和蘇聯無產階級在解決這一問題上的勝利是有保證的。必須指出，季諾維也夫不知爲什麼沒有從列寧這段主要的話中引出一個字來。

季諾維也夫引證了列寧的小冊子『論合作制』裏說到我們蘇聯有一切必要的和足夠的條件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一段話。但他甚至沒打算用一點點心思來提出（哪怕暗示一下）這樣的問題：這段話說明什麼，把它引來對誰有利，對反對派聯盟有利，還是對聯共（布）有利。

季諾維也夫力圖證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從列寧著作中引來用以證明這個論點的那些話，却把自己的論點完全推翻了。

例如下面就是這些引文中的一段：

『我屢次說過：與各先進國家相比，俄國人開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是比較容易的，但是把它繼續下去，直到獲得最後勝利，即完全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那就要困難些。』<sup>①</sup>（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二八四頁）

季諾維也夫竟沒有想一想，這段話不是有利於反對派聯盟而是有利於黨的，因爲它不是說在蘇聯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而是說這種建設是困難的；並且這段話承認，在蘇聯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是一種不言而喻的事情。黨總是說，在蘇聯開始革命比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容易些，但是建成社會主義則困難些。這是不是說承認這個事實就等於否認在蘇聯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呢？當然不是。相反地，從這個事實只能得出結論說，儘管有困難，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

試問，季諾維也夫需要這類引證是爲了什麼呢？

大概是爲了用一大堆引證來把聽衆弄得『目瞪口呆』，把水攪渾。（笑聲）

但是，季諾維也夫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他引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家的那種非常可笑的手法，確定無疑地使他陷入困境，我想這一點現在是很明白的了。

### 七、季諾維也夫所理解的修正主義

最後談談季諾維也夫對『修正主義』這一概念的解釋。在季諾維也夫看來，凡是使馬克思或恩格斯的舊公式或個別原理更加完善，更加精確，尤其是用適合新情況的公式代替它們的都是修正主義。試問，爲什麼呢？難道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難道科學不是不斷發展，不是用新經驗豐富自己，使舊公式更加完善的嗎？原來他認爲『修正』就是『修改』，而要使舊公式更加完善，更加精確，就不能不把這些公式作某些修改，因此，凡是使舊公式更加精確、更加完善，凡是用新經驗和新公式豐富馬克思主義的都是修正主義。這一切當然是可笑的。但如果季諾維也夫置自己於可笑的境地，同時以爲自己是在和修正主義作鬥爭，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例如斯大林有沒有權利完全按照列寧主義的指示和基本路線，把他自己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公式（一九二四年）加以改變並使之更加精確呢？在季諾維也夫看來是沒有這個權利的。爲什麼呢？因爲改變舊公式並使之更加精確，就是修改這個公式，而照德文的意思，修改就是修正。斯大林豈不是顯然陷入了修正主義嗎？

由此看來，我們有一個關於修正主義的新的季諾維也夫的標準，這個標準使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修正主義罪名的威脅下必然陷於停滯不前的境地。

例如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中葉說，在資本主義向上發展的時期，社會主義在民族範圍內獲得勝利是不可能的；而列寧在一九一五年說，在資本主義向下沒落的時期，在垂死的資本主義時期，這種勝利是可能的，那末，列寧在對待馬克思來說是陷入修正主義了。

例如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中葉說，「歐洲大陸的任何一個國家或除英國以外的整個歐洲大陸在經濟方面所發生的」社會主義「變革不過是杯內風浪」<sup>(三)</sup>；而恩格斯後來根據階級鬥爭的新經驗改變了這種論點，說社會主義革命「將由法國人開始，而由德國人完成」，那末，恩格斯在對待馬克思來說是陷入修正主義了。

恩格斯說，社會主義革命將由法國人開始，而由德國人完成，列寧根據蘇聯革命勝利的經驗，改變了這個公式，代之以另一個公式，說社會主義革命已由俄國人開始，而由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完成，那末，列寧在對待恩格斯尤其在對待馬克思來說是陷入修正主義了。



請看列寧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吧：

「社會主義的偉大創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幾十年來考察工人運動的發展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成長，清楚地看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需要經過長期的分娩痛苦，經過長期的無產階級專政，摧毀一切舊東西，無情地消滅各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團結全世界的工人，全世界的工人則應當聯合自己的一切力量來保證徹底的勝利。他們並且說過，在十九世紀末葉，「將由法國人開始，而由德國人完成」，其所以由法國人開始，是因為法國人在幾十年的革命中已經養成奮不顧身的革命創造精神，使他們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先鋒隊。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國際社會主義力量的另一種結合。我們說，比較容易開始革命運動的，並不是那些有可能易於進行掠奪和有力收買本國工人上層分子的剝削國家……現·在·的·局·勢·與·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預·期·的·不·同·了，它把國際社會主義革命先鋒隊的光榮使命交給了我們——俄國的勞動的和被剝削的階級了；我們現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發展會多麼遠大；俄國人開始了，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將去完成，社會主義定將勝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四二八頁至第四二九頁）

你們看，列寧在這裏簡直「修改了」恩格斯和馬克思的話，照季諾維也夫的说法，他是陷入「修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正主義」了。

例如恩格斯和馬克思確定巴黎公社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大家知道，公社是由兩個黨領導的，其中沒有一個黨是馬克思主義的；然而列寧後來根據帝國主義條件下的階級鬥爭的新經驗，說稍微發達的無產階級專政，只有在一個政黨即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下才能實現，那末，列寧在對待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是陷入明顯的「修正主義」了。

列寧在帝國主義大戰以前會說聯邦制是不可採用的國家組織形式，而在一九一七年，根據無產階級鬥爭的新經驗，他改變了、修改了這個公式，說聯邦制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適當的國家組織形式，那末，原來列寧在對待自己和列寧主義來說是陷入「修正主義」了。

如此等等。

這樣，在季諾維也夫看來，馬克思主義不應當用新的經驗來豐富自己，凡是使馬克思主義某些經典著作家的個別原理和公式更加完善的都是修正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什麼呢？馬克思主義就是科學。如果馬克思主義不用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新經驗來豐富自己，如果它不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不從馬克思主義方法的角度來吸取這些經驗，馬克思主義這門科學能保持和發展嗎？顯然是不能的。

馬克思主義要求在保持馬克思主義觀點、保持馬克思主義方法的條件下根據新的經驗來改善和豐富舊公式，而季諾維也夫則相反，他保持字眼，以馬克思主義個別原理的字眼頂替馬克思主義的觀

點和方法，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以馬克思主義個別公式的字眼和個別原理的摘引頂替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路線，這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諷刺，這難道還用懷疑嗎？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正是針對季諾維也夫那樣的「馬克思主義者」。

季諾維也夫倒霉的地方就在於他不懂得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句話的意義和作用。

## 二 社會主義在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內勝利的問題

我已經說過反對派首領講話中所表現出來的反對派的個別錯誤和與事實不符的地方。我已在結論的第一部分即幾點意見中說明了這個問題。現在讓我直接來談本題。

### 一、帝國主義時期個別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

第一個問題就是帝國主義時期社會主義在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內勝利的可能性問題。你們知道，這裏所說的不是某一個國家，而是一切相當發達的帝國主義國家。

反對派在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問題上的主要錯誤在什麼地方呢？

反對派的主要錯誤在於他們不了解或者不願了解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時期的資本主義之間的全部差別，他們不懂得帝國主義的經濟實質，把資本主義的兩個不同的階段即帝國主義以前的階段和帝國主義階段混為一談。

反對派的這種錯誤產生了他們的另一種錯誤，即他們不懂得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的意義和作用，把均衡趨勢與這個規律對立起來，因而滾到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的立場上去了。

這兩個錯誤引起了反對派的第三個錯誤，即他們把根據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所得出的公式和原理機械地應用到帝國主義時期的資本主義，因此他們否認社會主義在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內勝利的可能性。

舊的壟斷前的資本主義和新的壟斷的資本主義，如用三言兩語來說明，其差別在哪裏呢？

差別在於：資本主義通過資本家龐大的壟斷聯合的發展代替了通過自由競爭的發展；財政資本、『腐朽的』資本代替了舊的、『文明的』、『進步的』資本；躍進式的發展，通過各資本主義集團以軍事衝突來重分已被瓜分的世界的發展，代替了資本『和平的』擴大和向『自由』土地的伸展；因此，垂死的資本主義，整個向下沒落的資本主義，代替了舊的整個向上發展的資本主義。

列寧關於這一點說道：

『讓我們回想一下，以往的「和平的」資本主義時代被現代的帝國主義時代所代替的基礎是

什麼呢？這就是自由競爭讓位於資本家的壟斷聯合，整個地上的世界（地球？——斯大林註）已被瓜分。顯然，這兩件事實（和因素）確實具有世界的意義，因為當資本能夠暢然無阻地擴大殖民地和奪取非洲等處未被佔據的土地的時候，當資本的集中還很薄弱、壟斷企業即龐大到能夠控制某一整個工業部門的企業還沒有產生的時候，自由貿易與和平競爭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這種壟斷企業的發生和成長……使以往的自由競爭成爲不可能，並破壞了它的基礎，而地球的瓜分又迫使從和平擴張轉到用武裝鬥爭來重分殖民地和勢力範圍。」（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二〇〇頁至第二〇一頁）

他繼續說道：

『現在已不能照過去那樣在平穩進化和逐步向新的國家擴展的資本主義的比較平靜的、文明的、和平的環境中生活了，因爲另一個時代已經來到。財政資本正在排擠並且要把某一國家排擠出列強的隊伍，奪取其殖民地和勢力範圍。』（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二〇二頁）由此就得出了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基本結論：

「不難了解爲什麼帝國主義是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垂死的資本主義，因爲從資本主義中成長起來的壟斷已是資本主義的垂死狀態，是它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開始。帝國主義造成的大規

○ 普爾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模的勞動社會化（即辯護士——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稱之爲「互相錯綜」的東西），其含義也是一樣。」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三卷第九十六頁）

我們的反對派倒霉的地方就在於他們不懂得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時期的資本主義之間的這種差別的整個重要性。

而我們黨的立場的出發點則是承認現代的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這一事實。

可惜，這還不是說資本主義已經死亡了。但是，毫無疑義，這是說整個資本主義不是走向復興而是走向死亡，整個資本主義不是向上發展而是向下沒落。

從這個總的問題就產生出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列寧主義者在講到帝國主義時期的發展不平衡時通常指的是什麼呢？

是不是指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水平有很大的差別，一些國家在發展上落後於其他一些國家，這種差別在日益加大呢？

不，不是指這一點。把帝國主義時期的發展不平衡和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水平的差別混爲一談，那是庸人的看法。反對派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把發展不平衡問題和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狀況水平的差別問題混淆起來，正是這種庸人的看法。反對派正是以這個糊塗觀念爲出發點而得出了一個極不正確的結論：過去的發展不平衡比在帝國主義時代更厲害。正因爲如此，托洛茨基在

十五次代表會議上說：『這種不平衡在十九世紀比在二十世紀更厲害。』（見托洛茨基在聯共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季諾維也夫當時也這樣斷言：『說在帝國主義時代開始以前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比較緩和，這是不正確的。』（見季諾維也夫在聯共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誠然，現在，在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爭論以後，反對派認為必須改變陣綫，因而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上發表了一種完全相反的意見，或者乾脆不提自己這種錯誤。例如托洛茨基在擴大全會上演說時說：『至於發展的速度，那末，帝國主義是無止境地加劇了這種不平衡性。』至於季諾維也夫，他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全會上的演說中也認為對這個問題隻字不提是最明智的辦法，雖然他不能不知道所爭論的正是帝國主義時期不平衡規律的作用是在增強還是在削弱的問題。但這只說明爭論多少教育了反對派，對反對派不是沒有益處的。

總之，不能把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和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狀況水平的差別問題混為一談。

能不能說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水平差別的減小和這些國家的日趨均衡是在減弱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呢？不，不能這樣說。這種發展水平上的差別是在加大還是在縮小呢？無疑是在縮小。均衡化是在上升還是在下降呢？無疑是在上升。均衡化的上升是不是和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的加強相矛盾呢？不，不相矛盾。相反地，均衡化正是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作用可能加强的背景和基礎。只有像我們的反對派那樣不懂得帝國主義經濟實質的人，才能把均衡化和帝國主義時

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對立起來。正因為落後國家在加速自己的發展並和先進國家取得均衡，正因為如此，一些國家為超過另一些國家而進行的鬥爭便尖銳起來，正因為如此，便造成了一些國家超過另一些國家並把它們從市場中排擠出去的可能，從而為軍事衝突、為削弱世界資本主義戰綫、為個別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者突破這一戰綫創造前提。誰不了解這個簡單的道理，誰就毫不了解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實質問題。

因此，均衡化是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加強的條件之一。

能不能說，帝國主義時期的發展不平衡就是一些國家按照通常的方式，即按照所謂進化的方式，不經過躍進，不經過戰爭災禍，不經過重新分割已被瓜分的世界而在經濟方面趕上另一些國家，然後超過它們呢？不，不能這樣說。這種不平衡在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時期就已經有了，這一點馬克思是知道的，列寧在他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sup>(26)</sup>一書中也曾寫過。當時資本主義的發展是相當平穩、相當緩慢的，一些國家是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不經過躍進，不一定經過世界規模的軍事衝突而超過另一些國家的。現在說的不是這種不平衡。

那末，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究竟是什麼呢？

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就是：一些國家跳過另一些國家，一些國家很快地被另一些國家從世界市場上排擠出去，以軍事衝突和戰爭災禍的方式週期性地重新分割已被瓜分的世界，帝國主義陣營內部的衝突加深和加劇起來，世界資本主義戰綫削弱，個別國家的無產階級可能突破這條



戰綫，社會主義可能在個別國家內獲得勝利。

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規律的基本要點是什麼呢？

第一、世界已被各帝國主義集團瓜分完畢，世界上不再有『自由的』、未被佔據的土地了；爲了佔據新的市場和原料產地，爲了擴展勢力，必須用武力從別國奪取這些土地。

第二、技術的空前發展和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水平的日趨均衡，使一些國家可能並易於跳過另一些國家，使不很強盛但在迅速發展的國家可能並易於排擠比較強盛的國家。

第三、各個帝國主義集團間勢力範圍的劃分常常和世界市場上新的力量對比發生衝突，爲了在勢力範圍的劃分和新的力量對比之間求得『平衡』，必須用帝國主義戰爭來週期性地重分世界。

因此，帝國主義時期發展的不平衡是在加強和加劇起來。

因此，帝國主義陣營內的衝突是不能用和平方式解決的。

因此，鼓吹可能和平解決這些衝突的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是不能成立的。

由此應得出結論：否認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的加強和加劇這一事實的反對派是滾到超帝國主義論的立場上去了。

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的特點就是如此。

各個帝國主義集團是在什麼時候把世界瓜分完畢的呢？

列寧說是在二十世紀初葉把世界瓜分完畢的。

事實上第一次提出重分已被瓜分的世界的問題是在什麼時候呢？

是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時期。

由此得出結論：只有在二十世紀初葉才能發現和論證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

我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中已談到這一點，當時我說，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是列寧同志發現和論證的。

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是重分已被瓜分的世界的初次嘗試。這次嘗試使資本主義付出的代價是俄國革命的勝利與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和附屬國內的基礎的破壞。

不用說，繼重分世界的第一次嘗試之後必有第二次嘗試，並且帝國主義陣營已在進行這種準備工作。

無庸懷疑，重分世界的第二次嘗試將使世界資本主義付出的代價比第一次大得多。

從帝國主義條件下的不平衡規律看來，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就是如此。

可見這種前途直接使社會主義可能在帝國主義時期的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

大家知道，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個別國家內勝利的結論是直接從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中得出的。列寧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使所有一切社會民主黨人失去任何根據，來玩耍社會主義不可能在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種「理論的」把戲。

列寧在一九一五年所寫的綱領性的論文中關於這一點說道：

『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頁）

結論是：

（甲）反對派的基本錯誤是他們看不見資本主義兩個階段的差別，或者迴避對這種差別的強調。爲什麼他們要迴避這一點呢？因爲從這種差別裏會得出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來。

（乙）反對派的第二個錯誤是他們不懂得或者低估了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規律的決定意義。爲什麼他們低估這一點呢？因爲正確估計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規律就會得出社會主義可能在個別國家內勝利的結論。

（丙）由此產生了反對派的第三個錯誤，即否認社會主義在帝國主義時期的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內勝利的可能性。

誰否認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勝利的可能性，誰就不得不對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規律的意義默不作聲，而誰對不平衡規律的意義默不作聲，誰就不能不抹殺存在於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和帝國主義時期的資本主義之間的差別。

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問題就是如此。

這個問題有什麼實際意義呢？

從實際上說，在我們面前擺着兩條路綫。

一條路綫是我們黨的路綫，它號召個別國家的無產者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機警地注視事變的進程，並準備在有利條件下獨立地突破資本戰綫，奪取政權，動搖世界資本主義的基礎。

另一條路綫是我們的反對派的路綫，他們對獨立突破資本主義戰綫的適當性散播一種懷疑的情緒，並號召個別國家的無產者等待「總爆發」的時機。

我們黨的路綫是使個別國家的無產者加強對本國資產階級的革命進攻並發揮主動性的路綫，而我們的反對派的路綫則是使個別國家的無產者在反對本國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消極等待並限制主動性的路綫。

第一條路綫是使個別國家的無產者積極化的路綫。

第二條路綫是削弱無產階級革命意志的路綫，是消極等待的路綫。

列寧萬分正確地寫了一段和我們目前的爭論有直接關係的至理名言：

「我知道，當然有一些自以為很聰明，甚至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聰明人，他們硬說在世界各國的革命爆發以前不應奪取政權。他們並不懷疑他們這樣說就是脫離革命而轉到資產階級方面

去了。等待勞動階級完成世界規模的革命，——這就是使大家在等待中停滯不前。這是荒謬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七卷第三三六頁）  
列寧的這段話是不應該忘記的。

## 二、季諾維也夫怎樣「改正」列寧的話

我已經談過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現在我想談談季諾維也夫怎樣歪曲或者「改正」列寧那篇論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和社會主義在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內勝利的主要論文。我指的是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寫的並在我們討論時幾次引證過的那篇著名論文「論歐洲聯邦口號」。季諾維也夫責備我對這篇論文引證得不完全；同時他力圖給這篇論文作一種只能說是完全歪曲列寧的觀點、完全歪曲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勝利問題的基本路線的解釋。讓我把這段話全部引來，並把上次由於時間短促而被我放過的幾行用着重號標出。這段話就是：

「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者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然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國家的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掀起反對資本家的起義，必要時甚至用武力去反對剝削階級及其國家。無產階級在其中推翻資產階級而獲得勝利的那個社會的政治形式將是民

主·共·和·國，它·日·益·集·中·這·一·民·族·或·這·些·民·族·的·無·產·階·級·力·量·去·反·對·那·些·還·沒·有·轉·向·社·會·主·義·的·國·家。沒·有·無·產·階·級·這·一·被·壓·迫·階·級·的·專·政，便·不·能·消·滅·階·級。沒·有·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各·落·後·國·家·的·相·當·長·期·的·頑·強·鬥·爭，便·不·能·實·現·各·民·族·在·社·會·主·義·中·的·自·由·聯·合。」（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一一頁）

季諾維也夫在引證這段話時作了兩點解釋：第一點是關於民主共和國的，第二點是關於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的。

我們先談第一點解釋。季諾維也夫以為既然列寧在這裏說的是民主共和國，那末最多只能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同時季諾維也夫恬不知恥地在這裏做出極其含糊而又固執的暗示，說列寧在這裏大概指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這對不對呢？當然不對。要反駁季諾維也夫這個不大正派的暗示，只須讀一下引文中談到『各社會主義共和國對各落後國家的鬥爭』的最後兩行就夠了。顯然，列寧說的民主共和國不是指資產階級共和國，而是指社會主義共和國。

列寧在一九一五年還不知道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列寧早在一九〇五年就知道個別的蘇維埃是推翻沙皇制度時期的革命政權的萌芽。但他當時還不知道在全國範圍內聯合起來的蘇維埃政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列寧在一九一七年才發現蘇維埃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他在這年夏天，主要在其『國家和革命』<sup>(2)</sup>一書中詳盡地研究了過渡社會的這一新的政治組織形式問題。其實這也就說明列寧在上面引文中所說的不是蘇維埃共和國，而是民主共和國，

從引文中可以看出這指的是社會主義共和國。列寧在這裏的做法，正像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做法一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前認爲一般的共和國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的政治組織形式，而在巴黎公社以後解釋這個名詞則說這種共和國應當是巴黎公社式的共和國。我更不必說，假如列寧在那段話裏指的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那就談不到「無產階級專政」、「剝奪資本公司」等等了。

可見季諾維也夫想「改正」列寧的話的企圖不能說是成功的。

現在談談季諾維也夫的第二點解釋。季諾維也夫硬說列寧同志的「組織社會主義生產」這句話不應當像平常人一般所應了解的那樣去了解，而應當有所不同，應當了解成這樣：列寧在這裏所指的只是着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爲什麼，根據什麼，季諾維也夫並沒有說明。我得聲明：季諾維也夫在這裏又一次企圖「改正」列寧的話。上面引文直截了當地說道：「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然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這裏說的是「組織了」，而不是「組織着」。是否還需要證明這中間有差別呢？假如列寧指的只是着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那他就會說「組織着」，而不會說「組織了」，這是否還需要證明呢？可見列寧指的不單是着手組織社會主義生產，而且是可能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可能在個別國家內建成社會主義生產。

可見季諾維也夫想「改正」列寧的話的第二個企圖也應當認爲是慘敗了。

季諾維也夫竭力用「不能靠仙法在兩星期或兩個月內建設社會主義」這類笑話來掩蓋自己「改

正』列寧的話的企圖。恐怕季諾維也夫需要這類笑話是爲了『在敗局中故作鎮靜』。季諾維也夫究竟在什麼地方找到了打算在兩星期、兩個月或兩年內建設社會主義的人呢？假如世界上真有這種人，他爲什麼不指出他們來呢？他不指出他們來，是因爲世界上沒有這種人。季諾維也夫需要這類捏造的笑話是爲了掩蓋其『改正』列寧和列寧主義的『工作』。

總之：

(甲) 列寧根據帝國主義時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在其『論歐洲聯邦口號』那篇主要論文中得出了社會主義可能在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結論；

(乙) 列寧所說的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的勝利，是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剝奪資本家和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同時這一切任務並不是最終目的，而是用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和幫助全世界無產者與資本主義作鬥爭的手段；

(丙) 季諾維也夫企圖把列寧主義的這些原理截頭去尾和『改正』列寧的話，使之適合於目前反對派聯盟的半孟什維克的立場。然而實行這種企圖時所使用的手段是拙劣的。

我認爲再解釋是多餘的了。

### 三 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同志們，現在讓我談談我們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問題。

### 一、反對派的「手腕」和列寧黨的「民族改良主義」

托洛茨基在發言時說，斯大林的最大的錯誤是關於在一個國家即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這樣看來，這裏所說的並不是列寧關於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理論，而是斯大林的一種誰也不知道的「理論」。我對這一點的了解是這樣：托洛茨基的目的是要反對列寧的理論，但公開反對列寧是一件冒險的事情，於是他決定裝出和斯大林的「理論」作鬥爭的樣子來進行這一鬥爭。托洛茨基想藉此使自己便於和列寧主義作鬥爭，想通過批判斯大林的「理論」來掩蓋這個鬥爭。實際情況正是這樣：這和斯大林毫無關係，根本談不到什麼斯大林的「理論」，斯大林從未抱過在理論上創造什麼新東西的奢望，他只是不顧托洛茨基修正主義的掙扎，竭力促使列寧主義在我們黨內獲得完全勝利。這一點，我想在下面加以說明。現在要指出的是：托洛茨基關於斯大林的「理論」的聲明是一種手腕，一種詭計，一種怯懦的笨拙的詭計，他打算用這種詭計來掩蓋他與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勝利的理論所作的鬥爭，這一鬥爭從一九一五年就開始並一直繼續到現在。托洛茨基的這種手法是不是老老實實的論戰的表現，讓同志們來判斷吧！

我們黨對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問題的決議是以列寧同志的綱領性的名著為出發點的。列寧在這些著作中說：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的勝利是可能的，就解決無產階級

專政的經濟問題來說，這一專政的勝利是有保證的；我們蘇聯無產者具有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

列寧在其著名論文中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勝利的可能性問題的那一段話，我剛才引證過了，在這裏我就不重複了。這篇論文寫於一九一五年。這篇論文說，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獲得勝利，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剝奪資本家並組織社會主義生產，這一切都是可能的。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就是在同一年即一九一五年發表文章反對列寧這篇論文，稱列寧的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的理論爲『民族狹隘性』的理論。

試問，這和斯大林的『理論』有什麼關係呢？

其次，我在報告中還從列寧的名著『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裏摘引了一段話，在那裏列寧直接肯定地說，就解決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問題來說，蘇聯無產階級的勝利應該認爲是有保證的。這篇著作寫於一九一九年。下面就是這段引文：

『不管各國的資產者及其公開的和暗藏的幫兇們（第二國際的『社會主義者』）怎樣誣蔑，怎樣造謠，有一點是不容懷疑的：從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經濟問題來看，我國已經有了共產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保證。全世界資產階級所以猖狂地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組織軍事進攻和陰謀等等來反對布爾什維克，正是由於它完全懂得要是不用武力壓倒我們，我們在改造社會經濟方面就必然獲得勝利。可是資產階級要這樣來壓倒我們是辦不到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

卷第九十頁)

你們可以看見，列寧在這裏直接說到蘇聯無產階級在改造社會經濟方面、在解決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問題方面是可能獲得勝利的。

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和整個反對派是不同意這段引文的基本論點的。

試問，這和斯大林的「理論」有什麼關係呢？

最後，我從列寧在一九二三年寫的著名小冊子「論合作制」中摘引了一段話。這段話是這樣的：

「的確，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掌握着國家政權，無產階級和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有領導農民的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經過合作社，僅僅經過合作社，經過我們從前鄙視為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視的合作社來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嗎？這還不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sup>①</sup>（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二八頁）

你們可以看見，這段話使人們對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不會再有任何懷疑。

你們可以看見，這段引文列舉了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因素：無產階級政權，無產階級政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權掌握的大生產，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盟，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合作社。

不久以前，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托洛茨基企圖把列寧著作中的另一段話即「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八四頁）和這段話對立起來。把這兩段話互相對立起來就是曲解列寧『論合作制』這本小冊子的基本意思。難道電氣化不是大生產的組成部分嗎？難道在我國沒有集中在無產階級政權手裏的大生產，電氣化一般是可能的嗎？列寧在『論合作制』這本小冊子裏說大生產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因素之一，這句話本身就包含着電氣化，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大家知道，反對派是正進行多少公開的而多半是隱蔽的鬥爭，來反對摘自列寧的小冊子『論合作制』的這段引文所闡明的基本論點的。

試問，這和斯大林的『理論』有什麼關係呢？

列寧主義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基本論點就是如此。

黨斷定托洛茨基和反對派聯盟的某些衆所周知的論點，如『在民族國家範圍內建設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是在理論上爲民族狹隘性辯護』，『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保持政權』（托洛茨基），是和列寧主義的上述論點根本矛盾的。

黨肯定指出反對派聯盟的這些論點是我們黨內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表現。

黨肯定指出托洛茨基關於『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的公式是完全和列寧主義背道而馳

的。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依賴『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援助』是什麼意思呢？如果歐洲無產階級在最近幾年內不能奪取政權，那怎麼辦呢？能不能無限期地等待西方革命勝利而讓我國革命開空車呢？能不能指望我國資產階級也同意等待西方革命勝利而放棄其反對我國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的活動和鬥爭呢？從托洛茨基這個公式中產生出來的前途，豈不是在西方革命不能迅速勝利的時候，我們黨就逐步地把自己的障地讓給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然後放棄政權嗎？

這裏有兩條完全不同的路綫，一條是黨和列寧主義的路綫，另一條是反對派和托洛茨基主義的路綫，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我在做報告時問過托洛茨基，現在還要問他：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五年認為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勝利的可能性的理論是『民族狹隘性』的理論，這難道不是真的嗎？但是我沒有得到答覆。爲什麼呢？難道默不作聲就是論戰中有勇氣的表现嗎？

其次，我問過托洛茨基，現在還要問他：不久以前，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他在衆所周知的告反對派的文件中再度責備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是『民族狹隘性』的理論，這難道不是真的嗎？但是這次我也沒有得到答覆。爲什麼呢？是否因爲默不作聲也是托洛茨基的一種『手腕』呢？

這一切說明什麼呢？

說明托洛茨基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基本問題上仍然是站在他那反列寧主義的舊立場上的。

說明托洛茨基沒有勇氣直接反對列寧主義，而企圖藉批評事實上不存在的斯大林的『理論』來掩

蓋這一鬥爭。

現在來談談另一位「耍手腕的」加米涅夫。他大概受了托洛茨基的感染，也要起手腕來了。但他的手腕比托洛茨基耍得還要笨拙。托洛茨基企圖責備斯大林一個人，而加米涅夫竟責備全黨，說黨「以民族改良主義的前途頂替國際革命的前途」。大家瞧，我們黨原來是以民族改良主義的前途頂替國際革命的前途。因為我們黨是列寧的黨，因為黨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決議完全以列寧的著名原理為依據，於是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就是民族改良主義的理論了。列寧是「民族改良主義者」——加米涅夫就是拿這樣愚蠢的話來對待我們的。

我們黨有沒有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決議呢？是的，有決議，而且有非常明確的決議。這些決議是什麼時候被黨通過的呢？這些決議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在我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通過的。我指的是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著名決議。這項決議是不是列寧主義的呢？是的，是列寧主義的，因為這一點像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樣的權威人士都能給我們作證，季諾維也夫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會做報告維護這項決議，加米涅夫在這次代表會議上擔任主席並在表決時贊成這項決議。

為什麼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沒有設法揭發黨，指出它和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一致通過的（這是人所共知的）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決議有矛盾有分歧呢？

黨有一個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特別的決議，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表決時也贊成這

項決議，現在他們兩人責備黨是民族改良主義，爲什麼他們不把黨的這個重要文件，即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顯然完全是列寧主義的決議當做他們的論據呢？看來這樣做是再容易不過的了。

你們是否注意到整個反對派，特別是加米涅夫，避開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像貓兒避開熱粥一樣？（笑聲）爲什麼他們那樣懼怕這個根據季諾維也夫的報告並在加米涅夫的積極贊助下通過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呢？爲什麼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對於這項決議連提都不敢提呢？難道這項決議不是論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嗎？難道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不是我們辯論中引起爭執的基本問題嗎？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事情是這樣的：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一九二五年贊成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後來則背棄這項決議，因而也就背棄列寧主義，轉到托洛茨基主義方面去了，現在他們惟恐被人揭穿，對於這項決議連提也不敢提了。

這項決議說些什麼呢？

下面就是這項決議中的一段：

「一般說來，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不是指最後勝利）是絕對可能的。」

其次：

「……兩個直接對立的社會制度的存在，經常引起資本主義封鎖、其他種種經濟壓力、武裝干涉和復辟的危險。因此，幾個國家內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唯一保障，即免除復辟的唯一保障。但由此決不能得出結論說，在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中，如果沒有技術上經濟上比較發達的國家的「國家援助」<sup>①</sup>（托洛茨基），就不可能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高漲只有無產階級在歐洲幾個最重要的國家內獲得勝利以後，才會是可能的」這一論斷（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組成部分，這種論斷是要使蘇聯無產階級在目前採取聽天由命的消極態度。列寧同志反駁這一類的「理論」說：「他們在西歐社會民主黨發展時期背得爛熟的一條論據，已成爲他們萬古不變的金科玉律。這條論據就是我們還沒有成長到實現社會主義的地步，或像他們的各種『博學的』先生們所說的那樣，我們還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的經濟前提」（『評蘇漢諾夫的札記』）。（見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的決議而產生的任務』的決議<sup>②</sup>）可見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確切地說明了列寧主義關於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問題的基本原理。

可見決議認爲托洛茨基主義是與列寧主義相反的東西，而決議中一系列的論點都是以直接否定

① ② 膚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托洛茨基主義的原則爲出發點的。

可見決議完全反映了現在重新掀起的關於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問題的爭論。

你們知道，我的報告是以這個決議的指導性的原理爲基礎的。

你們大概還記得我在報告中特別提到了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責備了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說他們違反了這項決議，背棄了這項決議。

爲什麼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不設法消除這種責難呢？

秘密究竟在哪裏呢？

秘密就在於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早已背棄了這項決議，並且一背棄了這項決議就轉到托洛茨基主義方面去了。

因爲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不是列寧主義的，那末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既然在表決時贊成了這項決議，也就不是列寧主義者了；

或者這項決議是列寧主義的，那末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既然背棄了這項決議，也就不再是列寧主義者了。

有幾位發言人（里澤似乎也在內）在這裏說，不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轉到托洛茨基主義方面去了，相反地，是托洛茨基轉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方面去了。同志們，這完全是胡說。加米涅夫

和季諾維也夫背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決議這一事實，正是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轉到托洛茨基主義方面去的直接證據。

總之：

離開了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決議中所規定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問題方面的列寧主義路線的是誰呢？

原來是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

以托洛茨基主義「頂替國際革命前途」的是誰呢？

原來是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

加米涅夫現在叫嚷我們黨的「民族改良主義」，這是因為他企圖藉此轉移同志們對他的罪過的注意並嫁禍於人。

正因為如此，加米涅夫說到我們黨是「民族改良主義」的「手腕」乃是一種詭計，一種既醜惡又笨拙的詭計，這種詭計的用意是在以叫喊我們黨的「民族改良主義」來掩蓋自己背棄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背棄列寧主義而轉到托洛茨基主義方面去的行爲。

## 二、我們正在蘇聯建立並能建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我在報告中說過，社會主義的政治基礎在我國已經建立了，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我說過，社會

主義的經濟基礎還遠沒有建立，還必須把它建立起來。其次，我說過，問題因此是這樣的：我們有可能用本身的力量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最後，我說過，如果用階級語言來述說這個問題，那就是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有沒有可能以本身的力量戰勝我們蘇聯的資產階級呢？

托洛茨基在其演說中斷言，我說戰勝蘇聯資產階級是指在政治上戰勝它。這當然是不對的。這是托洛茨基醉心於派別活動的表現。從我的報告中可以看出，我說戰勝蘇聯資產階級是指在經濟上戰勝它，因為在政治上它已經被戰勝了。

在經濟上戰勝蘇聯資產階級是什麼意思呢？換句話說，在蘇聯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什麼意思呢？

『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就是把農業和社會主義工業結合為一個整體經濟，使農業服從社會主義工業的領導，在農產品和工業品交換的基礎上調整城鄉關係，堵死和消滅階級首先是資本藉以產生的一切孔道，最後造成直接消滅階級的生產條件和分配條件。』（見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上的報告①）

這就是我在報告中給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實質所下的定義。

這個定義確切地說明了列寧在其著名的『論糧食稅』小冊子綱要②中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實

① 見本卷第二十一頁至第二十二頁。——編者註。

質」、「經濟基礎」所下的定義。

這個定義是否正確，我們能否指望我國有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可能性，——這就是現時我們意見分歧的基本問題。

托洛茨基甚至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他乾脆避開了這個問題，大概他認為默不作聲是比較明智的。至於我們正在建立並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這至少從下列幾點可以看出：

(甲) 我們社會主義化的生產是聯合的大生產，我國非國有化的生產則是分散的小生產，大家知道，大生產而且是聯合的大生產對小生產佔優勢，這是不容爭辯的事實；

(乙) 我們社會主義化的生產已在領導並開始控制小生產，無論城市的或鄉村的小生產都是一樣；

(丙) 在我國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與資本主義成分作鬥爭的戰綫上，前者對後者佔有無疑的優勢，並在步步前進，在生產或流通方面不斷戰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

至於促使我國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戰勝資本主義成分的其他一些因素，我就不談了。有什麼理由推斷說戰勝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的過程今後不會再延續下去呢？

托洛茨基在發言時說：

『斯大林說，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就是力求消滅階級和國家，就是戰勝我國的資產階級。是的，同志們，但是要知道國家是需要軍隊去反對國外的敵人的。』（引自速記記錄。——斯大

林註)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從這段話裏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因為建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就是消滅階級和國家，因為我們仍然需要軍隊來保衛社會主義祖國，可是沒有國家就不能有軍隊（托洛茨基這樣想），所以在武裝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必要性還沒有消失以前，我們是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

同志們，這是把一切概念混淆起來了。或者在這裏把國家了解為不過是武裝保衛社會主義社會的機構。這是荒謬的，因為國家首先是一個階級反對其他階級的工具，不言而喻，既然沒有階級，也就不會有國家。或者在這裏認為沒有國家就不可能有保衛社會主義社會的軍隊。這也是荒謬的，因為從理論上說來，完全可以有這樣的社會狀態：沒有階級，沒有國家，但是有保衛無階級的社會免於外敵侵犯的武裝人民。社會學提供不少的例子，說明人類歷史上有過沒有階級沒有國家但用某種方法防禦外敵侵犯的社會。未來的無階級的社會也將是這樣，它雖然沒有階級和國家，但仍可以有防禦外敵侵犯所必需的社會主義的民兵。我認為我國發展到這種地步是很少可能的，因為無疑地，我國社會主義的建設成就，尤其是社會主義的勝利和階級的消滅，——這一些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事實，不能不引起資本主義國家無產者追求社會主義的強烈的願望，不能不引起其他國家革命的爆發。但是從理論上說來，完全可以有這樣的社會狀態：沒有階級和國家，却可能有社會主義的民兵。

而這個問題在我們的黨綱中也有一定的說明。黨綱中是這樣說的：

「紅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它不能不有公開的階級性質，即完全要由無產階級和接近無產階級的半無產的農民階層組成。只有在階級消滅以後，這類階級軍隊才能變為全民的社會主義的民兵。」<sup>①</sup>（見『聯共（布）黨綱』（三））

托洛茨基大概忘記了我們黨綱中的這一條。

托洛茨基在發言時談到我國國民經濟對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依賴，硬說「我們正在日益脫離孤立的戰時共產主義而和世界經濟結合起來」。

這樣說來，有資本主義成分和社會主義成分的鬥爭的我國國民經濟，正在和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結合起來。我所以講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是因為現實世界上並沒有另一種世界經濟。

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荒謬的。這是托洛茨基醉心於派別活動的表現。

誰也不否認我國國民經濟對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依賴是存在的。過去和現在誰也不否認這一點，正像誰也不否認每個國家和每個國家的國民經濟（美國的國民經濟也不例外）對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的依賴是存在的一樣。但這種依賴是雙方面的。不只是我們的經濟依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也依賴我們的經濟，依賴我們的石油、我們的糧食、我們的木材以及我們廣大的市場。比方說，我們從『美孚石油公司』那裏得到貸款。我們從德國資本家那裏得到貸款。但我們得到貸款，不

<sup>①</sup> 滑重號是我加的。 斯大林。

是因為我們的眼睛生得漂亮，而是因為資本主義國家需要我們的石油，需要我們的糧食，需要我們的市場來銷售裝備。不可忘記我國佔世界六分之一的面積，是一個廣大的銷售市場，資本主義國家不和我們的市場保持某種聯系是不行的。這一切就是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國經濟的依賴。在這裏依賴是雙方面的。

這是不是說我國國民經濟對資本主義國家的依賴使我國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呢？當然不是這個意思。以為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絕對閉關自守、絕對不依賴周圍各國國民經濟的東西，這就是愚蠢之至。能不能斷言社會主義經濟絕對不會有任何輸出和輸入，不會輸入本國沒有的產品，因而也不會輸出自己的產品呢？不，不能這樣斷言。而什麼是輸出和輸入呢？這是一些國家依賴另一些國家的表現。這是經濟上相互依賴的表現。

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也是這樣。你們不能設想一個沒有輸出和輸入的國家。就拿世界上最富的國家美國來說也是如此。能不能說現在的資本主義國家譬如英國或美國是絕對不依賴他國的國家呢？不，不能這樣說。為什麼呢？因為它們依賴輸出和輸入，它們依賴其他國家的原料（例如美國依賴橡膠和其他原料），它們依賴銷售市場以銷售自己的裝備和其他成品。

這是不是說既然沒有絕對不依賴他國的國家，也就不能有各個國家國民經濟的獨立性呢？不，不是這個意思。我國依賴其他國家，正像其他國家依賴我國國民經濟一樣，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國因而喪失了或就要喪失自己的獨立性，它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它應當變成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的小螺

絲釘。應該把各國彼此間的依賴性和各國的經濟獨立性區別開來。否認各個國民經濟單位的絕對不依賴，並不等於也不能等於否認這些單位的經濟獨立性。

但是托洛茨基不僅說到我國國民經濟的依賴性，他還把這種依賴性曲解為我國經濟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結合。把我國國民經濟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結合起來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把我國經濟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屬品。可是，難道我們國家是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屬品嗎？當然不是！同志們，這是愚蠢的。這是不嚴肅的。

假如這是對的，我們就沒有任何可能來保護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我們對外貿易的壟斷、我們國有化的運輸、我們國有化的信貸、我們對經濟的有計劃的領導。

假如這是對的，我們就已走上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蛻化成普通資本主義工業的道路。

假如這是對的，我們就不會在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成分和資本主義成分作鬥爭的戰綫上獲得勝利。

托洛茨基在發言時說：「實際上我們將始終處於世界經濟的控制之下。」

這樣說來，我國國民經濟將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控制之下發展，因為目前世界上除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以外再沒有其他的世界經濟。

這對不對呢？不，不對。這是資本主義豺狼的夢想，這種夢想是永遠不會實現的。

什麼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控制呢？資本家嘴裏的控制不是一句空話。資本家嘴裏的控制是一



種實在的東西。

資本主義的控制首先就是財政上的控制。可是，難道我們的銀行不是國有化的嗎？難道它們是在歐洲資本主義銀行的領導下進行工作嗎？財政上的控制就是在我國設立各個資本主義大銀行的分行，就是設立所謂「女兒」銀行。可是，難道我國有這樣的銀行嗎？當然沒有！不但沒有，而且只要蘇維埃政權存在，就永遠不會有。

資本主義的控制就是控制我們的工業，使我們社會主義工業非國有化，使我們運輸業非國有化。可是，難道我們的工業不是國有化的嗎？難道它不正是作為國有化的工業而在發展嗎？難道有人打算把我們國有化的企業，即使是一個企業，變為非國有化的嗎？當然，我不知道在托洛茨基那裏，在租讓委員會裏有什麼打算。（笑聲）不過只要蘇維埃政權存在，破壞國有化的人就不能在我國立足，這一點可以不必懷疑。

資本主義的控制就是有權支配我們的市場，就是取消我們對外貿易的壟斷。我知道，西方的資本家在竭力衝破對外貿易壟斷的鐵壁時曾不止一次碰得頭破血流。大家知道，對外貿易的壟斷是我們年輕的社會主義工業的盾牌和屏障。可是，難道資本家在取消對外貿易壟斷這件事情上已經獲得勝利了嗎？只要蘇維埃政權存在，對外貿易壟斷無論如何要長久存在下去，這難道不易理解嗎？

最後，資本主義的控制就是政治上的控制，就是使我國喪失政治上的獨立性，使我國的法律適合國際資本主義經濟的利益和口味。可是，難道我國不是一個政治上獨立的國家嗎？難道我們的法律

不是根據我國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的利益來制定的嗎？爲什麼不舉出事實，即使是一個事實，來說明我國喪失了政治上的獨立性呢？讓他們舉舉看吧。

資本家就是這樣理解控制的，當然，這裏是說實際的控制，而不是空談什麼有名無實的控制。

如果說的是這種實際的資本主義控制（也只能是這種控制，因爲只有蹩腳的文人才能空談有名無實的控制），那末我應當聲明：在我國沒有這種控制，只要我們的無產階級存在，只要我們有蘇維埃政權，永遠也不會有這種控制。（鼓掌）

托洛茨基在發言時說：

『現在所說的是要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包圍中建成孤立的社會主義國家。要達到這一點，只有使這個孤立的國家的生產力超過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因爲從前途上看，只有生產力比舊經濟制度的生產力更爲強大的那種國家，那種新的社會形態才會不止鞏固一年或十年，而會鞏固半世紀甚至一世紀。』（見托洛茨基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上的演說速記記錄）

這樣說來，要有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才能在生產力發展方面實際證明自己優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

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混淆了一切概念和前途。

封建經濟制度爲了證明自己比奴隸經濟制度優越，大約費去了二百年，也許略少些。不這樣也不可能，因爲當時發展的速度極爲緩慢，而生產的技術又非常原始。

資產階級經濟制度爲了證明自己比封建經濟制度優越，大約費去了一百年，或者不到一百年。還在封建社會內部，資產階級經濟制度就已顯示出它比封建經濟制度優越，並且優越得多。這裏時間長短的不同是因爲資產階級經濟制度有更快的發展速度，有更發達的技術。

從那時起，技術顯示了空前的進步，發展速度簡直快極了。試問，托洛茨基有什麼根據來推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要用將近一百年的時間才能證明自己優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呢？

領導我國生產的不是寄生蟲，而是生產者本人，這個事實難道不是使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有一切機會足以一日千里地發展經濟，並在較短期間內證明自己優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極重要的因素嗎？

社會主義經濟是最統一最集中的經濟，社會主義經濟是按計劃進行的，這個事實難道不是說明社會主義經濟會有一切有利條件足以在較短期間內證明自己優於被內部矛盾所分裂、被危機所腐蝕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嗎？

既然如此，在這裏還搬出五十年和一百年的前途，那就是和受驚的市僧一樣，患了迷信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萬能的病症，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喊聲：「對！」）

結論是什麼呢？結論有兩個。

第一、托洛茨基就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進行反駁時，已經從舊的論戰基地退到新的基地了。從前反對派是從內部矛盾、從無產階級和農民間的矛盾來進行反駁，認爲這些矛盾是不可克服的。現在

托洛茨基則強調外部矛盾，強調我國國民經濟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間的矛盾，認為這些矛盾是不可克服的。從前托洛茨基認為無產階級和農民間的矛盾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絆腳石，現在他改變戰綫，退到另一個基地來批評黨的立場，硬說我國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間的矛盾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絆腳石。於是他也就在實際上承認了反對派的舊論據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但托洛茨基的退却是退却到絕路上去了，退却到泥坑裏去了，托洛茨基實際上是直接公開地退却到蘇漢諾夫那裏去了。實質上托洛茨基的『新』論據歸結起來是什麼呢？歸結起來就是：由於經濟的落後性，我們沒有發展到建設社會主義的地步，我們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客觀條件，我國國民經濟因而正在變成而且定要變成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附屬品，變成世界資本主義控制下的經濟單位。

但這是『蘇漢諾夫思想』，是露骨的赤裸裸的『蘇漢諾夫思想』。

反對派滾到孟什維克蘇漢諾夫那裏去了，滾到直接否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可能勝利的蘇漢諾夫立場上去了。

### 三、我們和全世界無產者結成聯盟來建設社會主義

我們是和農民結成聯盟來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點似乎我們的反對派已不敢公然否認。我們是否和世界無產階級結成聯盟來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點反對派却打算表示懷疑。有些反對派分子甚至硬

說我們黨低估了這個聯盟的意義。其中有一位加米涅夫，竟至責備黨是民族改良主義，說黨以民族改良主義的前途頂替了國際革命的前途。

同志們，這是愚蠢，不可救藥的愚蠢。只有瘋子才會否認我國無產者和其他各國無產者的聯盟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極大意義。只有瘋子才會責備我們黨低估全世界無產者聯盟的事業。只有和全世界無產者結成聯盟才能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

整個問題就在於如何了解這一聯盟。

蘇聯無產者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奪取了政權，這就是對世界各國無產者的幫助，這就是和他們的聯盟。

德國無產者在一九一八年掀起了革命，這就是對世界各國無產者特別是對蘇聯無產者的幫助，這就是和蘇聯無產階級的聯盟。

西歐無產者瓦解對蘇聯的武裝干涉，不替反革命將軍們運輸武器，組織行動委員會並破壞本國資本家的後方，這就是對蘇聯無產者的幫助，這就是西歐無產者和蘇聯無產者的聯盟。沒有資本主義國家無產者的這種同情和援助，我們就不能在內戰中獲得勝利。

資本主義國家無產者派遣許多代表團到我們這裏來，監督我們的建設，然後向全歐洲的工人宣揚我們的建設成就，這就是對蘇聯無產者的幫助，這就是對蘇聯無產者極大的援助，這就是和蘇聯無產者的聯盟，並扼制帝國主義可能對我國實行的武裝干涉。沒有這種援助和這種扼制，我們現在就不

會有『喘息時機』，而沒有『喘息時機』，我們就不能在我國展開社會主義建設工作。

蘇聯無產者鞏固自己的專政，消滅經濟破壞狀態，展開建設工作，並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做出成績，這就是對全世界無產者、對他們反資本主義的鬥爭、對他們奪取政權的鬥爭的極大援助，因為蘇維埃共和國的存在、它的鞏固、它在社會主義建設戰綫上的勝利，是鼓舞全世界無產者去進行反資本主義鬥爭的世界革命的極重要的因素。而蘇維埃共和國的消滅會引起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最黑暗最殘酷的反動統治，這幾乎是無可懷疑的。

我國革命的力量和資本主義國家革命運動的力量就在於全世界無產者的這種互相援助和這種聯盟。

這就是蘇聯無產者和全世界無產者聯盟的種種形式。

反對派的錯誤在於他們不懂得或不承認這些聯盟形式。反對派的倒霉在於他們只承認一種聯盟形式，即西歐無產者對蘇聯無產階級的『直接的國家援助』的形式，可惜這種形式暫時沒有實現，而反對派却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命運直接寄託於這種未來的援助上面。

反對派認為只有承認這種援助形式才能使黨保有『國際革命前途』。但是我已經說過，在世界革命遲延的情況下，這種立場只能使我們向我國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分不斷讓步並終於走向投降主義和失敗主義。

由此可見，反對派提出來的這種和世界無產階級聯盟的唯一形式，即歐洲無產階級的『直接的國

家援助』的形式，在世界革命遲延的情況下，是投降主義的煙幕。

加米涅夫的『國際革命前途』是投降主義的煙幕，——這就是加米涅夫勾當的歸宿。

因此，加米涅夫在這裏責備我們黨是民族改良主義時的那種勇氣只能令人驚訝罷了。

說得客氣一些，革命性或國際主義向來不比人強的加米涅夫的這種勇氣是從哪裏來的呢？

我們這位一向是孟什維克中的布爾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中的孟什維克的加米涅夫的這種勇氣是從哪裏來的呢？（笑聲）

列寧當時有充分根據稱之為十月革命的『工賊』的加米涅夫的這種勇氣是從哪裏來的呢？

加米涅夫想知道蘇聯無產階級是不是國際主義者。我應當聲明，蘇聯無產階級用不着受十月革命的『工賊』的考核。

你想知道蘇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程度嗎？去問一問英國工人，問一問德國工人，（熱烈鼓掌）問一問中國工人吧，——他們會告訴你蘇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

#### 四、蛻化問題

這樣一來，可以有根據地認為反對派的觀點是公開否認在我國有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

但是，否認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就會使黨走向蛻化的前途，而蛻化的前途又會導致放

棄政權並引起組織另一政黨的問題。

托洛茨基裝做不能認真對待這個問題的樣子。這是偽裝。

不容置疑，假如我們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其他各國的革命又遲延下去，而我們這裏資本的增長正如我國國民經濟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結合」的增長一樣，那末，從反對派的觀點看來，出路只有兩條：

(甲)或者是繼續掌握政權而實行資產階級民主的政策，參加資產階級政府，因而實行「米勒蘭主義」；

(乙)或者是爲了不致蛻化而放棄政權，組織一個和正式的黨並列的新黨。這正是我們的反對派一向追求的、實際上還在繼續追求的目的。

兩個黨的理論，或組織新黨的理論，是否認勝利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直接結果，是蛻化前途的直接結果。

這兩條出路都是引向投降主義，引向失敗主義的。

在內戰時期問題是怎樣的呢？問題是這樣的：如果我們不善於組織軍隊和抗擊敵人，無產階級專政就會垮台，我們就會失去政權。當時戰爭佔第一位。

現在，當內戰已經結束和經濟建設任務佔第一位的時候，問題是怎樣的呢？現在問題是這樣的：如果我們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無產階級專政就會對資產階級作越來越大的讓步，就一定會蛻化，



變成資產階級民主的尾巴。

共產黨人能不能同意使無產階級專政蛻化而實行資產階級政策呢？

不，不能而且不應該。

因此出路就是：放棄政權，成立新黨，給復辟中的資本主義掃清道路。

投降主義是反對派聯盟目前的立場的必然結果，結論就是如此。

#### 四 反對派和黨的統一問題

現在來談談最後一個問題，談談反對派聯盟和我們黨的統一問題。

反對派聯盟是怎樣形成的呢？

黨肯定地說，反對派聯盟是經過「新反對派」、經過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轉到托洛茨基主義方面去而形成的。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否認這一點，暗示說不是他們到托洛茨基那裏去了，而是托洛茨基到他們這裏來了。

我們來看看事實。

我已談到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決議。我已談到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

夫背棄了這個托洛茨基沒有接受而且不能接受的決議，他們背棄它是爲了靠近托洛茨基並轉到托洛茨基主義方面去。這是否對呢？是的，這是對的。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是否打算用什麼來反對這種論斷呢？沒有，他們沒有這樣打算過。他們避開問題，默不作聲。

其次，我們還有我黨第十三次代表會議的決議，這項決議認定托洛茨基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傾向，是對列寧主義的修正<sup>(三)</sup>。大家知道，這項決議是由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批准的。我在報告中說過，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背棄了這項決議，他們在自己的特別聲明中承認托洛茨基主義一、二、三年的反黨鬥爭是正確的。這是否對呢？是的，這是對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否打算用什麼來反對這種論斷呢？沒有，他們沒有這樣打算過。他們默不作聲。

還有幾件事實。加米涅夫在一九二五年論到托洛茨基主義時寫道：

「托洛茨基同志已成爲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藉以在我們黨內表現出來的孔道。他的言論的全部性質，他過去的全部歷史都表明是這樣的。他在反黨鬥爭中已成爲國內一切反黨力量的象徵。」……「我們必須採取一切辦法使非布爾什維主義學說所指望的那一部分黨員，也就是我們的青年，也就是應當掌握黨的命運的未來成員，不受這種學說的感染。因此，盡力用各種方法說明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場的不正確，說明必須在托洛茨基主義和列寧主義之間有所選擇，不能把二者結合起來。這應該是我們黨的當前任務。」（見加米涅夫「黨和托洛茨基主義」，「擁護列寧主義」文集第八十四頁至第八十六頁）

加米涅夫現在有沒有足夠的勇氣來重複這些話呢？如果他準備重複這些話，爲什麼他現在和托洛茨基結成聯盟呢？如果加米涅夫不敢重複這些話，他就是拋棄舊有立場而轉到托洛茨基主義方面去了，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季諾維也夫在一九二五年論到托洛茨基主義時寫道：

『托洛茨基同志近來的言論（『十月革命的教訓』）不是別的，而是相當公開地企圖修正甚至直接取消列寧主義基礎<sup>①</sup>。稍過一些時候，我們全黨和整個共產國際都會明白這一點的。』（見季諾維也夫『布爾什維主義或托洛茨基主義』，『擁護列寧主義』文集第一二〇頁）

加米涅夫在發言中聲明『我們和托洛茨基站在一起，是因爲他沒有修正列寧的基本思想』，拿這個聲明和季諾維也夫的上述一段話比較一下，你們就會明白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已經墮落到極點了。

在同一年即一九二五年季諾維也夫論到托洛茨基時寫道：

『現在要解決的就是一九二五年俄國共產黨究竟是一個什麼黨的問題。在一九〇三年，這個問題是根據對黨章第一條的態度來解決的，而在一九二五年，則是根據對托洛茨基的態度，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態度來解決的。誰說托洛茨基主義可以成爲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合法色彩」，誰就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不再·是·布·爾·什·維·克·。誰·想·現·在·和·托·洛·茨·基·聯·合·、和·公·開·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托·洛·茨·基·主·義·合·作·來·建·黨·，誰·就·是·背·棄·列·寧·主·義·基·礎·。必·須·懂·得·托·洛·茨·基·主·義·已·經·是·過·去·的·階·段·，現·在·要·建·設·列·寧·主·義·的·黨·，只·有·反·對·托·洛·茨·基·主·義·才·有·可·能·。」（見一九二五年二月五日「真理報」）

季諾維也夫現在有沒有足夠的勇氣來重複這些話呢？如果他準備重複這些話，爲什麼他現在和托洛茨基結成聯盟呢？如果他不能重複這些話，那末，季諾維也夫已背棄列寧主義而轉到托洛茨基主義方面去了，這不是很明顯的嗎？

這一切事實說明什麼呢？

說明反對派聯盟是經過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轉到托洛茨基主義方面去而形成的。  
反·對·派·聯·盟·的·綱·領·是·什·麼·呢·？

反對派聯盟的綱領是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綱領，是我們黨內右傾的綱領，是集合所有一切機會主義派別來組織反黨鬥爭、反對黨的統一、反對黨的威信的綱領。加米涅夫說到我們黨內的右傾是指中央委員會的。但這是詭計，是笨拙而又虛偽的詭計，其目的是以反黨的大聲責難來掩蓋反對派聯盟的機會主義。實際上表現我們黨內右傾的是反對派聯盟。我們評判反對派不是根據他們的聲明而是根據他們的行動。而反對派的行動則說明反對派是所有一切機會主義分子（從奧索夫斯基和「工人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反對派』到蘇瓦林和馬斯洛夫、柯爾什和路特·費舍等人）的集合點和策源地。如果根據加米涅夫的發言來判斷，則反對派現在所追求的就是恢復派別活動，恢復黨內派別自由的理論，把我們黨內一切機會主義分子集合起來，反對黨的統一，反對黨的領導幹部，為建立新黨而鬥爭。加米涅夫的發言在這一方面是從反對派一九二六年十月的『聲明』發展到恢復反對派的分裂路綫的轉折點。

從黨的統一來，反對派聯盟是什麼呢？

反對派聯盟是我們黨內新黨的萌芽。反對派有自己的中央委員會和平行的地方委員會，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反對派在其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聲明』中硬說他們已放棄了派別活動。但加米涅夫的發言難道不是說明他們又在進行派別鬥爭嗎？有什麼保證能說反對派沒有恢復他們中央的和地方的平行的組織呢？反對派為自己的基金會收集特別黨費，這難道不是事實嗎？有什麼保證能說他們沒有重新走上這條分裂的道路呢？

反對派聯盟是破壞我黨統一的新黨的萌芽。

任務就在於摧毀這個聯盟和消滅這個聯盟。（熱烈鼓掌）

同志們，當其他各國還被帝國主義統治着的時候，當一個國家，僅僅一個國家，能突破資本的戰綫的時候，在這種條件下如果沒有以鐵的紀律武裝起來的黨的統一，無產階級專政是連一分鐘也不能存在的。我們要想保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要想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須根除破壞黨的統一的企圖，就必須消滅建立新黨的企圖。

因此，任務就在於肅清反對派聯盟和鞏固我黨的統一。

## 五 結 論

同志們，我就要講完了。

要是把討論做一總結，那就可以得出一個不容懷疑的總結論：我們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是對的，它指出反對派的病症就是不相信我國無產階級的力量，不相信我國勝利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

這就是同志們不能不得出的總的印象和總的結論。

可見在你們面前有兩種力量。一方面是我們的黨，它滿懷信心地領導蘇聯無產階級前進，建設社會主義，並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起來鬥爭。另一方面是反對派，它像一個腿患風濕症、腰患酸痛病、頭患偏頭風的衰朽的老頭子，一步一拐地跟在黨的後面，到處散佈悲觀主義，製造惡毒的流言，說在我們蘇聯建設社會主義是不會有結果的，說在他們資產者那裏什麼都好，而在我們無產者這裏什麼都不好。

同志們，這就是你們面前的兩種力量。

你們應當在這二者之間有所選擇。（笑聲）

我不懷疑，你們是會作正確的選擇的。（鼓掌）

反對派被自己的派別活動弄得頭暈目眩，竟把我們的革命看做一種毫無獨立能力的東西，看做一種未來的尙未獲勝的西方革命的毫無價值的附屬品。

列寧同志並不是這樣看我們的革命，看蘇維埃共和國的。列寧同志認定蘇維埃共和國是給全世界無產者照亮道路的火炬。

關於這一點列寧同志曾經說過：

「蘇維埃共和國這個榜樣將長期地擺在他們（即世界各國無產者。——斯大林註）面前。我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將作為國際社會主義的火炬，作為各國勞動羣衆的範例而穩固地站立着。在那邊是吵架、戰爭、流血、千百萬人的犧牲、資本的剝削，在這邊是真正的和平政策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四二九頁）

在這把火炬周圍形成了兩條陣綫：一條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的陣綫，他們力圖破壞這把火炬，動搖它和撲滅它，一條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朋友的陣綫，他們努力支持這把火炬，使它發出熊熊的光燄。

任務就在於支持這把火炬，鞏固它的存在，以爭取世界革命的勝利。

同志們！我相信你們定會採取一切辦法使這把火炬光燄萬丈，給一切被壓迫被奴役的人們照亮道路。

我相信你們定會採取一切辦法使這把火炬光燄萬丈，使無產階級的敵人胆顫心驚。

我相信你們定會採取一切辦法使這樣的火炬在世界各地燃燒起來，使世界各國的無產者歡欣鼓舞。（鼓掌多時，經久不息。全體代表起立，高唱「國際歌」，三呼「烏拉」。）

① 愛森納赫派和拉薩爾派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葉德國工人運動中的兩個政黨。愛森納赫派是馬克思主義的擁護者，由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領導，在一八六九年愛森納赫代表大會上創立了德國社會民主黨。拉薩爾派是拉薩爾思想的信徒。他們認為可用和平手段把資本主義改造成社會主義。馬克思曾嚴厲批評過拉薩爾派。這兩個政黨進行過激烈的鬥爭，後來於一八七五年間在哥達代表大會上合併成一個德國社會民主黨，而拉薩爾派則為黨內機會主義派。——譯者註。

② 特米多爾是法國資產階級第一共和國在一七九三年頒佈的新曆法中一個月份（七月）的名稱。雅各賓黨人執政後，因逐漸離開支持他們的廣大階層，而於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特米多爾月九日）被大資產階級代表推翻。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企圖從法國革命中舉出例子，誣騙布爾什維克黨走向特米多爾，斷言黨必然會遭到與法國雅各賓黨人同樣的毀滅。……譯者註。

③ 烏爾卡爾特是英國的工業家，他是十月革命前在俄國擁有大量土地、森林和礦產的「俄亞聯合公司」的經理。此處烏爾卡爾特即指「俄亞聯合公司」。——譯者註。





## 給克謝諾豐托夫的信

你的信和文稿已經看過。答覆遲了，請原諒。

我的意見如下：

(一) 我不同意你稱自己是「列寧和斯大林的學生」。我並沒有學生。你還是稱自己是列寧的學生吧，你有權這樣做，儘管沙茨金批評了你。但是，你沒有理由稱自己是列寧的學生的學生。這是不對的。這是多餘的。

(二) 我不同意你在一九二六年底和沙茨金進行論戰時引用我在一九二四年七月寫的那封私人信。何況你們所討論的關於列寧主義定義的問題，我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即「論列寧和列寧主義」(一書出版以前就已經闡明了。更不用說，這樣引用我信中的片段，在和沙茨金進行論戰時對你毫無好處，徒使問題糾纏不清並把注意力轉到另外一面，而可能迫使我在報上發表一個於你不利的聲明(這是不願意做的)。

(三) 我認為沙茨金基本上是對的，而你是不對的。可惜我未能看到你新寫的論戰略的小冊子。否則，我一定會勸阻你不要出版這種包含着許多極嚴重的錯誤和不正確的說法的粗製濫造的著作。

(四)這當然不是說沙茨金在各方面都是對的。現在我來指出沙茨金的主要錯誤。

這種地方就是沙茨金文章中的錯誤，例如他把馬克思關於工人階級的任務不可能在民族範圍內完成的公式和列寧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公式看做幾乎是相同的。沙茨金不說明這兩個公式的差別並揭示其歷史根源，反而把極重要的問題掩蔽起來，用絲毫不能說明什麼的解釋來搪塞。但搪塞不能解決問題。

沙茨金的另一個錯誤在於他無意中把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兩個公式（專政是一個階級的統治，以及專政是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勞動階層在無產階級的國家領導下的特種形式的聯盟）對立起來。沙茨金駁斥在專政的條件下農民參與政權的思想，即兩個階級分掌政權的思想，這是對的。但他把這兩個公式對立起來就不對了，因為把兩者對立起來，就是不懂得這兩個公式。

我也不喜歡沙茨金文章中極端自以為是的腔調：嘴上儘管說謙虛，實際上却顯得自負到極點。

(五)我勸你不要在報刊上進行論戰了，因為你是不對的，而沙茨金基本上是對的。最好去認真地和深入地加緊鑽研列寧主義。此外，我還勸你永遠拋棄那種趕製列寧主義小冊子的習慣。這是要不得的。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第一次刊印

# 在聯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 代表會議<sup>（註）</sup>上的演說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

同志們！我本來不準備講話，因為在代表會議上需要說的，別的同志都說過了，再沒有什麼新東西可說了，把說過的話重複一遍是沒有必要的。可是，由於許多代表團的要求，我不得不說幾句。

從管理國家來看，從領導我國整個建設工作來看，我國現狀中的主要特點表現在哪裏呢？

主要的特點表現在黨善於找出正確的政策，就是說，黨的基本路綫是正確的，黨的指示是切合實際的。

列寧說：

對農民的正確政策實行十年二十年，我們的勝利就有保證了。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在目前的歷史時期中，無產階級和農民間的相互關係問題對我們來說是一個主要問題。而我們的實踐，我們的工作，黨的工作正好表明黨是善於找出正確解決這個問題

在聯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題的辦法的。

怎樣才能使黨的政策在這個基本問題上是正確的呢？

第一、必須使黨的政策保證工人階級與農民的結合、聯盟。

第二、必須使黨的政策保證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在這個結合中的領導。

要保證結合，必須使我們一般的財政政策，其中包括我們的稅收政策，符合於勞動羣衆的利益；必須使我們的價格政策是正確的，符合於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利益；必須使合作社的組織，在城市裏，特別是在農村裏，有步驟地日益發展起來。

我以爲在這方面，我們走的是正確的道路。不然就會招致極嚴重的後果。

我不是說我們在這方面沒有困難。困難是有的，而且很嚴重。但是我們正在克服困難。我們能夠克服困難，因為我們的政策一般是正確的。

可是，怎樣才能保證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呢？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使國家工業化，必須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發展和鞏固起來，必須使我們日益增長的社會主義工業帶領着農業前進。

列寧說：在領導農村的意義上講，每個新的工廠都會鞏固工人階級的陣地，使我們不怕任何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這是他在一九二一年說的話。從那時到現在已有五年。在這五年裏，我們的工業發展了，許多新工廠出現了。於是每個新工廠都成了無產階級擁有的新堡壘，保證着無產階級對千百萬農民羣衆的領導。

可見黨在這方面也是善於找出正確的政策。

我不是說我們在這方面沒有困難。困難當然是有的，但是我們並不懼怕困難，而且正在克服困難，因為我們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確的。

有人說蘇維埃政權是世界上所有現存政權中最鞏固的政權。這是對的。爲什麼呢？因為蘇維埃政權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

但是，爲了戰勝我們道路上的種種困難，僅僅有正確的政策是不是就夠了呢？不，不。

要做到這一點，至少還要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首先必須使黨所制定的正確政策真正實行，真正完全實現。

有正確的政策，這當然是首要的事情。但是，如果這個政策沒有實行，或者實行的時候在實踐中被歪曲了，那末這個政策又有什麼用處呢？在實際生活中有這種情形：政策是正確的，但是沒有實行，或者實行得不當。現在這種情形在我們這裏是不少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在他最後一次報告〔六〕中指的正是這種情形，當時他說：

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但這還不够，因此，現在的問題在於做好正確挑選人材的工作並組織對執行情況的檢查。

挑選人材和檢查執行情況，這就是列寧在他最後一次報告中着重指出的問題。我以爲在我國整

個建設工作時期中，我們應當時時刻刻記住列寧的這個指示。要領導建設，只有正確的指示是不夠的，要領導建設，還必須把那些懂得這些指示的意義和作用，能夠忠誠老實地實行這些指示，並認為實行這些指示不是無謂的例行公事而是光榮的事業，是自己對黨和無產階級應盡的崇高義務的人，放在我們蘇維埃的、經濟的、合作社的以及其他的建設工作的領導崗位上。

列寧的正確挑選人材和檢查執行情況的口號正應當這樣理解。

然而在我們這裏有時却發生完全相反的情形。表面上似乎是接受黨和蘇維埃政權高級機關的指示，實際上却把這些指示束之高閣，繼續實行完全不同的政策。某些經濟的、合作社的和其他的機關的一些領導者有時把黨的正确指示束之高閣，繼續走熟悉的老路，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例如，根據黨和蘇維埃政權的中央機關的決定，我們政策的當前任務是減低零售價格，可是許多合作社的和一般的商業工作人員却寧願避開這個決定，不理這個決定，那末，這算什麼呢？這不是破壞正確的政策是什麼呢？要知道，工農結合的命運、工農聯盟的命運、蘇維埃政權的命運是決定於忠實執行正確的政策。

列寧所指的正是這種情形，當時他說：

我們的路綫是正確的，可是國家機器沒有朝它應有的方向移動。

爲什麼路綫和機器之間會有這種不協調呢？這是因爲這個機器的結構，這個機構的組成部分並非都是質量很好的。

正因為如此，正確挑選工作人員和檢查執行情況就成為當前黨和蘇維埃政權的任務之一了。  
正因為如此，黨應當密切注意，要使我們建設工作的基本工作人員是從忠實執行黨和蘇維埃政權的政策這個觀點挑選出來的。

第二個條件。問題當然不限於此。此外還必須努力提高黨對羣衆的領導的質量，從而更順利地吸引廣大工人羣衆和農民羣衆來參加我們的整個建設工作。保證無產階級的領導，這當然是首要的事情。但無產階級是通過黨來表現自己的領導意志的。以一個不好的黨爲首來領導建設是不可能的。要使無產階級能夠領導，就必須使它的黨真正擔負得起羣衆的最高領導者的使命。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怎樣呢？那就必須使黨的領導不是形式主義的領導，不是紙上的領導，而是實際的領導。那就必須使黨的領導具有最大限度的靈活性。

有人說，如果不把廣大的工人階級羣衆發動起來，我們就不能在我們的建設戰綫上取得勝利。這是完全正確的。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要使廣大羣衆參加我們的建設事業，就必須正確地、靈活地、穩重地領導這些羣衆。應當由誰來領導羣衆呢？應當由黨來領導羣衆。但是，黨如果不考慮到近幾年來工人和農民中間發生的變化，它就不能領導羣衆。現在不能用老一套辦法了，不能僅僅用命令和指示來領導了。這樣領導的時期已經過去了。現在，簡單的形式主義的領導只能引起不滿。爲什麼呢？因爲工人階級的積極性提高了，工人階級的需求提高了，工人們對我們工作的缺點更敏感了，工人們的要求更嚴格了。



這好不好呢？當然好。我們是一直想到這一點的。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對工人階級的領導是更複雜了，而領導本身也就應當有更大的靈活性。在過去，有時踩了他的腳也不算什麼。同志們，現在這可不行了！現在甚至對最不重要的小事情也要極其細心，因為工人的生活正是由這些小事情積成的。

對農民來說也是如此。現在的農民不是兩三年前以前的農民了。他們也更敏感並且更有覺悟了。他們閱讀所謂領導者的文章，討論這些文章，仔細研究每一個領導者，並得出自己對他們的看法。你們不要以為農民是愚蠢的，像某些聰明人有時候對我們所形容的那樣。不，同志們，農民比城市裏的許多聰明人還要聰明。他們也要求更細心地對待他們。這也和對待工人一樣，不能只是做做決議就算了。這也和對待工人一樣，必須解釋黨和蘇維埃政權的指示，耐心地仔細地進行解釋，使他們了解黨要做些什麼，要把國家引到哪裏去。今天不了解，明天再努力解釋；明天不了解，後天再努力解釋。現在不這樣，就不會有而且不能有任何領導。

當然，這並不是說要放棄領導。不，不是這個意思。如果黨放棄領導，如果黨停止領導，羣衆就不會尊重黨了。羣衆自己要求領導他們，羣衆在尋找堅強的領導。但羣衆所要求的不是形式主義的領導，不是紙上的領導，而是他們所能了解的實際領導。正是爲了這一點，才需要耐心解釋黨和蘇維埃政權的目的和任務、指令和指示。不可放棄領導，也不可減弱領導。相反地，應當加強領導。但是爲了加強領導，必須使領導本身更靈活，必須使黨對羣衆的要求有最高度的敏感。

同志們，我要結束我的講話了。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我們的力量也就在這裏。但是要使我們的政策不致懸在空中，至少要有兩個條件。第一、正確地挑選工作人員和檢查黨的指示的執行情況。第二、領導羣衆要有靈活性，對於羣衆的要求要有敏感、敏感、最高度的敏感。

（全場熱烈鼓掌並歡呼多時；全體起立，高唱『國際歌』。）

載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

「真理報」第十三號



## 給札依采夫同志的信

關於日羅夫同志的文章我答覆遲了，但是，答覆遲總比不答覆好。

我不同意在『布爾什維克』雜誌上刊載日羅夫同志關於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的文章，理由如下：

(一) 在我看來，這是一篇學生的文章。顯然，作者沒有把握住題目，也沒有意識到問題的複雜性。這樣的文章只宜於登在人們藉以練習寫作以便日後成爲成熟的作家的學生刊物上。但是，『布爾什維克』是一個指導性的雜誌，人們要求它發表有關理論和政策的基本問題的指導性的文章，因此，在『布爾什維克』雜誌上刊載日羅夫同志的文章，第一、會使讀者糊塗起來，第二、會損害『布爾什維克』這個指導性的雜誌的聲望。

(二) 日羅夫同志把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的政治方面和經濟方面同等看待，這顯然是錯誤的。說不平衡規律的內容由這兩方面構成，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如果注意一下目前聯共(布)黨內我們和反對派的爭論，那末，政治的不平衡現在對於我們並不是一個迫切的問題，這是絲毫用不着懷疑的。從世界的發展來看，目前政治的不平衡的最突出的表現究竟在哪裏呢？在於我國已經有了

先進的政權，即無產階級政權，蘇維埃政權，而在技術和文化最發達的國家裏却存在着落後的政權，即資產階級政權。反對派是不是否認這種政治的不平衡的可能或存在呢？不，不否認。相反地，他們認為無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內奪取政權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我們的意見分歧並不在這一方面。

意見分歧是從下面這個問題開始的：能不能在經濟上戰勝資產階級，就是說，能不能在蘇維埃政權存在於一個被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國家的條件下建成社會主義。由此可見，意見分歧是在經濟方面。這就是我們要強調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不平衡規律的經濟方面的緣故。日羅夫同志的錯誤在於他沒有看到我們和反對派爭論的這個特點，認為強調發展不平衡規律的經濟方面就是否認這一規律的政治方面。

簡言之，日羅夫同志忽略了我們和反對派爭論的焦點。

至於不平衡規律的經濟方面本來就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種種災難（政治災難也在內）的基礎，就更不用說了。

（三）日羅夫同志沒有看到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時期的資本主義之間的全部差別。他把不平衡規律說成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單純的「不勻稱和不協調」。如果真是這樣，那末上升的資本主義和垂死的下降的資本主義之間的差別從何而來呢？平穩地向上發展的資本主義和在腐朽、躍進、災難狀態中發展的資本主義之間的差別從何而來呢？為什麼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的勝利從前

是不可能的，現在却成了可能的呢？能否不管財政資本的統治，技術的巨大發展，均衡化的趨向，世界之劃分為各個勢力範圍，資本主義國家的蓬勃的躍進式的發展（這種發展帶來災難，引起已被分割的世界的週期性的重新分割，使得社會主義可能在個別國家內勝利）等等事實呢？

在這種場合日羅夫同志的立場和我們的反對派的立場有什麼不同呢？他究竟為什麼並根據什麼去和反對派爭論呢？

看來，日羅夫同志不懂得，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和有關社會發展一切階段的社會學規律不同，是能變化而且必然要變化的。在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時期，不平衡規律具有一種形式，產生一種相應的結果；在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時期，不平衡規律則具有另一種形式，因而產生另一種結果。正因爲如此，可以說並且應當說，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不平衡和舊資本主義時期的不平衡是不同的。資本主義的規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各個不同階段上是怎樣變化的，這些規律所發生的作用是怎样隨各種條件的變化而受到限制或加强的，這是一個在理論上值得特別注意的問題，凡是寫有關不平衡規律專文的人都應當首先加以考慮。日羅夫同志的不幸（而不是罪過）就是他完全看不到問題的這一面。

（四）我沒有提到日羅夫同志的文章所涉及的其他一些問題，例如「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非主觀性」一類的問題，這些問題我想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我看日羅夫同志的舌頭在發癢，想說些特別的和令人驚奇的東西。

(五)至於要給日羅夫同志的文章加的編者按語，我認爲在「布爾什維克」這樣重要的雜誌上附有這樣的編者按語是不應該的。聲明編輯部「不同意作者的某些論點」而不說明這些論點是什麼，這就是對問題避而不談，使讀者莫名其妙。我認爲「布爾什維克」雜誌不應當寫這樣的按語。 致  
共產主義敬禮

約·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第一次刊印

# 給連納的工人們

十五年前連納工人們遭受槍殺的四月慘案是沙皇專制政府的最大的血腥罪行之一。在遙遠的森林裏犧牲於沙皇槍彈下的同志們的英勇鬥爭，勝利了的無產階級是不會忘記的。蘇聯工人在回顧走過的道路時可以說：波戴勃工人的每一滴血都沒有白流，因為無產階級的敵人遭到了報復，無產階級已經戰勝了他們。

現在，你們擺脫了沙皇和資本主義的壓迫，你們已有可能在維提姆河岸上不是為寄生蟲的發財致富而是為加強世界上第一個自己的工人國家的威力來開採黃金了。

榮譽和光榮屬於為工人階級的勝利而犧牲的人們！

親愛的同志們，在這個追念死難同志的英勇鬥爭的日子裏，我向你們致敬，並深信你們會堅定不移地繼續為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完全勝利而鬥爭。

約·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載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七日「連納礦工報」  
(波戴勃版)第八十七號





# 致斯大林格勒『鬥爭報』的賀電

親愛的同志們！

『鬥爭報』在革命崗位上進行戰鬥工作的十周年紀念日，是斯大林格勒的工人們可以自豪的光榮的日子。

與克拉斯諾夫和鄧尼金這些將軍們作鬥爭，驅逐反革命分子和西方武裝干涉者，戰勝經濟破壞狀態，在新生活的和平建設戰綫上獲得勝利，——這就是最近十年來斯大林格勒無產階級生活中的主要事件。在這整個時期中，『鬥爭報』總是站在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戰士的前列，給勞動者照耀着前進的道路。

謹向『鬥爭報』致熱烈的敬禮，並祝它獲得新的成就！

約·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載於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鬥爭報』  
(斯大林格勒版)第一二三號

致斯大林格勒『鬥爭報』的賀電

一五三



# 在十月鐵路局斯大林鐵路工廠 工人大會上的演說（摘要）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

同志們！平常講演者「總得」講個不停，好讓別人一直聽下去。我想這一次稍微把方式改變一下。我只解答個別同志在條子上提出的問題。我想這樣會活潑些。如果大家同意，我就開始講了。

多數條子歸結起來是一個問題：今年，今年春天或秋天，我們這裏會不會有戰爭？

我的回答是：無論今年春天還是秋天，我們這裏都不會有戰爭。

今年在我們這裏不會有戰爭，並不是因為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根本沒有。不，戰爭的危險是存在的。今年不會有戰爭，是因為我們的敵人沒有作好戰爭準備，是因為我們的敵人比誰都懼怕戰爭的後果，是因為西方工人不願和蘇聯作戰，而沒有工人，作戰就不可能，最後是因為我們堅定不移地執行和平政策，這種情況使敵人難以和我國作戰。

（斯大林同志用我國和西方大小國家的關係方面的事實證明了這些論點之後，轉而談到蘇聯的

東方政策問題。」

有人對我們說，我們對東方附屬國和殖民地人民所實行的友好政策包含着我方的某些讓步，而我們要負擔若干費用。這當然是對的。但是，任何別的政策，不僅從原則上來看，而且從對外政策的費用上來看，都是我們所不能採取的。在原則上，我們除了友好政策以外，不能實行別的政策，這一點是由粉碎帝國主義枷鎖而樹立起自己威力的蘇維埃政權的性質產生的。因此，關於這一點我就不多說了。

現在我們從對外政策的費用上來看看。大家知道，我國在東方與中國、阿富汗、波斯、土耳其接壤的國境綫，長達數千俄里。在這條國境綫上，目前我們只駐有極少的軍隊，這些軍隊和交界國居民的關係是友好的，正因為我們對這些國家實行友好政策，我們才能在保衛邊疆方面減少大量開支。

但是，假定我們和這些國家的關係不是友好的而是敵對的，像俄國專制時代那樣，那我們就不得不在這條國境綫上駐紮幾個全副武裝的軍團，並在遠東停泊許多軍艦，像某些帝國主義國家現在所做的那樣。在這條國境綫上駐紮幾個軍團和相當數量的艦隊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每年要在這些軍團和艦隊上花費人民好幾億盧布。這也是一種東方政策。但這是一切可能的政策中最不合算最浪費和最危險的政策。正因為如此，我認爲在一切可能的東方政策中我們的東方政策在原則上是最正確的，在政治效果上是最可靠的，並且是最經濟的政策。

不用說這種政策在東方不僅保證了我們與殖民地和附屬國之間的持久和平，而且保證了我們與

日本之間的持久和平。

〔一些人對給代表的委託書發表意見後，斯大林同志又來回答到會者新遞上來的一些條子。〕

同志們！現在讓我來答覆同志們新遞上來的條子。從這些條子上可以看出兩個問題，就是英蘇外交關係有沒有破裂的可能的問題和我國經濟建設的基本成就的問題。

英國是否會撕毀一九二一年的通商條約呢？它是否會和蘇聯斷絕外交關係呢？

當然，從英國方面來說，絕交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我以為這種可能很小。這種可能之所以很小，是因為這種絕交對英國只有壞處，沒有好處。更不用說，在蘇聯實行和平政策的情況下，絕交的責任將是英國政府目前所能擔負的一切可能的嚴重責任中最嚴重的一項……

我們在經濟建設事業上的基本成就是什麼呢？

有人向我們說到我們建設中的缺點。他們說這些缺點還沒有克服。同志們，這些話都是對的。無論在工廠或我們的管理機構中都有很多缺點。假如在我們所擔負的這樣巨大的工作中沒有這些缺點，那才奇怪呢。但問題不在於這些缺點。現在最主要的是我們已能用本身的力量來實行我國的工業化了。

使我國工業化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把我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這就是在新的技術基礎上建立並發展我國的工業。

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大而落後的農業國不掠奪殖民地，不掠奪其他國家，或者不從外國取得大

量借款和長期信用貸款，就能變成工業國的。你們回想一下英國、德國、美國的工業發展史，就會知道情形確實是這樣的。甚至資本主義國家中最強大的美國，在內戰以後也不得不費了整整三四十年的工夫，靠着外國的借款和長期信用貸款以及對鄰近國家和島嶼的掠奪，才把自己的工業建立起來。我們能否走這條『可靠的』道路呢？不，不能，因為蘇維埃政權的性質絕不容許掠奪殖民地，同時要獲得大量借款和長期信用貸款又沒有指望。

舊俄即沙皇俄國是沿着另一條道路走向工業化的，那就是借用奴役性的外債，把我國基本工業部門實行奴役性的租讓。你們知道，幾乎整個頓巴斯，彼得堡的大半工業，巴庫的石油和許多鐵路，都掌握在外國資本家的手中，更不用說電氣工業了。這是犧牲蘇聯各族人民利益並違反工人階級利益的工業化的道路。顯然我們不能走這條道路，因為我們和資本主義的壓迫作鬥爭，我們推翻資本主義，並不是爲了日後自願地套上資本主義的羈絆。

現在只有一條道路，即自己積累資金的道路，節約的道路，精打細算地經營以爲我國工業化積累必需的資金的道路。不用說，這個任務是艱鉅的。然而，儘管有困難，我們現在却已在解決這個任務了。是的，同志們，在內戰以後過了四年，我們就已在解決這個任務了。同志們，問題就在這裏，我們的基本成就也就在這裏。

今年我們用在工業上的資金共有十三億盧布。我們用這筆錢來建立新工廠，修復舊工廠，裝置新機器，增加工人階級的數量。我們就是這樣做到用自己積累的資金來奠定新工業的基礎的。我們就

是這樣做到用自己的資金建築新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大廈的。同志們，這就是我們的基本成就。

有人說，這座大廈還有若干缺點：灰泥不好，某些地方的糊牆紙鼓起來了，某個牆角的垃圾還沒有清除等等。這些都是事實。但是，難道問題就在這裏嗎？難道這是主要的嗎？新工業大廈是不是在建築呢？是在建築。這所大廈是不是靠自己的資金來建築呢？是靠自己的資金來建築。那末我們在經濟建設方面、在工業化方面已獲得主要的和基本的成就，這難道還不清楚嗎？

我們的基本成就就在這裏。

有些同志喜歡把這些成就全部歸功於我們的黨。老實說，有些同志過分稱讚我們黨，原因就在這裏。某些共產黨員喜歡自誇自大，原因也在這裏，可惜我們的同志至今還有這種毛病。當然，我們黨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確的，它在獲得這些成就上起了極大的作用。但是，我們黨的政策如果得不到千百萬非黨工人羣衆真正友好的支持，那就會一錢不值。其實，我黨之所以強大有力，也就在於它得到非黨工人羣衆的支持。同志們！這一點是不能忘記的。（熱烈鼓掌）

載於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

【真理報】第五十一號





# 給茨維特柯夫和阿雷坡夫兩同志的信

你們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提出的質問，我認爲是一種誤解。理由如下：

(一) 我的報告<sup>〔一〕</sup>中所談的不是關於俄國「專制制度」建立的問題，而是關於東歐中央集權的多民族國家（俄國、奧地利、匈牙利）建立的問題。不難了解，這是兩個不同的題目，雖然不能認爲它們是互不相關的。

(二) 無論我的報告或提綱<sup>〔二〕</sup>中都沒有說過俄國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不是由於經濟發展的結果，而是爲了和蒙古人及其他東方人進行鬥爭」（見你們的來信）。應該對這種對立的說法負責的是你們而不是我。我只是說，由於防禦的必要，東歐中央集權國家建立的過程比民族形成的過程要快些，因此，這些地方在封建主義消滅以前就建立了多民族的國家。可見，這和你們不正確地加在我身上的那種說法是不同的。

下面是從我的報告中摘錄出來的一段話：

「在東歐恰恰相反，民族形成和封建割據消滅的過程與中央集權國家建立的過程在時間上不是一致的。我指的是匈牙利、奧地利和俄國。在這些國家中，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沒有開始，也許剛剛開始，然而爲了抵禦土耳其人、蒙古人和其他東方人的侵犯，必須立即建立能夠抵禦外侮

的中央集權國家。由於東歐中央集權國家出現的過程比民族形成的過程要快些，所以在那裏就建立了混合的國家，這些國家是由尚未形成爲民族但已結合在一個國家中的幾族人民組成的。『(三)下面是從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我的提綱中摘錄出來的一段話：

『凡民族的形成和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在時間上大體一致的地方，那裏的民族自然就具有國家的外貌，發展成獨立的資產階級民族國家。英國（愛爾蘭除外）、法國、意大利的情形都是如此。東歐却與此相反，由於自衛（抵禦土耳其人、蒙古人和其他人的侵犯）的需要而加速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建立早於封建主義的消滅，因而也早於民族的形成。所以這些地方的民族沒有發展成也不能發展成民族國家，而建立了一些混合的多民族的資產階級國家，這些國家通常都由一個強大的統治民族和幾個弱小的從屬民族組成。奧地利、匈牙利、俄國就是這樣。』(四)請你們注意引文中加着重號的字。

(三) 如果你們看看我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全文和關於民族問題的提綱（第一部分），那就不難相信：報告的題目不是關於「專制制度」建立的問題，而是關於東歐中央集權的多民族國家建立的問題，以及關於加速後一過程的因素的問題。 致

共產主義敬禮

約·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

第一次刊印

# 論工農政府問題

(答德米特利也夫)

今年一月十四日你向「布爾什維克」雜誌提出有關工農政府問題的那封信已經轉交中央委員會，由我答覆。我因為工作太忙，答覆遲了，請原諒。

(一)不能像某些同志那樣地提問題：「工農政府是實際存在，還是一個鼓動口號。」不能說：雖然事實上我們沒有工農政府，但是我們可以把工農政府當做一個鼓動口號來談。這樣提問題，就等於說我們黨可以提出些虛偽透頂的口號，這些口號事實上不能成立，黨自己也不相信，但黨還是把它們提出來欺騙羣衆。這只有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資產階級民主派才做得出，因為言行不一致和欺騙羣衆是這些垂死黨派的一種主要工具。但我們黨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都不會這樣提問題，因為它是馬克思主義的黨，是列寧主義的黨，是日益上升的、從言行一致中汲取力量的黨；它不欺騙羣衆，它對羣衆說的都是實話，它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對階級力量的科學分析上，而不建立在欺騙宣傳上。

問題應該這樣提：或者是我們沒有工農政府，那末就應當把工農政府這個口號當做不需要的和

虛偽的口號予以拋棄；或者是事實上我們有工農政府，並且這個政府的存在適合於階級力量的狀況，那末工農政府這個口號就是正確的和革命的口號。不是前者，就是後者。在這裏必須有所選擇。

(二) 你稱工農政府這個口號爲「斯大林同志的公式」。這完全不對。事實上這個口號（如果你願意，也可以說這個「公式」）是列寧的口號，而不是別人的。我不過在「問題和答覆」(一)中重複了這個口號。請看『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第十三、十五、九十、一三三、二二〇各頁，第二十三卷第九十三、五〇四兩頁，第二十四卷第四四八頁，第二十六卷第一八四頁，那裏列寧稱蘇維埃政權爲『工農政府』；再請看第二十三卷第五十八、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九各頁，第二十四卷第一一五、一八五、四三一、四三三、四三六、五三九、五四〇各頁，第二十五卷第八十二、一四六、三九〇、四〇七各頁，第二十六卷第二十四、三十九、四十、一八二、二〇七、三四〇各頁，那裏列寧稱蘇維埃政權爲『工農政權』。把列寧的這些著作和他的其他著作看一下，你就會知道工農政府這一口號或『公式』是列寧的口號或『公式』，而不是別人的。

(三) 你的基本錯誤在於：

(甲) 你把關於我們政府的問題與關於我們國家的問題混爲一談了；

(乙) 你把我們國家和我們政府的階級性質問題與我們政府的日常政策問題混爲一談了。

不能把我們國家和我們政府混淆起來，也就是說，不能把二者等量齊觀。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的組織，這個政權的使命是鎮壓剝削者的反抗，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消滅階級等等。我

們的政府則是這個國家組織的上層機構，是它的上層領導機構。政府可能犯錯誤，它可能犯一些使無產階級專政遭受暫時挫折的錯誤，但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專政這個過渡時期的建國原則是正確的，或者是錯誤的。這只是說上層領導機構不好，上層領導機構的政策即政府的政策不符合於無產階級專政，這種政策應當加以修改，使之符合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要求。

國家和政府按其階級性質來說是同一的，但是政府的範圍比較狹小，政府不包括國家。它們之間是有機地聯系着的，是相互依存的，但這並不是說可以把二者混為一談。

由此你可以知道，不能把關於我們國家的問題與關於我們政府的問題混淆起來，正像不能把關於無產階級的問題與關於無產階級的上層領導機構的問題混淆起來一樣。

但是，把我們國家和我們政府的階級性質問題與我們政府的日常政策問題混淆起來是更不能容許的。我們國家和我們政府的階級性質不言而喻是無產階級的。我們國家和我們政府的目的也是清楚的，就是鎮壓剝削者的反抗，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消滅階級等等。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政府的日常政策問題究竟是什麼呢？這就是我們這個農民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目的藉以實現的方法和手段的問題。無產階級國家之所以必要，是爲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消滅階級等等。我們政府之所以必要，除了這一切以外，還爲了規定種種方法和手段（即日常政策），沒有這些方法和手段，要在我們無產階級佔少數而農民佔大多數的國家中完成上述各項任務是不可想像的。

這是些什麼方法和手段，歸結起來，它們究竟是些什麼呢？歸結起來，基本上就是用以保持並鞏固工人與基本農民羣衆的聯盟，保持並鞏固執政的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作用的種種措施。幾乎無須證明，如果站在這種聯盟之外和不顧這種聯盟，我們的政府就會軟弱無力，我們就沒有可能實現我剛才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那些任務。這個聯盟，這個結合將存在多久？蘇聯政府鞏固這個聯盟，鞏固這個結合的政策將繼續到什麼時候？顯然，只要有階級，只要作為階級社會的表現，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表現的政府存在時，這個聯盟就會存在，這個政策就會繼續下去。

同時必須注意到：

(甲) 我們需要工農聯盟，並不是爲了把農民作爲一個階級保存下來，而是爲了在符合於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利益的方針下教育和改造農民；

(乙) 蘇聯政府實行鞏固這個聯盟的政策，並不是爲了鞏固階級，而是爲了消滅階級，爲了加快消滅階級的速度。

所以列寧說得完全對：

『專政的最高原則就是維護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夠保持領導作用和國家政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六六頁）

無須證明，正是列寧的這個原理，而不是別的原理，才是蘇聯政府在其日常政策中的領導路線，在發展的現階段，蘇聯政府的政策實質上正是保持並鞏固工人和基本農民羣衆的這種聯盟的政策。

在·這·個·意·義·上，僅僅在這個意義上，而不是在其階級性質的意義上，蘇聯政府才是工·農·政·府。

不承認這一點，就是離開了列寧主義的道路，走上了否定結合的思想、否定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羣衆聯盟的思想的道路。

不承認這一點，就是認爲結合是一種詭計，而不是現實的革命事業，就是認爲我們施行新經濟政策是爲了「鼓動」，而不是爲了和基本農民羣衆共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不承認這一點，就是認爲基本農民羣衆的根本利益不是我們的革命所能滿足的，認爲這些利益和無產階級的利益有不可調和的矛盾，認爲我們不能夠而且不應該和基本農民羣衆共同建設社會主義，認爲列寧的合作化計劃是不能成立的，認爲孟什維克及其應聲蟲是正確的等等。

只要提出這些問題，就會懂得對這個極其重要的結合問題採取「鼓動」態度，那是毫無原則和本無用的。正因爲如此，我在自己的「問題和答覆」中說，工農政府這個口號既不是「欺騙宣傳」，也不是「鼓動的」手腕，而是絕對正確的和革命的口號。

簡單地說，國家和政府的階級性質（它規定我國革命發展的基本目的）問題是一回事，而政府的日常政策問題，爲實現這些目的所必需的方法和手段的問題，是另一回事。這兩個問題無疑是相互聯系着的。但這並不是說二者是同一的，可以把它們混爲一談。

由此你可以知道，不能把國家和政府的階級性質問題與政府的日常政策問題混淆起來。

有人會說這裏有矛盾，怎能按階級性質來說是無產階級的政府叫做工農政府呢？但這裏的矛



盾是臆造出來的。老實說，這裏的『矛盾』是和我們有些自作聰明的人從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兩個公式中硬找出來的那種矛盾一樣。列寧的第一個公式說：『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階級的政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四七二頁）而第二個公式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勞動者的先鋒隊無產階級與人數衆多的非無產階級的勞動階層（小資產階級、小業主、農民、知識分子等等）所結成的特種形式的階級聯盟。』（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三五〇頁）

這兩個公式有沒有矛盾？當然沒有。既然如此，在階級聯盟的情況下，譬如說在和基本農民羣衆結成階級聯盟的情況下，又怎樣實現一個階級（無產階級）的政權呢？辦法就是實現執政的無產階級（『勞動者的先鋒隊』）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作用。一個階級即無產階級的政權是藉助於這個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的聯盟並對後者實行國家領導而實現的，——這就是這兩個公式的基本思想。這裏有什麼矛盾呢？

無產階級對基本農民羣衆的國家領導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不是像我們爭取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有過的那種領導呢？不是的，不是那種領導。無產階級對農民的國家領導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領導。無產階級的國家領導意味着：

（甲）資產階級已被推翻；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乙) 無產階級已掌握政權；

(丙) 無產階級不和其他階級分享政權；

(丁) 無產階級領導着基本農民羣衆建設社會主義。

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在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時期的領導則意味着：

(甲) 資本主義作爲一個基礎保留下來；

(乙) 革命的民主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它在政權的成分中佔優勢；

(丙) 民主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分享政權；

(丁) 無產階級使農民擺脫資產階級政黨的影響，在思想上政治上領導他們，並準備進行推翻資本主義的鬥爭。

由此可見，這裏的差別是根本的差別。

對於工農政府問題也應該這樣說。我們政府的無產階級性質和由此產生的社會主義任務，不僅不阻礙政府，反而推動它，必然推動它去實行保持並鞏固工農聯盟的政策，因爲工農聯盟是在我們農民國家中完成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階級任務的最重要的手段，因此，這種政府叫做工農政府，這裏會有什麼矛盾呢？

列寧實行工農政府這個口號並把我們的政府叫做工農政府，是正確的，這難道不明顯嗎？

總之應該說，藉以在我國實現一個階級的政權即無產階級的政權的『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是一

種頗爲複雜的東西。我知道這種複雜性是有些同志所不喜歡的，是不合他們口味的。我知道，其中有許多同志從「最省力的原則」出發，寧願與比較簡單比較容易的制度打交道。但有什麼辦法呢？第一、列寧主義實際上怎樣，就應當怎樣了解它（不能把列寧主義簡單化和庸俗化），第二、歷史證明，最簡單和最容易的「理論」並非常常是最正確的。

（四）你在信中抱怨說：

「所有闡明這個問題的同志的罪過在於他們或者只談政府，或者只談國家，因此都沒有給一個徹底的答覆，完全忽視了這兩種概念之間應有怎樣的關係。」

我承認我們的領導同志的確有這種「罪過」，特別是就下面這種情況來說：有些不很用心的「讀者」，自己不想好好地鑽研列寧的著作，而要求別人替他們把每一個句子都解釋得清清楚楚。但有什麼辦法呢？第一、我們的領導同志忙於日常工作，不可能把列寧主義像一般所說的，逐條加以解釋；第二、也應該給「讀者」留下些東西，他們終究應該由草率地閱讀列寧的著作轉而認真地研究列寧主義。同時必須指出，如果「讀者」不認真地研究列寧主義，那末，像你這樣的怨言和「誤解」是永遠會發生的。

例如拿我們的國家問題來說吧。顯然，我們的國家無論按其階級性質或者按其綱領、按其基本任務、按其所作所爲來說，都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工人的國家，固然它還帶着某種「官僚主義的病態」。請回憶一下列寧的定義：

「工人國家是一種抽象概念。而事實上我們有一個工人的國家，其特點是：第一、在國內佔人口多數的不是工人而是農民；第二、這個工人國家還帶着官僚主義的病態。」（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十七頁至第二十八頁）

恐怕只有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我們某些反對派分子才會懷疑這一點。列寧屢次解釋：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階級的政權，即無產階級的政權。所有這些都是大家老早知道的。可是有不少『讀者』，過去抱怨現在還在抱怨列寧有時稱我們的國家爲『工農』國家。不難了解，列寧在這種場合並不是說明我們國家的階級性質，更不是否定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性質，而是說明蘇維埃國家的無產階級性質使無產階級和基本農民羣衆的結合成爲必要，因此，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應當以鞏固這種結合爲目的。

請看一下『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四頁，第二十五卷第五十、八十兩頁，第二十六卷第四十、六十七、二〇七、二一六各頁，第二十七卷第四十七頁。在所有這些著作和其他一些著作中，列寧都稱我們的國家爲『工農』國家。但奇怪的是有人還不明白：列寧在所有這些場合都不是說明我們國家的階級性質，而是規定鞏固結合的政策，這種政策是由我們農民國家條件下的我們國家的無產階級性質和社會主義的任務產生的。在這種有條件有限度的意義上，而且僅僅在這種意義上才能說『工農』國家，列寧在其著作中的上述地方也正是這樣說的。

至於我們國家的階級性質，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列寧對此下了一個不容有任何曲解的最確切的

定義：我國是一個農民佔人口多數的帶着官僚主義病態的工人國家。看來是清楚了。可是有些只會『讀』字句而不願領會其內容的『讀者』仍在繼續埋怨列寧在我們國家的性質問題上把他們『弄糊塗了』，而『學生們』却不願把『糊塗的東西』『弄明白』。真有點可笑……

你要問：擺脫『誤解』的出路究竟在哪裏呢？

在我看來，出路只有一條：研究列寧的著作不在抓住個別的片段，而在抓住本質，研究時要嚴肅認真，要深思熟慮，要下工夫。

我看不出別的什麼出路。

載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

【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六期

## 給申凱維奇的信

答覆遲了，請原諒。

(一)你引用了列寧反對燒酒的話(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和第三十三卷(四三))。列寧的話中央委員會當然是知道的。雖然如此，黨中央還是同意實行燒酒買賣，因為中央在一九二二年就已得到列寧的同意。

列寧認為，在我方作一定犧牲的條件下，清理我國對各資產階級國家的債務，並得到巨額的借款或巨額的長期信用貸款，不是不可能的。在熱那亞會議(四)時期他曾這樣想過。如果這種策劃成功，我們當然不必實行燒酒買賣了。但是這種策劃並未實現，同時我們又沒有發展工業的資金，既沒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資金，我們就不能指望我國工業獲得較為可觀的發展，而這種發展又是決定我國整個國民經濟命運的，——於是我們和列寧一起得出了必須實行燒酒買賣的結論。

受外國資本奴役好些呢，還是實行燒酒買賣好些，——這就是當時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顯然，我們寧可實行燒酒買賣，因為我們當時認為而且現在繼續認為：如果我們爲了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勝利而不得不沾染一點髒的東西，那末，爲了我們事業的利益，我們只好採取這種極端的手段。

一九二四年十月我們黨中央討論了這個問題。有幾位中央委員反對實行燒酒買賣，然而並未指出可以獲取發展工業的資金的任何來源。爲了答覆這一點，七位中央委員，我也在內，向中央全會提出了如下的聲明：

『列寧同志在一九二二年夏天和同年秋天（九月）對我們每個人說過好幾次：由於借外債已經絕望（熱那亞會議的失敗），將來必須實行燒酒專賣，這對於籌集最低限度的基金以維持幣制和工業是特別需要的。因爲有幾位同志引用了列寧早年對這個問題的說明，所以我們認爲有責任聲明這一切。』

我黨中央全會通過了實行燒酒專賣的決議。

（二）至於你希望『和我建立通訊聯系』，我很歡迎，並請你把感興趣的問題寫給我。可能我答覆得遲一點，但我總是要答覆的。 致

共產主義敬禮

約·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

第一次刊印

# 在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次 全國代表會議<sup>(譯)</sup>上的演說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同志們！讓我代表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祝賀你們。(鼓掌)

讓我祝你們在組織我國工農青年並對他們進行政治教育的艱鉅工作中獲得成功。

共產主義青年團在我國向來都走在我們戰士的前列。我們相信青年團今後仍將站在前列，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前進。(鼓掌)

祝賀之後，現在讓我來談談你們中間幾位青年團員同志方才跟我談起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關於我國工業政策的問題。這可以說是我們國內的事情。第二個是關於南京事件的問題，這當然是國外的事情。

同志們！我國工業所必須遵循的基本路綫，決定我國工業今後一切步驟的基本路綫，就是不斷減低工業產品成本的路綫，不斷減低工業品的出廠價格的路綫。我國工業如果想要發展，想要壯大，

在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次全國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想要領導農業，想要鞏固並擴大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這就是它應該走的大道。

這條路綫是從哪裏來的呢？

決定這條路綫的必要性和適當性的原因是什麼呢？

這條路綫至少是由四個基本原因決定的。

第一個原因是：以高價為基礎的工業不是而且不能是真正的工業，因為這樣的工業必然會退化或沒有而且不能有生命力的溫室植物。只有不斷減低商品價格的工業，只有以不斷減低產品成本為基礎的工業，只有為此而不斷改進自己的生產、技術、勞動組織、經營管理的方式和方法的工業，只有這樣的工業才是我們所需要的，因為只有它才能向前發展，只有它才能使無產階級獲得完全的勝利。

第二個原因是：我國工業是以國內市場為基礎的。我們不能而且沒有可能在國外市場上和資本家競爭。國內市場是我國工業的基本市場。由此可見，我國工業只能隨着我國的國內市場，這一市場的容量，羣衆對工業品的需求的发展和擴大而发展和鞏固起來。我國國內市場的擴大，它的容量的增加是由什麼來決定的呢？這主要是由不斷減低工業品的價格，也就是前面我說過的我國工業發展的那條基本路綫來決定的。

第三個原因是：不減低工業品的價格，不逐步降低工業產品的成本，要保持進一步提高工人工資所必需的條件是不可能的。第一、工人本身就是工業品的消費者，因此，減低這些商品的價格對於保

持和提高實際工資不能沒有重大的意義。第二、減低工業品的價格，就能穩定城市中主要是由工人消費的農產品的價格，這對於保持和提高工人的實際工資也不能沒有極重大的意義。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能否不去不斷地提高工人的工資呢？不，不能。由此可見，不斷減低工業品的價格是逐步提高工人階級生活水平最必需的先決條件之一。

最後，第四個原因是：不減低工業品的價格，我們就不能保持無產階級和農民間、工業和農業間的結合，而這種結合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你們知道，農民用很貴的價錢購買工業品、紡織品、機器等。你們知道，這種情形在農民中引起了很大的不滿，並阻礙了農業的發展。由此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由此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真要保持這種結合，保持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並繼續發展農業，我們就必須實行不斷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

但是，要使減低工業品成本和商品出廠價格的政策成爲可能並完全實現，必須做些什麼呢？那就必須根本改善生產技術，根本改善企業中的勞動組織，根本改善並精簡全部經濟機構，並且和經濟機構中的官僚主義作堅決的鬥爭。我們把這一切稱爲生產和經營管理的社會主義合理化。我國工業已經進入這樣的發展階段，不採用新的更優良的技術，不採用新的更完善的勞動組織，不精簡我們的經濟機構，就不能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和不斷減低工業品的成本。這一切對我們之所以必要，不僅是爲了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減低工業品的價格，而且是爲了在這個基礎上積蓄資金，用來進一步發展和擴大我國的工業。這就是爲什麼我們需要生產和經營管理的社會主義合理化。

於是就得出一個連環的關係：若不不斷減低工業產品的成本和商品的出廠價格，我們就不能繼續發展工業，若不採用新的技術、新的勞動組織形式和新的簡化的經營管理方法，就不能減低工業品的價格。因此，生產和經營管理的社會主義合理化問題乃是當前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之一。

正因為如此，我認爲我們黨中央不久以前關於生產和經營管理的合理化的決議<sup>(8)</sup>是我們黨的最重要的決議之一，它規定了我們最近時期的工業政策。

有人說，合理化需要一部分工人，包括青年在內，作某些暫時的犧牲。同志們，這是對的。

我國革命的歷史說明，如果沒有一部分工人爲了我國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作某些犧牲，我們要向前邁一大步是做不到的。內戰就是一個例子，雖然目前這種輕微的犧牲是絕不能和我國內戰時期的那種重大犧牲相比的。你們看到，那些犧牲現時在我國已獲得綽綽有餘的補償了。

目前的輕微的犧牲在最近的將來定能獲得綽綽有餘的補償，這幾乎是用不着證明的。因此，我爲爲了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我們應當不怕某些輕微的犧牲。

在我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向來都站在我們戰士的前列。我從來沒有聽說青年團落在我們革命生活事件的後面。我不懷疑，現在青年團在實行社會主義合理化的問題上也一定會站在它應站的地位上。（鼓掌）

現在讓我談談第二個問題，關於南京事件的問題。我想，南京事件對我們來說不應該是件意外的事情。沒有暴力和掠奪，沒有流血和槍殺，帝國主義就活不下去。這就是帝國主義之所以爲帝國主

義。因此，南京事件對我們來說不能是件意外的事情。

南京事件說明了什麼呢？

它的政治意義在哪裏呢？

南京事件說明在帝國主義的政策中發生了轉折，就是從武裝的和平轉變為反對中國人民的武裝的戰爭。

在南京事件發生以前，帝國主義竭力用和平和不干涉他國內政的花言巧語，用「文明」和「博愛」的假面具，用國際聯盟等等來掩蓋它的意圖。而在南京事件發生以後，帝國主義却把這些花言巧語、不干涉、國際聯盟以及其他一切假面具統統拋棄了。現在帝國主義在全世界面前完全現出它那公開的掠奪者和壓迫者的原形了。

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又受到一次致命的打擊。老實說，帝國主義的和平主義的歌頌者，如彭庫爾之流和布萊夏德之流，除了他們的騙人的和平主義言詞以外，還能拿什麼來對抗槍殺南京居民的事實呢？

國際聯盟又挨了一個耳光。國際聯盟的一個會員國槍殺另一個會員國的居民，而國際聯盟本身却裝聾作啞，推說此事與己無關，這一事實，除了帝國主義的走狗以外，還有誰會認為是「正常的」呢？

這就證明我們黨是正確的，它估計到帝國主義國家的軍隊開往上海就是武裝進攻中國人民的前

奏曲。因為現在，除了瞎子以外，誰都看得清帝國主義所以需要上海駐紮軍隊，就是爲了從『言論』轉到『行動』。

南京事件的意義就是如此。

帝國主義者敢於在南京進行冒險，他們的意圖是什麼呢？

帝國主義者摘下自己的假面具，把砲轟南京提到日程上來，也許是想扭轉歷史的車輪，撲滅各國蓬勃發展的革命運動，並爲恢復帝國主義大戰前曾有過的世界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而鬥爭。

大家知道，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大戰中受到了無法醫治的創傷。

大家知道，約在十年前，蘇聯的工人和農民突破了資本的陣綫，帶給它無法醫治的創傷。

大家知道，帝國主義戰爭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和附屬國中的統治基礎。

大家知道，在十月革命爆發後十年，中國的工人和農民也開始向帝國主義陣綫進攻，並且沒有任何根據來推斷說，他們不能完全突破這條陣綫。

帝國主義者也許想一舉而把這一切消滅乾淨，揭開歷史的『新的一頁』。如果他們真要這樣做，那就必須承認他們是犯了很大的錯誤。因為只有老糊塗才會以爲大砲的規律勝過歷史的規律，才會以爲砲轟南京可以扭轉歷史的車輪。

帝國主義者也許想用砲轟南京的行動來恐嚇其他各國奮力爭取自由的被壓迫的人民，似乎對他們說：南京的故事就是給你們的教訓。同志們，這並不是不可能的。恐嚇政策在帝國主義的歷史上是

有其「根據」的。但這種政策是沒有用的，是達不到目的的，這一點幾乎用不着懷疑。當年俄國沙皇政府也曾「有效地」採用過這種政策。但其結果如何呢？你們知道，它是以沙皇制度的完全覆滅而告終的。

最後，帝國主義者也許想用砲轟南京的行動來打擊中國革命的心臟，一則使中國南方的軍隊不能繼續前進，使中國不能統一，二則使漢口的租界談判所議定的那些條件不能實現。這是完全可能的，也許完全是這樣的。爲了「更便於機動」，帝國主義者不願有一個統一的中國而寧願有兩個中國，關於這一點，資本主義報刊已經透露好幾次了。至於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租界，那幾乎用不着懷疑，很多帝國主義者是「不同情」在漢口擬定和批准的那些條件的。因此，帝國主義者砲轟南京，看來是想以此說明：他們寧願將來在壓力下和在砲火伴奏下與國民政府進行談判。帝國主義者的音樂趣味就是如此。這種奇怪的音樂很像吃人者的音樂，看來這並沒有使帝國主義者感到難以爲情……

他們能否達到他們的目的，最近將來的事實就會表明。然而必須指出，他們日前所達到的只有一點，那就是加深了中國人對帝國主義的仇恨，團結了國民黨的力量，使中國革命運動又往左移動了一步。

幾乎用不着懷疑，他們目前所得到的正是相反的結果。

由此可見，帝國主義者砲轟南京想得到的是一種結果，而事實上所得到的是一種結果，並且是和他們的初衷完全相反的結果。

這就是南京事件的結果和前途。

這就是保守陣營中的聰明人的政策。

俗語說得好，上帝註定誰死亡，他就奪去誰的理智。（熱烈鼓掌，經久不息。）

載於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真理報】第七十二號

## 給邱貢諾夫的信

回信太遲，請原諒。

(一)一九二二年列寧對孫中山的批判<sup>(註)</sup>當然沒有過時，仍舊有效。但這個批判所涉及的是舊的孫中山。要知道孫中山並非始終站在一點上。他是向前發展的，正像世界上一切都在發展一樣。十月革命以後，特別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列寧對孫中山很尊敬，這主要是孫中山開始和中國共產黨人接近和合作的緣故。談到列寧和孫中山主義的時候，必須注意到這種情況。這是不是說孫中山已經是共產主義者呢？不，不是這個意思。孫中山主義和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差別仍舊存在。中國共產黨人所以和國民黨人在一個黨內即國民黨內合作，則是由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權、民族、民生，對中國革命發展現階段上的共產黨人和孫中山主義者在國民黨內共同工作來說，乃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基礎。

有人說，俄國有一個時期也曾面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可是當時共產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並沒有加入一個共同的黨。這種說法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問題在於俄國當時在民族方面並不是一個被壓迫的國家（它不反對自己壓迫其他民族），因此，在俄國就沒有把全國各種革命力量聯合成一個統一



陣營的強大的民族因素，而在現時的中國，民族因素不僅存在，並且是一個主要的因素（反對帝國主義壓迫者），這個因素決定着國民黨內部中國各種革命力量相互關係的性質。

（二）我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sup>(8)</sup>中沒有一句話說到『對日讓步』，更沒有說到『犧牲中國』來『對日讓步』。這樣說是不嚴肅的，邱貢諾夫同志。我在那個報告中僅僅說到對日本的友好關係。從外交觀點看來，友好關係是什麼呢？這就是說，我們不願和日本打仗，我們堅持和平政策。

（三）至於說到美國的兩面政策，那末這種兩面性是如此清楚明白，簡直用不着解釋了。

致

共產主義敬禮

約·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

第一次刊印

# 論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

(答楊—斯基)

你的信當然是如期收到了。回信稍遲，請原諒。

(一) 列寧說：『任何一個革命的最主要的問題都是國家政權問題。』(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四〇頁)政權集中在哪個階級或哪些階級手裏，哪個階級或哪些階級應被推翻，哪個階級或哪些階級應當取得政權，——這就是『任何一個革命的最主要的問題』。

在革命某一階段的整個時期內都有效的黨的基本戰略口號，若不完全全以列寧的這個根本論點為依據，便不能稱為基本口號。

基本口號要成為正確的口號，便一定要以對階級力量作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為基礎，要規定階級鬥爭戰綫上革命力量的正確配置計劃，要使黨易於把羣衆引上爭取革命勝利的戰綫，引上新階級奪取政權的戰綫，要使黨易於把廣大人民羣衆編成一支為完成此項任務所必需的強大的政治軍隊。

在革命某一階段中可能有失敗和退却、失利和個別策略錯誤，但這並不是說基本戰略口號是不正確的。例如我國革命第一階段的基本口號——『聯合全體農民，中立資產階級，反對沙皇和地主，

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而奮鬥』是完全正確的，雖然一九〇五年革命遭到了失敗。

所以，決不能把黨的基本口號問題和革命在某一發展階段上成功或失敗的問題混爲一談。

也會發生這樣的情形，就是黨的基本口號在革命進程中雖已做到推翻了幾個舊階級或一個舊階級的政權，可是從這個口號中產生出來的一連串重大的革命要求却沒有實現，或它們的實現竟拖了一整個時期，或它們的實現還需要來一次革命，但這並不是說基本口號是不正確的。例如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和地主，可是沒有做到沒收地主土地等等，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在革命第一階段上的基本口號是不正確的。

再舉一個例子來說。十月革命推翻了資產階級，使政權轉到了無產階級手中，可是它沒有一下子做到一般地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特別是在鄉村裏使富農陷於孤立，它拖了一個相當時期才把這件事情做成，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基本口號——『聯合貧苦農民，中立中農，反對城鄉資本主義，爲無產階級政權而奮鬥』是不正確的。

所以，決不能把黨的基本口號問題和從這口號中產生出來的某種要求的實現的期限和方式問題混爲一談。

因此，在估計我黨的戰略口號時，決不能以某一時期內革命運動的偶一成功或失敗爲準則，尤其不能以從這些口號中產生出來的某種要求的實現的期限或方式爲準則。在估計黨的戰略口號時，只能以對階級力量作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在爭取革命勝利、爭取政權集中於新階級手裏這一戰綫上革

命力量的正確配置爲準則。

你的錯誤就在於你迴避了這個最重要的方法論問題，或是沒有懂得這個問題。

(二) 你在信中寫道：

「斷言我們只有在十月革命以前才聯合全體農民，這是正確的嗎？不，不正確。『聯合全體農民』這一口號，在十月革命以前，在十月革命時期和十月革命以後的第一個時期都是有效的，因爲當時全體農民都是關心資產階級革命的徹底完成的。」

照你這段話說來，黨在革命第一階段（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即問題是要推翻沙皇地主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時的戰略口號，跟黨在革命第二階段（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即問題是要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時的戰略口號，是沒有區別的。

可見你是否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間的基本差別的。你所以犯這種錯誤，是因爲你大概不願意了解一件簡單的事情：戰略口號的主題是革命某一階段上的政權問題，是哪個階級要被推翻和政權要轉到哪個階級手裏的問題。幾乎用不着證明，你在這裏是根本不對的。

你說，在十月革命時期和十月革命後的第一個時期，我們都是實行「聯合全體農民」的口號，因爲當時全體農民都關心資產階級革命的徹底完成。可是，誰告訴過你，十月的大轉變和十月革命只限於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或是以此作爲自己的基本任務呢？你從哪裏得出了這一點呢？難道可以以把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納入資產階級革命的範圍嗎？難道爭取無產階級

專政不是超出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範圍嗎？

怎麼可以斷定富農（要知道他們也是農民）能支持我們推翻資產階級並使政權轉歸無產階級呢？

怎麼可以否認我們實行土地國有、廢除土地私有制、禁止土地買賣等等法令（雖然這種法令不能算是社會主義的法令）時是和富農作鬥爭而不是和富農聯合呢？

怎麼可以斷定富農（也是農民）能支持蘇維埃政權沒收工廠、鐵路、銀行等等法令，能支持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無產階級口號呢？

怎麼可以斷定十月革命的基本內容不是實行諸如此類的辦法，不是推翻資產階級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呢？

毫無疑問，十月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沒有十月革命便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同樣，十月革命如果沒有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它本身也就不能鞏固；十月革命既然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了，它也就得到了全體農民的同情。所有這些都是無可爭論的。可是，難道根據這一點就可以斷定，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不是十月革命進程中的從生現象，而是十月革命的本質或主要目的嗎？你把十月革命的主要目的，即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剝奪資本公司等等，拋到那裏去了呢？

如果戰略口號的主題是任何一個革命的基本問題，即政權由一個階級轉到另一個階級的問題，那末決不能將無產階級政權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問題跟推翻資產階級並爭得這個無產階級政

權的問題混爲一談，即與那成爲革命第二階段戰略口號主題的問題混爲一談，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它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了，並把中世紀一切污垢掃除淨盡了。這對鄉村具有最主要的和真正決定性的意義。不這樣，就不能把農民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匯合起來，這一點馬克思早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就說過了。不這樣，無產階級革命本身就不能鞏固。

同時必須注意下述一個重要情況。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並不是一舉而成的事情。實際上，這件事情拖了一整個時期，不僅包括一九一八年的幾段時間，像你來信中所說的那樣，而且包括一九一九年（伏爾加河流域——烏拉爾）和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烏克蘭）的幾段時間。我指的是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的進攻，那時全體農民面臨地主政權復辟的危險，那時農民——正是全體農民——不得不團結在蘇維埃政權的周圍，以保證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並使自己保有這一革命的果實。必須時刻注意到實際生活過程的這種複雜性和多樣性，注意到無產階級專政的直接社會主義任務和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任務的這種「奇巧的」錯綜結合，才能正確了解你摘自列寧著作中的引文以及黨的口號如何見諸實行的訣竅。

能不能說這種錯綜結合的情形證明黨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口號不正確呢？能不能說這個口號和黨在革命第一階段上的口號沒有區別呢？不，不能這樣說。相反地，這種錯綜結合的情形恰巧證明黨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口號，即聯合貧苦農民，反對城鄉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爲無產階級政權而鬥爭等等口號是正確的。爲什麼呢？因爲要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必須首先在十月革命中推翻資產階

級政權並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因為只有這樣的政權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而爲了在十月革命中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就必須在十月革命以前準備並組織一支能推翻資產階級、能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相當的政治大軍，並且無須證明，這樣的政治大軍，我們只有在無產階級聯合貧苦農民、反對資產階級、爲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的口號下，才能準備並組織起來。

很明顯，沒有這樣一個從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所實行的戰略口號，我們就不會有這樣的政治大軍，也就不會在十月革命中獲得勝利，不會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因而也就沒有可能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

正因爲如此，就不能將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這件事跟革命第二階段上以保證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爲任務的戰略口號對立起來。

避免這一切「矛盾」的辦法只有一個，就是承認革命第一階段（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戰略口號和革命第二階段（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口號有根本的差別，承認我們在革命第一階段時期是聯合全體農民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奮鬥，我們在革命第二階段時期則是聯合貧苦農民、反對資本政權、爲無產階級革命而奮鬥。

承認這一點是必要的，因爲分析了革命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階級力量以後，我們非承認這一點不可。否則就無法解釋爲什麼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前，我們是在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下進行工作，而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這個口號就被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社會主義專政

的口號所代替了。

你應該同意，在一九一七年三四月間以一個口號代替另一個口號的事實，按照你的公式是無法解釋的。

列寧還在他的「小冊子『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裏就指出了黨的兩個戰略口號間的這種根本差別。他把黨在準備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的口號規定如下：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打破專制制度的反抗，並麻痺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八十一頁）

換句話說，聯合全體農民，中立資產階級，反對專制制度，爲民主革命而奮鬥。

至於黨在社會主義革命準備時期的口號，他則規定如下：

『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把居民中的半無產階級分子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使用強力打破資產階級的反抗，並麻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同上）

換句話說，聯合貧苦農民及一般半無產階層，中立城鄉小資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爲社會主義革命而奮鬥。

這是一九〇五年的事情。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把當時政治情況估計爲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跟資產階級實際政權錯綜結合的局面時說道：



「俄國時局的特點在於從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第二階段，第一階段由於無產階級的覺悟性和組織性不夠而使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第二階段則應當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階級手中。」（見列寧『四月提綱』，『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四頁）

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底，當十月革命的準備工作正以全力進行時，列寧在『農民和工人』這篇專論中寫道：

「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才能推翻君主制度，——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當時（指一九〇五年而言。——斯大林註）的基本定義。這個定義是對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再次證實了這一點。只有領導着貧苦農民（即我們黨綱所說的半無產者）的無產階級才能以民主的和平結束戰爭，醫好戰爭創傷，開始實行那些已成爲絕對必要而刻不容緩的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現時的定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二五八頁）

這一點不應了解成這樣：似乎我國現在是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這當然是不對的。我們是在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下走向十月革命的，並且我們在十月革命中在形式上實現了這個口號，因為我們當時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實行聯盟並和他們分掌過領導權，雖然事實上我國當時就已經是無產階級專政，因為我們布爾什維克在當時是佔多數的。可是自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盲動』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以後，自我們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聯盟破裂以後，當領導權已完完全全轉到一個政黨即我黨（我黨是不和而且不能和其他政黨分享國家領導權的）手中的時候，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在形式上也就不存在了。這在我們就叫做無產階級專政。

最後，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列寧回顧經歷過的革命道路時寫道：

「是的，當我們還和全體農民一道前進時，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這是我們十分清楚地意識到了的，是我們從一九〇五年起說過千百次的，我們從來沒有試圖跳過歷史過程中的這個必經階段，也沒有試圖用法令把它取消……可是，在一九一七年，從四月起，即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在我們奪取政權以前很久，我們就已經公開說過並向人民解釋過：現在，革命決不能停止在這個地方，因為國家已前進了，資本主義已前進了，破產現象已達到空前的程度，這種破產現象要求（不管誰願意與否）採取向社會主義前進的步驟。否則就不能前進，就不能挽救備受戰爭摧殘的國家，就不能減輕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的痛苦。結果正像我們說過的一樣。革命進程已證實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和「全體」農民一道，反對君主制度，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度（因此，革命還是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後和貧苦農民一道，和半無產階級一道，和一切被剝削者一道，反對資本主義，反對農村的富人、富農和投機者，因此，革命也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就成爲社會主義的革命了。」（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七六頁至第二七七頁）

由此可見，列寧曾屢次強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準備時期的第一個戰略口號和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的第二個戰略口號之間的全部差別。前一口號是聯合全體農民反對專制制度，後一口號是聯合貧苦農民反對資產階級。

十月革命後拖了一整個時期才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既然我們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全體』農民也就不能不同情我們，——這件事實，像我在上面說過的那樣，絲毫不會動搖這個基本原理：我們是和貧苦農民一道走向十月革命並在十月革命中獲得勝利的，我們是和貧苦農民一道，在富農（也是農民）的反抗和中農的動搖下，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之一就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

看來是很明白的了。

（三）其次，你在來信中寫道：

「我們是在聯合貧農和中立農的口號下走到十月革命的。」這一斷語是否正確呢？不，不正確。依照上面說過的理由和摘自列寧著作中的引文可以看出，這個口號只有在「農民內部階級分化已經成熟」（列寧）時，即「在一九一八年夏季和秋季」才能產生出來。」

照你這段話說來，黨走上中立農的道路，不是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也不是在十月革命時，而是在十月革命以後，特別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在貧農委員會取消以後。這是完全不對的。

恰恰相反，中立中農的政策，不是在貧農委員會取消以後即一九一八年以後開始的，而是在那時候完結的。正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中立中農的政策在我們的實踐中被取消了（而不是被施行了）。正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後，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寧宣佈我黨第八次代表大會開幕時說道：

「舊時的社會主義優秀代表，當他們還相信革命並在理論上思想上為革命服務的時候，會說到中立農民，就是說，即使不能把中農變成積極幫助無產階級革命的社會階層，至少也要把他們變成不妨礙革命的、中立的、不站在我們的敵人方面的社會階層。對任務的這種抽象的、理論上的提法，我們是十分懂得的。可是這種提法是不夠的。我們已進入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建設階段，此時必須具體地詳細地制定一種為農村工作經驗所考驗過的基本規則和指示，我們應當以這種規則和指示為準繩而對中農採取堅固聯盟的立場。」（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九卷第一二四頁至第一二五頁）

由此可見，結果是恰恰和你在來信內所說的相反，你在這裏把我們真實的黨的實踐顛倒過來，把中立中農政策的開始和終結混淆起來了。

當我們還在推翻資產階級時，當蘇維埃政權還沒有鞏固時，中農總是叫苦連天並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間動搖不定，因此也就不得不使他們中立。當中農開始確信資產階級『真』被推翻，蘇維埃政權

○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論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

已在鞏固，富農正被抑制，紅軍開始在內戰戰綫上獲得勝利時，他們就開始轉到我們這方面來了。正是在這樣的轉變發生以後，才能有列寧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提出的黨的第三個戰略口號：依靠貧農，和中農建立堅固聯盟，向前邁進，為社會主義建設而奮鬥。

你怎能忘記這件盡人皆知的事實呢？

其次，從你的來信得出，在向無產階級革命過渡時以及在這個革命勝利以後最初時日裏，中立中農的政策是不正確的，不適用的，因而是不能採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實際情形恰恰相反。正是在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時和在無產階級政權鞏固以前，中農的動搖和抗拒是最厲害的。正是在這個時期，必須聯合貧農和中立中農。

你在堅持自己的錯誤時，說農民問題不僅對於我國，而且對於「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國經濟多少相似的」其他國家，都有重大的意義。後一意見當然是對的。可是，請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土地問題提綱<sup>(5)</sup>內，怎樣說明各國無產階級政黨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時期對待中農的政策吧。列寧把貧苦農民，或更確切些說，「農村被剝削的勞動羣衆」，稱為由農業工人、半無產者或極小農和小農所組成的單獨集團，然後在講到中農是農村特別集團的問題時說道：

「所謂「中農」，在經濟意義上應了解為一種小耕作者，他們依據所有權或租佃權也佔有一塊不大的土地，但是第一、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塊土地通常使農家不僅能勉強維持生活，而且能得到某些——至少在好年成裏——可以變為資本的餘糧；第二、這種小的耕作者往往（例如兩

三戶中就有一戶)要僱傭他人的勞動力……革命無產階級不能(至少在最近的將來和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開始時)給自己提出把這個階層吸引到自己方面來的任務，而應當以中立這個階層的任務為限，也就是使它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保持中立。」(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三三頁)

既然如此，怎能說中立中農的政策在我國『只有』在一九一八年夏季和秋季，即鞏固蘇維埃政權、鞏固無產階級政權的事業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以後才能『產生』呢？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政黨在要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和鞏固無產階級政權時的戰略口號問題，也像中立中農問題一樣，並不如你所想像的那樣簡單。

(四)由上所述，可以看出，你摘自列寧著作中的幾段引文絲毫也不能和黨在革命第二階段上的基本口號相對立，因為(甲)這幾段引文所談論的不是黨在十月革命前的基本口號，而是在十月革命後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問題；(乙)它們並不是駁斥而是肯定這個口號的正確性。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現在不得不再重複一遍：決不能將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的時期內所實行的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任務，和黨在革命第二階段上，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前的時期內以政權問題為主題的戰略口號對立起來。

⊙ 青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論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

一九七

(五)你說到莫洛托夫同志在『真理報』上發表的那篇著名的文章『論我國資產階級革命』(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原來正是這篇文章『推動了』你來要我作解釋。我真不知道你是怎樣閱讀文章的。我也讀過莫洛托夫同志的文章，而且我以為這篇文章和我在我們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關於黨對農民的口號所說的話(三)是毫不矛盾的。

莫洛托夫同志在他的文章內不是說黨在十月革命時期的基本口號，而是說黨既然在十月革命後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它也就獲得了全體農民的同情。可是我在上面已經說過，確認這件事情，並不是否認而是證實下述基本原理的正確性：我們是和貧苦農民一道、中立中農、反對城鄉資產階級而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否則我們就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

載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布爾什維克』

雜誌第七、八兩期合刊

# 中國革命問題

(聯共(布)中央批准的給宣傳員的提綱)

## 一 中國革命的前途

決定中國革命性質的基本事實是：

- (甲) 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國主義的財政經濟的統治；
- (乙) 因軍閥和官僚的壓迫而加重的封建殘餘的壓迫；
- (丙) 千百萬工農羣衆日益發展的反封建官僚壓迫、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
- (丁) 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軟弱性，它對帝國主義的依賴性，它對革命運動規模的畏懼；
- (戊) 無產階級日益增長的革命積極性，無產階級在千百萬勞動羣衆中的威信的增長；
- (己) 中國鄰邦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

由此就產生了中國事件發展的兩條道路：

或者是民族資產階級擊敗無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勾結起來，共同進攻革命，以便建立資本主義的



統治而結束革命；

或者是無產階級把民族資產階級擠到一邊，鞏固自己的領導權，率領城鄉千百萬勞動羣衆克服民族資產階級的反抗，取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完全勝利，然後把它逐漸轉移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軌道上，並取得由此而產生的一切結果。

二者必居其一。

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和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這一專政的經驗可爲中國無產階級有成效地加以利用）大大地促進了中國革命走第二條道路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基本上是以統一戰綫來進攻中國革命的，現時在帝國主義者中間已沒有像十月革命以前存在於帝國主義陣營內部並削弱了帝國主義的那種分裂和戰爭，——這一事實說明中國革命在走向勝利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難要比俄國革命多得多，在這一革命進程中，投敵和叛變的事件也將比蘇聯內戰時期多得多。

因此，這兩條革命道路之間的鬥爭是中國革命的特點。

正因爲如此，共產黨人的基本任務就是爲中國革命的第二條道路的勝利而奮鬥。

## 二 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

在中國革命的第一個時期，在第一次北伐時期，當國民革命軍迫近長江，節節勝利，而工人和農民的強大運動還來不及展開的時候，民族資產階級（不是買辦）是和革命一道前進的。這是全民族聯合戰綫的革命。

這並不是說革命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沒有矛盾。這只是說，民族資產階級在支持革命時，竭力利用革命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限制革命的規模，使革命主要沿着爭奪地盤的路綫進行。這個時期國民黨內右派和左派間的鬥爭就是這些矛盾的反映。一九二六年三月蔣介石要把共產黨人逐出國民黨的企圖就是民族資產階級想壓制革命的第一次重大的企圖。大家知道，當時聯共（布）中央認為「必須執行把共產黨保留在國民黨內的路綫」，應當「使國民黨右派退出國民黨或把他們開除出去」（一九二六年四月）。

這條路綫使革命進一步展開，使左派與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和國民政府內親密合作，使國民黨的統一鞏固起來，同時揭露並孤立國民黨右派，使之服從國民黨的紀律；如果右派服從國民黨的紀律，就利用他們，利用他們的聯系和他們的經驗，如果右派破壞這種紀律並背叛革命利益，就把他們逐出國民黨。

後來的事件完全證實了這條路綫的正確性。農村中農民運動的猛烈發展以及農民協會和農民委員會的建立，城市裏洶湧的罷工浪潮以及工會委員會的成立，國民革命軍向帝國主義海陸軍包圍着的上海的勝利推進，——諸如此類的事實都說明當時所採取的路綫是唯一正確的路綫。

只有這一情況能夠說明下列事實：一九二七年二月國民黨右派企圖分裂國民黨並在南昌成立新中央，這一企圖在武漢的革命的國民黨一致反對之下遭到了破產。

但這個企圖是一種徵兆，表示國內正進行着階級力量的重新結合，右派和民族資產階級不會安心，他們將加緊反革命的工作。

因此，聯共（布）中央在一九二七年三月說得很對：

（甲）『現在由於階級力量的重新結合和帝國主義軍隊的集中，中國革命正處於危急關頭，它進一步的勝利只有在發展羣衆運動這一堅定的方針之下才有可能』；

（乙）『必須堅持武裝工農，把各地方的農民委員會變爲擁有武裝自衛力量的實際政權機關的方針』；

（丙）『共產黨不應當隱瞞國民黨右派的背叛的和反動的政策，應當用揭穿右派的辦法把羣衆動員到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周圍』（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

因此不難了解，後來革命的巨大規模和帝國主義者在上海的襲擊，不能不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拋入反革命的陣營，正像國民革命軍的佔領上海和上海工人的罷工不能不使帝國主義者聯合起來絞殺革命一樣。

事情正是這樣發生的。南京的砲聲在這方面就成了中國鬥爭力量重新劃清界限的信號。帝國主義者砲轟南京並提出最後通牒，是想表明他們在尋求民族資產階級的支持以共同反對中國革命。

蔣介石屠殺工人羣衆並實行政變，就像是響應帝國主義者的號召，表明他決心同民族資產階級一起勾結帝國主義者以反對中國工人和農民。

### 三 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

蔣介石的政變表示民族資產階級退出革命，國內反革命中心已經產生，國民黨右派已同帝國主義勾結起來反對中國革命。

蔣介石的政變表明從此以後在中國南部將有兩個陣營、兩個政府、兩個軍隊、兩個中心：武漢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

蔣介石的政變表明革命已進入其發展的第二階段，已開始從全民·族·聯·合·戰·綫的革命轉變為千·百·萬·工·農·羣·衆的革命，轉變為土·地·革·命，這個革命將加強和擴大反帝國主義、反土豪劣紳和封建地主、反軍閥和蔣介石反革命集團的鬥爭。

這就是說，革命的兩條道路之間的鬥爭，擁護進一步展開革命的人們和主張消滅革命的人們之間的鬥爭，將日益加劇，充滿當前整個革命時期。

這就是說，武漢的革命的國民黨既然與軍閥制度和帝國主義作堅決鬥爭，事實上將逐漸變成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機關；而南京的蔣介石反革命集團既然脫離工農並勾結帝國主義，終

究要遭受和軍閥同樣的命運。

由此可見，保持國民黨的統一的政策，在國民黨內孤立右派並爲了革命目的而利用右派的政策，已不能適應革命的新任務了。這個政策應當代之以堅決把右派逐出國民黨的政策，和右派作堅決鬥爭乃至在政治上把他們消滅乾淨的政策，把國家全部政權集中於革命的國民黨，沒有右派分子的國民黨，作爲左派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聯盟的國民黨手中的政策。

其次，由此可見，左派和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現階段上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義，這種合作反映出國民黨外漸漸形成的工農聯盟，沒有這種合作，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再其次，由此可見，革命的國民黨的力量，其主要來源是進一步展開工農革命運動和鞏固工農羣衆組織——革命農民委員會、工會以及其他作爲將來蘇維埃的準備因素的羣衆革命組織，革命勝利的基本保證是千百萬勞動羣衆革命積極性的增長，而對反革命的主要解毒劑則是工人和農民的武裝。

最後，由此可見，共產黨在與革命的國民黨人在同一隊伍中戰鬥的時候比任何時候都更應當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這是保證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的必要條件。

#### 四 反對派的錯誤

反對派（拉狄克及其同夥）的基本錯誤是他們不懂得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懂得中國革命現在處於什麼階段，不懂得中國革命目前的國際環境。

反對派要求中國革命以類似十月革命的速度發展起來。反對派不滿上海工人沒有去和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進行決戰。

但是他們不懂得中國革命不能以很快的速度發展起來，其中原因之一是目前的國際環境不像一九一七年那樣有利（帝國主義者之間沒有戰爭）。

他們不懂得在後備軍還沒有跟上的不利條件下是不能進行決戰的，例如布爾什維克不論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或七月都沒有進行決戰。

反對派不懂得在不利的條件下不避免決戰（在可以避免的時候）就是幫助革命的敵人。

反對派要求立即在中國成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然而現在成立蘇維埃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蘇維埃不是任何時候都可以成立的，——蘇維埃只有在革命浪潮特別高漲的時期才能成立。

第二、蘇維埃不是爲了空談而成立的，蘇維埃首先是作爲和現存政權進行鬥爭的機關，作爲奪取政權的機關而成立的。一九〇五年的情況是這樣，一九一七年的情況也是這樣。

但在目前，例如在武漢政府活動地區內成立蘇維埃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提出反對這個地區內的現存政權的口號，這就是說，提出成立新的政權機關的口號，提出反對革命的國民黨（和左派

國民黨人結成聯盟的共產黨人也加入其中)的政權的口號，因為現時在這個地區內，除了革命的國民黨的政權而外，並沒有其他的政權。

其次，這就是說，把兩種任務混淆起來了。一種任務是成立和鞏固現在革命的國民黨所依靠的工農羣衆組織，例如罷工委員會、農民協會、農民委員會、工會委員會、工廠委員會等等；另一種任務是成立作為新型國家政權的蘇維埃制度以代替革命的國民黨的政權。

最後，這就是說，他們不懂得中國革命目前處於什麼階段。這就是說，給中國人民的敵人以新的武器來和革命作鬥爭，來製造新的傳奇，說中國現在不是在進行民族革命，而是在人為地移植『莫斯科的蘇維埃化』。

可見反對派提出在目前成立蘇維埃的口號是有助於中國革命的敵人的。

反對派認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不適當的。因此，反對派認為共產黨最好退出國民黨。但是現在，當整個帝國主義匪幫及其一切走狗要求把共產黨人趕出國民黨的時候，共產黨退出國民黨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退出戰場，拋棄自己在國民黨內的同盟者，使革命的敵人稱快。這就是說，削弱共產黨，破壞革命的國民黨，幫助上海的卡維涅克<sup>①</sup>們，把中國一切旗幟中最受歡迎的國民黨旗幟交給國民黨右派。

現在帝國主義者、軍閥和國民黨右派所要求的正是這一點。

由此可見，反對派主張共產黨在目前退出國民黨是有助於中國革命的敵人的。

因此，不久以前我黨中央全會堅決地擯棄了反對派的政綱是完全正確的〔五〕。

載於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真理報」第九十號

① 卡維涅克（一八〇二——一八五七）是法國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後臨時政府的陸軍部長，他殘酷地鎮壓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義。——譯者註。





# 給『真理報』

(紀念創刊十五周年)

敬禮！  
向『真理報』，向列寧遺訓的體現者和無產階級爭取共產主義的革命鬥爭的旗手，致熱烈的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

『真理報』第九十九號



# 論中國革命的幾個問題

(答馬爾秋林同志)

你寫給「農村共產黨人」雜誌〔吾〕編輯部的關於中國蘇維埃問題的信，已由編輯部轉來由我答覆。我對你的信作一個簡短的答覆，想你不會有異議吧。

馬爾秋林同志，我以為你的信是由誤會引起的。理由如下：

(一) 在斯大林的給宣傳員的提綱中反對在目前的中國立即成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你在反駁斯大林時，却援引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提綱和演說〔吾〕，其實這些提綱和演說只說到農民蘇維埃，勞動者蘇維埃，勞動人民蘇維埃，沒有一句話說到成立工人代表蘇維埃。

為什麼列寧在自己的提綱或演說中都沒有說到成立工人代表蘇維埃呢？因為列寧在演說或提綱中指的都是「還談不到純粹無產階級運動」，「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國家（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二一八頁）。列寧在演說中直截了當地說，他指的是中亞細亞、波斯那樣「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國家（同上）。

中國有上海、漢口、南京、長沙等等工業中心，有將近三百萬組織在工會裏的工人，能不能把中

國列入那樣的國家呢？顯然是不能的。

顯然，說到有一定數量的工業無產階級的現代中國的時候，必須注意到不僅要成立農民蘇維埃或勞動者蘇維埃，而且要成立工人和農民代表蘇維埃。

如果說的是波斯、阿富汗等等國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大家知道，斯大林的提綱中所指的是中國，而不是波斯、阿富汗等等國家。

因此，你反駁斯大林，你援引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和提綱，這是不正確的，這是無的放矢。

(二) 你的來信裏摘引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補充提綱』，這個提綱說東方『無產階級政黨應當加緊宣傳共產主義思想，一有可能就建立工人和農民蘇維埃』。同時你把這個『補充提綱』和從其中摘出的引文說成似乎是列寧寫的。這是不對的，馬爾秋林同志。在這裏你簡直弄錯了。『補充提綱』是羅易<sup>①</sup>寫的。它是作為羅易的提綱經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來『補充』列寧的提綱的（見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第一二二頁至第一二六頁）。

爲什麼需要『補充提綱』呢？爲的是從那些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落後的殖民地國家中特別劃出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因爲不能斷言這兩個國家『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你看一下這個『補充提綱』就會了解那裏主要是指中國和印度（見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第一二二頁）。

爲什麼要以羅易的特別提綱來『補充』列寧的提綱呢？這是因爲列寧的提綱是在第二次代表大

會開幕以前，在殖民地國家代表到達以前，在第二次代表大會專門委員會討論以前早就寫成和發表的。可是大會專門委員會在討論時發現有必要把中國、印度這樣的國家從東方落後殖民地中劃分出來，所以要有一個『補充提綱』。

因此，不能把列寧的演說和提綱與羅易的『補充提綱』混淆起來，同樣不可忘記：談到中國、印度這樣的國家時，必須注意到要成立的是工人和農民蘇維埃，而不僅是農民蘇維埃。

(三) 在中國要不要成立工人和農民蘇維埃呢？要，一定要。斯大林的給宣傳員的提綱就直截了當地說到了這一點。這個提綱說：

『革命的國民黨的力量的主要來源是進一步展開工農革命運動和鞏固工農羣衆組織——革命農民委員會、工會以及其他作爲將來蘇維埃的準備因素的羣衆革命組織……』<sup>①</sup>

全部問題是在什麼時候，在什麼條件下，在什麼環境中成立蘇維埃。

工人代表蘇維埃是工人階級的包括一切的因而是最好的革命組織。但這並不是說，在任何時候和在任何條件下都可以成立工人代表蘇維埃。一九〇六年夏天，在革命退潮以後，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第一任主席赫魯斯塔寥夫提出了成立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問題，列寧當時反駁他說：目前後衛隊（農民）還沒有趕上先鋒隊（無產階級），成立工人代表蘇維埃是不適當的。列寧是完全對的。爲什麼

① 見本卷第二〇四頁。——編者註。

呢？因為工人代表蘇維埃不是工人的普通組織。工人代表蘇維埃是工人階級和現存政權作鬥爭的機關，是起義機關，是新的革命政權機關，而且只有作為這樣的機關，它們才能發展和鞏固。如果沒有反對現存政權的羣衆性的直接鬥爭的條件，沒有反對現存政權的羣衆起義的條件，沒有組織新的革命政權的條件，那末成立工人蘇維埃就是不適當的，因為沒有這樣的條件，它們就會有腐朽的危險，有變成空談場所的危險。

列寧關於工人代表蘇維埃說道：

「工人代表蘇維埃是羣衆直接鬥爭的機關……不是一種什麼理論，不是任何一個人的號召，不是某個人想出來的策略，不是黨的學說，而是事實的力量使這些非黨的羣衆機關必須起義，並使這些機關成爲起義機關。現在建立這樣的機關就是成立起義機關，號召建立這樣的機關就是號召起義。忘記這一點或對廣大人民羣衆隱瞞這一點，那就是最不可饒恕的近視和最惡劣的政策。」（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一卷第一〇三頁至第一〇四頁）他又說：

「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兩次革命的全部經驗，以及布爾什維克黨多年來的一切決定和一切政治聲明，歸結起來就是：工兵代表蘇維埃，只有作為起義機關，只有作為革命政權機

① ② ③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關○，才是現實的。沒有這個任務，蘇維埃就是空洞的玩物，勢必引起羣衆的麻木、冷淡、失望，因為羣衆對決議和抗議的無限重複表示厭惡是完全應該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一七頁）

這樣說來，在今天中國的南部，例如在革命的國民黨正掌握政權、運動正在「全部政權歸革命的國民黨」這個口號下向前發展的武漢政府地區，號召立即成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是什麼意思呢？現在號召在這個地區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就是號召起義以反對革命的國民黨的政權。這是否適當呢？顯然是不適當的。顯然，誰號召在這個地區立即成立工人代表蘇維埃，誰就是企圖跳過中國革命的國民黨階段，誰就是冒險把中國革命置於極端困難的境地。

馬爾秋林同志，關於在中國立即成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問題就是如此。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會通過一項標題爲「在什麼時候和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蘇維埃」的特別決議。這項決議是列寧在場時通過的。我勸你看一看這項決議。它還是有意義的（見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第五八〇頁至第五八三頁）。

（四）什麼時候需要在中國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呢？在中國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一定要在這樣的時機，就是勝利的土地革命全面展開的時候，作爲中國革命民粹派（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聯盟。

○ 齊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的國民黨開始衰落的時候，還未勝利而且不是很快就會勝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開始顯露其壞的一面的時候，從現今國民黨型的國家組織逐步地進到新的無產階級型的國家組織成爲必要的時候。

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羅易的「補充提綱」對工農蘇維埃所談到的那一段人所共知的話，正是應當這樣去理解的。

這個時機是否來到了呢？

無須證明，這樣的時機還沒有來到。

那末現在做什麼呢？現在要使中國的土地革命擴大和深入。要成立並鞏固種種工農羣衆組織，從工會委員會和罷工委員會到農民協會和農民革命委員會，以便隨着革命運動的發展和勝利把這些組織變爲將來工農兵代表蘇維埃的組織上和政治上的基礎。

現在的任務就在於此。

一九二七年五月九日

載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

「農村共產黨人」雜誌第十期

署名：約·斯大林

① 羅易曾是印度共產主義運動的活動家之一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後來成爲叛徒，一九二九年被開除出共產黨和共產國際。——譯者註。

# 和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同志們！可惜我今天只能談兩三個鐘頭的話。也許下一回我們可以舉行一次時間較長的座談。我想今天我們只能分析一下你們書面提出的問題。我一共收到了十個問題。我就在今天的談話中來答覆。如果還有補充的問題（據說是有的），我設法在下次座談中答覆。好吧，我們就來談本題吧。

## 第一個問題

「拉狄克斷言，中國農村中的農民鬥爭與其說是反對封建殘餘，不如說是反對資產階級。這種論斷爲什麼不對呢？」

能不能斷言在中國佔統治地位的是商業資本主義或封建殘餘呢？

爲什麼中國軍閥既是大工業企業的所有者同時又是封建制度的代表者呢？」

拉狄克確實下過類似這個問題中所指出的論斷。我記得拉狄克在莫斯科黨組織的積極分子會議

上的發言中，不是完全否認中國農村中有封建殘餘存在，就是不承認封建殘餘在中國農村中有重大的意義。

這當然是拉狄克的一個大的錯誤。

假如中國沒有封建殘餘，假如這些封建殘餘對中國農村沒有極重大的意義，那就不會有進行土地革命的基礎了，那就談不上土地革命是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現階段上的主要任務之一了。

中國農村裏是不是存在着商業資本呢？是的，是存在着，不僅存在着，而且從農民身上榨取脂膏並不亞於任何封建主。但是這種原始積累型的商業資本在中國農村中是和封建主的統治、和地主的統治獨特地結合着的，它從地主那裏襲用了中世紀的剝削和壓迫農民的方法。同志們，這就是問題之所在。

拉狄克的錯誤在於他不了解這種獨特性，不了解在保存封建的中世紀的剝削和壓迫農民的方法的條件下，中國農村中封建殘餘的統治和商人資本的存在的這種結合。

所有的軍閥、督軍、省長以及現在一切殘酷的進行掠奪的軍事和非軍事的官僚，都是中國這種獨特性的上層建築。

帝國主義支持着並鞏固着這整個的封建官僚機器。

某些軍閥擁有地產，同時是工礦企業的所有者，這種情況基本上沒有改變問題的實質。俄國許多地主也曾有過工廠和其他工礦企業，可是這並沒有妨礙他們依舊是封建殘餘的代表者。

既然在一些區域裏農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歸地主豪紳所有，既然地主在經濟方面和在行政、司法方面都握有實權，既然迄今在一些省份裏還有買賣婦女和兒童的事情，那就應該承認，這個中世紀環境中的統治勢力是和商業資本的勢力獨特地結合着的封建殘餘的勢力，地主的勢力，軍事與非軍事的地主官僚的勢力。

這些獨特的條件就給中國正在發展和還要發展的農民的土地運動造成基礎。

沒有這些條件，沒有封建殘餘和封建壓迫，在中國就不會有土地革命、沒收地主土地等等問題了。

沒有這些條件，中國的土地革命就會是不可理解的。

## 第二個問題

『拉狄克斷言：既然馬克思主義者不承認幾個階級的政黨，那末國民黨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了。他錯在哪裏呢？』

對於這個問題必須提出幾點意見。

第一、問題在這裏是提得不正確的。我們過去和現在都沒有說過國民黨是幾個階級的政黨。這是不對的。我們過去和現在都說：國民黨是幾個被壓迫階級聯盟的政黨。同志們，這並不是一回事。

假如國民黨是幾個階級的政黨，那末問題就會歸結成這樣：在加入國民黨的各階級中不論哪一個階級都不會在國民黨以外有自己的政黨，而國民黨本身就會是所有這些階級的一個共同的和唯一的政黨。難道實際上真是這樣的嗎？難道中國無產階級參加了國民黨就沒有自己單獨的政黨，就沒有和國民黨不同而且具有自己單獨的綱領、自己單獨的組織的共產黨嗎？顯然，國民黨不是幾個被壓迫階級的政黨，而是各有其黨組織的幾個被壓迫階級聯盟的政黨。因此，問題在這裏是提得不正確的。事實上，在目前的中國，只能說國民黨是幾個被壓迫階級聯盟的政黨。

第二、說馬克思主義在原則上不承認幾個被壓迫的革命階級聯盟的政黨，說馬克思主義者加入這種政黨在原則上是不容許的，這是不正確的。同志們，這是絕對不正確的。事實上馬克思主義不僅承認過（而且繼續承認）馬克思主義者加入這種政黨在原則上是容許的，而且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實際上也加入過這樣的政黨。我可以舉個例子，即馬克思本人在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時期的例子，當時馬克思和他的同志加入了德國有名的資產階級民主聯盟〔吾〕，並且在這個聯盟中與革命資產階級的代表合作。大家知道，加入這個資產階級民主聯盟的，加入這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除了馬克思主義者以外，還有革命資產階級的代表。當時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報』〔吾〕就是這個資產階級民主聯盟的機關報。只是在一八四九年春天，當德國革命開始走向低潮的時候，馬克思和他的同志才退出這個資產階級民主聯盟，決定建立一個具有獨立階級政策的完全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

可見，馬克思甚至比我們今天作為獨立的、具有自己單獨組織的無產階級政黨而參加國民黨的

中國共產黨人走得更遠。

一八四八年，當問題是要和革命資產階級共同進行革命鬥爭以反對專制制度的時候，馬克思和他的同志加入了德國資產階級民主聯盟，這樣做是否適當，是可爭論可不爭論的。這是策略問題。但馬克思在原則上承認這種加入是容許的，——這一點是無可疑的。

第三、說武漢國民黨是小資產階級政黨，而且就此為止，那是根本錯誤的。只有既不懂得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又不懂得中國革命性質的人，才會這樣說明國民黨的特徵。國民黨不是『普通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小資產階級政黨有各種各樣的。俄國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也是小資產階級政黨，但它們又是帝國主義的政黨，因為它們同法英帝國主義者結成戰鬥同盟，同他們一起征服和壓迫其他的國家——土耳其、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加里西亞。

能不能說國民黨是帝國主義的政黨呢？顯然是不能的。國民黨是反帝國主義的政黨，正像中國革命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一樣。這裏是有根本差別的。看不出這種差別，把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黨和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的帝國主義的政黨混為一談，就是一點也不懂得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

當然，假如國民黨是帝國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政黨，那末中國共產黨人就不會和它結成聯盟，而會叫它滾蛋。但問題正在於國民黨是反帝國主義的政黨，它正和帝國主義者及其在中國的走狗進行着革命的鬥爭。在這個意義上說，國民黨要比克倫斯基和策烈鐵里類型的一切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者』高得多。

甚至國民黨右派蔣介石，在發動政變以前就用種種陰謀詭計來反對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的蔣介石；當時也要比克倫斯基之流和策烈鐵里之流高出一些，因為克倫斯基之流和策烈鐵里之流進行戰爭是爲了奴役土耳其、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加里西亞，從而鞏固帝國主義，而蔣介石進行戰爭——無論進行得好壞——則是反對奴役中國，從而削弱帝國主義的。

拉狄克和一般反對派的錯誤就在於他們撇開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看不見中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性質，看不出武漢的國民黨即沒有國民黨右派的國民黨是中國勞動羣衆反帝國主義鬥爭的中心。

### 第三個問題

「你估計國民黨是兩種力量（共產黨和小資產階級）的聯盟（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全體學生大會上的演說），而共產國際關於國民黨的決議則估計國民黨是連大資產階級也在內的四個階級的聯盟。這兩種估計有沒有矛盾呢？」

在中國無產階級專政時，中國共產黨參加國民黨是否可能呢？」

第一、必須指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全會）對國民黨實際狀況所下的定義，在你們的「問題」中是轉述得不對和不完全確切的。在「問題」中說「連大資產階級也在內」。然而買辦也是大資產階級。這是不是說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產國際認爲買辦資產階級是國民黨內聯盟的

一員呢？顯然不是這個意思，因為買辦資產階級曾經是而且現在還是國民黨的死敵。共產國際決議中所說的不是一般大資產階級，而是「一部分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因此，這裏所說的並不是任何大資產階級，而是非買辦類型的民族資產階級。

第二、應當聲明，我看不出國民黨的這兩個定義有矛盾。我所以看不出，是由於我們在這裏是從兩個不同的觀點給國民黨下定義，這兩個觀點，不論哪一個，都不能說是不正確的，因為它們兩個都是正確的。

我在一九二五年說國民黨是工農聯盟的政黨的時候，我並不是想說明國民黨的實際狀況，也不是想說明一九二五年有哪些階級事實上加入了國民黨。我說到國民黨的時候，我只是把國民黨當做東方被壓迫國家特別是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裏的獨特的人民革命政黨的結構形式，當做應當依靠工人和城鄉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的人民革命政黨的結構形式來談的。我當時直截了當地說：「在這種國家裏，共產黨人應當從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過渡到工人和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的政策。」（見斯大林『論東方人民大學的政治任務』，『列寧主義問題』第二六四頁（五））

因此，我當時所指的不是一般人民革命政黨（包括國民黨在內）的現在，而是它們的將來。在這裏我是完全對的。因為國民黨之類的組織，只有力求依靠工人和小資產階級聯盟才能有前途，而且說到小資產階級時主要是指農民而言，因為農民是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中的小資產階級的基本力量。

共產國際所注意的却是問題的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在其第七次擴大全會上不是從國民黨的將



來；不是從它應當成爲什麼，而是從現在，從國民黨內部的實際狀況和正是哪些階級在一九二六年事實上加入了國民黨這種觀點去考察國民黨的。共產國際說得完全正確：在這個時候，在國民黨還沒有分裂的時候，國民黨事實上是工人、小資產階級（城市和鄉村的）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這裏還可以添上一句：不僅在一九二六年，而且在一九二五年，國民黨所依靠的也正是這些階級的聯盟。在我曾經積極參加起草的共產國際決議中直截了當地說：『無產階級同積極爲自己利益而鬥爭的農民，同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組成聯盟』；『各種力量的結合在政治方面表現在國民黨內和廣州政府內相應的聯合上』（見決議<sup>五七</sup>）。

但是共產國際並不限於論到一九二六年的實際狀況，而且論到國民黨的將來，所以它不能不說這種聯盟只是暫時的聯盟，不能不說在最近期間這種聯盟應代之以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聯盟。正因爲如此，共產國際決議接着又說：『目前運動正處在第三階段的門口，正處在階級力量重新結合的前夜』；『在這個發展階段上，運動的基本力量將是更富有革命性的聯盟——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把大部分資本主義大資產階級排除出去』（同上）。

這也就是國民黨所應當依靠的工人和小資產階級（農民）的聯盟，這個聯盟從國民黨分裂和民族資產階級退出以後已在武漢開始形成，一九二五年我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報告中所談到的

① 青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就是這個聯盟（見前）。

由此可見，我們是從兩個不同的方面來說明國民黨的：

（甲）從國民黨的現在方面，從一九二六年國民黨的實際狀況的方面；

（乙）從國民黨的將來方面，從國民黨作為東方國家的人民革命政黨的結構形式，應當成為什麼的方面。

這兩種說明都是合理的和正確的，因為它們從兩個不同的方面來把握國民黨，終於提供了一幅詳盡的圖畫。

試問這裏有什麼矛盾呢？

爲了更清楚起見，我們拿英國「工黨」來做例子。大家知道，英國存在着一個依靠工人和職員的工會組織的特別的工人政黨。稱這個黨爲工人政黨是誰也不懷疑的。不僅在英國的而且在其他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中，也都是這樣稱它的。

但是能不能說這個政黨是真正的工人政黨，是把自己和資產階級對立起來的工人的階級政黨呢？能不能說它事實上是一個階級即工人階級的政黨，而不是兩個階級的政黨呢？不，不能說。事實上英國工黨是工人和都市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黨。事實上這個政黨是兩個階級聯盟的政黨，如果說到在這個黨內誰的影響大，是把自己和資產階級對立起來的工人的影響大，還是小資產階級的影響大，那末應該說小資產階級的影響在這個黨內是佔優勢的。

其實，這一點也就說明英國工黨事實上是自由資產階級政黨的附屬品。然而在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却把它叫做工人政黨。怎樣來解釋這個「矛盾」呢？可以這樣來解釋：在確定這個政黨為工人政黨的時候，通常指的不是這個政黨現在的實際狀況，而是工人政黨的結構形式，由於這種形式，在某種條件下，這個政黨將來一定會變成和資產階級世界相對立的工人的真正的階級政黨。這並不排斥事實上這個黨暫時是工人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黨這一事實，相反地，而是以這一事實為前提的。這裏也沒有矛盾，正像我剛才談到國民黨時所說的一切沒有矛盾一樣。

在中國無產階級專政時，中國共產黨參加國民黨是否可能呢？

我以為這是不適當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的。不僅在無產階級專政時，而且在工農代表蘇維埃成立時，加入國民黨都是不適當的。在中國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就是建立兩重政權。這就是國民黨和蘇維埃奪取政權的鬥爭。成立工農蘇維埃，就是準備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在共同參加一個革命民主政黨的兩個政黨的領導下，不能進行這種準備呢？不，不能。革命的歷史說明，準備無產階級專政和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一個政黨即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辦到。當然，如果所說的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革命的歷史說明，只有在一個政黨即共產黨的領導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爭取到手，才能發展起來。沒有這一點，在帝國主義條件下是沒有而且不能有真正的和完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

因此，不僅在無產階級專政時，而且在無產階級專政以前，在工農代表蘇維埃成立時，共產黨就

必須退出國民黨，以便在自己單獨領導之下準備中國的十月革命。

我以為在中國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和準備中國十月革命的時期，中國共產黨必須以國民黨黨外的聯盟代替目前國民黨黨內的聯盟，就像在過渡到十月革命的時期我們和社會革命黨左派的那種聯盟一樣。

#### 第四個問題

「武漢政府是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如果不是，那末今後爭取民主專政的鬥爭的道路將是怎樣的呢？」

馬爾丁諾夫斷言不經過「第二次」革命也可能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否正確，如果正確，那末中國的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界限究竟在哪裏呢？」

武漢政府還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它可能成為這樣的專政。如果以全力展開土地革命，武漢政府就一定會成為民主專政，可是它現在還不是這種專政的機關。

爲了使武漢政府變成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機關，需要些什麼呢？這至少要有兩個條件：

第一、必須使武漢政府成爲中國農民土地革命的政府，成爲竭力支持這個革命的政府。

第二、必須使國民黨以工農出身的土地運動的新領袖補充其上層領導集團，並且擴大其下層組

織，把農民協會、工會委員會和城鄉其他革命組織都包括進去。

國民黨現在約有五十萬黨員。這太少了，對於中國實在太少了。必須使國民黨把數百萬的革命農民和工人包括進去，從而變成千百萬人的革命民主組織。

只有在這種條件下國民黨才有可能產生出一個革命政府，這個政府將變成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機關。

馬爾丁諾夫同志是否確實說過和平地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點我不知道。我沒有看過馬爾丁諾夫同志的文章，我所以沒有看過，是因為我沒有可能瀏覽我們日常的一切著述。但如果他確實說過在中國可能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平地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那末這就是一個錯誤。

邱貢諾夫有一次問我：『怎麼樣，斯大林同志，是不是可以這樣做，不兜什麼圈子，通過國民黨用和平方法一下子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呢？』我反問他：『邱貢諾夫同志，你們中國的情形怎樣，——你們那裏有沒有國民黨右派、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者呢？』他回答說有。我就對他說：『那就非打架不可了。』

這還是在蔣介石政變以前。當然，在原則上可以提出中國革命和平發展的可能性的問題。例如列寧有一個時期就曾認為俄國革命可能經過蘇維埃而和平發展。這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到七月的時期。但是在七月失敗以後，列寧就承認和平地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應該認為是不可能的。我以為在中國更應當認為和平地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呢？

第一、因爲中國革命的敵人，無論是國內的（張作霖、蔣介石、大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等等）或國外的（帝國主義者），都太多太强了，不能設想在革命進一步發展時可以避免嚴重的階級搏鬥和嚴重的分裂與投敵行爲。

第二、因爲沒有根據認爲國民黨的國家組織形式是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適當形式。

最後因爲：既然在俄國通過無產階級革命的典範形式的蘇維埃而和平地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都沒有成功，那末有什麼根據可以推想這樣的過渡通過國民黨就可以成功呢？

因此，我以爲和平地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在中國應該認爲是不可能的。

## 第五個問題

「爲什麼武漢政府不進攻蔣介石，而進攻張作霖呢？」

武漢政府和蔣介石同時向北方進攻，這不是抹殺了反對中國資產階級的戰綫嗎？」

同志們，你們向武漢政府要求得太多了。既打張作霖，又打蔣介石，又打李濟深，又打楊森，那當然是很好的。但目前武漢政府的形勢不允許它在所有這四條戰綫上同時舉行進攻。武漢政府對奉軍

進攻，至少有兩個原因：

第一、因為奉軍向武漢進發，要肅清武漢，所以進攻奉軍是刻不容緩的防禦措施。

第二、因為武漢派想和馮玉祥軍隊會師並向前推進以擴大革命根據地，這在目前對於武漢來說又是極其重要的軍事政治事件。

在反對蔣介石和張作霖這兩條重要戰綫上同時進攻，目前對於武漢政府是不能勝任的事情。關於西攻楊森和南伐李濟深，就更不用說了。

在內戰時期，我們布爾什維克是較為強大的，可是我們也沒有能够在所有戰綫上展開順利的進攻。在目前有什麼根據要求武漢政府做更多的事情呢？

其次，現在，當奉軍和吳佩孚系軍隊從北方向武漢推進的時候，進攻上海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便利奉軍南下，無限期地推遲和馮軍的會師，而在東部又一無所得。倒不如暫時讓蔣介石在上海地區掙扎，跟帝國主義者在那裏糾纏吧。

奪取上海還要經過戰鬥，這場戰鬥不會像現在奪取鄭州等地的戰鬥一樣。不，在上海要進行更激烈的戰鬥。上海是世界各個帝國主義集團重要利益的交叉點，帝國主義是不會輕易讓出的。

首先和馮軍會師，在軍事方面充分地鞏固起來，以全力展開土地革命，加緊瓦解蔣介石的後方和前綫，然後將上海問題全部提出，這是不是比較適當呢？我想這樣做是比較適當的。

因此，這裏問題並不在於『抹殺』對中國資產階級鬥爭的戰綫，因為只要土地革命發展起來，它

反正是抹殺不了的，而土地革命正在發展，將來還要發展，——這一點現在幾乎是無可懷疑的。我再說一遍，問題不在於「抹殺」，而在於制定適當的鬥爭策略。

某些同志以爲現時在所有的戰綫上進攻是革命性的基本標誌。不，同志們，這是不對的。目前在所有的戰綫上進攻，乃是愚蠢，而不是革命性。不能把愚蠢和革命性混爲一談。

## 第六個問題

「基馬爾式的革命在中國是否可能呢？」

我認爲基馬爾式的革命在中國是不可思議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的。

基馬爾式的革命，只有在像土耳其、波斯、阿富汗這些沒有或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也沒有強大的農民土地革命的國家內，才有可能。基馬爾式的革命是民族商業資產階級的上層革命，它是在反外國帝國主義者的鬥爭中產生的，在其繼續發展中實質上是反對農民和工人、阻礙土地革命發生的。

在中國不可能有基馬爾式的革命，因爲：

- (甲) 在中國有一定數量的戰鬥的和積極的工業無產階級，它在農民中間享有很高的威信；
  - (乙) 在中國有展開了的土地革命，它正在掃除自己道路上的封建殘餘。
- 千百萬的農民在許多省份裏已經奪取了土地，並在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領導下進行鬥爭，——



這就是防止所謂基馬爾式革命的可能性的解毒劑。

不能把基馬爾黨和武漢左派國民黨相提並論，正像不能把土耳其和中國相提並論一樣。土耳其並沒有像上海、武漢、南京、天津那樣的中心。安哥拉遠不如武漢，正像基馬爾黨遠不如左派國民黨一樣。

從國際地位來看，也應該注意到中國和土耳其之間的差別。在土耳其方面，帝國主義已經達到了自己一系列的基本要求，奪取了土耳其的敘利亞、巴勒斯坦、美索不達米亞和其他對帝國主義者說來是重要的據點。土耳其現在已經降為一個只有一千萬到一千二百萬人口的地域不大的國家。它對於帝國主義既不是重要的市場，也不是有決定意義的投資場所。這種情形所以會發生，就中是由於舊土耳其是各種民族的混合體，只在安那托里亞才有稠密的土耳其族居民。

中國就不是這樣。中國是有幾億人口的民族密集的国家，是全世界極重要的銷售市場和資本輸出市場。在那裏，在土耳其，帝國主義利用舊土耳其內部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民族對抗，能以割取東部一些極重要的地區而滿足；而在這裏，在中國，帝國主義必須在民族中國的活的軀體上開刀，把它割成碎片，奪取它整個的省份，以保持自己的舊有陣地，或者至少維持住這些陣地的一部分。因此，在那裏，在土耳其，反帝國主義的鬥爭能以基馬爾派的天折了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而告終；而在這裏，在中國，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一定會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鮮明的民族性，一定會步步深入，直到同帝國主義作殊死的決鬥，震撼帝國主義在全世界的基礎。

反對派（季諾維也夫、拉狄克、托洛茨基）的最大的錯誤就在於他們沒有看到土耳其和中國之間的這一切差別，把基馬爾式的革命和土地革命混爲一談，不加區別地把一切東西攪成一團。

我知道在中國民族主義者中間有些人抱着基馬爾主義的思想。現在妄想扮演基馬爾角色的人在中國是不少的。其中第一個就是蔣介石。我知道某些日本新聞記者有意把蔣介石算做中國的基馬爾。但這一切都是張皇失措的資產者的夢想和幻覺。在中國，要就是張作霖和張宗昌之流的中國的墨索里尼們勝利，然後又被土地革命的浪潮推翻，要就是武漢勝利。

力圖使自己保持在這兩個營壘之間的蔣介石及其幫手們一定要垮台，遭到和張作霖、張宗昌同樣的命運。

## 第七個問題

「在中國現在是不是需要提出農民立即奪取土地的口號，對於湖南農民奪取土地的事實應當怎樣估計呢？」

我認爲是需要的。事實上沒收土地的口號在若干地區內已在實行。在好些地區，如湖南、湖北等地，農民已經從下面奪取土地，成立自己的法庭，懲治自己的敵人，組織自己的自衛力量。我想，中國全體農民在最近期間都要去實現沒收土地的口號。中國革命的力量就在這裏。

如果武漢政府想要勝利，如果它想要建立真正的力量去反對張作霖、反對蔣介石、反對帝國主義者，它就應當大力支持奪取地主土地的農民土地革命。

如果以為在中國只用軍事力量就可以打倒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那是愚蠢的。沒有土地革命，沒有千百萬工農羣衆對武漢軍隊的積極支援，要打倒這些勢力是不可能的。

反對派常常把蔣介石的政變估計爲中國革命的低落，那是錯誤的。把蔣介石的政變估計爲中國革命的低落的人，事實上是擁護蔣介石，事實上是擁護蔣介石回到武漢的國民黨裏去。看來他們以爲：假如蔣介石沒有分裂出去，革命事業也許要好些。這是愚蠢而又不革命的想法。蔣介石的政變事實上是使國民黨洗去了污點，把國民黨的核心向左推移。當然，蔣介石的政變不能不使一些地區的工人遭到局部的失敗。然而這只是局部的和暫時的失敗。事實上整個革命已隨蔣介石的政變而進入其發展的更高階段即土地運動階段。

中國革命的力量和威力就在這裏。

不能把革命運動看做一直上升的運動。這是對於革命的一種書本上的非現實的想法。革命總是曲折地進行的，它在一些地區裏實行進攻並破壞舊秩序，在另一些地區裏却遭到局部失敗並實行退却。蔣介石的政變就是中國革命進程中的曲折之一，這一曲折是必要的，因爲藉此可以把一切飢餓東西從革命中清洗出去，並沿着強大的土地運動的道路把革命向前推進。

但是，要使這個土地運動能夠形成，就必須使它有一個概括性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沒收地主

土地。

## 第八個問題

「爲什麼組織蘇維埃的口號在目前是不正確的呢？」

中國共產黨是不是由於河南已經組織了工人蘇維埃而有做革命運動尾巴的危險呢？」

你們說的是什麼樣的蘇維埃呢，是無產階級蘇維埃，還是非無產階級蘇維埃，「農民」蘇維埃，「勞動者」蘇維埃，「人民」蘇維埃？列寧在其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提綱中曾經談到在東方落後國家裏成立「農民蘇維埃」、「勞動者蘇維埃」。列寧指的是中亞細亞那些「沒有或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國家。他指的是像波斯、阿富汗等等國家。其實這也就說明列寧的提綱中沒有一句話說到要在那樣的國家裏組織工人蘇維埃。

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列寧的提綱指的不是中國，因爲對於中國不能說「沒有或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他指的是東方其他較落後的國家。

因此，這裏說的是在中國立即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因此，在解決這個問題時，應該注意的不是列寧的提綱，而是同一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羅易的提綱，這個提綱說到要在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裏成立工農蘇維埃。但這個提綱中說的是：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

時，在這些國家裏應該成立工農蘇維埃。

什麼是工農代表蘇維埃呢？工農代表蘇維埃主要是反對現存政權的起義機關，是爲新的革命政權而鬥爭的機關，是新的革命政權機關。同時工農代表蘇維埃又是組織革命的中心。

但是只有在工農代表蘇維埃是推翻現存政權的機關時，是新的革命政權機關時，它才能成爲組織革命的中心。如果它不是新的革命政權機關，它也就不能成爲組織革命運動的中心。反對派在反對列寧主義對工農代表蘇維埃的看法時不願了解這一點。

現在，例如在武漢政府活動地區內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建立兩重政權，成立反對武漢政府的起義機關。中國共產黨人現在是否應當推翻武漢政府呢？顯然是不應當的。相反地，他們應當支持武漢政府，把它變爲反對張作霖、反對蔣介石、反對地主豪紳、反對帝國主義的機關。

既然共產黨現在不應當推翻武漢政府，那末現在爲什麼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呢？

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是立即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去推翻武漢政府，這在目前是不正確的和不可容許的；

或者是共產黨人立即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但不實行推翻武漢政府的路綫，不把蘇維埃變成新的革命政權機關，——那時蘇維埃就會死亡，變成對蘇維埃的諷刺。

列寧在說到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時，總是警告不要這樣做的。

你們的『問題』中說到河南已經出現了工人蘇維埃，說到共產黨如果不把成立蘇維埃的口號帶到羣衆中去，便有做運動的尾巴的危險。同志們，這是無稽之談。現在河南並沒有任何的工人代表蘇維埃。這是英國報紙散佈的謠言。那裏有『紅槍會』，那裏有農民協會，而工人代表蘇維埃目前根本沒有。

當然，成立工人蘇維埃是可以的。這件事情並不十分困難。但問題不在於成立工人蘇維埃，而在於把它們變成新的革命政權機關。不這樣做，蘇維埃就是空架子，就是對蘇維埃的諷刺。過早地成立工人蘇維埃，以致後來又把它們斷送，變成空架子，這正是把中國共產黨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袖變成以蘇維埃玩各種各樣『極左的』把戲這種行爲的附屬品。

一九〇五年的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第一任主席赫魯斯塔廖夫，在一九〇六年夏天也曾要求恢復亦即成立工人代表蘇維埃；認爲不管環境如何蘇維埃本身都能把階級力量的對比倒轉過來。列寧當時反對赫魯斯塔廖夫說，在一九〇六年夏天不應該成立工人代表蘇維埃，因爲後衛隊（農民）還沒有靠近先鋒隊（無產階級），在這種條件下成立蘇維埃，提出起義的口號是冒險的，是不適當的。

由此可見，第一、不可誇大蘇維埃本身的作用；第二、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時不能不估計到周圍的情況。

一般說來，在中國需要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嗎？

是的，需要成立。在武漢革命政府鞏固以後，在土地革命展開以後，在從土地革命、從資產階級

民主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是必須成立蘇維埃的。

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就是在中國奠定蘇維埃政權的基礎。而奠定蘇維埃政權的基礎，也就是奠定兩重政權的基礎和採取以蘇維埃政權代替現在武漢國民黨政權的方針。

我以為這樣做還不到時候。

你們的『問題』中說到中國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權。

爲了使中國無產階級在現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易於起領袖的作用，起領導者的作用，需要些什麼呢？

這首先需要中國共產黨成爲工人階級的團結一致的組織，有自己的黨綱，有自己的政綱，有自己的組織，有自己的路綫。

第二、需要中國共產黨人站在農民土地運動的前列，教導農民尤其是貧農去組織革命的協會和委員會，去沒收地主土地。

第三、需要中國共產黨人在軍隊中鞏固起來，使軍隊革命化，改造軍隊，把軍隊從個別冒險分子的工具變成革命的工具。

最後，需要中國共產黨人參加武漢政府的地方機關和中央機關，參加武漢國民黨的地方機關和中央機關，在這些機關中實行進一步展開既反對地主又反對帝國主義的堅決的革命的政綱。

反對派想以中國共產黨脫離革命民主力量和退出國民黨及武漢政府的辦法來保持中國共產黨的

獨立性。但這是我國孟什維克在一九〇五年所說過的那種十分可疑的『獨立性』。大家知道，孟什維克當時反對列寧說：『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工人政黨的領導權，而是工人政黨的獨立性。』列寧當時答覆得很對：這就是否認獨立性，因為把獨立性和領導權對立起來就是把無產階級變成自由資產階級的附屬品。

我以為反對派現在談到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同時要求或暗示中國共產黨退出國民黨和武漢政府，正是滾到一九〇五年時期孟什維克的『獨立性』的道路上去。共產黨只有既在國民黨黨內又在國民黨黨外即在廣大勞動羣衆中成爲領導力量時，才能保持真正的獨立性和真正的領導權。

不是退出國民黨，而是保證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和國民黨黨外的領導作用，——如果中國共產黨想做一個真正獨立的政黨，這就是它現在要做的事情。

## 第九個問題

『目前能不能在中國提出成立正規紅軍的問題呢？』

我以為從前途來看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但是，如果問題實際存在，那末現在，在目前，用新的軍隊，用紅軍來代替現在的軍隊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暫時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它。

現在主要的是一方面要改善現有軍隊，用一切可行的辦法使軍隊革命化，一方面要立刻奠定由



受過土地革命鍛鍊的革命農民和革命工人所組成的新的革命的團和師的基礎，成立一些新的、真正可靠的、擁有可靠的指揮人員的軍團，使它們成爲武漢革命政府的柱石。

這些軍團也就是以後要發展成爲紅軍的新的軍隊的核心。

這對於在前綫尤其是在後方反對所有突然鑽出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都是必要的。

沒有這一點，就沒有防止後方和前綫的潰敗、防止投敵和叛變的保障。

我以爲這條道路是目前唯一可能而又適當的道路。

## 第十個問題

『現在，在和資產階級鬥爭的時候，能不能提出奪取中國企業的口號呢？』

在什麼條件下才能奪取在中國的外國工廠，這會不會引起同時奪取中國企業呢？』

我以爲，一般說來，奪取中國企業的時機還沒有成熟。但是，中國企業主的頑強怠工，大批怠工企業的關閉和人爲的失業現象，可以迫使武漢政府現在就開始把某些怠工企業收歸國有，並用武漢政府的力量使這些企業開動起來，——這種事情不是不會發生的。

可能武漢政府現在就要被迫在個別場合下實行這種預防辦法去對付特別壞的和反革命的中國企業主。

至於外國企業，要把它們收歸國有則是將來的問題。把這些企業收歸國有，就是對帝國主義者直接宣戰。但是要直接宣戰，就需要有稍微不同於現在的較為有利的環境。

我以為在革命的現階段，當革命還沒有鞏固的時候，這種辦法是過早的，因而也是不適當的。

現在的任務不在於此，而在於以全力燃起土地革命的火燄，保證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的領導權，鞏固武漢，把武漢變成和中國革命的各種各樣敵人作鬥爭的中心。

不能一下子把一切任務都堆在自己身上，而冒壓傷自己的危險。況且國民黨及其政府是不適於解決剝奪中外資產階級這種極重要的任務的。

要解決這些任務，就需要有另一種環境，另一個革命階段，另一種革命政權機關。

按斯大林「中國革命和反對派的錯誤」

一九二七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刊印



# 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無產階級和 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

(答坡克羅夫斯基)

我認爲你今年五月二日的來信沒有理由和根據要我作詳細的回答，所謂逐條的回答。其實，你這封信和楊—斯基的信比較起來，沒有什麼特別新的東西。

但我還是回答你這封信，因爲它包含着一些直接恢復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間加米涅夫立場的成分。只是爲了揭露這些恢復加米涅夫立場的成分，我才認爲需要對你的來信作一個簡短的答覆。

(一) 你在來信裏說：「事實上我們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這一時期所實行的是和全體農民聯盟的口號」，「黨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這一時期所維護的，是它對農民的舊口號，即和全體農民聯盟的口號」。

第一、照你這樣說來，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並沒有力求把貧苦農民和富裕農民分開，而是把農民看做一個整體。

第二、照你這樣說來，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並沒有以『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新口號代替『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舊口號，而是停留在一九〇五年列寧的小冊子『兩個策略』所規定的舊的立場上。

第三、照你這樣說來，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十月）與蘇維埃的動搖和妥協、與中農在蘇維埃內部和前綫上的動搖、與他們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動搖、與他們在七月事變時（即以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中的妥協分子為首的蘇維埃協同反革命將軍一起來孤立布爾什維克的時候）表現得特別厲害的動搖和妥協作鬥爭的政策，即布爾什維克反對某些農民階層的動搖和妥協的鬥爭，原來是無的放矢，絕對不需要的。

最後，照你這樣說來，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間堅持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舊口號原來是對的，而列寧認為這個口號已經陳舊並宣佈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新口號原來是不對的。

只要提出這些問題就會明白你這封信從頭到尾都是荒謬絕倫的。

可是，因為你是一位很喜歡從列寧著作裏引證個別詞句的人，我們就來看看引文吧。

不必費多大氣力就可以證明，列寧認為從革命的進一步發展來看，二月革命以後俄國土地關係中的新現象，不是無產階級和全體農民的利益一致，而是貧苦農民和富裕農民的分裂；貧苦農民趨向於無產階級，而富裕農民則跟着臨時政府走。

請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和加米涅夫及加米涅夫派爭論時是怎樣說明這一點的：

『現在◎把希望寄託在和農民利益的一致上，這對無產階級政黨是不可容許的。』（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二〇五頁）

其次：

『我們現時從一些農民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已看出一種等待召集立憲會議去解決土地問題的思想，——這是傾向立憲民主黨人的富裕農民◎的勝利。』（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全市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一七頁）

再其次：

『可能農民將取得全部土地和全部政權。我不僅不忘記這個可能性，不把自己的眼界局限於今天，而且在直接而明確地規定土地綱領時我還估計到新現象，即僱農和貧苦農民跟富裕農民間所發生的更深的分裂◎。』（見列寧一九一七年四月寫的「論策略書」，『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七頁）

這就是列寧在二月革命後的農村新環境裏看出的新穎的和重要的東西。

這就是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的時期內規定黨的政策時所持的出發點。

列寧根據這個原理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全市代表會議上說道：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

『我們只是在這裏，在本地，才知道工兵代表蘇維埃已把政權交給臨時政府了。工兵代表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和士兵專政的實現，而士兵大多數是農民。這也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可是，這個「專政」已和資產階級妥協了。所以需要重新審查「舊」布爾什維主義。』<sup>①</sup>（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一六頁）

列寧根據同一原理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寫道：

『現在誰還只說「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誰就是落後於實際生活，因而誰就是實際上跑到了小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誰就應該被送到革命前的「布爾什維克」檔案庫（可以叫做『舊布爾什維克』檔案庫）裏去。』（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六頁）

在這個基礎上也就產生了代替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舊口號的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

你可以說（而你在信裏正是這樣說的）這是像托洛茨基那樣跳過尚未完成的農民革命，但這種說法令人信服的程度，正像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對列寧的反駁一樣。

列寧完全估計到這種反駁，所以當時他說：

『托洛茨基主義是「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這是不對的。小資產階級是存在的，決不可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把它一筆勾銷。但它有兩部分。它的貧苦的○部分是跟工人階級一道走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三頁）

加米涅夫的錯誤和你現在的錯誤就是不善於看出並着重指出小資產階級（這裏是指農民）兩個部分的區別，不善於從全體農民羣衆中劃出農民的貧苦的部分，並根據這一點來規定黨在一九一七年由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第二階段時的政策，不善於從這一點引伸出新口號，黨的第二个戰略口號，即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

我們且根據列寧的著作來循序考察「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這一口號從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間的實際歷史吧。

一九一七年四月：

「俄國時局的特點在於從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第二階段，第一階段由於無產階級的覺悟性和組織性不夠而使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第二階段則應當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階層手中。」○（見列寧『四月提綱』，『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四頁）

一九一七年七月：

「只有革命工人——如果貧苦農民○支持他們的話——才能打破資本家的反抗，引導人民

○ ○ ○ ○ 着這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



無償地奪取土地，獲得完全自由，戰勝飢荒，消除戰爭，爭得正義的持久的和平。」（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二一八頁）

一九一七年八月：

『只有領導着貧苦農民（即我們黨綱所說的半無產者）的無產階級才能以民主的和平結束戰爭，醫好戰爭創傷，開始實行那些已成爲絕對必要而刻不容緩的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現時的定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二五八頁）

一九一七年九月：

『只有無產者和貧苦農民專政才能打破資本家的反抗，顯示政權的真正偉大的勇敢果決精神，使自己無論在軍隊或農民中間都能得到羣衆熱烈的、奮不顧身的和真正英勇的支持。』（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四六頁至第三四七頁）

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月，列寧在『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一書中和『新生活報』（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四六頁至第三四七頁）

行論戰時寫道：

『或者全部政權歸資產階級，這是你們早已不擁護的，甚至資產階級自己也不敢提及的，因爲它知道，在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人民只聳一聳肩就把這樣一個政權拋開了，而現在則會』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加倍堅決地、無情地拋開這樣一個政權。或者①政權歸小資產階級即這個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同盟（聯盟，協定），因為小資產階級不願意而且不能獨立自主地奪取政權，這是一切革命的經驗證明了的，也是經濟科學證明了的。經濟科學表明：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可以擁護資本，可以擁護勞動，但在中間是站不住的。這個同盟半年來在俄國已試用過不下幾十種的方法，但終歸失敗了。最後，或者②全部政權歸無產者和貧苦農民③，反對資產階級，打破資產階級的反抗。這還沒有嘗試過，而這是你們「新生活報」的各位先生勸人民不要去幹的，你們用自己畏懼資產階級的心理去嚇唬人民。第四種辦法是連臆造也臆造不出來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九十九頁至第一〇〇頁）

事實就是如此。

十月革命準備史中的這一切事實和事件，你都『安然地』迴避過去了；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為反對當時坐在蘇維埃裏的『富裕農民』的動搖和妥協而進行的鬥爭，你都『安然地』從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一筆勾銷了；列寧的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你都『安然地』埋葬了，你還以為這不是褻瀆歷史和列寧主義。

你應從這些舉不勝舉的引文中看到：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後所持的出發點，不是聯合

①②③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全體農民，而是聯合農民中的貧苦的部分；布爾什維克在走向十月革命時所實行的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舊口號，而是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新口號。

由此可見，布爾什維克在實行這個口號時必須反對蘇維埃的動搖和妥協，反對坐在蘇維埃裏的某一部分農民的動搖和妥協，反對那些叫做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政黨的動搖和妥協。

由此可見，沒有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新口號，我們當時就不能聚集一支相當強大的政治軍隊，以克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妥協，中立某一部分動搖的農民，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從而使資產階級革命能夠進行到底。

由此可見，「我們是和貧苦農民一道，在富農（也是農民）的反抗和中農的動搖下，走向十月革命並在十月革命中獲得勝利的」（見我給楊—斯基的回信）。

這樣看來，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和十月革命整個準備時期內對的是列寧，而不是加米涅夫。你現在却來恢復加米涅夫立場，看來未免結交了一個不大好的伙伴吧。

（二）和上述一切相對立，你引證列寧的話，說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是在全體農民支持下取得政權的。說我們是在全體農民的某種支持下取得政權，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你竟忘記補說一件「小

◎ 見本卷第一九四頁。——編者註。

事情」；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後，全體農民只是在我們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限度內才支持過我們。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小事情」，它在這裏是能解決問題的。「忘記」這樣重要的「小事情」，從而抹殺最重要的問題，這對一個布爾什維克來說是不可容許的。

從你的來信中可以看出，你把列寧關於全體農民的支持的言論和同樣是列寧規定的「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黨的口號對立起來。可是爲了把列寧這種言論和前面摘自列寧著作的引文對立起來，爲了有根據地用你引來的列寧關於全體農民的言論來駁倒前面所引的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的幾段話，——爲了這樣做，至少必須證明兩件事情。

第一、必須證明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是十月革命的主要之點。列寧認爲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是十月革命的「副」產物，十月革命「順便地」解決了這個任務。首先必須駁倒列寧這個原理，並證明十月革命的主要之點不是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不是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手裏，而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你試證明這一點吧，你如果能證明，我就決意承認：我們黨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間的口號不是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專政，而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

從你的來信中可以看出，你沒有認爲自己能承擔這種過分冒險的任務，但你企圖「順便地」證明在十月革命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上，即和平問題上，似乎全體農民都支持過我們。這當然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在和平問題上，你的觀點已經是庸人的觀點了。其實，當時在我們這裏和平問題就是政權問題，因爲只有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手裏才能指望擺脫帝國主義戰爭。

你大概忘記了列寧的話：「只有使政權轉到另一個階級手裏，才能結束戰爭」，「打倒戰爭」，並不是拋棄刺刀，而是使政權轉到另一個階級手裏」（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全市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三頁和第一一九頁）。

總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你應當證明十月革命的主要之點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或者你不能證明這一點，——那時自然要得出結論說，在十月革命中，全體農民只是在我們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消滅君主制、消滅地主所有制和地主秩序的限度內，才支持過我們。

第二、你應當證明：布爾什維克不必在十月革命整個準備時期一貫實行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不必根據這個口號來一貫反對小資產階級政黨的妥協，不必根據這個口號來一貫揭露某些農民階層及其在蘇維埃中的代表們的動搖，便能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後由於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而得到全體農民的支持。

你試證明這點吧。實際上，爲什麼我們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後都能保證自己得到全體農民的支持呢？這是因爲我們已有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可能。

爲什麼我們得到了這種可能呢？這是因爲我們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而代之以無產階級政權，只有無產階級政權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

爲什麼我們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呢？這是因爲我們在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下進行了十月革命的準備工作，因爲我們根據這個口號不斷地和小資產階級政黨的妥協

作了鬥爭，因為我們根據這個口號不斷地和坐在蘇維埃裏的中農的動搖作了鬥爭，因為我們只有在這樣的口號下才能克服中農的動搖，打破小資產階級政黨的妥協，並聚集一支能夠為無產階級獲得政權而鬥爭的政治大軍。

沒有這些決定十月革命命運的先決條件，我們無論在十月革命時或十月革命後，都不能得到全體農民的支持來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這幾乎是用不着證明的。

農民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匯合的問題是要這樣來了解的。

因此，將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後全體農民支持我們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事實跟我們在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下準備十月革命的事實對立起來，就是一點也不懂得列寧主義。

你的基本錯誤就在於你既不懂得社會主義的任務和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任務在十月革命進程中錯綜結合的事實，又不懂得從黨的第二個戰略口號即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中產生出來的十月革命的個別要求如何得以實現的訣竅。

讀到你的來信時會以為不是我們使農民為無產階級革命服務，反而是「全體農民」（包括富農在內）使布爾什維克為他們服務。假使布爾什維克這樣容易地「去」為非無產階級服務，布爾什維克的事情可就糟了。

拖你後腿的正是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加米涅夫立場。

（三）你硬說斯大林看不出一九〇五年的環境和一九一七年二月前的環境的差別。這當然是不

嚴肅的。我沒有這樣說，而且不能這樣說。我在信裏只是說，黨在一九〇五年提出的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口號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已得到了證實。這當然是對的。一九一七年八月列寧在『農民和工人』一文中正是這樣描寫那種情況的：

『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才能推翻君主制度，——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當時（指一九〇五年而言。——斯大林註）的基本定義。這個定義是對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再次證實了這一點。』<sup>①</sup>（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二五八頁）

你不過是想吹毛求疵罷了。

（四）其次，你企圖證明斯大林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企圖把他在『列寧主義問題』一書中說到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後有可能和中農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那段話，和他的關於十月革命前中農的妥協的論點對立起來。

不必費多大氣力就能證明你把這兩種不同現象等量齊觀是絕對不科學的。十月革命前的即資產階級執政時的中農，和無產階級專政已鞏固後的即資產階級已被推翻和剝奪、合作制已經發展、主要生產資料已集中到無產階級手裏時的中農，是兩種不同的東西。把這兩種中農等量齊觀，把它們混為一談，就是不聯系歷史環境來觀察現象而喪失一切前途。這頗與季諾維也夫混淆日子和時期、胡亂引

①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證他人言論的手法相似。

如果這叫做『革命辯證法』，那就必須承認坡克羅夫斯基打破一切『辯證的』吹毛求疵的紀錄了。

(五) 其餘的問題我不談了，因為我認為在我和楊—斯基的通信中已把這些問題解決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

第一次載於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

一九二八年第四版





# 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

第八次全會<sup>(三)</sup>第十次會議上的演說)

## 一 幾個小問題

同志們！我應當道歉，今天執行委員會的會議我遲到了，未能完全聽到托洛茨基在這裏，在執行委員會上的演說。

可是我想，最近幾天托洛茨基關於中國問題給執行委員會寫了這麼多的論著、提綱和書信，我們要批判反對派，材料不會是不夠的。

因此，我將根據這些文件來批判托洛茨基的錯誤，我不懷疑，這個批判同時將是對托洛茨基今天演說的基礎的批判。

我將盡可能在論戰中排除個人的成分。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對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個別委員的個人攻擊是不值一談的。

看來托洛茨基想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上把自己扮成一個英雄，使執行委員會把討論戰爭

危險、中國革命等等問題變成討論托洛茨基的問題。我想，托洛茨基是不值得予以這樣大的注意的。（有人喊道：「對！」）況且，與其說他像個英雄，不如說像個演員，把演員和英雄混爲一談無論如何是不行的。

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這樣一些被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揭穿了他們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人，痛罵布爾什維克，這對布哈林或斯大林並不是什麼侮辱，這一點我就不講了。相反地，要是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型的半孟什維克讚揚我而不罵我，那對我倒是莫大的侮辱。

反對派現在的這種派別言論是否違背了他們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所承擔的義務，這一點我也不多講了。托洛茨基認定，根據反對派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聲明，他有權堅持自己的觀點。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如果托洛茨基要硬說聲明的內容只限於這一點，這就只能叫做詭辯，不能叫做別的。

在反對派十月十六日的聲明中不僅說到反對派有權堅持自己的觀點，而且說到這些觀點只有在黨所許可的範圍內才能堅持，派別活動應當拋棄和肅清，反對派必須「無條件地服從」黨的意志和中央的決定，反對派不僅應當服從這些決定，而且應當誠心誠意地「實行」這些決定。

既然如此，是否還需要證明反對派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聲明已經被他們自己極粗暴地破壞和撕得粉碎了呢？

在反對派的許多提綱、論文和演說中，下流地和極端誣蔑地歪曲了聯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立場，這一點我也不多說了。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不斷地硬說聯共（布）中央和共產

國際似乎過去堅持而且現在還在堅持「支持」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

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這個論斷是捏造，誹謗，故意歪曲事實，這幾乎是用不着證明的。實際上，當中國革命還是全民族聯合戰綫的革命的時·候，聯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所堅持的不是支持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而是利用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後來當中國革命已成爲土地革命而民族資產階級開始離開革命的時·候，聯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就用和民族資產階級進行武裝鬥爭的政策代替了那一個政策。

只要看看這些文件，如第七次擴大全會的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著名宣言<sup>①</sup>、斯大林的給宣傳員的提綱<sup>②</sup>，以及布哈林日前交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提綱，就會確信這一點。

反對派的倒霉正在於他們不造謠不歪曲就活不下去。

現在我們來談本題。

## 二 農民土地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

托洛茨基的基本錯誤在於他不懂得中國革命的意義和性質。共產國際的出發點是：封建殘餘是

① 見本卷第一九九頁至第二〇七頁。——編者註。

現時在中國推動土地革命的壓迫的主要因素。共產國際的出發點是：中國農村中的封建殘餘和這種殘餘上面的全部軍閥官僚上層建築及其督軍、省長、將軍、張作霖之流等等，是現在的土地革命藉以發生和日益展開的基礎。

既然很多省份裏農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歸地主豪紳所有，既然武裝的和非武裝的地主不僅握有經濟權力，而且握有行政和司法權力，既然直到現在一些省份裏還有中世紀的買賣婦女和兒童的事情，那就不能不承認封建殘餘是中國各省的壓迫的主要形式。

正因為封建殘餘及其全部軍閥官僚上層建築是中國國內的壓迫的主要形式，正因為如此，現在中國正經歷着一個按其力量和規模來說是最偉大的土地革命。

而土地革命是什麼呢？土地革命正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和內容。

正因為如此，所以共產國際說，中國目前正經歷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但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僅反對封建殘餘，同時也反對帝國主義。

為什麼呢？

因為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全部財政的和軍事的力量，乃是支持、鼓舞、培植和保存封建殘餘及其全部軍閥官僚上層建築的力量。

因為不同時進行革命鬥爭以反對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就不能肅清中國的封建殘餘。

因為誰要肅清中國的封建殘餘，誰就一定要和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集團作鬥爭。

因爲不和帝國主義作堅決的鬥爭，就不能打倒並肅清中國的封建殘餘。

正因爲如此，所以共產國際說，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時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

這樣，中國現在的革命便是兩條革命運動（反封建殘餘運動和反帝國主義運動）巨流的匯合。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殘餘的鬥爭和反帝國主義的鬥爭的結合。

共產國際（自然聯共（布）中央也是這樣）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整個路線的出發點就是如此。

而托洛茨基對中國問題的立場的出發點是什麼呢？它是和剛才說過的共產國際的觀點正相對立的。托洛茨基不是完全不承認中國封建殘餘的存在，就是認爲這些封建殘餘沒有決定的意義。托洛茨基（自然反對派也是這樣）對中國封建官僚壓迫的力量和意義估計過低，以爲中國民族革命的基本原

因是中國關稅受帝國主義國家的控制。

請讓我引證托洛茨基幾天以前送交聯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衆所周知的提綱吧。

托洛茨基這個提綱的標題是「中國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綱」。

托洛茨基在這個提綱中寫道：

「布哈林藉口「封建殘餘」在中國經濟中似乎起主要作用來爲機會主義的妥協路線辯護，他這種企圖是毫無根據的。即使布哈林對中國經濟的估計是根據經濟的分析，而不是根據一些瑣屑哲學的定義，「封建殘餘」仍舊不能替如此明顯地促進了四月政變的政策作辯護。中國革命具有民族資產階級的性質，其基本原因在於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受阻於中國關稅。受帝國

主義國家的控制。」（見托洛茨基『中國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綱』）

不仔細看這一段引文就會以為托洛茨基不是反對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的路線，而是反對布哈林的『妥協政策』。這當然是不對的。事實上在這一段引文中所說的是否認封建殘餘在中國的『主要作用』。事實上這裏所說的是把中國現在日益展開的土地革命宣佈為上層的革命，所謂反關稅的革命。

托洛茨基在這裏所以要把布哈林的『妥協政策』說一頓，其目的是為了掩蓋自己背叛共產國際路線的行爲。直截了當地說，這是托洛茨基慣用的欺騙手法。

這樣，在托洛茨基看來，中國封建殘餘及其全部軍閥官僚上層建築，不是目前中國革命的基本發條，而是次要的、不大的、只配放在引號裏面的力量。

這樣，在托洛茨基看來，中國民族革命的『基本原因』是中國關稅受帝國主義者的控制，因此，中國革命主要是所謂反關稅的革命。

托洛茨基的論調的出發點就是如此。

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性質所持的觀點就是如此。

請讓我指出：這種觀點正是張作霖『陛下』的五等文官的觀點。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如果托洛茨基的觀點是正確的，那就應該承認張作霖和蔣介石也是對的，因為他們既不要土地革命，也不要工人革命，他們所要達到的只是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實現中國的關稅自主。

托洛茨基的觀點已經是張作霖和蔣介石的辦事員的觀點了。

如果封建殘餘應該放在引號裏面，如果共產國際宣稱封建殘餘在革命現階段上有主要的意義是不對的，如果中國革命的基礎是關稅不自主，而不是和封建殘餘及支持這些殘餘的帝國主義作鬥爭，那末，中國的土地革命還有什麼內容呢？

中國的土地革命和沒收地主土地的要求從哪裏來的呢？在這種情況下有什麼根據認為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呢？土地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這難道不是事實嗎？難道土地革命能夠從天上掉下來嗎？

在湖南、湖北、河南等等省份裏，千百萬的農民被捲進極偉大的土地革命中，農民在這些省份裏建立起自己的政權、自己的法庭、自己的自衛力量，趕走地主，『用平民手段』<sup>①</sup>制裁他們，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如果封建軍閥的壓迫不是中國的壓迫的主要形式，那末，這樣強大的土地運動是從哪裏來的呢？如果不承認帝國主義是壓迫中國人民的封建主和軍閥的基本同盟者，那末，千百萬農民的這種聲勢浩大的運動怎能同時具有反帝國主義的性質呢？

僅湖南一省的農民協會現在就有二百五十餘萬會員，這難道不是事實嗎？而這種會員在湖北和



河南現在有多少呢？最近期間在中國其他省份又將有多少呢？

還有「紅槍會」、「硬肚」等等，——難道這一切都是捏造而不是現實嗎？

難道可以真正地斷言以沒收地主的土地爲口號的千百萬農民的土地革命不是反對真正的不容懷疑的封建殘餘，而是反對想像出來的引號裏的封建殘餘嗎？

托洛茨基的觀點已經是張作霖「陛下」的辦事員的觀點了，這難道不明顯嗎？

由此可見，我們有兩條基本路線：

(甲)共產國際的路綫——估計到中國存在着封建殘餘這一壓迫的主要形式，估計到強大土地運動的決定意義，估計到封建殘餘和帝國主義的聯系，估計到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質及其反帝國主義鬥爭的突出性；

(乙)托洛茨基的路綫——否認封建軍閥壓迫的主要意義，看不見中國土地革命運動的決定意義，並且僅以要求中國關稅自主的中國資本主義的利益來說明中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性質。

托洛茨基（自然反對派也是這樣）的基本錯誤在於低估了中國的土地革命，不懂得這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性質，否認中國千百萬人所參加的土地運動的前提，低估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

這種錯誤對托洛茨基來說並不是新的錯誤。它是托洛茨基在和布爾什維主義作鬥爭的整個時期中整個路綫的極顯著的特點。

低估農民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作用這一錯誤，從一九〇五年起就和托洛茨基形影不離，它

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夜表現得特別明顯，並且直到現在也沒有離開托洛茨基。

請讓我舉出幾件托洛茨基反對列寧主義的事實，例如舉出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夜的事實，那時我們正走向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

當時托洛茨基硬說，既然農民中間的分化已經加劇，既然目前我們這裏存在着帝國主義的統治，並且無產階級把自己和資產階級民族對立起來，那末農民的作用就會降低，而土地革命就不會有一九〇五年所賦予它的那種意義了。

列寧對這一點是怎樣回答的呢？請讓我從一九一五年列寧關於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問題的論文中引出一段話來：

「托洛茨基的奇特的理論（指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斯大林註）從布爾什維克這裏攝取了號召無產階級進行堅決革命鬥爭並奪取政權的思想，而從孟什維克那裏攝取了『否認』農民作用的思想。農民呢，分爲階層了，分化了，他們可能有的革命作用漸漸消失了；在俄國「民族」革命是不可能了，因爲「我們生活在帝國主義時代」，而「帝國主義不是把資產階級民族和舊制度對立起來，而是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民族對立起來」。

這真是一個「玩弄字眼」（帝國主義這個字眼）的滑稽例子！如果在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和「資產階級民族」對立起來，那就是說，俄國面臨社會主義革命了！！那末「沒收地主的土地」的口號（托洛茨基繼一九一二年一月代表會議之後在一九一五年重複說的）就不對了，那末不應當說

「工人的革命的」政府，而應當說「工人的社會主義的」政府了！！托洛茨基糊塗到什麼程度，從他的這句話裏就可以看出來：無產階級也以堅決性吸引「非無產階級的（！）人民羣衆」（第二一七號）！！托洛茨基不會想到：如果無產階級吸引農村非無產階級羣衆去沒收地主的土地並推翻君主制，那末這將是俄國「民族資產階級革命」的完成，這將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

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五年這整整十年，這偉大的十年，證明了俄國革命有兩條階級路綫，而且只有兩條階級路綫。農民的分化加強了農民內部的階級鬥爭，喚醒了很多在政治上睡覺的分子，使農村無產階級接近了城市無產階級（從一九〇六年起，布爾什維克就主張要特別組織農村無產階級，並把這個要求列入了孟什維克佔多數的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的決議中）。但是「農民」和馬爾柯夫之流——羅曼諾夫之流——赫沃斯托夫之流的對抗却加強了，增長了，尖銳化了。這是一個很明顯的真理，甚至托洛茨基在巴黎寫的幾十篇文章的千言萬語都「推翻」不了它。托洛茨基實際上是幫助俄國那些把「否認」農民的作用理解為不願意發動農民起來革命的自由主義的工人政治家！而現在關鍵就在這裏。」（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一頁至第三八二頁）

托洛茨基公式的特點在於他看見資產階級，看見無產階級，而看不見農民，不了解農民在資產階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級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正是這個特點構成了反對派在中國問題上的基本錯誤。

托洛茨基和反對派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的『半孟什維主義』也正是在這裏。

從這個基本錯誤中產生了反對派的其他一切錯誤，產生了反對派在中國問題提綱中的一切糊塗觀念。

### 三 屠殺共產黨人的南京右派國民黨及與共產黨人 保持聯盟的武漢左派國民黨

就拿武漢問題做例子吧。共產國際關於武漢的革命作用的問題的方針是人所共知的，而且是很清楚的。既然中國正經歷着土地革命，既然土地革命的勝利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是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專政的勝利，既然南京是國內反革命的中心，而武漢是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那末，在保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國民黨內和國民黨黨外的領導作用的條件下，必須支持武漢國民黨，共產黨人必須參加武漢國民黨及其革命政府。

現在的武漢政府是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機關呢？不，暫時還不是，而且不會很快就成爲這樣的機關。但是在革命進一步發展時，在這一革命取得勝利時，它是有一切機會發展成這樣的機關的。

共產國際的方針就是如此。

托洛茨基看問題則完全不同。他認為武漢是『空架子』，而不是革命運動的中心。對於左派國民黨現在代表什麼這個問題，托洛茨基回答說：『暫時還不代表什麼，或幾乎不代表什麼。』

就說武漢是空架子吧。既然武漢是空架子，那末，托洛茨基爲什麼不要求和這個空架子作堅決的鬥爭呢？從什麼時候起，共產黨人竟開始支持空架子，參加空架子，領導空架子呢？共產黨人必須和空架子作鬥爭，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共產黨人拒絕和空架子作鬥爭，便是欺騙無產階級和農民，這難道不是事實嗎？爲什麼托洛茨基不提議和空架子作鬥爭，即使採取共產黨人立即退出武漢國民黨和武漢政府的辦法呢？爲什麼托洛茨基提議留在這個空架子裏，不退出這個空架子呢？這裏的邏輯何在？

這種『邏輯上的』不對頭是不是由於托洛茨基對武漢指手劃腳地講了一頓，把它叫做空架子，然後又胆怯起來，不敢在自己的提綱裏做出相當的結論呢？

或者拿季諾維也夫做例子來說。季諾維也夫在今年四月提交聯共（布）中央全會的提綱中，把武漢國民黨估計爲一九二〇年時期的基馬爾派的政府。但基馬爾派的政府是反對工人和農民的政府，是沒有而且不能有共產黨人的位置的政府。看來從對武漢的這種評價中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和武漢作堅決的鬥爭，推翻武漢政府。

具有人類的普通邏輯的普通人是會這樣想的。

季諾維也夫却不這樣想。他把漢口的武漢政府估計為基馬爾派的政府，同時提議給這個政府以最有力的支持，提議共產黨人不要退出這個政府，不要離開武漢國民黨等等。他直截了當地說：

「必須給漢口以最有力的和全面的幫助，從那裏組織對卡維涅克們的反擊。在最近時期必須集中力量幫助漢口組織起來和鞏固起來。」（見季諾維也夫的提綱）

誰能懂得呵！

托洛茨基說武漢（漢口）是空架子。相反地，季諾維也夫却斷言武漢是基馬爾派的政府。由此應該做出結論：和空架子作鬥爭，為推翻武漢政府而鬥爭。然而不管托洛茨基也罷，季諾維也夫也罷，都不敢做出從他們的前提中必然產生的結論，而季諾維也夫甚至更進一步，提議「給漢口以最有力的和全面的幫助」。

這一切說明什麼呢？說明反對派糾纏在矛盾裏了。他們失去了邏輯思考的能力，喪失了一切前途。觀點糊塗，在武漢問題上失去任何前途，——如果一般說來可以把糊塗叫做方針的話，這就是托洛茨基和反對派的方針。

#### 四 論中國工農代表蘇維埃

或者再拿中國工農代表蘇維埃問題做個例子吧。

關於組織蘇維埃的問題，我們有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三個決議：列寧論在落後國家中成立非無產階級的農民蘇維埃的提綱，羅易論在中國、印度這樣的國家裏成立工農蘇維埃的提綱，以及論『在什麼時候和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蘇維埃』的特別提綱。

列寧的提綱是說明在沒有或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中亞細亞諸國成立「農民的」、「人民的」、「非無產階級的蘇維埃」。列寧的提綱裏沒有一句話說到在這樣的國家成立工人代表蘇維埃。並且列寧的提綱認為蘇聯無產階級對落後國家的革命的直接援助是在這些國家裏成立並發展「農民的」、「人民的」蘇維埃的必要條件之一。顯然，這個提綱指的不是中國或印度，因為在這些國家裏有一定數量的工業無產階級，並且在這些國家裏建立工人蘇維埃在一定條件下是成立農民蘇維埃的先決條件；這個提綱指的是其他較落後的例如波斯等等國家。

羅易的提綱主要是指已有工業無產階級的中國和印度。這個提綱建議在一定條件下，在從資產階級革命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過渡時期，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顯然，這個提綱對中國有直接的關係。

標題為「在什麼時候和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蘇維埃」的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特別提綱根據俄國和德國革命的經驗說明了工人代表蘇維埃的作用。這個提綱斷言：「沒有無產階級革命的蘇維埃不可避免地會變成對蘇維埃的諷刺。」顯然，在討論立即在中國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問題時，我們也應當考慮到最後這個提綱。

如果同時考慮到目前中國的形勢和作為革命運動中心的武漢國民黨的存在，以及共產國際第二

次代表大會的後兩個提綱的指示，那末，在中國立即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的問題是怎樣的呢？

現在，例如在武漢政府活動地區內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這就是建立兩重政權，這就是提出推翻左派國民黨和在中國成立新的蘇維埃政權的鬥爭口號。

工農代表蘇維埃是為推翻現存政權而鬥爭的機關，是為新政權而鬥爭的機關。工農代表蘇維埃的出現不能不造成兩重政權，而兩重政權又不能不使全部政權應當歸誰的問題尖銳化起來。

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月、五月、六月的情形是怎樣的呢？當時存在着臨時政府，它握有一半政權，而且也許是較為實在的政權，因為當時軍隊還是支持它的。與此同時，還存在着工兵代表蘇維埃，它們也握有似乎一半政權，雖然不是像臨時政府那樣實在的政權。當時布爾什維克的口號是取消臨時政府，把全部政權轉歸工兵代表蘇維埃。當時布爾什維克中間誰也沒有想到加入臨時政府，因為既要推翻這個政府，就不能加入這個政府。

能不能說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六月俄國的形勢類似現在中國的形勢呢？不，不能這樣說。所以不能這樣說，不僅由於俄國當時面臨着無產階級革命，中國現在則面臨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且由於俄國臨時政府是反革命的和帝國主義的政府，現在的武漢政府則是反帝國主義的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意義下的革命的政府。

反對派在這方面向我們建議些什麼呢？

反對派建議在中國立即成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作為組織革命運動的中心。但工農代表蘇維埃



並不只是組織革命運動的中心。它們首先而且主要是反對現存政權的起義機關，是建立新的革命政權的機關。反對派不懂得：工農代表蘇維埃，只有作為起義機關，只有作為新政權機關，才能變成革命運動的中心。不這樣，工人代表蘇維埃就會變成空架子，變成現存政權的附屬品，就像一九一八年在德國和一九一七年七月在俄國發生過的情形一樣。

反對派是否懂得現時在中國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就是造成蘇維埃和武漢政府這兩重政權，而且必不可免要提出推翻武漢政府的口號呢？

我很懷疑季諾維也夫懂得這個簡單的道理。但托洛茨基是完全明白這一點的，因為他在自己的提綱中直截了當地說：「蘇維埃的口號就是號召經過兩重政權的過渡制度去建立實際的政權機關。」（見托洛茨基的提綱「中國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綱」）

由此可見，我們在中國成立蘇維埃，同時就是建立「兩重政權的制度」，就是推翻武漢政府和建立新的革命的政權。大概托洛茨基在這裏是拿俄國革命歷史中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一個時期的事變作樣本的。當時在我國的確有過兩重政權，當時我們的確推翻了臨時政府。

但是我已經說過，當時誰也沒有想到加入臨時政府。為什麼托洛茨基不建議共產黨人現在立即退出國民黨和武漢政府呢？怎能成立蘇維埃，建立兩重政權的制度，同時又加入你要推翻的武漢政府呢？托洛茨基的提綱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顯然，托洛茨基在這裏已無望地陷入他自己的矛盾的迷宮裏了。他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產

階級革命混淆起來了。他『忘記了』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僅沒有完結，不僅沒有勝利，而且只處在它發展的第一階段。托洛茨基不懂得拒絕支持武漢政府，提出兩重政權的口號，現在用立即成立蘇維埃的辦法來推翻武漢政府，就是給蔣介石和張作霖以直接的和明顯的援助。

有人向我們說：既然如此，又怎樣去了解一九〇五年在俄國成立工人代表蘇維埃呢，難道當時我們不是經歷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嗎？

但是，第一、當時只有兩個蘇維埃，一個在彼得堡，一個在莫斯科，這兩個蘇維埃的存在並沒有造成俄國蘇維埃政權系統。

第二、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蘇維埃當時都是反對舊的沙皇政權的起義機關，這再度證實：不可把蘇維埃看做僅僅是組織革命的中心，蘇維埃只有作為起義機關和新政權機關才能成為這樣的中心。

第三、工人蘇維埃的歷史說明：只有具備了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直接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順利條件，也就是只有具備了從資產階級政權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順利條件，這樣的蘇維埃才能在和進一步發展。

一九〇五年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蘇維埃，以及一九一八年德國的工人蘇維埃所以滅亡，不都是由於當時沒有這樣的順利條件嗎？

假如一九〇五年在俄國存在着類似現在中國左派國民黨這樣的廣大革命組織，那末可能當時在俄國就不會有蘇維埃了。但是，這樣的組織當時在俄國是不能存在的，因為在俄羅斯工農中間沒有民

族壓迫的因素，俄羅斯人自己就在壓迫其他民族，而類似左派國民黨這樣的組織，只有在受到外國帝國主義者的民族壓迫的環境中才能產生，因為這種壓迫會把國內革命分子都集中到一個廣大的組織裏去。

只有瞎子才會否認左派國民黨有革命鬥爭機關的作用，有反對中國封建殘餘和帝國主義的起義機關的作用。

但是，由此應得出什麼結論呢？

由此應得出這個結論：中國左派國民黨對現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蘇維埃在一九〇五年對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種作用。

假如中國沒有像左派國民黨這樣一個很受歡迎的革命民主的組織，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既然有了這樣一個特殊的革命組織，適合於中國條件的特點，並已證明自己適合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進一步發展，那末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剛剛開始，還沒有勝利，而且不會很快勝利的現在，就把這個費了多年時間才成立起來的組織加以破壞，未免太愚蠢太無知了。

某些同志根據這一點做出結論說，將來在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也可以利用國民黨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組織形式，而且他們把這一點看做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平地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性。

一般說來，革命和平發展的可能性當然不是沒有的。在我們俄國，在一九一七年初，也曾談到革

命有經過蘇維埃而和平發展的可能性。

但是，第一、國民黨不是蘇維埃，說國民黨適合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發展的事業，並不是說國民黨就能適合於無產階級革命發展的事業，其實，工人代表蘇維埃才是無產階級專政最適合的形式；

第二、即使在一九一七年俄國蘇維埃的條件下，和平地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中國的無產階級中心是那樣地稀少，而中國革命的敵人是那樣地強大和衆多，以致革命的每一推進和帝國主義者的每一進攻，都必然會使國民黨發生新的分化，使共產黨因國民黨的威信降低而更爲加強起來。

我想，中國革命的和平發展道路應該認爲是不可能的。

我想，在中國，在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過渡時期是不得不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的。因爲在現今的條件下，沒有工農代表蘇維埃，這種過渡是不可能的。

必須首先在全中國展開土地運動，必須鞏固武漢並支持它和封建官僚制度作鬥爭，必須幫助武漢戰勝反革命，必須在各地廣泛地發展農民協會、工會和其他革命組織作爲將來成立蘇維埃的基礎，必須使中國共產黨鞏固自己在農民和軍隊中的勢力，——只有在這以後，才可以成立當做爲新政權而鬥爭的機關、當做兩重政權的要素、當做準備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要素的工農代表蘇維埃。

在中國成立工人蘇維埃，不是一句空話，不是一篇空洞的『革命的』演說。不能像托洛茨基那樣輕率地看這個問題。

首先，成立工農蘇維埃就是說要退出國民黨，因為不能既成立蘇維埃，推進兩重政權，號召工農建立新政權，同時又留在國民黨及其政府裏面。

其次，成立工人代表蘇維埃就是說要以國民黨黨外的聯盟，要以類似一九一七年十月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聯盟的那種聯盟，代替現在國民黨黨內的聯盟。

爲什麼呢？

因爲如果在那裏，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條件下，問題是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專政，而在國民黨黨內結成聯盟的政策是完全適合於這一點的，那末在這裏，在成立蘇維埃的條件下和在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下，問題將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蘇維埃政權，而要準備並建立這種政權，則只有在一個政黨即共產黨的領導下才有可能。

其次，工人代表蘇維埃是使共產黨人負有義務的。現在中國工人每月得八個盧布到十五個盧布，生活條件極惡劣，工作時間非常長。這種情形必須立即結束，而且可以結束，只要增加工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改善工人階級的居住條件等等。但是，在工人代表蘇維埃的條件下，工人是不會滿足於這一點的。他們會向共產黨人說（而且他們是對的）：既然我們有蘇維埃，而蘇維埃又是政權機關，就不能壓一壓資產階級，『稍微』剝奪資產階級一下嗎？如果共產黨人在工農代表蘇維埃存在的條件下

不走上剝奪資產階級的道路，那末他們就會成爲空談家了。

試問，現在，在革命現階段上，是否可以而且需要走這條道路呢？

不，不需要。

將來，在工農代表蘇維埃的條件下，是否可以而且需要拒絕剝奪資產階級呢？不，不可以。如果以爲在這種情形下可以保持共產黨人在國民黨黨內的聯盟，那就是流於妄想，不了解從資產階級革命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過渡時期中階級力量鬥爭的訣竅。

在中國建立工農代表蘇維埃的問題就是如此。

由此可見，這個問題並不像某些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之流的極輕率的人向我們描述的那樣簡單。

從原則上來看，一般地是不是容許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資產階級一起參加一個共同的革命民主政黨或一個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府並在那裏與之合作呢？

某些反對派以爲這是不可容許的。然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表明，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時期內，這種參加是完全容許的。

我可以舉出馬克思一八四八年在德國反對專制制度的革命時期的例子。當時馬克思和他的同志加入了萊茵省的資產階級民主聯盟，當時這個革命的民主政黨的機關報『新萊茵報』就是由馬克思主編的。

馬克思和他的同志處在這個資產階級民主聯盟內，把革命資產階級向前推進，同時用一切辦法批判自己的右派同盟者的不徹底性，正像中國共產黨處在國民黨內應當用一切辦法批判自己的同盟者左派國民黨人的動搖和不徹底一樣。

大家知道，直到一八四九年春天，馬克思和他的同志才脫離了這個資產階級民主聯盟，並着手成立一個具有完全獨立的階級政策的獨立的工人階級組織。

由此可見，馬克思甚至比作爲無產階級獨立的階級政黨加入國民黨的中國共產黨走得更遠。

馬克思和他的同志在一八四八年加入這個資產階級民主聯盟是否適當，是可爭論可不爭論的。例如羅莎·盧森堡認爲馬克思不應當加入這個資產階級民主聯盟。這是策略問題。但是，在原則上，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爲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時期內，加入資產階級革命政黨是可能的而且是適當的，——這是無可懷疑的。至於說到馬克思主義者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環境中參加革命民主政府並在那裏與革命資產階級合作，那末，關於這一點，我們已有恩格斯和列寧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指示。大家知道，恩格斯在他的小冊子「在工作中的巴枯寧主義者」〔卷〕中是贊成參加這種政府的。大家知道，列寧在一九〇五年也是主張容許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政府的。

## 五 兩條路綫

總之，在我們面前有兩條完全不同的關於中國問題的路綫：共產國際的路綫與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路綫。

共產國際的路綫。封建殘餘和依靠這種殘餘並為各國帝國主義者所竭力支持的官僚軍閥上層建築是中國現狀中的基本事實。

中國目前正經歷着既反對封建殘餘又反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和內容。

武漢國民黨和武漢政府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中心。

南京和南京政府是國內反革命的中心。

支持武漢的政策同時就是展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取得由此而產生的一切結果的政策。由此便有了共產黨人之參加武漢國民黨和武漢革命政府，這一參加並不排斥共產黨人用一切辦法批評國民黨黨內自己的同盟者的不徹底和動搖，而是以此為前提。

應當利用共產黨人的這種參加使無產階級便於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起領導者的作用，並促使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更快地到來。

到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接近完全勝利的時候，到了在資產階級革命進程中顯露出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的時候，到了那個時候，就必須成立當做兩重政權的要素，當做為新政權而鬥爭的機關，當做新政權即蘇維埃政權的機關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



到了那個時候，共產黨人在國民黨黨內的聯盟應當代之以在國民黨黨外的聯盟，而共產黨則應成爲中國新的革命的唯一領導者。

現在，當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處在發展的最初階段的時候，當國民黨是最適合於並且最能適應中國特點的民族民主革命組織形式的時候，像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所做的那樣，提議立即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和立即建立兩重政權，——這就是瓦解革命運動，削弱武漢，促使武漢垮台，幫助張作霖和蔣介石。

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路綫。中國的封建殘餘乃是布哈林的捏造。在中國，封建殘餘不是完全沒有，就是微乎其微，沒有什麼重大的意義。

原來土地革命現在在中國是有的。但它從何而來，連鬼也不知道。（笑聲）

既然這種土地革命是有的，那當然只好設法支持它了。

現在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爭取中國關稅自主的革命，即所謂反關稅的革命。

武漢國民黨和武漢政府不是『空架子』（托洛茨基）就是基馬爾主義（季諾維也夫）。

一方面，必須建立兩重政權以推翻武漢政府，其辦法是立即成立蘇維埃（托洛茨基）。另一方面，必須鞏固武漢政府，必須給武漢政府以有力的和全面的幫助，其辦法原來也是立即成立蘇維埃（季諾維也夫）。

照例說來，共產黨人應該立即退出這個『空架子』，退出武漢政府和武漢國民黨。可是最好是讓

他們留在這個「空架子」裏，就是既留在武漢政府裏又留在武漢國民黨裏。既然武漢是「空架子」，爲什麼他們還要留在武漢呢？——這實在只有上帝才知道。誰要是不同意這一點，誰就是好賊和叛徒。

所謂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路綫就是如此。

幾乎再想不出比這種所謂路綫更荒謬更糊塗的東西了。

得到的印象是：我們不是和馬克思主義者打交道，而是和一些脫離實際生活的辦事員，或者說得好一些，和「革命的」旅行家打交道。這些旅行家遊歷了蘇胡姆和基斯洛沃得斯克<sup>②</sup>之類的地方，忽略了提出中國革命基本方針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後來從報紙上得知中國確實爆發了什麼革命，既像土地革命，又像反關稅革命，於是就決定寫一堆提綱，四月寫了一個提綱，五月初寫了一個提綱，五月底又寫了一個提綱，把這一堆提綱寫好，就扔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他們以爲這許多糊塗的和矛盾的提綱就是挽救中國革命的主要手段。

同志們，這就是中國革命問題上的兩條路綫。

你們必須在這兩條路綫中間加以選擇。

同志們，我要結束我的講話了。

我想在最後用幾句話談談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派別言論在當前的政治意義和作用。他們抱怨說，沒有給他們充分的自由來對聯共（布）中央和共產國際執委會進行聞所未聞的謾罵和不能容許的斥責。他們抱怨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制度」。實質上，他們要得到瓦解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

自由。實質上，他們要把馬斯洛夫一夥人的作風移植到共產國際和聯共（布）裏來。

同志們，我應當說，托洛茨基所選擇的攻擊黨和共產國際的時機太不恰當了。我剛剛得到英國保守黨政府決定和蘇聯絕交的消息。用不着證明，現在到處都會展開對共產黨人的進攻。這種進攻已經開始了。有些是以戰爭和干涉來威脅聯共（布）。另一些則是以分裂來威脅聯共（布）。正在建立一種從張伯倫到托洛茨基的統一戰綫之類的東西。

可能是想用這個來嚇唬我們。但是，幾乎用不着證明，布爾什維克並不是胆小的孩子。在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上有過不少這樣的『戰綫』。布爾什維主義歷史表明，這些『戰綫』都被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的決心和無比的勇敢一一粉碎了。

不用懷疑，我們也能够粉碎這種新的『戰綫』。（鼓掌）

載於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期

① 「用平民手段」係馬克思語。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在「新萊茵報」上寫道：「全部法蘭西的恐怖主義無非是用以打垮資產階級的敵人即打垮專制制度、封建主義和市會主義的一種平民手段而已。」——譯者註。

② 蘇胡姆和基斯洛沃得斯克是蘇聯著名的風景區和療養地，均在高加索。——譯者註。

# 給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學生們

親愛的同志們！

兩年以前，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成立四周年的時候，我在你們那裏講過話，談到這個大學對於各蘇維埃共和國和東方各被壓迫國家的任務<sup>(四)</sup>。

這個大學執行着自己的任務，現在正把新的戰鬥幹部，代表七十四種民族的第四期畢業生，用列寧主義這種強大武器武裝起來的同志們，送到鬥爭的烈火中去。

同志們在一個極其重要的歷史關頭走上戰鬥的工作崗位，在這時，世界帝國主義，首先是英帝國主義，正企圖扼住中國革命的咽喉，同時向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蘇聯挑戰，希望摧毀世界各國無產者的這個堅固而強大的堡壘。

我祝賀畢業的同志們，同時堅信你們會光榮地對無產階級盡自己的義務，會把自己的所有力量和知識貢獻給東方勞動者為擺脫帝國主義壓迫而鬥爭的解放事業。

約·斯大林

載於一九二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真理報」第一二二號



## 答坡克羅夫斯基

在開始和你通信的時候，我以為是和一個追求真理的人來往。現在，在接到你的第二封信之後，我才知道我是和一個妄自尊大、把個人「利益」看得高於真理利益的無賴通信。因此，如果我在這封簡短的（也是最後的）回信中直言不諱，你可不要詫異。

一、我會肯定說，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的時期中，黨已經用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以及「和貧苦農民聯盟」的新戰略口號代替了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以及「和全體農民聯盟」的舊戰略口號。

我會肯定說，黨是在實行這個新口號下走向十月革命並到達十月革命的，不實行這個口號，黨就不能組成一支能夠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並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必要的政治大軍。

你堅決反駁我的這種論斷，並且證明說：「黨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這一時期所維護的，是它對農民的舊口號，即和全體農民聯盟的口號。」（見你的第一封信）你不僅證明這個反列寧主義的、純粹加米涅夫式的概念，而且認為這個概念幾乎是一個公理。

問題原是這樣的，我們所爭論的也正是這一點。

現在，你看到你的固執和自負把你弄到了這麼難堪的境地，於是不得不低聲承認自己的錯誤，肯定「黨在四月至十月期間的戰略口號正是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見你的第二封信）。

但你一低聲承認自己的錯誤，就馬上大叫大嚷地竭力把它說成是「措辭」不當的小事，並且聲明：「我在上次信中說到黨拋棄了和全體農民聯盟的舊口號時用以表達自己思想的那種措辭，也許有不明確的地方。」（見你的第二封信）

這樣一來，我們進行的是「措辭」上的爭論而不是兩種原則上不同的概念的爭論了！客氣些說，這就叫做耍無賴。

二、我曾肯定說，我們是在跟蘇維埃中某部分農民的動搖和妥協作鬥爭的情況下準備十月革命的，這種動搖和妥協給革命造成了極大的危險（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的失敗），只有在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下才能够順利地跟這種動搖和妥協作鬥爭；布爾什維克只是靠這個口號才得以把動搖和妥協的中農中立起來。

你堅決反駁這一點，堅持自己的錯誤，認為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期間黨是在「和全體農民聯盟」的舊口號下進行工作的。而你這樣反駁，就把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談到布爾什維克為爭取中農階層脫離各小資產階級政黨、為孤立這些政黨、為中立農民中某些動搖和妥協的階層而鬥爭的那些光輝燦爛的篇幅一下刪除了。

問題原是這樣的。

現在，你既不得不承認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期間某部分農民動搖和妥協的事實，也不得不承認布爾什維克跟這種動搖和妥協作鬥爭的事實。

但你一面承認這一切，一面却裝出好像這和中立中農問題沒有關係的樣子，甚至處心積慮地責備我，說我『沒有答覆』中立中農的問題。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你太天真了，或者是你爲了達到某種絕非科學的目的而有意識地給自己戴上一副天真的假面具。

三、我曾肯定說，黨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是由於它順利地貫徹了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新戰略口號；如果不以和貧苦農民聯盟的新口號代替和全體農民聯盟的舊口號，黨既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也不能在十月革命進程中獲得全體農民的支持；全體農民只是在布爾什維克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限度內才支持了布爾什維克的；由於十月革命的主要目的是社會主義革命而不是資產階級革命，所以全體農民的支持是有條件的，有限度的。

其實你是反對這一點的，因爲你在第一封信中否認了在二月革命以後的時期中以新口號代替舊口號這一事實。

問題原是這樣的。

現在，你不得不在口頭上承認和全體農民聯盟的舊戰略口號確實已被和貧苦農民聯盟的新戰略口號所代替了。



但你承認了這種真理，就立即像加米涅夫那樣着手消滅痕跡，把保證獲得全體農民支持的『策略』任務與保證和貧苦農民聯盟的『戰略』任務對立起來，從而像加米涅夫那樣侮辱你剛才承認的關於第二個戰略口號的真理。實際上你又回到了原來的加米涅夫的立場，同時却處心積慮地誣蔑我，說我似乎不承認全體農民在十月革命時給予布爾什維克一定的有條件的支持。

看來你不懂得策略任務是戰略任務的一部分，不能把前者 and 後者等量齊觀，更不能把它們對立起來。

看來你不懂得我國全體農民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支持只能是有條件的，有限度的，他們只是在十月革命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亦即十月革命消滅地主所有制、地主秩序和地主秩序的政治上層建築（君主制度）的限度內，才支持無產階級革命的。

看來你不知道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中，在蘇維埃奪取政權以後，當克倫斯基向彼得堡進軍的時候，彼得堡的衛戍部隊（農民組成的）拒絕開赴前線去抵抗克倫斯基，同時宣稱他們這支衛戍部隊是『擁護和平並反對新戰爭』的，他們不是把和平了解為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而是了解為放下武器，停止戰鬥，正像你和其他許多政治上的庸人所了解的那樣（見你的第一封信）。

看來你不知道當時彼得堡是由赤衛隊員和水兵從克倫斯基和克拉斯諾夫的襲擊下拯救出來的。看來你不知道我們國內戰爭在其初期（自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一九一八年春天）主要是依靠工人和水兵的力量進行的，所謂『全體農民』的支持，在當時往往只表現於他們並沒有阻礙我們去直接打

擊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罷了。

看來你不知道實際上只是在一九一八年的下半年我們才把紅軍建成一支羣衆性的軍隊，那時農民已分得土地，富農力量已相當削弱，蘇維埃政權已能保衛自己，並且已有實行『和中農結成鞏固聯盟』的口號的可能……

當然，可以寫種種荒誕無稽的東西，紙張總是會忍受的，可以像加米涅夫那樣轉彎抹角並消滅痕跡……但總要有些分寸。

四、你醉心於自己筆頭的『藝術』，若無其事地忘掉自己的第一封信，還硬說我不懂得由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

這真是嫁禍於人！

什麼是由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呢？不以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新口號代替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舊口號，能不能設想我國會有這種轉變呢？顯然是不能的。

列寧爲什麼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和加米涅夫作鬥爭，主張以新口號代替舊口號，並把這種代替和俄國革命從第一階段（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第二階段（無產階級革命）的過渡聯系起來呢？是不是爲了使資產階級革命有可能和更容易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呢？顯然是爲了這一點。

是誰在當時反對從舊口號過渡到新口號呢？顯然是加米涅夫。

是誰在一九二七年春天否認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以新戰略口號代替舊戰略口號的事。

實呢？顯然是你這位可敬的坡克羅夫斯基。

是誰糾正了坡克羅夫斯基的這個加米涅夫式的錯誤呢？顯然是斯大林同志。

由此可見，你對於由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是一竅不通的，簡直是一竅不通的，這難道還不清楚嗎？

結論：要兼有無知之徒的無賴手段和本領有限的賣藝者的自滿心理，才能像你這位可敬的坡克羅夫斯基一樣隨意地顛倒是非。

我想，已經到了和你斷絕書信往來的時候了。

約·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一次刊印

# 時事問題簡評

## 一 論戰爭的威脅

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威脅這一問題是現時的基本問題，這是幾乎不能懷疑的了。這裏所說的不是什麼不固定的無形的新戰爭『危險』，而是一般新戰爭特別是反蘇戰爭的真正的實在的威脅。

最近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對世界的重新分割和對勢力範圍的重新劃分已經『過時』了。某些新的國家（美國、日本）跑到前面去了。某些老的國家（英國）落在後面了。在凡爾賽幾乎被埋葬了的資本主義德國正在復活，成長並日益強大起來。資產階級的意大利懷着嫉視法國的心理正往上爬。爭奪銷售市場、爭奪輸出資本的市場、爭奪通向這些市場的海陸道路、爭取重新分割世界的瘋狂鬥爭正在進行。美英之間、日美之間、英法之間、意法之間的矛盾正在增長。

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正在增長，有時表現為無產階級公開的革命發動（英、奧）。帝國主義世界和附屬國之間的矛盾也在增長，往往表現為公開的衝突和革命的爆發（中國、印尼、北非、南美）。

這一切矛盾的增長都表明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增長，儘管穩定是事實，這次危機却較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以前的危機無比地加深了。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存在和繁榮，只是使這個危機加深和尖銳罷了。

帝國主義正在準備新的戰爭，並把它看做解決這個危機的唯一途徑，這是不足為奇的。軍備的空前擴張，資產階級政府實行法西斯「管理」方法的總方針，對共產黨人的十字軍討伐，對蘇聯的瘋狂攻擊，在中國的直接干涉，這一切都是同一現象（準備重新分割世界的新戰爭）的各種不同的方面。

假如沒有共產黨進行堅決的鬥爭以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假如沒有蘇聯的和平政策成為新戰爭煽動者的絆腳石，假如帝國主義者不怕彼此削弱從而使帝國主義戰綫易於遭受新的突破，那末帝國主義者早已廝殺起來了。

我想，後一種情況，即懼怕彼此削弱從而使帝國主義戰綫易於遭受新的突破，乃是暫時阻止廝殺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帝國主義者的某些集團就有了一種「自然的」意圖：把自己陣營裏的矛盾推到後面去，暫時掩蓋這些矛盾，成立帝國主義者的統一戰綫，向蘇聯進軍，以便犧牲蘇聯來解決日益加深的資本主義危機，即使是局部地暫時地解決也好。

首先倡導這件事情的，首先倡導成立帝國主義者的反蘇統一戰綫的，是英國資產階級及其戰鬥的參謀部——保守黨，這一事實對於我們不是什麼意外。英國資本主義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人民革

命的最兇惡的絞殺者。從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起到現在的中國革命止，英國資產階級一直站在而且仍然站在人類解放運動的摧毀者的前列。蘇聯人永遠不會忘記幾年前我國因英國資本家的恩賜而遭到的暴行、掠奪和軍事侵犯。如果英國資本及其保守黨再來領導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世界策源地的戰爭，即反蘇的戰爭，這又有什麼奇怪呢？

但是英國資產階級是不喜歡用自己的手來作戰的。它總是寧願借別人的手來進行戰爭。它有時的確找到了甘願爲它火中取栗的傻瓜。

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時期的情形就是這樣，那時英國資產階級建成了歐洲各國的聯盟來反對革命的法國。

蘇聯十月革命以後的情形就是這樣，那時英國資產階級進攻蘇聯，企圖建立「十四國聯盟」，雖然如此，它還是被趕出了蘇聯國境。

現在中國的情形也是這樣，英國資產階級企圖在那裏建立統一戰綫來反對中國革命。

十分明白，保守黨在準備對蘇戰爭，它已經進行好幾年的準備工作來建立大小國家的反蘇「神聖同盟」。

如果在從前，在最近時期以前，保守黨人的這種準備工作多少是隱蔽地進行的，那末在現今，在最近時期，他們却轉而採取了「直接的行動」，給予蘇聯幾次公開的打擊，企圖在萬目睽睽之下結成臭名遠揚的「神聖同盟」。

第一次公開打擊是英國保守黨政府在北京襲擊蘇聯大使館。這次襲擊至少有兩個目的。它要發現蘇聯「破壞」工作的「可怕」文件，憑藉這些文件造成普遍憤怒的氣氛和反蘇統一戰綫的基礎。它要造成和北京政府的軍事衝突，使蘇聯對中國作戰。

大家知道，這一次打擊是失敗了。

第二次公開打擊是襲擊阿爾柯斯<sup>①</sup>並對蘇絕交。這次打擊的目的是要建立反蘇統一戰綫，開始全歐洲對蘇聯的外交封鎖，挑起一系列對蘇斷絕條約關係的事件。

大家知道，這一次打擊也失敗了。

第三次公開打擊是在華沙暗殺沃依柯夫<sup>②</sup>。保守黨代理人所組織的對沃依柯夫的暗殺，照主謀者的毒計，是要起薩拉也沃暗殺事件<sup>③</sup>的作用，使蘇聯和波蘭發生軍事衝突。

這一次打擊看來也失敗了。

這些打擊暫時都還沒有使保守黨人得到他們所預期的效果，其原因何在呢？

因為各個資產階級國家的利益是互相矛盾的，這些國家有許多是願意和蘇聯保持經濟聯系的。

因為蘇聯政府堅定不移地實行蘇聯的愛好和平的政策。

因為英國的附屬國，無論是張作霖的國家或皮爾蘇茨基的國家都一樣，不願意做保守黨人的無聲無臭的工具以損害其本身的利益。

看來可敬的公爵們不願了解：每個國家，即使它是最小的國家，都情願把自己當做一個單位，力

求過自己的日子，不願爲了保守黨人的漂亮眼睛而把自己的生存作孤注一擲。英國保守黨人忘記了估計這一切情況。

這是不是說再不會有這樣的打擊呢？不，不是這樣。相反地，這只是說打擊將更加厲害地重複下去。

不能把這些打擊看做偶然的事情。它們是從整個國際環境中、從英國資產階級在『宗主國』和殖民地的地位中、從作爲執政黨的保守黨的地位中自然地產生出來的。

現在的整個國際環境，英國政府反蘇『業務』中的一切事實，它組織對蘇的財政封鎖，它和列強進行關於反蘇政策的秘密商談，它資助烏克蘭、格魯吉亞、阿捷爾拜疆、阿爾明尼亞等等的流亡『政府』以期在蘇聯的這些國家內組織暴動，它資助間諜恐怖集團炸壞蘇聯橋梁、燒燬蘇聯工廠、恐嚇和刺殺蘇聯駐外使節，這一切都無疑地向我們說明英國保守黨政府堅決地走上了組織反蘇戰爭的道路。同時決不可認爲保守黨人在某種條件下造成某種反蘇的軍事同盟是不可能的。

我們的任務是什麼呢？

任務就是要在歐洲各國敲起新戰爭威脅的警鐘，提高各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和士兵的警惕性，不倦地使羣衆有準備地以革命鬥爭的全副武裝對付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組織新戰爭的種種企圖。

任務就是要當衆揭露一切『認爲』新戰爭的威脅是『虛構』，以和平主義的謊言安慰工人並漠視資產階級在準備新戰爭的工人運動活動家，因爲這些人想使戰爭出乎意外地襲擊工人。



任務就是要使蘇聯政府今後仍然堅定不移地實行和平政策，實行保持和平關係的政策，不願我們敵人的挑撥伎倆，不願他們對我們威信的傷害。

敵人營壘中的挑撥者正在刺激我們，將來也要刺激我們，硬說我們的和平政策是由於我們軟弱，由於我們軍隊軟弱。這有時激怒了我們的某些同志，他們易受挑撥並要求採取「斷然的」手段。這是神經脆弱。這是缺乏耐性。我們不能也不應當受敵人愚弄。我們應當走自己的道路，保衛和平事業，表明自己的和平意志，揭穿我們敵人的強盜意圖，暴露他們是戰爭煽動者。

因為，假如敵人逼迫我們，確切些說，當敵人逼迫我們進行戰爭的時候，只有這樣的政策才能使我們有可能把蘇聯的勞動羣衆團結成一個統一的戰鬥營壘。

至於說我們「軟弱」或我們軍隊「軟弱」，那末我們的敵人在這一點上並不是第一次犯錯誤。約在八年以前，當英國資產階級對蘇聯實行干涉，而邱吉爾以「十四國」進軍來威脅的時候，資產階級報刊也叫嚷我們軍隊「軟弱」，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英國干涉者及其同盟者是可恥地被我們勝利的軍隊趕出國境了。

新戰爭挑撥者先生們不妨記住這一點。

任務就是要加強我國的國防力量，發展我們的國民經濟，改進我們的軍事工業和非軍事工業，提高我國工人、農民和紅軍戰士的警惕性，鍛鍊他們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意志，消滅那種可惜還遠沒有被消滅的鬆弛現象。

任務就是要鞏固我們的後方並清除其骯髒東西，毫不躊躇地懲辦「顯貴的」恐怖分子和縱火焚燒我們工廠的人，因為沒有鞏固的革命後方，就不可能有我國的國防。

不久以前，收到了英國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蘭斯柏利、馬科斯頓和布羅克韋對於槍斃俄國王公貴族中二十個恐怖分子和縱火者的抗議書。我不能把這些英國工人運動的活動家看做蘇聯的敵人，但是他們比敵人更壞。

他們比敵人更壞，因為他們自稱是蘇聯的朋友，可是又以自己的抗議幫助俄國地主和英國密探今後組織對蘇聯代表的暗殺。

他們比敵人更壞，因為他們要以自己的抗議使蘇聯工人在其死敵面前解除武裝。

他們比敵人更壞，因為他們不願了解槍斃二十個「顯貴的」分子是革命自衛的必要措施。

無怪乎人們說：「願上帝使我們擺脫這種朋友，而敵人，我們自己是能對付的。」

至於槍斃二十個「顯貴的」人物，那是讓蘇聯的敵人知道，讓國內外的敵人知道，蘇聯是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它的手腕是堅強的。

既然如此，對於我們那種在新戰爭威脅下向黨作新攻擊的倒霉的反對派能說些什麼呢？對於認為在戰爭威脅下對黨加強攻擊是適合時機的反對派能說些什麼呢？它不團結在黨的周圍去反對外來的威脅，却認為利用蘇聯處境的困難來對黨作新的攻擊是適合時機的，這能有什麼好結果呢？難道反對派反對蘇聯在將來和帝國主義作戰時獲得勝利，反對加強蘇聯的國防力量，反對鞏固我們的後

方嗎？或者，也許這是在新的困難面前畏縮，臨陣脫逃，以喋喋不休的左的詞句掩飾逃避責任的願望吧？……

## 二 關於中國

現在中國革命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已能給走過的道路做出某種總結，並考察一下關於檢查共產國際在中國的路綫的問題。

有幾個列寧主義策略原則是必須顧到的，不顧到這些原則，既不可能正確地領導革命，也不可能檢查共產國際在中國的路綫。我們的反對派早已忘記了這些原則。但是，正因為反對派有健忘的毛病，所以必須一再提到這些原則。

我指的是這樣的列寧主義策略原則：

第一個原則。在共產國際給各國工人運動作出指導性的指示時，一定要估計到每個國家的民族特殊的東西和民族獨有的東西；

第二個原則。每個國家的共產黨一定要利用最小的可能以保證無產階級有數量衆多的同盟者，即使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不可靠的也好；

第三個原則。一定要估計到這樣一個真理：在政治上教育千百萬羣衆，只有宣傳和鼓動是不夠

的，必須要有羣衆自身的政治經驗。

我以為顧到這些列寧主義策略原則是一個必要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便不可能對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的路綫作馬克思主義的檢查。

我們就從這幾個策略原則來考察中國革命問題。

儘管我們黨在思想上有了提高，可惜我們黨內還存在着某種『領導者』，他們真誠地相信：根據共產國際的某些公認的一般原理，不用顧到中國經濟、中國政治制度、中國文化、中國習俗和傳統的民族特點，所謂用電報就能領導中國革命。實在說來，這些『領導者』不同於真正領導者的地方，就在於他們衣袋裏總藏着兩三個現成的、對一切國家都『適用的』、在任何條件下都『必需的』公式。顧到每個國家的民族特殊的和民族獨有的東西的問題，對他們來說是不存在的。把共產國際的一般原理和每個國家革命運動的民族特點結合起來的問題，使共產國際的一般原理適應於各個國家的民族國家的特點的問題，對他們來說是不存在的。

他們不懂得，現在，當各國共產黨已經成長起來並成爲羣衆性的政黨的時候，領導的主要任務就在於發現和掌握每個國家的運動的民族特點，並善於把這些特點和共產國際的一般原理結合起來，使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目的易於實現並得以實現。

由此他們便企圖把對一切國家的領導千篇一律化。由此他們便企圖機械地搬用若干一般公式，而不顧到個別國家的運動的具體條件。由此便產生了公式和個別國家革命運動之間的永遠的衝突，

這種衝突是這些可憐的領導者領導的基本結果。

我們的反對派正是這類可憐的領導者。

反對派聽說中國正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同時他們知道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的情況下進行的。由此便得出一個對中國的現成公式：打倒和資產階級的任何共同行動，共產黨人立即退出國民黨萬歲（一九二六年四月）。

但是反對派忘記中國和一九〇五年的俄國不同，它是一個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半殖民地國家，因此，中國革命不單純是資產階級革命，而且是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革命；帝國主義掌握中國工業、商業和交通命脈，帝國主義的壓迫不僅加於中國勞動羣衆，而且加於中國資產階級某些階層，因此，中國資產階級能够在一定條件下和在一定時期內支持中國革命。

大家知道，實際情形正是如此。如果拿中國革命的廣州時期、國民革命軍到達長江的時期、國民黨分裂以前的時期來說，那就不能不承認：中國資產階級是支持中國革命的，共產國際容許在一定時期內和在一定條件下與這個資產階級一起行動的路綫是完全正確的。

結果是反對派背棄了自己的舊公式，宣佈了一個「新」公式：和中國資產階級一起行動是必要的，共產黨人不應當退出國民黨（一九二七年四月）。

這是對反對派的第一個懲罰，他們所以遭受懲罰，是由於他們不願顧到中國革命的民族特點。

反對派聽說北京政府和帝國主義各國的代表在中國關稅自主的問題上發生了爭吵。反對派知道

關稅自主首先是中國資本家所需要的，由此便得出一個現成的公式：中國革命是民族的、反帝國主義的，因為它的主要目的是爭取中國關稅自主。

但是反對派忘記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力量主要不在於限制中國的關稅，而在於它在中國擁有從數萬萬中國工人和農民身上吸吮血液的工廠、礦山、鐵路、輪船、銀行和商行。

反對派忘記了中國人民所以進行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首先而且主要是由於帝國主義在中國是一種支持並鼓勵直接剝削中國人民的封建主、軍閥、資本家、官僚等等的力量，是由於中國工人和農民不同時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便不能戰勝自己的這些剝削者。

反對派忘記正是這種情況才是使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有可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極重要的因素之一。

反對派忘記誰宣傳中國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是爭取關稅自主的革命，誰就會否認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有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因為他把中國革命交給中國資產階級去領導了。

的確，後來的事實也證明關稅自主實質上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政綱，因為甚至連張作霖和蔣介石那樣的反動頭子現在都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建立中國的關稅自主了。

由此便產生了反對派的兩重性，他們企圖擺脫自己的關稅自主公式，企圖悄悄地放棄這個公式，而轉向共產國際關於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可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立場。

這是對反對派的第二個懲罰，他們所以遭受懲罰，是由於他們不願認真地研究中國革命的民族

特點。

反對派聽說商人資產階級滲入了中國農村，把土地租給無產的農民。反對派知道商人不是封建主，由此便得出一個現成的公式：封建殘餘，也就是說，農民反封建殘餘的鬥爭，在中國革命中沒有重大的意義，現時在中國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中國關稅受帝國主義國家控制的問題。

但是反對派看不見中國經濟的特色不是商人資本滲入農村，而是在封建的中世紀的剝削和壓迫農民的方法依然保存的條件下，中國農村封建殘餘的統治是和商人資本的存在相結合的。

反對派不懂得，中國現在那種慘無人道地掠奪並壓迫中國農民的整個軍事官僚機器，本質上就是農村封建殘餘和封建剝削方法的統治與商人資本的這種結合上面的政治上層建築。

的確，後來的事實也表明在中國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這個革命首先而且主要是反對中國的大小封建主。

事實表明這一革命已席卷幾千萬農民並有擴展到全中國的趨勢。

事實表明，封建主，實在的活的封建主，在中國不僅存在着，而且在好多省份裏掌握政權，使軍隊中的指揮人員服從他們的意志，使國民黨的領導受他們的影響，接二連三地給中國革命以打擊。

在此以後還否認封建殘餘和封建剝削制度是中國農村壓迫的基本形式，在此以後還不承認土地革命是目前中國革命運動的基本事實，這就是反對彰明較著的事實。

由此反對派便放棄了自己關於封建殘餘和土地革命問題的舊公式，由此反對派便企圖偷偷放棄

自己的舊公式並默認共產國際的立場是正確的。

這就是對反對派的第三個懲罰，他們所以遭受懲罰，是由於他們不願顧及中國經濟的民族特點。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公式和現實間的不協調，——這就是反對派可憐的領導者的命運。

而這種不協調是反對派違背一定要估計到每個國家革命運動中民族特殊的和民族獨有的東西這一列寧主義著名策略原則的直接結果。

請看列寧是怎樣論述這個原則的：

「現在全部問題就是要使每個國家的共產黨人十分自覺地認清同機會主義和「左的」教條主義作鬥爭的基本的原則的任務，並且十分自覺地估計到這種鬥爭因每個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民族成分（如愛爾蘭等）、殖民地、宗教派別等等的特徵而具有的並且必然具有的具體特點。現在對第二國際的不滿到處都感覺得到，並且在擴大和增長，這種不滿是由於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由於它不善於或不能夠創立一個真正集中的、真正領導的中心，這個中心能够在革命無產階級爲建立全世界蘇維埃共和國的鬥爭中指導革命無產階級的國際策略。必須認識清楚，這樣的領導中心無論如何不能建立在鬥爭策略規則的千篇一律、死板劃一、彼此雷同上面。只要各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民族間和各國間的民族差別和國家差別還存在（這些差別甚至在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以後也還要保持很久很久），那末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的國際策略的統一所要求的不是消除多樣性，不是消滅民族差別（這在目前是可笑的幻想），而是在運用共產主義基本原則（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時，把這些原則在細節上加以正確的變更，使這些原則正確地適應並且適用於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差別。在每個國家爲解決統一的國際任務、爲戰勝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和左的教條主義、爲推翻資產階級、爲建立蘇維埃共和國和無產階級專政而採取具體辦法的時候，要調查、研究、找出、看透、抓住民族特殊的東西和民族獨有的東西<sup>⊖</sup>，——這便是一切先進國家（而且不僅是先進國家）在目前歷史階段上的主要任務。」（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一頁至第七十二頁）

共產國際的路綫就是一定要顧到這個列寧主義策略原則的路綫。

相反地，反對派的路綫就是違背這個策略原則的路綫。

這種違背也就是反對派在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問題上倒羈的根源。

現在來談第二個列寧主義策略原則。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從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中產生了無產階級在爭取革命勝利的鬥爭中的同盟者的問題。

無產階級的同盟者的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之一。在中國無產階級面前站着強大的敵人：大小封建主，新舊軍閥的軍事官僚機器，反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以及掌握中國經濟生活命脈並用海陸軍來鞏固自己剝削中國人民的權利的東方和西方的帝國主義者。

爲了擊破這些強大的敵人，除其他一切而外，還必須有無產階級的靈活的和考慮周到的政策，必須善於利用敵人陣營裏的每一裂痕，善於給自己找尋同盟者，即使這些同盟者是動搖的、不穩定的同盟者，只要他們是人數衆多的同盟者，只要他們不限制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的宣傳和鼓動，不限制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工人階級和勞動羣衆的工作。

這種政策是第二個列寧主義策略原則的基本要求。沒有這種政策，無產階級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反對派認爲這種政策是不正確的，非列寧主義的。但這只是說明他們把列寧主義丟得乾乾淨淨了，他們離開列寧主義是這樣遠，就像天地相隔一樣。

中國無產階級在不久以前有過這種同盟者嗎？  
是的，有過。

在革命的第一階段上，革命是全民族聯合戰綫的革命（廣州時期），這時無產階級的同盟者是農民、城市貧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

中國革命運動的特點之一，在於這些階級的代表是和共產黨人一起在一個叫做國民黨的資產階

級革命組織內共同進行工作的。

這些同盟者不是也不能是同樣可靠的。他們中間有些是比較可靠的同盟者（農民、城市貧民）；有些是不大可靠的和動搖的同盟者（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些則是完全不可靠的同盟者（民族資產階級）。

國民黨當時不容爭辯地是人數比較衆多的組織。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的政策是孤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右派），爲了革命的利益而利用他們，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左派）推向左邊，把農民和城市貧民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

當時廣州是不是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呢？無疑地是的。現在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才會否認這一點。這一時期共產黨人的成就是什麼呢？擴大了革命地區，廣州軍隊到達了長江；有了公開組織無產階級的可能（工會、罷工委員會）；共產主義小組結成了政黨；成立了第一批農民組織的基層組織（農民協會）；共產黨人滲入了軍隊。

可見這一時期共產國際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

在革命的第二階段上，蔣介石和民族資產階級轉到了反革命陣營，革命運動的中心由廣州移到了武漢，這時無產階級的同盟者是農民、城市貧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民族資產階級退到反革命陣營的原因是什麼呢？第一是民族資產階級對工人革命運動規模的恐懼，第二是帝國主義者在上海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壓力。

這樣，革命便失去了民族資產階級。這對革命是局部的損失。但革命却進入發展的更高階段，進入土地革命階段，使廣大農民羣衆更靠近了自己。這對革命是有利的。

當時，在革命的第二階段上，國民黨是不是人數衆多的組織呢？無疑地是的。它不容爭辯地是一個比廣州時期的國民黨人數更加衆多的組織。

當時武漢是不是革命運動的中心呢？無疑地是的。現在只有瞎子才會否認這一點。否則武漢地區（湖北、湖南）當時就不會成爲共產黨所領導的土地革命最發展的根據地了。

當時共產黨人對國民黨的政策是把它推向左邊，把它變成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核心。

當時有沒有這種轉變的可能呢？是的，是有的。無論如何沒有理由認爲沒有這種可能。當時我們直截了當地說，要把武漢國民黨變爲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核心，至少須有兩個條件：國民黨的徹底民主化和國民黨對土地革命的直接贊助。假使共產黨人放棄實行這種轉變的企圖，那就太愚蠢了。

這個時期共產黨人的成就是什麼呢？

共產黨在這一時期從五六千人的小黨成長爲有五六萬黨員的羣衆性的大黨。

工會成長爲巨大的全國性的團體，約有會員三百萬。

農民基層組織成長爲擁有幾千萬人的巨大的團體。農民的運動發展到宏大的規模，在中國

革命運動中佔了中心地位。共產黨爭得了公開組織革命的可能。共產黨成了土地革命的領導者。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開始由願望變成事實。

誠然，中國共產黨不善於利用這一時期的一切可能。誠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這一時期犯了一系列的極大的錯誤。但是以爲中國共產黨能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一下子就成爲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黨，那就可笑了。只要把我們黨經歷過的一系列的分裂、脫離、變節、叛賣等等歷史回憶一下，就能明白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黨並不是一下子就能產生出來的。

由此可見，這一時期共產國際的領導也是完全正確的。

現在中國無產階級有沒有同盟者呢？

是的，是有的。

這些同盟者就是農民和城市貧民。

現時的特徵是武漢國民黨領導集團轉入了反革命陣營，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脫離了革命。

這一脫離的原因，第一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日益發展的土地革命的恐懼和封建主對武漢領導集團的壓力，第二是帝國主義者在天津地區施壓力，要求國民黨和共產黨人分裂，作爲容許北進的代價。

反對派懷疑在中國有封建殘餘存在。但是現在誰都明白，封建殘餘在中國不僅存在着，而且它甚至比目前革命的進攻力量還要強大。正因爲帝國主義者和封建主在中國暫時還較強大，所以革命遭

到了暫時的失敗。

革命在這次失去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這也正是革命暫時失敗的標誌。

但是革命却把廣大農民和城市貧民羣衆更緊密地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從而奠定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基礎。

對於革命的好處就在這裏。

反對派說革命的暫時失敗是由於共產國際的政策。可是只有背棄馬克思主義的人才會這樣說。只有背棄馬克思主義的人才會要求正確的政策永遠而且一定導致對敵人的直接勝利。

布爾什維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政策是否正確呢？是的，是正確的。既然有蘇維埃的存在，既然有布爾什維克的正確政策，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爲什麼還遭到失敗呢？因爲封建殘餘和專制政體當時比工人的革命運動要強大些。

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的政策是否正確呢？是的，是正確的。既然有蘇維埃的存在（蘇維埃當時背叛了布爾什維克），既然有布爾什維克的正確政策，布爾什維克當時爲什麼還遭到失敗呢？因爲俄國帝國主義當時比工人的革命運動要強大些。

正確的政策並不永遠而且一定導致對敵人的直接勝利。要直接戰勝敵人，不僅決定於正確的政策，而且首先和主要決定於階級力量的對比，決定於革命力量的顯著優勢，決定於敵人陣營的瓦解，

決定於有利的國際形勢。

只有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的正确政策才能導致直接的勝利。

但有一個必不可少的是正當的政策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都應當予以滿足的。這個要求就是黨的政策要提高無產階級的戰鬥力，加強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的聯系，提高無產階級在這些羣衆中間的威信，把無產階級變爲革命的領導者。

能否斷言過去一個時期爲中國革命的直接勝利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呢？顯然是不能的。能否斷言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沒有提高無產階級的戰鬥力，沒有加強無產階級和廣大羣衆的聯系，沒有提高無產階級在這些羣衆中間的威信呢？顯然是不能的。

只有瞎子才看不見：中國無產階級在這個時期內使廣大農民羣衆離開了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把他們團結在自己的旗幟周圍了。

共產黨在革命的第一階段和廣州民族資產階級結成聯盟，是爲了擴大革命地區，形成羣衆性的黨，使自己有公開組織無產階級的可能，並給自己開闢一條接近農民的道路。

共產黨在革命的第二階段和武漢國民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結成聯盟，是爲了增強自己的力量，擴大無產階級組織，使廣大農民羣衆脫離國民黨的領導，爲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創造條件。

民族資產階級跑進了反革命陣營，和廣大人民羣衆失去了聯系。

武漢國民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被土地革命嚇倒，在千百萬農民羣衆心目中信譽掃地，跟着民

族資產階級走了。

但是千百萬農民羣衆却因此更緊密地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認爲無產階級是自己唯一可靠的領袖和領導者了。

只有正確的政策才能導致這樣的結果，這難道不明白嗎？

只有這種政策才能提高無產階級的戰鬥力，這難道不明白嗎？

除了我們的反對派中的可憐的領導者以外，誰能否認這種政策的正確性和革命性呢？

反對派斷言：武漢國民黨領導集團之轉到反革命方面，說明在革命的第二階段和武漢國民黨聯盟的政策是不正確的。

但是，只有忘記了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並把列寧主義丟得乾乾淨淨的人才會這樣說。

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後，直到一九一八年春，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革命聯盟的政策是否正確呢？我想，還沒有人敢於否認這個聯盟的正確性。這個聯盟的結局如何呢？結局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舉行反蘇維埃政權的暴動。能否根據這點就斷言和社會革命黨人聯盟的政策是不正確的呢？顯然是不能的。

在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和武漢國民黨的革命聯盟的政策是否正確呢？我想，還沒有人敢於否認這種聯盟在革命第二階段時期的正確性。反對派自己當時（一九二七年四月）也斷言這種聯盟是正確的。現在，在武漢國民黨領導集團脫離革命之後，怎能根據這種脫離就斷言和武漢國民黨的革命聯盟



是不正確的呢？

只有不堅定的人才會搬弄這樣的「論據」，這難道不明白嗎？

難道有人斷言過和武漢國民黨的聯盟是永無止期的聯盟嗎？難道天地間有永無止期的聯盟嗎？反對派簡直絲毫不懂得第二個列寧主義策略原則，即無產階級要與非無產者的階級和集團結成革命聯盟的原則，這難道不明白嗎？

請看列寧是怎樣論述這個策略原則的：

「要能戰勝較強大的敵人，就只有用最大的力量，同時一定要最仔細地、小心地、謹慎地、巧妙地利用敵人中間任何的即使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之間、各國內部各種各樣資產階級之間的任何利害衝突，並且利用任何的即使是最小的機會以獲得人數衆多的同盟者，儘管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同盟者。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絲毫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絲毫不懂得一般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誰要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在相當複雜的政治情況中，沒有在實踐上證明自己真正善於應用這個真理，那他就還沒有學會幫助革命階級去進行鬥爭，把全體勞動人類從剝削者的壓榨下解放出來。上述一切，對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和以後的時期都一樣。」（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

○ 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反對派的路綫是違背這個列寧主義策略原則的路綫，這難道不明白嗎？

相反地，共產國際的路綫是一定要顧到這個策略原則的路綫，這難道不明白嗎？

現在來談第三個列寧主義策略原則。

這個策略原則所涉及的是更換口號、更換口號的程序和方法問題。它所涉及的問題是用什麼方法把黨的口號變成羣衆的口號，怎樣和用什麼方法把羣衆引導到革命的立場上來，使羣衆自己根據親身的政治經驗深信黨的口號的正確性。

要說服羣衆，單靠宣傳和鼓動是不行的。爲此必須有羣衆自身的政治經驗。爲此必須使廣大羣衆親身體驗到推翻現存制度的不可避免性，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不可避免性。

先進集團、政黨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已經深信，譬如說，推翻米留可夫——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的不可避免性，這是好的。然而單是這一點還不足以推翻這個政府，還不足以把推翻臨時政府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提出來作爲當前的口號。爲了把「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公式從最近將來的前途變成當前的口號，變成直接行動的口號，還必須有一個決定性的條件，就是使羣衆自己深信這個口號的正確性並給黨以某種支持來實現這個口號。

必須把作爲最近將來的前途的公式和作爲當前口號的公式嚴格地區別開來。以巴格達齊也夫爲

首的彼得堡布爾什維克集團，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正是在這一點上碰了釘子，那時他們過早地提出了「打倒臨時政府，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當時列寧把巴格達齊也夫集團的這種企圖看成是危險的冒險主義，當衆斥責了它〔六五〕。

爲什麼呢？

因爲後方和前方的廣大勞動羣衆還沒有決心接受這個口號。因爲這個集團把作爲前途的「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公式和作爲當前口號的「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混淆起來了。因爲這個集團冒進，使黨有脫離當時還相信臨時政府的革命性的廣大羣衆和蘇維埃而完全孤立的危險。

中國共產黨人應不應當，譬如說，在半年以前提出「打倒武漢國民黨領導集團」的口號呢？不，不應當提出。

不應當提出，因爲這是危險的冒進，這會妨礙共產黨人去接近那些還相信國民黨領導集團的廣大勞動羣衆，這會使共產黨脫離廣大農民羣衆而孤立起來。

不應當提出，因爲武漢國民黨領導集團、武漢國民黨中央還沒有把它作爲資產階級革命政府的作用發揮淨盡，還沒有因它反對土地革命、因它反對工人階級、因它轉到反革命方面而在廣大勞動羣衆的心目中大丟其臉，信譽掃地。

我們總是說：只要武漢國民黨領導集團還沒有把它作爲資產階級革命政府的作用發揮淨盡，就不能採取使它信譽掃地和更換它的方針，必須讓它先把自己的作用發揮淨盡，然後才在實踐上提出

更換它的問題。

現在中國共產黨人應不應當提出「打倒武漢國民黨領導集團」的口號呢？是的，應當，完全應當。

現在國民黨領導集團已因它反對革命而大丟其臉，使自己和廣大工農羣衆處於敵對地位，這個口號一定會在人民羣衆中間獲得有力的響應。

現在每個工人和每個農民都會懂得，共產黨人退出武漢政府和武漢國民黨中央而提出「打倒武漢國民黨領導集團」的口號是做得正確的。

因為現在擺在農民和工人羣衆面前讓他們選擇的是這樣一個問題：或者是國民黨現在的領導集團，那末就要拒絕滿足農民和工人羣衆的迫切需要，就要放棄土地革命；或者是土地革命和根本改善工人階級狀況，那末更換武漢國民黨領導集團就成爲羣衆的當前口號了。

第三個列寧主義策略原則的要求就是如此，這個原則是有關更換口號的問題，是把廣大羣衆引導到新的革命立場上的方法和途徑的問題，是以自己的政策、自己的行動、適時地以另一些口號代替這一些口號來幫助廣大勞動羣衆根據親身的經驗認識黨的路綫的正確性的問題。

請看列寧是怎樣論述這個策略原則的：

「單靠先鋒隊是不能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站在直接援助先鋒隊的立場上，或者沒有站在至少對先鋒隊嚴守善意的中立而對其敵人完全不予支持的立場上的時候，單

把先鋒隊投入決戰，這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罪惡。而要真正使整個階級、真正使廣大的勞動羣衆和被資本壓迫的羣衆都站到這個立場上來，要做到這一點，單靠宣傳鼓動是不夠的。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有這些羣衆親身的政治經驗。這是所有的大革命的基本規律，這個規律現在不僅被俄國而且被德國十分有力地 and 明顯地證實了。不僅文化水平低的和多半是不識字的俄國的羣衆，就連文化程度高的和個個識字的德國的羣衆，也必須親身體驗到第二國際騎士們的政府真是軟弱無力、毫無氣節、束手無策、向資產階級獻媚、卑鄙醜態，親身體驗到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就必不可免地是極端反動派（俄國的科爾尼洛夫，德國的卡普<sup>④</sup>及其同夥）的專政，然後才會堅決地轉向共產主義。國際工人運動中覺悟的先鋒隊，即共產黨、共產主義集團、共產主義派別，其當前任務就是要善於把廣大的（現在大半還是酣睡、消沉、守舊、因循而沒有醒悟的）羣衆引導到這種新的立場上，確切一點說，就是不僅要善於領導自己的黨，而且要在這些羣衆走近新的立場、轉到新的立場的時候，善於領導這些羣衆。」（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七十三頁）

反對派的基本錯誤在於他們不了解這個列寧主義策略原則的意義和作用，他們不承認這個策略原則，他們一貫地破壞這個策略原則。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他們（托洛茨基分子）在一九一七年初就破壞了這個策略原則，企圖「跳過」還沒有完成的土地運動（這是列寧的看法）。

他們（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破壞了這個策略原則，企圖「跳過」工會的反動性，不承認共產黨人在反動工會中工作是適當的，否認和這種工會結成臨時聯盟的必要性。

他們（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拉狄克）破壞了這個策略原則，企圖「跳過」中國革命運動的民族特點（國民黨），「跳過」中國人民羣衆的落後性，於一九二六年四月要求共產黨人立刻退出國民黨，而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國民黨發展階段還沒有完結沒有終了的情況下又提出立即組織蘇維埃的口號。

反對派以爲既然他們了解了，認清了國民黨領導集團的不徹底、動搖、不可靠，既然他們認清了與國民黨的聯盟是暫時的和有條件的（而每個有經驗的政治工作人員都不難認清這一點），那末，這就完全足以展開反國民黨、反國民黨政權的「堅決行動」了，就完全足以使羣衆、使廣大工農羣衆「立即」支持「我們」和「我們的」「堅決行動」了。

反對派忘記了，在這裏，「我們的」了解還遠不足以使中國共產黨人能够率領羣衆。反對派忘記了，爲了這一點，還必須使羣衆自己根據他們親身的經驗去認清國民黨領導集團的不可靠性、反動性、反革命性。

反對派忘記了，「幹」革命的不僅是先進集團，不僅是黨，不僅是個別的即使是「高級的」「人物」，

而首先和主要的是千百萬人民羣衆。

奇怪的是反對派忘記了千百萬人民羣衆的狀況、認識和堅決行動的決心。

我們、黨和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是否知道必須推翻米留可夫—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是否知道臨時政府的存在和蘇維埃的活動不能相容，是否知道政權應當轉到蘇維埃手中呢？是的，是知道的。

以巴格達齊也夫爲首的彼得堡的著名的布爾什維克集團於一九一七年四月提出了『打倒臨時政府，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並企圖推翻臨時政府，那時候爲什麼列寧斥責這個集團是冒險主義者呢？

因爲廣大勞動羣衆、一部分工人、千百萬農民、廣大軍隊羣衆以及蘇維埃本身都還沒有決心把這個口號作爲當前的口號來接受。

因爲臨時政府以及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等小資產階級政黨，還沒有使自己的作用發揮淨盡，還沒有使自己在千百萬勞動羣衆的心目中信譽掃地。

因爲列寧知道，爲了推翻臨時政府和建立蘇維埃政權，只有無產階級先進集團即無產階級政黨的認識和覺悟是不夠的，爲了這一點，還必須使羣衆自己根據親身的經驗深信這種路線的正確性。

因爲必須經過雜亂的聯合政府，經過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月、八月各小資產階級政黨的變節和背叛，必須經過一九一七年六月前綫上可恥的進攻，經過各小資產階級政黨跟科爾尼洛夫之流和米留

可夫之流的『誠實的』聯合，經過科爾尼洛夫的暴動等等，才能使千百萬勞動羣衆深信推翻臨時政府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是不可避免的。

因爲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才能把作爲前途的蘇維埃政權口號，變成作爲當前口號的蘇維埃政權口號。

反對派的倒臺在於他們屢犯巴格達齊也夫集團當時犯過的錯誤，他們離開了列寧的道路，寧願順着巴格達齊也夫的道路『行進』。

我們、黨和列寧在參加立憲會議選舉的時候和在彼得堡召開這個會議的時候，是否知道立憲會議是和蘇維埃政權制度不相容的呢？是的，是知道的。

我們究竟爲了什麼召開這個會議呢？資產階級國會制度的敵人布爾什維克在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以後，不僅參加選舉，而且自己召開立憲會議，怎麼會有這種事情呢？這是不是『尾巴主義』，落後於事變，『抑制羣衆』，破壞『遠程射擊』策略呢？當然不是的。

布爾什維克採取這個步驟，是爲了幫助落後的人民羣衆親眼看到並確信立憲會議的無用，確信它的反動性和反革命性。只有用這種辦法才能使千百萬農民羣衆靠近自己，使自己易於解散立憲會議。

列寧關於這一點寫道：

『我們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參加了俄國資產階級國會即立憲會議的選舉。我們當時



的策略是否正確呢？……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不是比西方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人都更有理由認為國會制度在俄國是政治上過了時的嗎？當然，我們更有理由這樣認為，因為問題不在於資產階級國會是否早已存在，而在於廣大勞動羣衆對於採用蘇維埃制度和解散（或容許解散）資產階級民主國會的準備（思想上、政治上、實踐上）達到什麼程度。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俄國城市工人階級、士兵和農民，由於一系列特殊的條件，已有了極好的準備來採用蘇維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會，——這是完全不容爭辯、完全確定的歷史事實。雖然如此，但布爾什維克並沒有抵制立憲會議，而是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前和以後都參加了選舉……

由此就得出完全不容爭辯的結論：已經證明，甚至在蘇維埃共和國勝利以前幾個星期，甚至在這個勝利以後，參加資產階級民主國會，不僅對革命無產階級無害，反而會使革命無產階級易於向落後羣衆證明這種國會爲什麼應該解散，易於把這種國會解散，易於使資產階級國會制度成爲「政治上過時的東西」。（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四十一頁至第四十二頁）

布爾什維克實際上就是這樣應用第三個列寧主義策略原則的。

在中國也必須這樣應用布爾什維主義的策略，不論所指的是土地革命、國民黨或蘇維埃口號都一樣。

看來反對派以爲中國革命已經完全失敗。這當然是不對的。中國革命遭到了暫時的失敗，這是沒有疑問的。但這是怎樣的失敗，是多大的失敗，——現在的問題就在這裏。

可能這是近乎長期的失敗，像俄國一九〇五年發生過的那樣，革命中斷了整整十二年，然後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新的力量爆發起來，推翻專制政體，爲新的蘇維埃的革命掃清道路。

不能認爲這個前途是沒有的。這還不是革命的完全的失敗，正像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失敗不能認爲是徹底的失敗一樣。這不是完全的失敗，因爲當前發展階段上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土地革命，中國的革命的統一，從帝國主義羈絆下得到解放）還待解決。如果這個前途成爲現實，當然在中國也談不上立即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因爲只有在革命高漲的環境中蘇維埃才能成立和興盛起來。

但是，恐怕不能認爲這個前途是可能的。無論如何暫時還沒有根據認爲這個前途是可能的。沒有根據，是因爲反革命還沒有聯合起來，也不會很快聯合起來，如果一般說來它有一天會聯合起來的話。

因爲新舊軍閥之間的戰爭正以新的力量爆發起來，這個戰爭不能不削弱反革命的力量，同時不能不使農民破產和更加怨恨。

因爲在中國還沒有一個集團或政府能够實行類似斯托雷平的改革來作爲統治集團的避雷針。

因爲已經奪得地主土地的千百萬農民是不容易抑制和壓倒在地上的。

中國革命的失敗，就其程度說來，可能類似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遭到的失敗，那時候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的蘇維埃背叛了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不得不轉入地下，經過了幾個月，革命又重新走上街頭，來掃除俄國的帝國主義政府了。

當然，這裏的比擬是有條件的。我作這個比擬是附有一切保留條件的，如果注意到當前中國的形勢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國的差別，那就會看出這一切保留條件都是必要的。我採用這種比擬僅僅是爲了大略地描繪出中國革命失敗的程度。

我想這個前途的可能性較大。如果這個前途成爲現實，如果在最近時期（不一定是經過兩個月，也許經過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漲成爲事實，那末，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的問題就會提到日程上來，成爲當前口號，以與資產階級政府相對立。

爲什麼呢？

因爲在當前革命發展階段上，在新的革命高漲條件下，成立蘇維埃將是一個完全成熟的問題。

昨天，在幾個月以前，中國共產黨人不應當提出成立蘇維埃的口號，因爲這會是我黨的反對派所特有的冒險主義，因爲國民黨領導集團還沒有作爲革命的敵人而使自己信譽掃地。

現在，相反地，成立蘇維埃的口號可以成爲真正革命的口號，如果（如果！）在最近時期將有一個新的和強大的革命高漲的話。

因此，現在，在高漲沒有到來以前，除了爭取以革命的領導代替目前的國民黨的領導之外，還應

當在廣大勞動羣衆中間極廣泛地宣傳擁護建立蘇維埃的思想，不要冒進，不要立即成立蘇維埃，要記住只有在強大的革命高漲的條件下蘇維埃才能興盛起來。

反對派可以說，他們是『頭一個』說這話的人，這就是他們叫做『遠程射擊』的策略。

不對，最親愛的，完全不對！這不是『遠程射擊』的策略，而是徘徊歧路的策略，不是射遠了就是射近了的策略。

當反對派一九二六年四月要求共產黨人立即退出國民黨時，這就是射遠了的策略，因為後來反對派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共產黨人應當留在國民黨內。

當反對派宣稱中國革命是爭取關稅自主的革命時，這就是射近了的策略，因為後來反對派自己也不得不偷偷地拋棄了他們的公式。

當反對派一九二七年四月宣稱中國封建殘餘被誇大了，而忘記了羣衆性的土地運動的存在時，這就是射近了的策略，因為後來反對派自己也不得不默認了自己的錯誤。

當反對派一九二七年四月提出立即成立蘇維埃的口號時，這就是射遠了的策略，因為當時反對派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他們陣營內部的矛盾，其中一個（托洛茨基）要求採取推翻武漢政府的方針，而另一個（季諾維也夫）相反地要求『用一切辦法幫助』這個武漢政府。

但是，從什麼時候起在我們中間開始把這種徘徊歧路的策略，不是射遠了的就是射近了的策略，稱爲『遠程射擊』的策略呢？

關於蘇維埃必須說，共產國際早就先於反對派而在自己的文件中談到了中國的蘇維埃這一前途。至於反對派在今年春天爲了對抗革命的國民黨（國民黨在當時是革命的，否則季諾維也夫就用不着喊叫『用一切辦法幫助』國民黨了）而把蘇維埃作爲當前口號提出來，這就是冒險，就是亂叫亂嚷的冒進，就是巴格達齊也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所犯的那種冒險和那種冒進。

雖然蘇維埃口號在中國最近的將來可能成爲當前口號，但是還遠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反對派在今年春天提出蘇維埃口號不是危險的和有害的冒險行爲。

同樣的，雖然『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曾於一九一七年九月被列寧認爲是必要的和切合時宜的口號（見中央關於起義的有名的決定）<sup>（二）</sup>，但還遠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巴格達齊也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提出這個口號不是有害的和危險的冒險行爲。

巴格達齊也夫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可以講他是『頭一個』說到，還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說到蘇維埃政權的人。這是不是說，巴格達齊也夫是對的，而列寧把他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的言論斥責爲冒險主義就是不對的呢？

看來我們的反對派對巴格達齊也夫的『桂冠』總是羨慕不已。

反對派不懂得，問題並不在於『頭一個』說話，從而冒進和攪亂革命事業，而在於及時地說話，並且要使所說的話爲羣衆所響應而變成行動。

事實就是如此。

反對派離開了列寧主義的策略，其政策是「過左的」冒險主義，——總結就是如此。

載於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真理報」第一六九號

署名：約·斯大林

- ① 阿爾柯斯是蘇聯合作社代表團於一九二〇年在倫敦設立的股份公司的簡稱。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二日該公司及蘇聯駐英國商務代表處同遭英國警察的搜查和襲擊。——譯者註。
- ② 沃依柯夫（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是蘇聯外交家，自一九二四年十月起，任蘇聯駐波蘭全權大使，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在華沙被白衛分子殺害。——譯者註。
- ③ 薩拉也沃暗殺事件係指奧國皇太子弗蘭茨·斐迪南於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薩拉也沃（波斯尼亞）被一個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刺殺而言，這次刺殺案成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帝國主義大戰開始爆發的表面原因。——譯自「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編者註。
- ④ 卡普（一八六八——一九二二）是德國一九二〇年反革命政變——「卡普盲動」的主要領導者，政變後成為政府首領，他的政府僅存在數日即被德國工人的總罷工推翻。——譯者註。



## 註 釋

(一)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十六日在莫斯科舉行。全會討論了下列幾個報告：關於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的任務的報告，關於中國問題和英國問題的報告，關於托拉斯化、合理化和由此而產生的共產黨員在工會中的任務的報告，關於聯共（布）黨內問題的報告，關於德國問題和荷蘭問題的報告。全會又審查了馬斯洛夫—路特·費舍案件、布爾德勒和塔爾蓋麥案件、蘇瓦林案件。會上成立了下列幾個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中國委員會、英國委員會、德國委員會和其他委員會。斯大林被選為全會政治委員會、中國委員會和德國委員會的委員。全會在討論斯大林「關於聯共（布）黨內問題」的報告以後，斥責聯共（布）黨內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聯盟是一個在政綱上滾到孟什維克立場上去的分裂主義者的聯盟。全會責成共產國際各個支部進行堅決的鬥爭，以反對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及其在各國共產黨內的門徒破壞共產國際和全世界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的領導者——列寧黨隊伍的思想統一和組織統一的一切企圖。全會批准了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關於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聯盟」的決議，並決定把它作為自己的決議附在全會決議的後面。斯大林「關於聯共（布）黨內問題」的報告和關於這個報告的結論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印成單行本，題為「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正文第三頁）。

(二) 反社會主義者特別法是俾斯麥政府於一八七八年在德國實施的。這個法令取締了社會民主黨的一切組織、羣衆性的工人組織和工人報刊。根據這個法令，社會主義的書籍被沒收，社會民主黨人遭到迫害。德國社會民主黨被迫轉入秘密狀態。一八九〇年，在羣衆性的工人運動的壓力下，該法令才被廢除。——（正文第九頁）。

(三) 「社會民主黨人報」(Der Sozialdemokrat) 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秘密機關報，於一八七九年九月創刊，一八九〇年九月停刊，最初在蘇黎世(瑞士)，自一八八八年十月起移至倫敦。——（正文第九頁）。



〔四〕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一九四七年俄文版第三五八頁至第三五九頁。——（正文第十七頁）。

〔五〕指俄共（布）黨內白稱爲「民主集中主義」集團的反黨集團。這個集團成立於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由薩普龍諾夫和奧新斯基領導。「民主集中派」否認黨在蘇維埃中的領導作用，在工業方面反對實行一長制和廠長個人負責制，在組織問題上反對列寧的路綫，他們要求讓派別和小集團在黨內自由活動。黨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會堅決地斥責了民集派。一九二七年，「民主集中派」集團和托洛茨基反對派的積極分子一起被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開除出黨。——（正文第十三頁）。

〔六〕「工人反對派」是俄共（布）黨內的無政府工團主義反黨集團，由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維捷夫等領導。這個集團於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形成，它反對黨的列寧路綫。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斥責了「工人反對派」，認爲宣傳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的思想和共產黨的黨籍是不相容的。被擊潰了的「工人反對派」的殘餘後來和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勾結起來，成爲黨和蘇維埃政權的敵人並被粉碎了。——（正文第十三頁）。

〔七〕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於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在莫斯科舉行。大會討論了「關於蘇聯經濟狀況和俄共（布）黨內的爭論」問題，一致支持布爾什維克黨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大會批准了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所批准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關於黨內爭論總結和小資產階級傾向」的決議，並決定把它作爲大會的決議予以公佈。——（正文第十四頁）。

〔八〕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會議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三日舉行。「論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聯盟」提綱是斯大林同志受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委託而寫的。十一月三日代表會議一致通過該提綱爲代表會議的決議。同日該決議爲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批准（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二一四頁至第二三三頁）。——（正文第十六頁）。

〔九〕總委員會是英國工聯代表大會的執行機關，於一九二一年第一次被選出。——（正文第十八頁）。

〔一〇〕指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關於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全會的決議而產生的任務」的決議（見「聯共（布）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四一年版卷下第二十五頁至第三十一頁）。——（正文第二十三頁）。

(二)「社會民主黨人報」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秘密的中央機關報，於一九〇八年二月創刊，一九一七年一月停刊，共出五十八號。創刊號在俄國出版，後來移至國外出版，最初在巴黎，以後在日內瓦。根據俄國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的決定，「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由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的代表組成。列寧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部內為徹底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綫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使孟什維克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的代表退出了編輯部。自一九一一年十二月起，「社會民主黨人報」由列寧主編。該報曾刊載斯大林的許多文章。列寧的「論歐洲聯邦口號」一文刊載在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社會民主黨人報」第四十四號上（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〇八頁至第三一一頁）。——（正文第二十七頁）。

(三)「我們的言論報」是孟什維克——托洛茨基的報紙，於一九一五年一月至一九一六年九月在巴黎出版。——（正文第二十八頁）。

(四)見列寧「論糧食稅」（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八頁至第三四三頁）。——（正文第三十頁）。

(五)見斯大林「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二三四頁至第二九七頁）。——（正文第三十五頁）。

(六)指一九二六年五月三日至十二日英國工人舉行的總罷工。參加罷工的有最重要的工業部門和運輸部門的五百多萬有組織的工人。關於罷工的發生和失敗的原因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八卷第一五五頁至第一六八頁。——（正文第四十二頁）。

(七)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三〇〇頁至第三〇二頁。——（正文第四十三頁）。

(八)維丁派是德國共產黨「極左派」之一，存在於柏林市內西北部的維丁區黨組織內。「維丁反對派」的領導人和聯共（布）黨內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聯盟是互相勾結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堅決地斥責了「維丁反對派」，要求它完全停止派別活動，和被開除出德國共產黨的、仇視德共的分子斷絕一切關係，無條件地服從德共和共產國際的決議。——（正文第四十六頁）。

(九)「最近新聞報」（日刊）是米留可夫反革命資產階級政黨的中央機關報，於一九二〇年四月至一九四〇年七月在巴黎出版。——（正文第五十頁）。

(二五) 見列寧「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三頁至第七頁)。——(正文第五十九頁)。

(二六) 齊美爾瓦爾得左派是左派國際主義者集團，於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九月五日至八日)在齊美爾瓦爾得(瑞士)舉行的國際主義者第一次國際代表會議上由列寧組成。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在齊美爾瓦爾得左派集團中採取了唯一正確的始終一貫的反戰立場。關於齊美爾瓦爾得左派，見「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一九四九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〇六頁。——(正文第六十頁)。

(二七) 路標轉換派分子是一九二一年在流亡國外的俄國資產階級中間產生的一個資產階級政派的信徒，該派以「路標轉換」雜誌得名。路標轉換派思想是蘇俄新興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觀點的反映，他們由於新經濟政策的實行而放棄了對蘇維埃政權的公開武裝鬥爭，指望蘇維埃制度逐漸蜕化為普通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烏斯特里雅洛夫是路標轉換派思想的代表人物。——(正文第六十三頁)。

(二八) 涅恰也夫主義是陰謀手段和恐怖主義的策略，以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分子涅恰也夫的名字得名。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涅恰也夫在俄國建立了一個和羣衆隔絕的、狹隘的陰謀組織，該組織的成員的意志和意見完全受到壓制。——(正文第七十二頁)。

(二九) 阿拉克切也夫制度是十九世紀前二十五年在俄國施行的無限制的警察獨裁制度，軍閥專橫和對人民實行暴力的制度，以反動政客阿拉克切也夫伯爵的名字得名。——(正文第七十二頁)。

(三〇)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一年俄文版第八卷第七十一頁。——(正文第七十八頁)。

(三一)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一年俄文版第二十二卷第三六二頁。——(正文第七十八頁)。

(三二) 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附錄一九三九年俄文版第七十五頁至第九十七頁。——(正文第八十一頁)。

(三三)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〇年俄文版第七卷第一〇三頁。——(正文第八十七頁)。

(三四)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卷第一頁至第五三五頁。——(正文第九十五頁)。

(三五)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五三頁至第四六二頁。——(正文第一〇二頁)。

(三六) 見「聯共(布)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四一年版卷下第二十五頁至第三十一頁。——(正文

第二一頁。

〔三〕指「論糧食稅」小冊子的計劃和提要（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二九九頁至第三〇七頁）。——（正文第一一四頁）。

〔三〕見「聯共（布）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四一年版卷上第二八一頁至第二九五頁。——（正文第一一七頁）。

〔三〕指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會議根據斯大林「關於黨的建設的當前任務」的報告通過的「關於黨內爭論總結和小資產階級傾向」的決議（見「聯共（布）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一九四一年版卷上第五四〇頁至第五四五頁）。——（正文第一二九頁）。

〔四〕斯大林「論列寧和列寧主義」一書於一九二四年五月出版。該書包括兩篇著作：「論列寧。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克列姆里軍校學員晚會上的演說」和「論列寧主義基礎。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講演」（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五十二頁至第六十四頁，第六十九頁至第一八八頁）。——（正文第一三七頁）。

〔五〕聯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代表會議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八日至十五日舉行。代表會議討論了蘇聯的國內外形勢問題，關於中央監察委員會——工農檢查院的當前任務的報告，聯共（布）莫斯科省委的總結報告以及其他問題。斯大林在代表會議一月十四日的晚間會議上發表了演說。代表會議贊成聯共（布）列寧中央的政策。——（正文第一三九頁）。

〔六〕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二七一頁至第二七六頁。——（正文第一四二頁）。

〔七〕「鬥爭報」於一九一七年五月作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察里津委員會的機關報出版，自一九一七年底起作為察里津工兵農和哥薩克代表蘇維埃的機關報出版。察里津改名為斯大林格勒後，該報是斯大林格勒省和市的黨組織與蘇維埃組織的機關報。「鬥爭報」終刊號第五十八號（總第四六七〇號）於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出版。——（正文第一五三頁）。

〔八〕指斯大林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所做「論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當前任務」的報告（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三十三頁至第四四頁）。——（正文第一六一頁）。

〔九〕指斯大林為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寫的「論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當前任務」的提綱（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十五頁至第二十九頁）。——（正文第一六一頁）。

〔四〇〕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三十四頁。——（正文第一六二頁）。

〔四一〕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十五頁至第十六頁。——（正文第一六二頁）。

〔四二〕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五六頁至第二一一頁。——（正文第一六四頁）。

〔四三〕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二卷第四〇二頁至第四〇三頁和第三十三卷第二七九頁至第二八〇頁。——（正文第一七三頁）。

〔四四〕熱那亞（意大利）國際經濟會議於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至五月十九日舉行。參加會議的一方是英、法、意、日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另一方是蘇俄。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向蘇俄代表團提出了幾項要求（償還戰時和戰前的一切債務，把收歸國有的財產歸還外國產權人等等），如果實行這些要求，就等於把蘇維埃國家變為西歐資本的殖民地。蘇俄代表團拒絕了外國資本家的這些無理要求。關於熱那亞會議，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一八六頁至第二〇〇頁和第二二五頁至第二三八頁。——（正文第一七三頁）。

〔四五〕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次全國代表會議於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至三十一日在莫斯科舉行。代表會議討論了下列幾個報告：關於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的工作，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政策，關於青年參加生產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經濟工作任務，關於青年團員參加發展農業和農村合作事業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斯大林在代表會議三月二十九日的晚間會議上發表了演說。代表會議在其決議中向黨保證：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今後仍然是黨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工作方面的忠實助手。——（正文第一七五頁）。

〔四六〕聯共（布）中央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關於「生產合理化問題」的決議，發表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真理報」第六十八號上。——（正文第一七八頁）。

〔四七〕見列寧「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十八卷第一四三頁至第一四九頁）。——（正文第一八三頁）。

〔四八〕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二九三頁至第二九四頁。——（正文第一八四頁）。

〔四九〕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兩卷集一九四八年俄文版卷下第四三四頁。——（正文第一八九頁）。

〔五〇〕指一九一八年七月六日至七日在莫斯科發生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反革命叛亂，這次叛亂在數小時內即被鎮

壓下去。——（正文第一九二頁）。

〔五〕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二九頁至第一四一頁。——（正文第一九六頁）。

〔五〕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三二五頁至第三三三頁。——（正文第一九八頁）。

〔五〕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至十六日舉行的聯共（布）中央全會。這次全會討論了一系列與蘇聯和俄羅斯聯邦共和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有關的問題，決定了召開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日期。四月十三日，斯大林就全會議程問題和在討論加里寧的「蘇聯和俄羅斯聯邦共和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問題」報告時發了言。全會在討論了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的關於國際事件（中國事件及其他）的決定的通告以後，批准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國際問題的政策，堅決地駁斥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反黨政綱。——（正文第二〇七頁）。

〔五〕「農村共產黨人」（雙周刊）是供農村黨的積極分子閱讀的雜誌，是聯共（布）中央的機關刊物，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創刊，一九三〇年八月停刊。一九二七年二月以前，該雜誌的主筆是莫洛托夫。——（正文第二一一頁）。

〔五〕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一二二頁至第一二八頁和第一二五頁至第一二〇頁。——（正文第二一一頁）。

〔英〕指科倫民主協會，於一八四八年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成立。參加協會的除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外還有工人。馬克思曾被選入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亞省民主協會州委員會，並且是它的領導者之一。——（正文第二二〇頁）。

〔五〕「新萊茵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於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至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在科倫出版。該報領導人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主編是馬克思。關於「新萊茵報」，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七年俄文版第十六卷第一部第一六五頁至第一七三頁。——（正文第二二〇頁）。

〔英〕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四七頁。——（正文第二二三頁）。

〔五〕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通過的關於中國狀況的決議。該決議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的綱領和決議」一九二七年莫斯科——列寧格勒版。——（正文第二二四頁）。

〔六〕「新生活報」是孟什維克的報紙，於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八年七月在彼得格勒出版。——（正文第二四八頁）。

〔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會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至三十日在莫斯科舉行。全會討論了共產國際在反對戰爭和戰爭危險的鬥爭中的任務、英國共產黨的任務、中國革命問題等等。斯大林同志五月二十四日在全會的第十次會議上

做了「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的報告。全會對國際形勢作了估計，擬定了反對戰爭威脅的鬥爭綱領，並由於英國與蘇聯斷絕外交及商務關係，通過了宣言「告全世界工人和農民書」。告一切被壓迫人民書。告士兵和水兵書。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黨聯盟的首領們利用蘇聯國際形勢的緊張，在全會上以誹謗性的抨擊來反對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領導。全會通過特別決議尖銳地指斥了反對派首領們的分裂行動，並警告他們：如果再繼續派別鬥爭，就要把他們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開除出去。——（正文第二五七頁）。

〔六〕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宣言「告全世界無產者和農民書」。告一切被壓迫人民書。宣言發表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真理報」第八十五號上。——（正文第二五九頁）。

〔六三〕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五年俄文版第十五卷第一〇五頁至第一二四頁。——（正文第二七八頁）。

〔六四〕見斯大林「論東方人民大學的政治任務」。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七卷第一三三頁至第一五二頁。——（正文第二八三頁）。

〔六五〕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八一頁至第一八二頁。——（正文第三一四頁）。

〔六六〕列寧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從地下寄給中央委員會和布爾什維克組織的文章和信件中提出了「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把它作為組織武裝起義的直接任務（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二八八頁至第二九四頁和第二十六卷第一頁至第九頁）。當九月十五日黨中央委員會會議討論列寧的來信時，斯大林同志對要求消滅這些文件的投降主義者加米涅夫給予堅決的反擊，提議把列寧的來信散發給最大的黨組織討論。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在列寧、斯大林、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烏里茨基參加之下，舉行了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有歷史意義的會議，會上通過了列寧起草的武裝起義的決定（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一六二頁）。——（正文第三二四頁）。

## 年 表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

### 一九二六年

- 十一月二十二日至  
十二月十六日 斯大林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
- 十二月二日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會議上當選為全會德國委員會委員。
- 十二月四日 斯大林和印度共產黨的代表談話。
- 十二月七日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會議上做了關於聯共(布)黨內問題的報告。
- 十二月十三日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會議上做了關於聯共(布)黨內問題報告的結論。
- 十二月十七日 斯大林和保加利亞共產黨代表季米特洛夫、柯拉羅夫等人談話。
- 十二月十八日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
- 十二月二十二日 斯大林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的聯共(布)代表團和德國共產黨代表團的聯席會議討論和德國「極左派」作鬥爭的問題。
- 十二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被聯共(布)莫斯科紅色勃列斯尼亞區第七次代表會議選為出席聯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代表會議的首席代表。



十二月二十四日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的聯共（布）代表團代表和美國共產黨代表團代表的聯席會議上就美國共產黨黨內狀況問題發表演說。

斯大林的小冊子『再論我們黨內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上的報告和結論）出版。

十二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和莫斯科鋼筋工廠工人代表團談話。

十二月三十日

斯大林寫信給克謝諾豐托夫。

### 一九二七年

一月七日

斯大林和謝米列契耶省尤利耶夫卡村的農民代表談土地問題。

一月八日

斯大林和莫斯科索科里尼基區工人代表團談話。

一月十四日

斯大林在聯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五次代表會議上發表演說。

斯大林和波蘭共產黨代表談話。

一月二十一日

斯大林出席在莫斯科大戲院舉行的列寧逝世三周年的紀念大會。

一月二十八日

斯大林寫信給札依采夫。

一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被聯共（布）列寧格勒省第二十四次代表會議選為聯共（布）列寧格勒省委員會委員。

二月七日至十二日

斯大林領導聯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

二月二十二日

為紀念連納慘案十五周年，斯大林寫信給連納金礦的工人。

為紀念斯大林格勒『鬥爭報』十周年，斯大林向該報致賀電。

- 二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法國委員會會議上就法國共產黨策略問題發言。
- 斯大林出席在莫斯科大戲院舉行的紅軍建軍九周年慶祝大會。
- 二月二十五日  
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召集的紡織工業工作人員會議上就布爾什維克領導方法和進一步發展蘇聯紡織工業的道路問題發表演說。
- 二月二十八日  
斯大林和十月鐵路局斯大林鐵路工廠工人代表團談話。
- 三月一日  
斯大林在十月鐵路局斯大林鐵路工廠工人大會上發表演說。
- 三月七日  
斯大林在十月鐵路局斯大林鐵路工廠工人大會上當選為莫斯科蘇維埃代表。
- 斯大林寫信給茨維特柯夫和阿雷坡夫兩同志。
- 三月九日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法國委員會會議上講話。
- 三月十五日  
斯大林「論工農政府問題。答德米特利也夫」一文發表在一九二七年「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六期上。
- 三月二十日  
斯大林寫信給申凱維奇。
- 三月二十九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次全國代表會議上發表演說。
- 四月二日  
斯大林被莫斯科省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選為出席全俄蘇維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 四月五日  
斯大林在莫斯科黨組織的積極分子會議上就中國革命性質和前途問題發表演說。
- 四月八日  
斯大林被列寧格勒省蘇維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選為出席全俄蘇維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 四月九日  
斯大林寫信給邱貢諾夫。

年 表

四月十日至十六日 斯大林出席全俄蘇維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

四月十三日至十六日 斯大林領導聯共(布)中央全會的工作。

四月十三日 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全會會議上就全會議程問題和在討論加里寧的報告「蘇聯和俄羅斯聯邦共和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問題」時發言。

四月十五日 斯大林的「論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答揚斯基一文發表在一九二七年「布爾什維克」雜誌第七、八兩期合刊上。

四月十六日 斯大林被全俄蘇維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選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四月十八日至二十日 斯大林出席蘇聯蘇維埃第四次代表大會。

四月十九日至二十日 斯大林寫給宣傳員的提綱「中國革命問題」。該提綱經聯共(布)中央批准後發表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真理報」第九十號上。

四月二十六日 斯大林被蘇聯蘇維埃第四次代表大會選為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五月一日 斯大林在紅場檢閱莫斯科衛戍部隊和首都勞動人民的五一遊行隊伍。

五月五日 斯大林於「真理報」十五周年紀念日給該報寫的祝詞發表在「真理報」第九十九號上。

五月九日 斯大林寫「論中國革命的幾個問題。答馬爾秋林同志」一文。該文發表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農村共產黨人」雜誌第十期上。

五月十三日 斯大林和中山大學學生談中國革命問題。

五月二十日 斯大林寫「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答坡克羅夫斯基」一文。該

五月二十四日

文於一九二八年第一次發表在斯大林的「列寧主義問題」一書中。  
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會會議上發表關於「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的演說。

五月三十日

斯大林寫信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第四期畢業生致賀。

六月二十三日

斯大林寫信答坡克羅夫斯基。

七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

斯大林寫「時事問題簡評」一文。該文發表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真理報」第一六九號上。

年 表

三三九